

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天地翻覆

楊繼繩 著

下篇



### 楊繼繩

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學者。1966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在新華通訊社任記者、編輯35年。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五屆理事。發表新聞、通訊、評論數以千篇計。出版專著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技術貿易學》、《社會奧秘之門》、《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墓碑》等。1984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作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 天地翻覆

楊繼繩 著

下篇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  
作  
出  
版** 名 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  
者 楊繼繩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  
智群商業中心 15 字樓（總寫字樓樓）  
電話：25283671 傳真：2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1 樓（門市部）  
電話：28650708 傳真：28611541
- 印 刷** 美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室  
電話：23420109 傳真：27903614

出版日期 2016 年 12 月初版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6

ISBN 978-988-8257-54-6

# 下篇目錄

## 第一七章 清理階級隊伍

- 一、清隊的指導思想和法律依據……592
- 二、清隊的政策樣板……595
- 三、受害者以千萬計……600
- 四、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都受到打擊……608
- 五、株連眾多的重大集團冤案……616

## 第一八章「一打三反」

- 一、「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633
- 二、大批思想者被搶絕……638
- 三、無辜的受害者……655
- 四、制造全民恐怖……656
- 五、殘酷地扼殺最后的聲音……658
- 六、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659

## 第一九章 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

- 一、北京郊縣大屠殺……663
- 二、湖南道縣大屠殺……667
- 三、江西瑞金大屠殺……674
- 四、廣西大屠殺……676
- 五、云南沙甸事件……678
- 六、其它地方的大屠殺……683
- 七、集體屠殺的總體情況和根本原因……684

## 第二〇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清除劉少奇

- 一、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688
- 二、將劉少奇定為叛徒集團的頭子……694
- 三、再批「二月逆流」……707

## 第二一章「九大」：從團結到分裂的大會

- 一、高度集中的秘密會議……714
- 二、政治報告起草中的爭論……718
- 三、選舉和選票……722
- 四、微妙的「中央政治」……727
- 五、「九大」以後林彪、江青的關係……730
- 六、毛澤東對「軍事官僚專政」的憂慮……735

## 第二二章 霧鎖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 一、上山前的第一輪博弈：要不要設國家主席……743
- 二、上山前的第二輪博弈：關於「政治武器」……746
- 三、上山前的第三輪博弈：誰是林彪的接班人……750
- 四、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753
- 五、「大有炸平廬山之勢」……756
- 六、毛澤東拋出了陳伯達……763

## 第二三章 從批陳整風到林彪出逃

- 一、華北會議和改組北京軍區……774
- 二、批陳整風，毛等待林彪檢討……779
- 三、毛澤東南巡，將火直接燒向林彪……791
- 四、「小艦隊」紙上談兵……796
- 五、林彪葬身溫都爾汗……803
- 六、「9·13」事件迷團重重……811

## 第二四章 批林整風：批左還是批右？



- 一、毛澤東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822
- 二、批林整風匯報會……………S30
- 二、批判周恩來……………837
- 四、毛澤東起用鄧小平……………845
- 五、第十次黨代會和軍區司令互調……………852

## 第二十五章「批神批孔」中的鬥爭

- 一、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860
- 二、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865
- 三、批林批孔中的鬧劇……………871
- 四、李慶霖事件……………874
- 五、幾個省的批林批孔運動……………876
- 六、中央發文件限制造反派……………889
- 七、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892
- 八、批判江青一個月……………896

## 第二十六章 從全面整頓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一、鄧小平全面整頓……………908
- 二、毛澤東轉變了態度……………917
- 三、毛澤東要鄧小平肯定文革……………924
- 四、全面反擊右傾翻案風……………932
- 五、各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938
- 六、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給后代……………943

## 第二十七章「四五運動」

- 一、圍繞悼念周恩來活動的鬥爭……………950
- 二、廣場反叛的深層：思想的反叛……………958
- 三、壓制民情使抗議升級……………970
- 四、激烈沖突，強制清場……………974

## 第二八章 文革落幕

- 一、毛澤東逝世.....986
- 二、劍拔弩張.....991
- 三、十月政變.....1000

## 第二九章 文革后的大清查

- 一、揭批查運動擴大化.....1020
- 二、還是采用文革的思維和手段.....1044
- 三、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1045
- 四、清理「三種人」.....1047
- 五、清查三種人運動的雙重標準.....1052
- 六、大清查的正面作用.....1058

## 第三〇章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 一、經濟建設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1066
- 二、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1071
- 三、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1076
- 四、效益差 管理亂 科技水平低.....1080
- 五、工人、農民家徒四壁.....1082
- 六、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1086

## 第三一章 文革期間的外交

- 一、「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1092
- 二、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1098
- 三、從「兩條線」到「一條線，一大片」.....1102

## 第三二章 官僚體制下的改革開放

- 一、文革后中國的政治光譜.....1112
- 二、一股洶涌的民主浪潮.....1117

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1122
四、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1128
五、階層固化和階層沖突·····	1134
六、制衡權力 駕馭資本·····	1139
文革大事記·····	1142



## 第一七章

# 清理階級隊伍



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的一個場面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份。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sup>1</sup>清隊是用政權的暴力對所謂「階級異己分子」進行一次殘酷的清洗，受害者主要是歷次政治運動造就的「政治賤民」<sup>2</sup>和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舊人。清隊全面開展的1968年，正是毛澤東要求盡快實現「大聯合」、重建新秩序的時刻。群眾組織中出身不好的人、雖然出身好但阻礙重建秩序的人，也成了清隊的受害者。

## 一、清隊的指導思想和法律依據

1967年1月30日，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sup>3</sup>全國各單位領導人按這個批示，用階級鬥爭的眼光審視職工、審視舊社會過來的人。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必須堅持不懈地狠抓階級鬥爭。在執政者的眼裏，到處都是敵人。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對敵鬥爭」。

1968年2月9日，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到天津新港採訪，這個港口在1967年4月3日進過行了軍管。軍代表向我們介紹：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17個舊企業合起來的，經過美、英、日、國民黨統治的港口，有「中華海員特別黨」、「國民黨」、「三青團」、「興中協會」、「共濟會」等多種反動組織。解放前夕，很多壞人混進港區。劉少奇路線招降納叛，敵偽人員全部留用。1962年又把社會成份十分複雜的5千名搬運

---

<sup>1</sup>毛澤東在中共九大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11日。

<sup>2</sup>指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這些人共2千多萬（200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公佈的數據），按每人有3-4個家屬計，共有6千萬到8千萬人。

<sup>3</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9頁。

工人全部納入港口。目前還有敵偽的軍、警、憲、特、反動會道門等反動人員 1, 800 多人，佔全港口 7, 400 名職工總數的 25%，其中混入黨內的 313 人，佔現有黨員數的 19%。軍代表認為，文革中的純種。問題（派性鬥爭、港口停產等）都是階級敵人造成的。他向我們表明，對這些人要「認真查明。徹底批倒」。<sup>4</sup>其實，這些舊社會過來的人，已經受過多次清理和打擊，絕大多數不會對社會構成危害。

自 1966 年 10 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級政權癱瘓，社會秩序開始混亂。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紅衛兵，以掃「四舊」、抄家的方式入室搶劫。僅 1967 年 1 月 25 日夜裏，合肥市就發生這類搶劫案 27 起，被搶劫 37 家，受害者都以為是紅衛兵掃「四舊」，不敢反抗，不敢報案（即使報了案，也沒有人管），有 3 名省、市領人家被冒充紅衛兵的劫匪以抄家名義搶去財產 4 萬多元；一位副市長稍有微詞，被打傷住院。一時間，分不清誰是紅衛兵，誰是入室搶劫的犯罪分子。<sup>5</sup>

1967 年初，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個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中發（67）19 號）（即「公安六條」）。這個文件於 1967 年 1 月 13 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佈。這個文件認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安六條」第一條就規定：「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第二條）「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中的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

<sup>4</sup>摘自本書作者 1968 年 2 月 9 日採訪記錄。

<sup>5</sup>尹嚮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祕〉，載《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

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第四條）

第二條是以思想和言論定罪，不能「攻擊污蔑」的對象除了毛、林以外，在執行中還擴展到周恩來、江青、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第四條將專政對象擴展到 21 種人及其家屬。這是一部惡法。這部惡法成為後來清理階級隊伍的法律依據。

1967 年 11 月至 1968 年 4 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各省開展試點，1968 年 5 月，運動在全國推開。1968 年 4 月 29 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槍殺，用她的鮮血為清理階級隊伍祭旗。

1968 年春發表的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為清理階級隊伍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這條指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sup>6</sup>

1968 年 10 月，正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中，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訪華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等人說：「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所以我們不說最後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餘孽。有些人鑽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鑽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一次算是一個一個作了清理。在過去，一些工廠主要領導權掌握在這些壞人手裏」，「新華印刷廠有四朝元老，北洋軍閥時印妙票，日本人佔領時也印妙票，以後國民黨接管了這個工廠還印。解放以後幫我們共產黨印，裏面主要的人沒有動過。這次運動了他們，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有些國民黨的中將、少將搖身一變，變成工人了，甚麼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這一次黨、政、軍、民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 7 億人來說，壞人大概千分之一，這是指敵我矛盾嚴重的。廣東清除出來的包括國民黨士兵、憲兵、警察、國民黨軍官、國民黨黨

<sup>6</sup>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乘勝前進》，1968 年 5 月 1 日。



部的人、三青團、一貫道，大體清理一下，有 40 萬人。廣東省有 4 千萬人，40 萬佔 4 千萬的 1%，這 40 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憲兵、警察、黨員，不都是壞人。如果按千分之一計算，4 千萬中有 4 萬人。……大概還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階級隊伍、整黨。這樣可以保持一個時候的安寧，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說這一次搞得那麼乾淨了。<sup>7</sup>

毛澤東在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甚麼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1968 年 10 月 31 日發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發佈公報稱：「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躲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

## 二、清隊的政策樣板

1968 年 2 月 21 日，中央警衛團（8341 部隊）派出的軍管人員進入了新華印刷廠開展「對敵鬥爭」。到 5 月，就總結了一整套「對敵鬥爭的經驗」。5 月 13 日，姚文元在這個材料上寫「此件總結了清理隊伍中一些政策性問題。」呈送給毛。5 月 19 日，毛澤東在批示中指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中發〔68〕74 號）。這個文件下發後，就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中發〔68〕74 號文件特別強調要注意政策：「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放手發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

---

<sup>7</sup>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1968 年 10 月 5 日晚，人民大會堂，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版。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談到清理階級隊伍時，也一再強調政策。謝富治說：「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把廣大群眾和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區別開來，把有一般歷史問題的人同叛徒、特務區別開來，把一般性的錯誤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sup>8</sup>張春橋說：「要掌握好黨的政策，不然的話，一個個跳樓，這是不行的，不能解決問題，你們（華東）師（範）大（學）一下子搞了這麼多，人家要告你的狀來了。學生要處理好，不要打擊面過廣。」<sup>9</sup>

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和中央文件及中央領導人講話相反，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打擊面越來越大，鬥爭越來越殘酷。為甚麼出現了和毛的意願相反的效果呢？由於多年向全民灌輸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各級領導人和政治運動的骨幹分子滿眼都是階級敵人。他們覺得，抓少了是立場問題，抓多了是政策問題。寧可犯政策錯誤，不能犯立場錯誤。在極權制度下，下級為了迎合上級，總是將上級的意圖一級一級地放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凡是整人的運動都是擴大化的。此外，在兩派群眾組織還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地區和單位，為了搞垮對方，就競相在對立派中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壞人」；為了不讓對方抓辮子，各派又主動地「純潔隊伍」，在本派內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

本書作者沒有找到新華印刷廠這個樣板的真實情況的資料，我的朋友、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夏俊生提供了另一個樣板——二七機車車輛廠（原稱長辛店機車廠）的資料。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文化大革命中「六廠二校」<sup>10</sup>之一。由於「六廠二校」的「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隊」是由中央警衛團（8341 部隊）派出的，這些單位被稱為「毛主席的試點」。在 1969 年 4 月 25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說：「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比如二七廠，就是長辛店鐵路機車

<sup>8</sup>謝富治 1968 年 5 月 15 日北京市革委會上談清理階級隊伍，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

<sup>9</sup>張春橋在華東師大談清理階級隊伍，1968 年 5 月 28 日，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

<sup>10</sup>「六廠二校」：北京新華印刷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北京針織總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化工三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車輛修理廠，是一個大工廠，8千工人，連家屬幾萬人。過去國民黨有9個區分部，三青團有3個機構，另有8個甚麼特務機構。」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全市轉發了〈北京二七廠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二七機車車輛廠就成為全國「清理階級隊伍」執行政策的樣板。從當時看，二七廠的經驗是糾左的，是強調政策的。實際上，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糾正幾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卻被打成反革命，最後不戴反革命的帽子，也算執行了政策。

二七廠，這個「注意政策」的樣板單位，原來是8341部隊製造的一個假典型。文革結束以後，二七廠在「清隊」中被整錯的許多老工人喊冤叫屈，1978年7月，鐵道部派出工作組，與北京市工業交通辦公室一起，幫助二七廠落實政策。經調查核實，1969年影響全國並被毛澤東引用的這個「報告」裏的許多材料，竟然是假的。<sup>11</sup>所謂1949年前的八個特務組織，有的根本不是特務組織，有的完全是無中生有搞出來的大冤案。涉及全廠278人（連同廠外計500多人）的所謂軍統特務組織「戡亂救國潛伏小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甚麼「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計劃潛伏下來的特務組織」。二七廠解放前的地下黨支部地下黨員沒有一個是叛徒，卻定為定為「叛變了的地下黨支部」。至於「報告」中所說的「裏通外國分子和進行間諜活動的天主教骨幹分子」，都是沒有的。

「報告」說：在全廠155名中層以上幹部中，已查出有各種政治歷史問題的49人，佔31.6%，其中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佔15.5%，他們竊取黨委書記、副廠長、監委書記和副總工程師等重要領導職務，把持了全廠黨、政領導大權。叛徒當上了幹部部長，一貫道壇主當上了組織部長，保衛科3個科長有2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全廠27個車間中20個車間的領導權和17個科室的領導權也大部或全部落入這些人手中。事實是：二七廠在「清隊」中因歷史問題被審查的中層以上幹部有97人，其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有42人。經過1975年落實政策的複查，只有1名副廠長能不

---

<sup>11</sup>夏俊生：〈文革樣板：北京二七廠清理階級隊伍〉，載《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下面揭露「報告」造假內容均引自此文。

能定為叛徒還有待進一步複查（他的問題過去已經交代並按一般歷史問題作了結論）。其餘 41 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

「報告」說：全廠已清查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215 人，清查出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特務外圍組織和其他反動組織的一般成員 373 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廠敵特組織的系統和關係，清出了一些血債繫繫的反革命分子，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並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等若干重大線索。事實是：「清隊」中定的 215 名反革命分子，1975 年複查時，只有 12 人仍定為敵我矛盾，其餘 203 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至於 373 名國民黨員等反動組織的一般成員，多數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歷史問題，大多數早已主動作過交代。所謂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的重大線索，純屬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案；所謂「清出了一些血債繫繫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沒有一個能落實；所謂「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錯案。

為了「挖得深，戰果大」，二七廠「清隊」肆意擴大敵情，製造冤案。這些人被定為「反革命」後，黨員都被開除出黨，幹部全部監督勞動，其親屬和子女也受到株連。

二七廠在「清隊」時規定，不管本人承認不承認，只要有三個人揭發就可以定案。「報告」說的人證、物證、旁證「三證俱全」，其實都是逼出來的假口供。

另據資料，在清隊中，二七廠 1949 年以前進廠的 1, 400 多名老工人有 900 多人遭到審查，佔老職工的 64%，定案處理的有 230 多人，其中 32 人被帶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帽子，有 20 多名老黨員，老工人被逼自殺。在清理階級隊伍那一段時間，二七廠的職工不敢串門，不敢互相說話，全廠處於紅色恐怖之中。<sup>12</sup>

二七廠這個清隊樣板，使北京市群眾大受其害。1968 年 9 月 2 日北京市革委會向中央寫了〈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截止 8 月 28 日，全市揪出的各種壞人已達 68, 123 人，其

---

<sup>12</sup>二七廠老工人聯名反映徐鎧的冤案，2008 年 8 月 24 日。

中叛徒 2, 827 人, 特務 3, 721 人,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2, 688 人, 現行反革命分子 7, 942 人, 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 24, 161 人, 反動學術權威 151 人, 反動資本家 1, 855 人, 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 2, 284 人, 新揪出的五類分子 10, 819 人, 其他 11, 675 人。」<sup>13</sup>此後, 北京被迫害的人繼續增加。1969 年 3 月 9 日, 中共北京市委在報送中央的〈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報告〉中說:「到 2 月底, 全市已揪出 99, 000 人。」到 2 月 20 日的不完全統計, 全市已定案 15, 000 人, 佔新挖出壞人(不含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總數的 22%, 其中定為敵我矛盾的佔已經定案總數的 54%。<sup>14</sup>

根據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sup>15</sup>的最高指示, 全國各地都組織了群眾專政隊伍。到 1969 年春天, 群眾專政組織遍佈安徽全省城鄉每個角落, 隊員發展到 110 萬人。群眾專政不顧法律, 想揪誰就可以揪誰。安徽省群眾專政組織存在的三年多時間裏, 在軍管會或革委會「人民保衛組」領導下, 先後對 150 多萬人實行專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來的 43 萬「壞人」)。那些被專政的對象遭到殘酷批鬥、毒打, 受盡折磨, 其中有 18 萬多人被非法長期關押、拘禁, 直到到 1971 年 6 月 7 日省革命委會通知撤銷群眾專政組織時, 仍有 5 萬多人被非法關押。<sup>16</sup>

為防止「階級敵人」漏網, 根據「樣板」單位的經驗, 各單位都成立了專案組, 對本單位「有問題」的人進行內查外調。專案組是在工宣隊或軍宣隊的領導下, 組織本單位政治可靠、歷史清白的人組成。1968 年, 在火車上的乘客很多是專案組成員。各省市還組織專門隊伍清理敵偽檔案, 清查敵偽檔案上記載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 清查出來的都建立卡片, 並通報這些人的工作單位。江蘇省革委會成立清理敵偽檔案辦公室, 組織數千名工作人員, 清理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 摘編成組織卡片 8 千多張, 人物卡片 42 萬多張, 彙編個人材

13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編寫小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 年 11 月-1976 年 1 月)(徵求意見稿)》, 1987 年, 轉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006 年第 2 版。

14 《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1989)》, 當代中國出版社? 第 265 頁。

15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 1967 年 7 月 9 日。

16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秘〉,《炎黃春秋》2011 年, 第 1 期。

料 1, 100 份。<sup>17</sup>涉及的人都是清理對象。四川由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掛帥，組織大量人力共建立了 16 萬張卡片，其中叛徒 800 人特務 3 千人，反革命分子 108, 000 人。<sup>18</sup>

### 三、受害者以千萬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志，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縣份外，一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 100 人以上。<sup>19</sup>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 3 千萬人被鬥，50 萬人死亡。<sup>20</sup>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 1, 500 多個縣志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 3, 600 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 75 萬至 150 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sup>21</sup>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了數以百萬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 1 億人。<sup>22</sup>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 1968 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 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 1969 年 4 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 43 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 188, 225 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 4, 646 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 1, 074 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 359 人。1968 年 5 至 9 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 90 人，自殺 445

<sup>17</sup>《江蘇省志·中共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18 頁。

<sup>18</sup>李秉鐸：〈清查敵偽檔案〉。李秉鐸參加了四川清理敵偽檔案工作，他給《炎黃春秋》投稿，稿件沒有被錄用，這裏採用了他的數字，在此致謝。

<sup>19</sup>丁抒：〈大規模迫害人民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8 年，第 605 頁。

<sup>20</sup>同上，第 607 頁。

<sup>21</sup>轉引自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關心譯、唐少傑校，尼克爾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65 頁。

<sup>22</sup>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9 頁。

人。<sup>23</sup>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一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 965 起，重大集團性案件 731 起，被立案審查的達 169, 405 人，有 5, 449 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衝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sup>24</sup>1968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 142, 453 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 53, 344 人，新挖出來的 89, 109 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 8, 893 人。」<sup>25</sup>

江蘇的清隊一直延續到 1970 年，1971 年 11 月 13 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彙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 190 多人。<sup>26</sup>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 1968 到 1969 年的清隊中，就有 13, 326 人被審查。<sup>27</sup>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颶二十四級紅色颱風」的口號，將縣一級的「牛鬼蛇神」108 人關進棚，共揪鬥 14, 600 多人。<sup>28</sup>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 9, 198 人。<sup>29</sup>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 1968 年至 1969 年 2 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 萬 3, 200 人。至 1970 年 3 月，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 291 個，批鬥重點對象 63, 297 人。從 1968 年 7 月到 10 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 261 期，近 217 萬人參加了「學習」。7 月到 11 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 738 人，一批人被迫害致死。<sup>30</sup>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 10, 200 名「敵人」，被害死亡 26 人，還製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

23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秘〉，《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

2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57-658 頁。

25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 年，第 1194 頁。

26 《江蘇省志·中共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18 頁。

27 《高郵縣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9 頁。

28 《武進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6 頁。

29 《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中國黨史出版社，1996 年，第 164 頁。

30 《廣州市志·卷一·大事記》，廣州出版社，1999 年，第 479 頁。

人。<sup>31</sup>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係幹部的 6 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台關係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台山縣有 4 千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係」，佛山地區有 15,000 多戶「僑改戶」，有一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sup>32</sup>

廣西南寧地區 1968 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一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颱風」，78,746 人被揪鬥，17,372 被迫害致死。<sup>33</sup>

陝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 年陝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陝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一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一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陝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陝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勳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 40 多萬人，被整幹部 62,000 多人，補劃地主、富農 5 萬多戶。一批人含冤致死。<sup>34</sup>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 30 多萬人。<sup>35</sup>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 人，查出「反動組織」15 個。

<sup>36</sup>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 113,605 人。其中，叛徒 23,596 人；特務 9,131 人；死不悔改走資派 5,609 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58,985 人；現行反革命分子 7,238 人；其他 9,046 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sup>37</sup>

截止 1969 年 10 月 30 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

<sup>31</sup>《河源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1 頁。

<sup>32</sup>《廣東省志·政治紀要》，廣東人民出版社，第 228-229 頁。

<sup>33</sup>中共南寧地委整黨辦公室：《南寧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1976）》（絕密），1987 年 5 月 11 日。

<sup>34</sup>《陝西省志·政務志》，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80 頁。

<sup>35</sup>《甘肅省志·第 1 卷·大事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41 頁。

<sup>36</sup>《定邊縣志》，方志出版社，2003 年，第 20 頁。

<sup>37</sup>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2001 年 3 月。轉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



「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 104, 643 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 24, 252 人。<sup>38</sup>

1968 年 12 月 16 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 11 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 10 萬多人，其中，4, 100 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一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39

吉林省從 1968 年 4 月開始全面清隊，到 9 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 090 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 560 個，集團成員 12, 464 人。<sup>40</sup>長春地區從 1968 年 5 月至 12 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 1, 929 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 184 人，自殺 1, 745 人。<sup>41</sup>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代：從 1968 年到 1969 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 2 萬多人。<sup>42</sup>遼寧台安縣成立以原來的縣委武裝部長為首的革委會後，就清理階級隊伍。城鄉各單位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門弓子、木棒子、爐勺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用細鐵絲勒到脖子上）、舉磚頭、跪碗渣，無奇不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 288 名，135 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殘。43 人被判刑投獄。<sup>43</sup>

1968 年 4 月，遼寧省新金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到夾河廟公社了解革委會成立後領導班子建設問題。他聽說樂家大隊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李本柱和一位 23 歲的女子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許連榮是農民許長家的三女兒。許長家的三兒子 1958 年因參加所謂反動組織被判刑三年。6 月 3 日王立龍到樂

<sup>38</sup>中共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室《石家莊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 年 5 月，1978 年 12 月）》。1997 年 3 月。轉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

<sup>39</sup>《黑龍江省志·第 70 卷·共產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50 頁、251 頁。

<sup>40</sup>吉林省公安機關軍管會：〈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一些情況〉。載《保衛工作情況》和 15 期，1968 年 10 月 21 日。

<sup>41</sup>《長春市志·公安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7 頁。

<sup>42</sup>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678 頁。

<sup>43</sup>《台安縣志》1981 年，第 136-137 頁。

家大隊，斷定「這是階級敵人用美人計拉攏腐蝕革委會幹部，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宣佈停止李本柱的職務並組織群眾批鬥。李本柱在高壓下不敢否認他和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1968年7月11日對許長家嚴刑拷打，並被群眾專政「法庭」判十年徒刑，交群眾管制。7月16日，許連榮被抓去打得遍體鱗傷，不得不「招供」。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一起上吊自殺身亡。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着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44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萬多人。<sup>45</sup>江西省開展「三查」運動才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千人。在江西的水電部某工程局派有一個工程隊，開展「三查」運動以來，這個工程隊有兩人自殺。一個工程技術人員在辦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腸子一節節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兩旁各個辦公室的門口圍觀的人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他在走廊上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另一個自殺者在挨鬥的時候，趁上廁所之機硬是用磚頭將一枚鐵釘打進頭部的顱腔，另一枚打進一半就倒下了，死於送往醫院的途中。<sup>46</sup>

據江西省公安部門統計，從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個公社（鎮）的群眾專政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標等銳器，殺死202人，受害者最大的81歲，最小的9歲。寧岡縣葛田公

<sup>44</sup>呂達芳：〈一家七口集體自殺迷案〉，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76-85頁。

<sup>45</sup>《當代江西簡史》，2002年，當代中國出版社，轉引自姚蜀平：〈鮮為人知六八年民辦槍斃：不用證據想殺誰就殺誰〉。

<sup>46</sup>汝其：《支左日記（1967-1968）》，原載《天涯》1999年，第1期。

社葛田大隊，在 1968 年的「三查」運動中，逼出「反共救國團」，將 91 人打成「反革命」，設立監獄 58 間，刑訊逼供用了 42 種刑罰，11 人死亡。奉新縣甘坊公社揪出 905 人，打殘、逼死 73 人。宜春地區在「三查」和「一打三反」中，錯定「反共救國軍」等「反革命集團」644 個，「反革命分子」3,384 人，錯劃階級成份 7,709 戶，錯定「四類分子」9793 人，非法抄家 39,002 戶，「群眾判刑」4,512 人，被迫自殺 4,378 人，被打致殘 217 人。<sup>47</sup>

江西萬年縣總共 21 萬人，一下子就抓了 8107 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這些「階級敵人」，慘遭毒刑，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槓子、佔橈頭、跪瓦片、坐老虎櫬、電擊、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 214 人。<sup>48</sup>為了製造紅色恐怖氣氛，1968 年 5 月 18 日到 21 日，江西貴溪縣革委會出動 12 輛大卡車將 360 多名被清理出來的人拉到各公社進行批鬥。<sup>49</sup>

江西上饒地區在「三查」運動中，95,768 人受到迫害<sup>50</sup>。于都縣在「三查」中揪出「三查對象」11,165 人，一些人被迫自殺。1968 年 6 月 25 日，全縣統一行動，對「四類分子」和「三查對象」進行大抄家，大搬遷，提出「政治上要進行大掃除，經濟上要徹底搞垮」<sup>51</sup>。1968 年 7 月 4 日，龍南縣革委會政治部在縣體育場舉辦「學習班」，開展清查運動，嚴刑逼供，製造出「反共救國軍」假案，數千人受牽連。<sup>52</sup>

雲南省清理階級隊伍是 1968 年 12 月開始，到 1969 年底，全省共清出「九種人」237,310 人，其中「叛徒 3,231 人，特務 5,481 人，現行反革命分子 18,028 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1,669 人，沒

<sup>47</sup> 《江西省志·江西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6 年？第 351 頁、353 頁。

<sup>48</sup> 《萬年縣志》，1982 年，第 255、258 頁，《萬年縣志》方志出版社 2000 年版無此內容。

<sup>49</sup> 《貴溪縣志》，中國科學出版社，1996 年，第 30 頁。

<sup>50</sup> 《上饒地區志》，方志出版社，1997 年，第 67 頁。

<sup>51</sup> 《于都縣志》，新華出版社，大事記，第 47 頁。

<sup>52</sup> 《龍南縣志》，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第 42 頁。

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208, 901 人。破獲「反革命集團」1, 854 起，其他集團 818 起，各種反革命和刑事案件 6769 起。<sup>53</sup>

1968 年 11 月 9 日，雲南省公檢法軍管會在宜良縣羊街部隊營房舉辦「學習班」，集中公檢法幹部 900 多人，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學習班上製造了「裏通外國的雲南特務組」等八大假案，涉及原公安廳幹部的 70%。學習班上 219 人被批鬥拷打，60 多人被致殘，9 人被迫自殺（死 3 人），9 人被逼瘋。<sup>54</sup>德宏州盈江縣的昔馬是一個不足 5 千人的公社，被捆綁吊打 500 多人，被打成特務的 180 人。人人自危，不斷離境外遷，從 1969 至 1971 年，全省邊民被迫離境外遷的約 3 萬餘人。<sup>55</sup>雲南省清隊和「劃線站隊」結合在一起。1967 年初，雲南群眾組織分裂為「炮派」和「八派」。3 月間，中央對雲南實行軍管。雲南省軍管會支持「八派」（8.23 無產階級派）壓制「炮派」（毛澤東主義炮兵團）。「八派」仗勢進一步排擠、壓制「炮派」，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1968 年 5 月，工程兵政委譚甫仁調任昆明軍區政委，8 月 13 日任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上任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八派」，反對「炮派」。革委會一成立就把「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工作」作為重要任務。清理階級隊伍和「劃線站隊」結合在一起。所謂「劃線站隊」就是看你站在哪一派。「炮派」成了被清理的重點。12 月 9 日、25 日，譚甫仁在幾個地區講話時提出：「你們對敵人不要手軟，要狠一點，要克服右傾思想，不要怕。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不要受兩個 95% 的框框的限制。」<sup>56</sup>

在「劃線站隊」中，玉溪地區揪鬥群眾 27, 900 多人，打傷致殘 1, 700 多人，打死逼死了 1, 089 人。昆明市受迫害的群眾 50 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 1, 703 件，迫害致死 1, 486 人，使用刑罰 100 多種。在紅河州，從 1968 年 12 月到 1969 年 5 月底，共批鬥了 54, 324 人，SU9 月底全州批鬥人數上升到 62, 397 人。<sup>57</sup>在巧家縣，「八派」觀點

<sup>53</sup> 《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 年，第 149 頁。

<sup>54</sup> 《雲南省志·卷 56·公安志》，雲南人民出版社，大事，第 37 頁。

<sup>55</sup> 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雲南「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紀實》（內部資料），2005 年 5 月 18 日。

<sup>56</sup> 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 年，第 144-145 頁

<sup>57</sup> 同上，第 176-177 頁。

的群眾組織（當地為「紅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於 1968 年 5、6 月間，無辜殺害另一派群眾 277 人。6 月 10 日，巧家縣「新店區貧下中農審判大會」宣佈農民周明太死刑。周被處死後，兇手楊國有等把周的心臟挖出示眾。兇手彭其德把周的腦袋砍開取走腦髓，兇手彥家申將生殖器煮了吃。<sup>58</sup>1969 年 1 月 22 日，巧家縣成立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掀起了捆綁打人的高潮，施以刑罰 80 多種，2, 438 人被批鬥，定案 87 件計 1, 687 人，打死逼死 75 人，打傷殘 21, 519 人。幾天之內 32, 500 多「站錯隊」的人逃難到四川。<sup>59</sup>

1968 年 11 月 29 日，譚甫仁在全省黨代會上的總結報告說：「雲南 150 萬人口地區是和平協商土改，還有 90 萬人沒有劃分階級成份。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解決劃分成份問題。」<sup>60</sup>1969 年初，全省派出 83, 687 人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土改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就是在文革中的「站隊」，把一大批「站錯隊」的群眾劃為地主、富農。據保山、臨滄、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紅河等十個地、州、市的部份縣統計，原為貧下中農而被升格為地主、富農的有 7605 戶，共抄家 30, 620 戶<sup>61</sup>。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一次大抄家。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 1966 年的「破四舊」不徹底，宣佈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sup>62</sup>甘肅慶陽縣「深挖底財」、「金銀大掃除」。5, 062 人被揪鬥和實行群眾專政。<sup>63</sup>江蘇如東縣大颶「紅色颱風」，僅 3 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 60 人被關押，183 戶被封門抄家。1966 年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sup>64</sup>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4 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5 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

---

<sup>58</sup>同上，第 179 頁。

<sup>59</sup>同上，第 199-180 頁。

<sup>60</sup>同上，第 180-181 頁。

<sup>61</sup>同上，第 201-205 頁。

<sup>62</sup>《正寧縣志》1986 年，第 582 頁。

<sup>63</sup>《慶陽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6 頁。

<sup>64</sup>《掘港鎮志》1989 年，第 93 頁。

幣 28 萬多元。沒收地富房屋 92 幢。」<sup>65</sup>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全縣抄家 5 千多戶，拘捕了 9 千餘人。<sup>66</sup>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一年多。直到 1970 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 23, 000 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抄了 4, 683 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錶等。<sup>67</sup>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大致搜羅殆盡。

清隊的打擊面如此之大，毛澤東也不滿意。1969 年 3 月 15 日，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麼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麼辦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甚麼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

68

#### 四、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都受到打擊

知識分子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重點群體之一。大學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重災區。清華大學 6 千名教職員工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的有 1, 228 人，<sup>68</sup>據清華大學教授、文革專家唐少傑統計，清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非正常死亡人數 16 人，佔文革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 27.6%。其中有陳祖東、楊景福、李丕濟、鄒致圻、程應銓、路學銘、李玉珍、王大樹和殷貢璋、王慧琛夫婦。1968 年 8 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碰腿」（毛澤東曾說過北京大學「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全校有 900

<sup>65</sup>《泉港鎮志》1986 年，第 19 頁。

<sup>66</sup>《攸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39 頁。

<sup>67</sup>《陽朔縣志》，1988 年，第 13 頁。

<sup>68</sup>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 年 3 月 15 日。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69</sup>周良霄、顧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記》，新大陸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 年。第 591 頁。

多人被重點審查，佔全校教職工總人數的 22.5%，迫害致死的有 23 人。<sup>70</sup>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 166 位、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 110 位老科學家和青年科技人員打成特務。<sup>71</sup>安徽馬鞍山鋼鐵設計院 978 名職工，被揪鬥 134 人，大多數是專家、技術權威，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壞人。<sup>72</sup>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 600 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 200 多人被「隔離審查」，2 人被活活打死，10 人打成殘廢，4 人自殺，包括 1949 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 9 人自殺未遂。<sup>73</sup>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化學博士。本來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職。1950 年懷着愛國之心從美國歸來，為中國石油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到懷疑和衝擊。1968 年 10 月 5 日，工宣隊把蕭光琰抓進「牛棚」，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財物。12 月 11 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已經死亡。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自殺。他剛剛 48 歲。工宣隊宣貼出了「特大喜訊」的大標語並通報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由大連多個單位組成了聯合專案組，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301 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株連 11 個單位的 26 人。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他妻子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去，向她宣佈：「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代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14 歲的女兒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

---

<sup>70</sup> 《當代中國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第 169 頁。

<sup>71</sup> 胡耀邦就吉林省單奎章迫害知識分子一事的批示，1978 年 4 月 8 日。

<sup>72</sup>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秘〉，《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

<sup>73</sup> 《春風化雨集》（上），群眾出版社，1981 年，第 441 頁。



老舍，著名作家，文革中自沉於太平湖。



顧聖嬰，著名鋼琴家，受批鬥後聯同母親、弟弟開煤氣自殺。



陳璉，中共黨員。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兒，文革被開除黨籍，誣為叛徒，跳樓自殺。



歷史學家翦伯贊與夫人，吃安眠藥自殺。



鄧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飽受批判後自殺。



文學翻譯家傅雷與妻子周梅靚在文革中飽受虐待後，含冤自殺。



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着：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耗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sup>74</sup>

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有突出貢獻的23安裝工程公司(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牛棚」裏關的人越來越念軍代表在群眾專政大會上講：「有人說，抓的人太多了。多甚麼？！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團結兩個95%，<sup>75</sup>剩下兩個5%，加起來，就是10%。我們要按10%的比例抓！」當時這個工程處擔負着國家大的原子能反應堆801工程的建設。公司的第三工程處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會影響工程進度。但是，「牛棚」在不斷擴大，被抓的已超過了150多人，此時軍代表又說：「現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蝦米，大魚還沉在水下，要繼續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發生過兩次全廠武鬥。第二天，蘇聯對華電台廣播說，中國最大的原子城發生了一次大武鬥。軍代表斷定，我們的隊伍中有蘇聯間諜，要不然，他們怎麼會如此清楚。於是，一個深挖蘇聯間諜的大網鋪開了。公司很多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曾在蘇聯學習過。去過蘇聯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過了一段時間，懷疑對象又開始擴大。凡是無線電愛好者，自己裝過收音機的人，也不放過。被抓的人，已達到了170多人，佔職工總數的11%以上。幾年以後，經複查，當時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風捉影造成的冤假錯案。<sup>76</sup>

中國物理學泰鬥葉企孫，在1968清理階級隊伍時已經70歲，因他的學生熊大績的事，被捕入獄。1938年，他的學生熊大績去冀中抗日。葉企孫幫助學生在後方搜購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那些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黃色炸藥地雷，就是他的學生製造的，而不是電影《地雷戰》中說的是農民土法製成。戰爭中，熊大績被懷疑為漢奸，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

<sup>74</sup>白介夫：〈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

<sup>75</sup>毛澤東說過，要團結幹部中的95%和群眾中的95%，簡稱「團結兩個95%」。

<sup>76</sup>于峰華：〈我親歷的清理階級隊伍〉，載《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



上海著名演員上官云珠被誣為「戰略特務」，跳樓自殺。



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文革中飽受摧殘後，服毒自殺。



中國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從香港歸來的榮國團，被誣為特務，懸樑自盡。

中用石塊砸死。清理階級隊伍時重提此事，將葉企孫關押。提審他的時候他只說一句話：「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放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 90 度。他是中國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饒毓泰，1891 生，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1948 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灣的特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5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清理階級隊伍」時，飽受折磨，1968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大學燕南園 51 號樓自來水管上上吊自殺身亡。時年 77 歲。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着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樑，1945 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在美國參與第一代電子計算機 eniac 的設計編程。1956 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清隊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被關押審查，1968 年 10 月 18 日，上吊身亡。

趙九章：1907 年生，著名氣象學家、空間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1949 年後籌組並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擔任國家科委氣象組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1960 年代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 651 設計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68 年 10 月 10 日在極度絕望中服藥自殺。在趙九章自殺的 1968 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 20 位！其中有「一代數學宗師」熊慶來、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劉崇樂，真菌專家鄧叔群，化工冶金專家葉渚沛等。

李廣田，著名作家。1949 年後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雲南省作協副主席。1968 年投水自殺。

傅雷，著名翻譯家。1958 年被劃為「右派」。1968 年傅雷與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櫓上戴上高帽子批鬥，受盡人格凌辱。9 月 3 日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

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sup>77</sup>廣東和平縣，「颶 12 級颱風」全縣共有 38,000 人被揪鬥，其中 750 多人致傷致殘，249 人非正常死亡。<sup>78</sup>中、小學教師是清理重點，被抓起來「審查」的佔教師總數的 38.5%。<sup>79</sup>

體育界也受到衝擊。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樑自盡。1959 年為中國奪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1957 年他歸國時才 19 歲，也是「特務」嫌疑犯。1968 年 6 月 20 日，他寫「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繩子將自己吊死在槐樹上，年僅 30 歲。<sup>80</sup>

文藝界在清隊中是重點。

1968 年 11 月，上海電影製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裏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sup>81</sup>

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以「資產階級反動藝術權威」成為批判對象。在軍代表劉萬泉的領導下，「紅梅劇院」（安徽省黃梅戲劇院文革中改名為「紅梅劇院」）對她大會批、小會鬥。為了達到摧殘心靈的效果，讓她的兩個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場同接受批判。根據省軍管會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專案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樣板戲、潛伏特務三大罪名。在軍代表、專案組的壓力下，她的老搭檔、黃梅戲劇團主要演員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也貼出大字報誣陷她，使嚴鳳英受到極大震撼和傷害。1968 年 4 月 7 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藥，然後寫遺囑，準備徹底解脫。丈夫王冠亞發現後，報告軍代表劉萬泉，請求組織搶救。可劉萬泉等人來到她家後，不是馬上送醫院搶救，而是在她的床頭開批鬥會，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說話，才草草

---

<sup>77</sup>《崇義縣志》第 26 頁。

<sup>78</sup>《和平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1986 年，大事記，第 25 頁。

<sup>79</sup>《和平縣志·政府志》1986 年，第 33 頁。

<sup>80</sup>金汕：〈容國團之死〉，《歷史在這裏沉思》第 6 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 年。

<sup>81</sup>方守玉：《上官雲珠的藝術和婚姻》長江文藝出版社，1987 年，第 86 至 91 頁。

收場，耽誤了寶貴的搶救時間。從送醫院門診部折騰到住院部，沒有救護車，靠丈夫王冠亞借來拉貨的板車拉來拉去，又耽誤了些時間。到了醫院，沒有醫生給予及時搶救，直到8日凌晨2時，嚴鳳英帶着滿腔悲憤離開了人間。全國人民心中那個美麗、善良的「七仙女」，死時還不到38歲。人死了以後，軍代表劉萬泉率領一批人趕到醫院，胡說嚴鳳英是接受特務機關指令而自殺的，發報機和照相機就藏在她的肚子裏，要開腸破肚，搜出特務證據。劉萬泉勒令醫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進入「三結合」的一名革命幹部、兩個群眾組織頭頭的監督下，醫生剖開她的腹腔，把內臟扒出來翻了一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藥外，所謂特務證據子虛烏有。劉萬泉還對着屍體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演的黃梅戲，也沒看過你演的電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形。」<sup>82</sup>

1949年以前進廠的老工人普遍都受到清查。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是1949年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18歲的都要「過篩子」。1968年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油礦革委會負責人說：「我們現在揪出了一些敵人，可以說只挖了幾尺深，面上的敵人好挖，十二級颱風把他們一颳就颳出來了。玉門3萬多人，現在才挖2千多，不算多。」「我們把原封未動的舊企業接過來也原封未動地接過了特務組織。」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通過對老技工朱迪清嚴刑拷打，逼出了所謂「俞國安特密小組」。又將已經調走的原廠黨委副書記聶鴻信揪回來，連續審問17個晝夜，用18種刑具、60多種刑罰，逼着聶鴻信交代出247個特務。結果，4名處級幹部、6名科級幹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數百人被毒打，幾千名親屬受株連。玉門油礦是中國石油工業的發源地，有「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的說法。在清隊中，所謂「偽玉門油礦應變潛伏特務組織案」波及整個石油系統。「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製造了很多冤案。<sup>83</sup>

大城市的一些老企業都是清查的重點。本書作者1972年在天津

<sup>82</sup>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祕〉，《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

<sup>83</sup>宋克力：〈石油河在哭泣〉298頁。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291頁。

汽油機廠調查得知，全廠不到 400 人，就有 100 多人在清隊中被抄家。

## 五、株連眾多的重大集團冤案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了很多重大冤案，迫害了大批無辜者。1968 年，正是毛澤東大力推行「大聯合」、「三結合」的一年，期望從「大亂」走向「大治」。一些支左部隊主持的「大聯合」進一步使造反派邊緣化。造反派哪能服氣？他們就成了「大聯合」的障礙。有些地方就製造冤案，把造反派群眾組織打成各種「反革命集團」，加以消滅。有些重大冤案是中央和地方共同製造的。

### 「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冤案

1968 年 7 月 25 日凌晨 1 時 5 分至 6 時 15 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中央領導人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嚴厲批評了廣西「4.22」這派群眾組織，還提到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周恩來說：「你們（指廣西『4.22』）組織裏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甚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康生說：「你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你們那裏也有這個問題。」周恩來、黃永勝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廣東省革委會常委武傳斌。武傳斌是廣東造反組織「紅旗派」頭頭。

中央領導人提出「反共救國團」是來自廣西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上報中央的〈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報告〉。這個報告是 1968 年 5 月 17 日送上去的。報告說，已捕獲團長、副團長、政治部主任等共 63 人，並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份槍枝彈藥等罪證。這份報告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 2 月 3 日正式合併定名為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發展組織活動

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南華僑有聯繫。」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以「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的名義，組織過反叛活動，這件事當時就由公檢法處理過。1968年初，廣西「聯指」出於派性，又將二十年前已經處理的案件加以編造，加在「4.22」頭上。

1968年1月17日，《廣西聯指報》稱容縣有43個「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組織」。1968年2月17日，《廣西聯指報》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一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一文，公佈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一批「反共救國團」組織。這批「反共救國團」是：容縣「4.22革總」的「反共救國隊」；長壽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鵬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國軍」、「殺人戰鬥隊」及「反共救國軍第三軍」；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國軍」；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和「反共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團第四軍」；尋陽公社的「反共救國團」等等。

5月20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軍分區和革委會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要求把偵破這一案件當作一個戰役來打。6月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發佈〈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簡稱「6.17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這一「公告」發佈後，在全區掀起了所謂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狂潮。

在追查所謂「反團」的旗號下，公開地、集中地對「4.22」進行鎮壓，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數以萬計的人被殘酷批鬥。其中有的人被殺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殺死亡，不少人被打致殘。這一冤案直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才得到平反昭雪。<sup>84</sup>

---

<sup>84</sup>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7月。

「6.17 公告」發佈後，廣西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掀起了圍剿「反共救國團」的高潮，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同時還把「反共救國團」案與「4.22」群眾組織掛鉤，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把參加「4.22」組織或傾向「4.22」組織的幹部、群眾，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一大批。

南寧市有 3,547 人被列為「反共救國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共救國團」的有 5,213 人；百色地區僅僅那坡縣一個縣就逼出「反共救國團」40 名「團長」；河池地區被打死、逼死 7,864 人；欽州地區 7 個縣市打死、逼死、失蹤人數達 10,420 人；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共救國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與「反共救國團」有關，迫害致死，全縣十一天打死 338 人；柳州地區柳江縣，打死了所謂「反共救國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共救國團」標記掛在德墟、拉堡墟示眾。

85

周恩來、康生的「7.25 講話」點了造反派中有「反共救國團」以後，下面就變本加厲地迫害無辜。7 月 30 日、31 日，廣東省革委會召開全委會批鬥武傳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國團」問題，同時還要交代與被打倒的王、關、戚的關係、揪軍內一小撮問題等。8 月 4 日《中大戰報》、中山大學革命造反委員會「衛二紅」戰鬥團發表〈反革命小臭蟲武傳斌罪行錄〉。8 月 7 日至 8 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武傳斌、莫競偉、劉繼發、高翔、林昌文、丘學科等「旗派」<sup>86</sup>頭頭交代問題，8 月 12 日，廣州紅代會作出清除武傳斌、林凡（廣醫紅旗頭頭，紅代會常委兼核心組副組長）的決定。

由於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廣西軍政官僚的鎮壓，「反共救國團」案涉及廣西全區，關押、判處了幾十萬人，株連幾百萬人，被打死、槍殺的人數以萬計。直到 1984 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結束時，才對「反共救國團」的受害者給以平反、昭雪。<sup>87</sup>

---

<sup>85</sup>徐勇《韋國清屠殺廣西「四二二」派》。

<sup>86</sup>「旗派」是廣東省的造反派，與其對立的偏保守的是「東風派」。

<sup>87</sup>晏樂斌：《廣西「文化大革命」運動》，未刊稿。



### 雲南趙健民特務集團案<sup>88</sup>

趙健民，1912年出生於山東冠縣，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鐵道部副部長、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省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雲南和越南接壤，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1964年，經周恩來批准，在雲南省內修建一條國防公路。雲南勞動力缺乏，就從山東、河南徵調了17,000名青壯勞動力，組成五個工役制工程團，其中山東人組成了「工七團」、「工八團」。當時雲南省領導人向這些勞工承諾，完成任務後「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省委分工趙健民負責援越工作，這批成建制的工人由趙健民領導。文革開始後，這批修路工人也捲入了文革，且大部份持「炮派」（軍管會不支持的派）觀點。1967年6月份，雲南省軍管會整理了〈趙健民近況〉，說趙反對「八派」（軍管會支持的一派）。文革中，軍管會負責人改變了原來「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的承諾，要將17,000名精壯青年遣送回老家。「工八團」強烈反對。趙健民主張履行原來的承諾。工程團去留問題和派性糾結在一起，「炮派」的對立面「八派」說趙健民是這批工人的後台。1968年1月5日，「工八團」在下關蒼山飯店遭到「八派」的「4.20」組織的武裝攻打，7人致死。這一事件引起了「工八團」在昆明西山省委黨校等待退役回山東的人員的關切。「工八團」負責人李國貞率77人從1968年1月10日離開昆明西進，企圖解救在下關被圍困的600多人，說不能讓一個人丟在雲南。這77人13日到達下關。1月16日，「八派」和「炮派」在下關發生一場武鬥，李國貞任這場武鬥的副總指揮，「工八團」有300多人參加。武鬥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1月21日，「工八團」離開下關去昆明。1月19日，支持「八派」的當地駐軍向昆明軍區報告，說「昆明『炮派』所屬工八團一部，在走資派和少數壞人操縱下，組成所謂『滇西挺進隊』，全副武裝，西進了450公里，攻佔了很多重要城鎮……」，還說「滇西挺進隊」殺害軍代表、殺害群眾等。昆明軍區未經核實就上報中央。中央未經調查聽信了軍區報告。

<sup>88</sup>此案資料來源：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

中央領導人批示：同意對「工八團」回竄以堅決堵截，勸他們放下武器，交出他們西竄沿途搶槍、殺人的壞頭頭。1月27日，軍隊對回昆明的「工八團」進行武裝圍剿，當場打死近200人，將100多名俘虜捆綁關押。

實際上，「工八團」從來沒有使用過「滇西挺進隊」這個名稱，「工八團」西進時沿途沒有發生武鬥和打砸搶行為，說他們攻佔城鎮、搶槍殺人也純係捏造！然而，工八團被定為「反革命匪幫」，趙健民是這個匪幫的黑後台。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上，康生說，昆明「工八團」成立了一個「滇西挺進縱隊」，打死了軍代表。謝富治（他是支持「八派」的）說，趙健民在北京遙控「炮派」進行武鬥，「炮派」組織的「滇西挺進隊」都是山東人，是趙健民指揮的。趙健民據理力爭、矢口否認，激怒了康生。康生說：「憑我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你是個叛徒！」謝富治宣佈：「中央決定對趙健民監護審查。執行！」趙健民當場被荷槍實彈的軍人帶走，從此開始了2,089個晝夜的鐵窗生涯。在關押期間，長期遭受戴背手銬、強燈烤、飢餓等酷刑。與此同時在全省清查子虛烏有的「趙健民特務案」，全省上下、軍內軍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階級隊伍與派性的「劃線站隊」結合在一起，被審查人數達138萬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受害者多為「炮派」群眾。】

### 內蒙古「內人黨」冤案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華北局會議。參加華北局會議的內蒙古黨政軍領導人共146人。這個會上，將內蒙古黨政一把手烏蘭夫定為「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還加上了「破壞祖國統一、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在這一會議上把烏蘭夫定性為「民族分裂」的反黨叛國集團頭子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不是毛的決策有待資料揭曉）。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撤銷了烏蘭夫的一切職務，將其監禁在北京。1967年5月華北局會議以後，中央將內蒙古軍區降為省軍區，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任代司令。滕海清到任以後，對自治區

公安廳和盟、旗的公安機關實行軍管。1967年11月1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滕海清是革委會主任。

解決「民族分裂」問題就是內蒙文化大革命的主線，這條線貫串始終。

從1968年7月開始的清隊中，搞「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運動（簡稱「挖肅」），就是針對「民族分裂」問題。「挖肅」主要任務是清查「反黨叛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還將烏蘭夫定為「內人黨」的總頭目<sup>89</sup>。這是張冠李戴。在華北會議上，烏蘭夫申訴陳情，說，內蒙有沒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正在抓這個分裂集團，這個「集團」就是原來的「內人黨」，人數200人。的確，他在文革前是抓了「內人黨」。

<sup>90</sup>

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曾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的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漢族主義。1927年蔣介石「清黨」反共，「內人黨」也一分为二：部份投奔了國民黨，部份繼續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日本投降後，哈豐阿、博彥滿都、特木爾巴根等「內人黨」領袖發表宣言，提出內蒙古將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導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友邦的中國革命緊密提攜，以期公平徹底地解決蒙漢民族問題」。隨後又重建「內人黨」東蒙黨部，並創建「內蒙古人民青年團」。並派代表團赴烏蘭巴托商議合併統一大業。在遭到外蒙的拒絕後，哈豐阿等人轉而獨立，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月中，烏蘭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與東蒙自治負責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見面，洽談內蒙東西部統一問題，經過洽談，哈豐阿等放棄了獨立自治的主張，決定停止內人黨活動。「內人黨」到1947年5月以後就不存在了。

60年代初，一位從內地調入內蒙古大學的歷史教師，不了解內蒙革命歷史，在查閱歷史資料中，得出一個結論：原先的「內人黨」頭目都混進了共產黨，在內蒙掌握了領導權。他向校黨委書記郭以清密

<sup>89</sup>滕海清：〈關於「內人黨」問題的彙報提綱〉，1968年12月22日。

<sup>90</sup>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續編》」。2008年9月編印。

報「敵情」。恰好在1963年2月6日，公安機關郵檢中發現了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二次代表會議」署名的信，是寄給蒙古人民共和國主席澤登巴爾的，這封信要求與外蒙合併，爭取民族統一。但這個案件始終沒有偵破。<sup>91</sup>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區黨委密報「內人黨」。1967年滕海清任革委會主任後，郭以清向他講「『內人黨』有長期搞民族分裂的歷史」。<sup>92</sup>因華北會議製造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滕海清就相信了郭以清。「挖肅」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還有一個蒙古族人——內蒙古文聯副主席、《草原烽火》的作者烏蘭巴干（原名寶音達賴）。他在1967年9月建立「內蒙古揪叛國集團聯絡站」，這個「聯絡站」專揪「內人黨」。康生在揪「內人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7月，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革委會認定：「內人黨」是「潛藏在內蒙古地區搞民族分裂的反動組織」，是「烏蘭夫的暗班子」。首先由內蒙古大學和軍區政治部逼供出「新內人黨分子」。10月的一天，內蒙古革委會在呼和浩特市體育場召開敦促「新內人黨」成員自首登記群眾大會，提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求限期登記，否則從嚴處理。接着發出1號通令、2號通令，勒令「新內人黨」成員登記自首。當時宣傳：「新內人黨」是一個極具能量的龐大的「鑽進內蒙古自治區三里五界的反革命組織」，「挖出『新內人黨』比揪出烏蘭夫的成就還要大」。於是，「挖肅」運動又發展為「挖烏、哈、特勢力」（烏指烏蘭夫；哈是哈豐阿，自治區副主席；特是特古斯，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運動。鬥爭矛頭直指蒙古族幹部，而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派」了。

滕海清說：「烏蘭夫有個龐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內人黨，……這批暗班子已經混入了革委會，在革委會裏掌權，……他們比叛徒、特務還危險，黨政軍權力都由他們掌握了。」於是，在

---

<sup>91</sup>卜偉華在《砸爛舊世界》第103頁提出另一種說法：1964年「四清」運動中曾在全自治區範圍發了〈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即1935年12月20日以毛澤東名義發出和宣言，在國民黨統治條下，這個宣言提出內蒙實行民族自治。前門飯店會議就以這個宣言為據，說烏蘭夫搞民族分裂。

<sup>92</sup>阿拉滕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7頁、第10頁。

剛成立的革委會內深挖「新內人黨」。華北局會議後西部蒙族幹部基本都被打了下去，有的漢族幹部受牽連被批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人有的得到了解放。成立革委會時，其中個別人如王再天（時任內蒙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特古斯（時任內蒙宣傳部副部長）都被「結合」到革委會。挖「內人黨」時首先針對這些人。對蒙族一般幹部和文教戰線的工作人員，「挖肅」運動更加殘酷。

隨着運動的深入，打擊面的擴大，革委會核心小組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開始緊跟滕海清的核心小組成員權星垣感嘆：「現在的形勢是，凡是揪出來的是蒙古人，不用問，打！」核心小組成員高錦明說：「這就是大漢族主義，但不能說運動就是整蒙古人」，「不能再挖了，再挖挖到自己頭上來了」。滕海清說：「從內蒙古的歷史看，由於烏蘭夫搞民族分裂在組織上培植了他的黑勢力，民族幹部倒下去要多一些，這是事實。」在滕海清這種指導思想下，下面就無所顧忌了。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說：「哲盟敵情嚴重，光蒙族就有 70 萬！」錫盟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說：「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國也是一小撮。」

93

高錦明的意見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區進行了批判。文革前高錦明是自治區常務書記，烏蘭夫很信任他。但 1966 年 5 月的華北局會議上，他揭發、批判烏蘭夫的「民族分裂罪行」，是反烏蘭夫的主要幹將。後來滕海清管內蒙時，他和滕一起主管內蒙工作，是滕海清的得力助手。但挖到一定階段，他和滕海清產生了意見分歧。對高錦明的批判，使「挖肅」運動越來越擴大，越來越殘酷。內蒙自治區只有 200 萬蒙古族人，挖了十幾萬還不停手，普通的工農牧民，幾乎家家都有反革命。還挖了很多長期在內蒙工作的漢族幹部、職工。<sup>94</sup>在「挖肅」中大搞逼供信，動用各種刑罰：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鎮冰塊、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窮、木棒

<sup>93</sup>阿拉滕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前言，第 4 頁。

<sup>94</sup>內蒙古黨委第二書記廷懋致黃克誠的信，1981 年 8 月 1 日，轉引自阿拉滕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 236 頁。

捅陰道、熱鹽水澆傷口等<sup>95</sup>。在烏蘭察布盟，盟計委主任比力格圖門的牙齒被專案組用老虎鉗一顆一顆地拔掉，接着又割掉舌頭和鼻子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書敖日布扎木蘇夫婦二人，被專案組用刮臉刀片將身上的肉一道一道地割開，在傷口裏揉進鹽，再用燒紅的烙鐵烙傷口。夫婦二人被虐殺後，剛滿五個月的孩子活活餓死。達茂旗黨委書包國良的妻子被打成「內人黨」後，兇手們用繩子「拉大劇」，將陰道和肛門拉通，慘不忍睹。<sup>96</sup>

伊克昭盟有 15 萬人被打成「新內人黨」，佔總人口的 21%，致死 1, 260 人，致殘 2, 322 人。<sup>97</sup>圖克公社共有 2, 961 人，挖出 926 人，佔成年人的 71%。另被懷疑的有 270 人。在「挖肅」中致死 49 人，嚴重傷殘 270 人。為了逼口供，將女牧民脫光衣服，用燒紅的濕柳棍燙肚皮，腸子露出來再燙陰道，外陰燒壞，變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纏鐵絲，連打 20 多鞭後，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傷口腐爛不給治療，活活臭爛而死。<sup>98</sup>

成千上萬的「挖肅」積極分子被迅速提拔重用<sup>99</sup>，兇手們受到鼓勵，傷亡者越來越多。

「內人黨」冤案造成的傷亡人數有三種說法。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數字：34.6 萬人被關押，1. 6222 萬人被迫害致死，8. 1808 萬人致殘；<sup>100</sup>二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學者巴赫的說法：逮捕關押了 80 萬人，50 萬人致殘，5 萬人被迫害致死；三是半官方學術機構內蒙古大學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的說法：2. 79 萬人被迫害致死，12 萬多人致殘，該文沒有提到被關押人數。學界認為第三種看法比較接近實際，即：致死兩三萬，致殘 12 萬，關押 50 萬。<sup>101</sup>

挖「新內人黨」搞亂了局勢，加劇了民族矛盾，中共中央採取了

<sup>95</sup>阿拉騰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 85-98 頁。

<sup>96</sup>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649 頁。

<sup>97</sup>內蒙古《全區牧區草原建設工作會議簡報》第 11 期，1978 年 6 月 8 日。

<sup>98</sup>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落實政策辦公室簡報第 3 期，1978 年 8 月 5 日編印。

<sup>99</sup>阿拉騰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 119 頁。

<sup>100</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

<sup>101</sup>程楊潔：〈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載宋永毅等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8 年，第 746 頁。

行政分割的辦法。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將內蒙行政區劃出了6塊：東三盟（呼倫貝爾、哲裏木、昭烏達）分別劃給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巴盟所屬的三個旗劃給了寧夏和甘肅。從此，內蒙古自治區面積只剩下原來的38%，蒙古族人口只剩下原來的16%。<sup>102</sup>

1969年春天，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在清隊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4月19日（九大期間）滕海清、吳濤、李樹德3人對前一段工作中的錯誤，向中央作了檢討。經毛澤東和林彪批准，1969年5月13日和16日，中央將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李質找到北京談話。對挖「內人黨」事作了研究。5月19日，滕海清、吳濤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這個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在挖『內人黨』的工作中，產生了『左』的傾向，犯了嚴重的逼、供、信和擴大化的錯誤，「混淆了兩類矛盾和階級陣線，傷害了不少基本群眾，損害了各族人民的團結，一些革委會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聯合遭到破壞」，「挖『新內人黨』的工作應立即停下來，對誤傷的好人要徹底平反，並做好善後工作；因『內人黨』問題被關起來的，除確有證據和少數有重大嫌疑的要繼續審查外，其餘都要立即放出來。該解放的幹部要迅速解放出來」。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呈報的這個文件。中共中央的批語中要求「迅速糾正前一段時期在清隊中所犯的擴大化的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毛澤東批不：「照辦。」<sup>103</sup>這就是「5.22」批示。

「5.22」批示以後還有兩種意見相持不下，一種意見認為，挖「新內人黨」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這種意見以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所主張；另一種意見認為，「新內人黨」子虛烏有，挖「新內人黨」運動完全錯了。在挖「內人黨」時，造反派群眾組織比較消極且有抵制，還壓制保守派參加「挖肅」。為此滕海清號召保守派群眾起來踢

<sup>102</sup> 舍那木吉拉：《我的人生足跡》，自印本，2012年，第104頁。

<sup>103</sup> 中共中央批轉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呈報的〈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1969年5月22日；中發（69）24號。

開壓制他們革命的「假洋鬼子」，在「挖肅」運動中立新功。一些保守派的幹部群眾成了「挖肅」的積極分子，他們立功心切，在「挖肅」中心狠手辣。1969年「5.22」毛的指示下達後，「挖肅派」被動，而反對「挖肅」的群眾形成了強大的「批滕派」隊伍，「挖肅派」就成了「保滕派」。「保滕派」有軍隊支持仍有恃無恐。兩派尖銳對立。

1969年12月19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實行全面軍管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9〕85號，簡稱「12.19決定」），由北京軍區負責執行。北京軍區由鄭維山司令員、杜文達副司令員、黃振棠、張正光副政委組成前線指揮所，進駐呼市。從此，內蒙古革委會的一切活動都在「前指」控制下進行。以鄭維山為首的「前指」，堅持「挖肅」只是擴大化了，不能否定。鄭維山執行軍管任務後，扶「挖肅派」，壓「批滕派」。軍管會將內蒙幹部分為四等：一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肅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肅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批滕派」批判軍管，批判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這樣，原來的「挖肅派」和「批滕派」的鬥爭轉化為擁軍派和反軍派的鬥爭。<sup>104</sup>

直到1971年「9.13」事件後，鄭維山因和林彪的關係，被接受審查，調離內蒙。接替鄭維山的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他和前兩任一樣，繼續把「民族分裂」問題當作文革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他強調保護那些挖「內人黨」的積極性。

王鐸1975年2月復出任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10月尤太忠調走後，王鐸接管清查工作（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在內蒙主要是清查「挖肅」），他將保守派組織「無產者」定為「正確的一派」，是「保黨派」，有些在「挖肅」中罪行繫繫的人受到保護。<sup>105</sup>阻止「挖肅」的造反派再一次受害。任自治區革委會常委的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迴批鬥，接着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三年之久。還準備判重刑，在胡耀邦的干預下，才得以

<sup>104</sup>阿拉滕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316頁。

<sup>105</sup>阿拉滕德力海：《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自印本，第249頁。



釋放，但釋放後還是放在工廠勞動。

### 河北省深澤叛徒集團案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將天津部份幹部召到北京，發表了講話，指出了天津「二黑一砸」<sup>106</sup>問題。這次會議後，天津立即開展了清查「二黑一砸」運動，這是天津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內容，受害者沒有統計。就在2月21日晚上，江青點了天津文藝界許多人的名字，還點了河北省獻縣、深澤縣有大叛徒集團。深澤縣、獻縣都是冀中老根據地，在這裏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很多，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澤縣的。江青的講話，實際上誣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2.21」接見之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隨即進行了一次改組。市革委會常委王亢之自殺身亡。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一排排彎腰掛牌或戴着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3萬多人。<sup>107</sup>

### 廣西地下黨案<sup>108</sup>

1969年3日廣西自治區革委會把廣西地下黨作為「大案」「要案」列入所謂鬥批改的「主要任務」。自治區一位負責人說：「廣西地下黨受敵人的破壞是很大的，據初步掌握的部份資料，先後發生過35起重大事件，破壞面達到8個專區58個縣（市），其中重點縣市28個。」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了「清查廣西地下黨小組」，又在全區解放前有地下黨活動的74個縣市，都組織了地下黨問題專案組，專案人員共700

---

<sup>106</sup>「二黑一砸」：1967年在天津召開了「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代表座談會」，被稱為黑會，1967年天津話劇團編演了《新時代的狂人》（歌頌反劉少奇的湖南人陳里寧），被稱為黑戲，還有「砸爛公檢法」。

<sup>107</sup>1978年5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孫福田發言第4頁：《春風化雨集》（上），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年，第196-204頁。

<sup>108</sup>《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多人。對廣西地下黨進行全面審查，時間長達三年多，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例如桂林地區地下黨游擊隊先後共 5 千多人，被審查的有 3, 910 人，遭迫害的達 2, 087 人，被迫害致死的 201 人。1968 年 2 月，廣州軍區、廣西軍區、欽州專區「三辦」派人到合浦縣、北海市組織 106 人的工作隊，調查清理地下黨所謂「南路黨」的問題。在審查所謂「南路黨」事件中，合浦全縣被審查 1, 348 人，被打死逼死 7 人，致傷致殘 26 人，被打成「叛徒」36 人，「特務」4 人，「土匪」109 人。

### 廣東地下黨案

1968 年 3 月，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親自掛帥，設立公室，部署審查「廣東地下黨問題」，把地下黨組織說成「特務免組織」、「叛徒支部」、「國民黨支部」，被關押、批鬥的有 7 千多人，數以萬計的家屬和知情人被株連。<sup>109</sup>

### 很多地方都有集團冤案

在清隊運動中，憑空製造的集團冤案很多地方都有。中央組織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8 萬多人受株連，3 千人死於非命。<sup>110</sup>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 913 人，「致死 25 人，致殘 51 人。」<sup>111</sup>北京密雲縣高嶺公社 5 造出一個「反共救國軍北京地下野戰軍」，構陷 100 餘人，其中 7 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sup>112</sup>山東棗莊製造了「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 720 人被關押，10, 659 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 2, 425 人，致殘的 692 人，被打死過死的 94 人。」<sup>113</sup>在臨沂地區弄出一個「馬陵山游擊隊土匪集團」，「在這一事件中，全地區有 4 萬多人被抓捕、

---

<sup>109</sup>當代廣東研究室編：《嶺南紀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69 頁。

<sup>110</sup>馬志剛編《大冤案與大平反》。團結出版社，北京。1993 年，第 261 頁。

<sup>111</sup>《凌源縣志》1995 年，第 24、416 頁。

<sup>112</sup>《密雲縣志》，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30 頁。

<sup>113</sup>《山東四十年紀事》。1989 年，第 138 頁。

關押和慘遭毒打，有 9,000 多人被打傷致殘，有 569 人被打死和逼死。」<sup>114</sup>1969 年 11 月 13 日，安徽馬鞍山第 17 冶金公司禮堂因電器路失火，當時正是「清隊」高潮，市人保組（軍管會）認為是階級敵人縱火，對公司 6 名所謂嫌疑對象隔離審查。一位被審查者在嚴刑中被迫交代自己參加了「中華民族新生黨馬鞍山區十七冶特別執行委員會」反革命集團。並編造出蕪湖市、池州地區、馬鞍山市、馬鞍山鋼鐵公司一大批領導幹部都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計劃在馬鞍山搞反革命暴動，因暴動未成，所以縱火燒禮堂。以軍隊幹部為主的專案組信以為真，組織幾百人進行偵查，將 712 名人員作為審查對象，關押 133 人，被刑訊逼供自殺人 8 人，在關押中病死 1 人。<sup>115</sup>安徽東至縣在清隊中清出 58 個反革命集團，成員 3,564 人，被打死、逼死 37 人，事後調查，全是假案。靈璧縣在「清隊」中，挖出了一個「特務網」案件，涉及 4 省、6 市、9 縣、30 個公社、12 個縣直單位，挖出所謂特務組織 70 個，特務分子 1,020 人，其中逮捕、拘留 18 人，立案調查 231 人，關押審查 965 人。在辦案中刑訊逼供致死 120 人，致殘 146 人。在抓這個特務網案過程中，縣、社、隊先後辦學習班 1629 期，被強迫進學習班的人數達到 28.3 萬人次，佔全縣人口總數 1/2。一段時間靈璧縣成了一座大監獄。如此荒唐的「特務網案」，安徽省革命委員會還作為清隊典型，於 1970 年初在合肥進行展覽，讓全省效仿。

116

---

<sup>114</sup>同上。

<sup>115</sup>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秘〉，《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

<sup>116</sup>同上。



第一八章

「一打三反」



「三反分子」彭德懷

「一打三反」運動源於 1970 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的三個文件，即〈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1970〕3 號，1 月 31 日發出，以下簡稱「一打」）、〈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中發〔1970〕5 號，2 月 5 日發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中發〔1970〕6 號，2 月 5 日發出）。本書作者是親歷過、採訪過這段歷史的人，我對「三反」沒有留下記憶，而「一打」印象深刻。「一打三反」的重點是「一打」。

「一打」就是鎮壓現行反革命，就是鎮壓文革運動中的政治異己分子。1970 年 2 月 11 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公佈的 55 名「罪犯」當中，除了少數幾人因殺人獲罪外，絕大部份人是因「思想反動」「散佈反革命言論」而獲罪的。「一打」是極權政府發動的一場大規模以扼殺思想言論為目的政治運動。

如果說清理階級隊伍的受害者主是文革前的政治賤民，那麼「一打」的受害者主要是挑戰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者，他們是政治犯，是「言論犯」、「思想犯」。

「一打三反」運動從 1970 年初開始，到秋天風頭正健，這時卻發生了毛、林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全國轉入「批陳整風」運動。1970 年 11 月，「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也有些地方結束得晚一些。這場運動有多少人受害？文革史專家王年一認為，1970 年 2 月到 11 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 萬多名，捕了 28.48 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sup>1</sup>很多學者認為，「殺了數以千計的人」這個數字偏小，文革研究者王銳估計，殺人數在 2-3 萬人之間<sup>2</sup>，旅美學者丁抒認為，「一打三反」殺了 10 萬人，<sup>3</sup>他又說過 15 萬到 20 萬之間<sup>4</sup>。多數研究者認為被殺人數有幾萬人。

清查「5.16」（1967 年 8 月到 1972 年）、清理階級隊伍（1968 年初到 1970 年初）、「一打三反」（1970 年初到年底）都是當權者鎮壓群

<sup>1</sup>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37 頁。

<sup>2</sup>王銳：〈誰簽署了遇羅克的處決令〉，共識網 2010 年 1 月 20 日。

<sup>3</sup>丁抒：〈風雨如磐的日子：1970 年的「一打三反」運動〉，載《華夏文摘》343 期（2003 年增刊），第 1-14 頁。

<sup>4</sup>丁抒：〈文革死亡人數一家之言〉，引自白晶：《我們應該怎樣記憶歷史——「一打三反」四十週年反思》。

眾的運動。這三個運動時間有交叉，有些地方在某個時段上把三個運動結合在一起進行。所以，很難單獨統計出「一打三反」的受害人數。我估計，這三個運動加在一起，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 200 萬，相當於文革中幹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 20 倍。

## 「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

1970 年 1 月 30 日，周恩來將〈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毛澤東批：「照辦。」第二天，這個文件以中發（1970）3 號文件下發。

「一打」文件的起草之前，沒有看到毛澤東有甚麼指示（例如「公安六條」是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再由周恩來主持制訂）。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是周恩來主動提出「一打」的。周恩來說：「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sup>5</sup>並且向毛交上了這個文件的「成品」。

為甚麼周恩來「認為現在需要這樣一個文件」？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備戰。當時中蘇關係緊張，全國都在落實元旦社論提出的「落實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為了不讓國內的「反革命分子」成為「帝修反的內應」，預先嚴厲鎮壓，這是加強戰備的一個方面。第二是維持社會穩定。當時各地革委會已經成立，「九大」已召開了半年多，就各地軍政要員來說，鞏固革委會、維持地方穩定是他們最關心的事。當時，群眾組織已經解散，造反派雖然成了被邊緣化了的散兵游勇，但還有一定的勢力。他們搞「反復舊」，挑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河南省革委會負責人劉建勳憂慮地說：「有的人提出『打一場政治建廠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軍威』，實際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謂『反復舊』的硬仗，重振軍威，就是重新打旗。」「他們提出『反復舊』的口號，……他反的是甚麼復舊？他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sup>6</sup>很多地方革委會領導人也有

<sup>5</sup>《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346 頁。

<sup>6</sup>劉建勳、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0 年 1 月 24 日。

劉建勳這樣的想法，他們用「鎮壓反革命」的震懾力逼迫不服從者就範。第三是社會上出現了反對文革的力量。到 1970 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三、四年，問題越來越顯露出來，懷疑文革、批評文革的言論逐漸多了起來。

「一打」文件強調：「為了落實戰備，鞏固國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反必肅』的教導，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穩、準、狠地予以打擊」，「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繫繫、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會人心大快，敵人震懾」。文件規定，殺人權下放到省革委會，在中央備案。

周恩來不僅主動提出鎮壓反革命的文件，掀起了這場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他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周恩來年譜》多處記錄了他對這場運動的關注。

「一打」文件（中發〔1970〕3 號）正式下發前，北京市已經行動。1970 年 1 月 9 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 20 人「處決名單」。1 月 27 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 10 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 19 人。遇羅克謊稱有「5.16」重大問題要交代，這次沒有處決。

2 月 11 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發出通知，公佈了包括顧文選、沈元、張郎郎、聞佳等 55 人「罪犯」名單。3 月 5 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 18 人，加上遇羅克共 19 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 10 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sup>7</sup>。

有首都的示範，中央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迅速行行動。

1970 年 2 月 12 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

---

<sup>7</sup>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 30 號判決書。



查金華等人。查金華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小組，對當時的政策提出了批評。處決查金華等人當天，江蘇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報道公判大會實況同時，發表了殺氣騰騰的評論員文章〈迎頭痛擊階級敵人的進攻〉，號召「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當天夜裏，陳卓然、蘇小彬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拼合成六條標語，貼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標語的主要內容有：「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這些標語猶如夜空的閃電，使人震驚。省市公安機關作為要案偵查。陳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畢業後赴江蘇省洪澤縣人河公社插隊落戶。兩個月後，因知情者告密而案破。在4月28日公判大會上，陳、蘇等人鎮定自若，當陳卓然看到那個賣友求生的告密者時，憤怒斥責道：「總有一天要跟你算賬……」話沒說完，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龍繩被狠狠抽緊。大會宣佈，陳卓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蘇小彬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sup>8</sup>

3月6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10萬人公判大會，當場宣判1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判處其他幾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這天下午，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商店停業，上百萬人被集中到主要幹道兩旁列隊「觀摩」，十餘部刑車加上警車、軍車，殺氣騰騰地押解「現行反革命分子」遊街示眾，所有「犯人」均被揪住頭髮強迫仰起面孔，以便讓廣大革命群眾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車隊出五台山體育場北大門後，沿廣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東路—大行宮—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門等路段遊街後，直馳鳳凰西街盡頭處刑場，在那裏11名被判死刑者當場處決。死者家屬由於事先不知親人被判死刑，因此不曾準備盛骨灰的器具，所有骨灰被棄，真正乾淨徹底被「消滅」了。

繼「三六公判」之後，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1970年相繼召開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大張旗鼓地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1970年4月28日殺12人；7月30日殺24人；12月10日殺10

<sup>8</sup>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第126頁。

人。<sup>9</sup>

以上四批慘遭處決的 57 人，罪名幾乎完全一致——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當時簡稱為「惡攻」罪。1980 年前後，上述 57 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確認為冤案而獲「平反」，冤殺率為 100%!

上海的「一打三反」運動至 1972 年底始漸告平息。僅上海市郊區的 10 個縣，有 64, 000 人被揪出來進行鬥爭。其中有 520 人「非正常死亡」。<sup>10</sup>

廣東省從 1970 年 1 月到 1971 年 6 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殘酷鬥爭，隨意株連，全省共挖出「階級敵人」26, 000 多名。其中絕大部份是冤案。<sup>11</sup>1972 年 1 月，廣州市革委會宣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破獲了 2, 168 起「大案」，發現了 147 個「反革命集團」。<sup>12</sup>

浙江全省立案審查的達 67, 900 人，其中定性判刑的 2, 200 人。運動深入到基層，隨意定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廣場開大會，隨手拿張上面有毛主席語錄的報紙墊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sup>13</sup>

2 月 17 日：哈爾濱市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對運動進行了動員和部署，全面開展了「大揭發、大檢舉、大圍剿」的群眾運動。3 月 1 日，哈爾濱市革委會保衛組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門前廣場召開「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宣判大會」，10 萬餘人參加，殺了一批人。<sup>14</sup>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黑龍江省僅「在全省財貿戰線」就破獲的 3, 173 起「政治案件」和 37, 462 起「經濟案件」。<sup>15</sup>1970 年 5 月，黑龍江省革委會人民保衛部〈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情況綜合彙報提綱〉中說：「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分子 5, 927

---

<sup>9</sup>方子奮：〈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共識網，2010 年 1 月 27 日，方子奮說「三六公判」是第一次，實際上 2 月 12 日殺了查金華。

<sup>10</sup>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523 頁。

<sup>11</sup>《廣東省志·政治紀要》，廣東人民出版社，第 229 頁。

<sup>12</sup>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廣州黨史大事記》，313 頁。

<sup>13</sup>程超、魏皓奔主編《浙江文革紀事》，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 年。

<sup>14</sup>哈爾濱檔案館：《哈爾濱「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大事記》，1988 年 2 月。

<sup>15</sup>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1949 年 10 月-1989 年 12 月）》，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36 頁。

人，歷史反革命 1,043 人，叛徒 61 人，特務 172 人，地富反壞分子 1,805 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 72,069 人。<sup>16</sup>其中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長春市在 1970 年共組織了 6 個戰役，搞了四次全地區大清查，召開五次公審大會，判處各類「罪犯」1,068 人，多數是錯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長春地區被逼自殺死亡 248 人。<sup>17</sup>

河北省保定市，運動一直延續到了 1972 年 12 月。接連 7 場公開審判會使恐怖達到了高潮，17 人被處決，1,325 人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懲處。<sup>18</sup>石家莊地區，地、縣兩級普遍建立了「一打三反」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先集中時間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6 月份轉向經濟領域的鬥爭。一年來，全地區被列為「重點對象」共 46,738 人，其中被刺為敵我矛盾的 3,942 人。全地區曾先後公判 8 批「罪犯」，判處死刑 100 名、關押 1,372 人、戴帽管制 1,078 人。<sup>19</sup>

四川省萬縣地區革命委員會建立了「一打三反」領導小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骨幹學習班和「受蒙蔽群眾及知情人員學習班」。先後將進入萬縣各級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頭頭和其他被清查對象 1,167 人送進了隔離學習班。清理了群眾組織頭頭以後，召開了萬縣地區 9 縣 1 市號稱有 100 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清查和打擊。到 1971 年的 1 月底，全地區揭發出反革命集團 225 個，現行反革命、叛徒特務和敵偽軍警憲骨幹分子 17,497 人，貪污盜竊、大投機倒把分子 2,999 人。<sup>20</sup>

1970 年 2 月 10 日，中共西安市革委會核心小組對「一打三反」運動作了具體部署。截至 3 月底，全市共檢舉、揭發各種問題 15 萬餘件，涉及 42,000 多人。運動開始僅兩個月，全市就有 89 人逃跑，160 人自殺（死亡 125 人）。<sup>21</sup>西安交大在「三、五、六」（即中央 3

<sup>16</sup>《黑龍江省志·第 70 卷·共產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51 頁。

<sup>17</sup>《長春市志·公安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56 頁。

<sup>18</sup>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保定黨史大事記（1949 年 10 月 4978 年 12 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 361 頁。

<sup>19</sup>中共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室：《石家莊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 年 5 月-1978 年 12 月）》，1997 年 3 月，轉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第 2 版。

<sup>20</sup>謝聲顯：〈我怎樣被炮製成「從嚴對象」〉，共識網 2014 年 3 月 26 日。

<sup>21</sup>《西安市志政治軍事卷》，西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安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73 頁。

號文件、5 號文件、6 號文件）學習班期間，錯定現行反革命 35 人，錯定反革命集團多起，6 人被迫自殺致死，13 人被無辜送司法機關拘捕。陝西安康縣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是 1949 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 254 人，槍決 17 人，判刑 12 人，戴「反革命」帽子 25 人，20 人自殺身亡。<sup>22</sup>

湖南省在「一打三反」運動是由軍宣隊、工宣隊主持的。各單位都成立了「三號」（即中共中央 3 號文件）辦公室，原來參加過造反派活動的頭目與骨幹分子在這場運動中也遭到打擊。從中央委員唐忠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至區街小廠、街道居委會中的原造反派負責人，幾乎都被整肅。少數被槍決，相當部份被拘捕入獄，其他大部份則統統從各級革命委員會中開除，進行批鬥，並關進所謂「學習班」予以隔離長達數月、甚至近一年時間的「反省」。當時，《長沙晚報》的一篇社論中，竟連續提出九個「殺」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正國法，殺、殺、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

## 二、大批思想者被槍斃

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判死刑卻倖存下來的張郎郎說：「一打三反」「是一次『坑儒』的運動。因為被殺的大多數是知識分子。」<sup>23</sup>當時，一些人對文革、對專制制度的獨立思考，產生了與官方不一致的看法，他們傳播和堅持自己的看法，就被槍殺。槍殺思想者是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行徑。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屠殺的思想者成千上萬，本書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介紹以下受害者。

### 張志新

張志新，1930 年生於天津市，1957 年調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工

<sup>22</sup>白磊：《我們應該怎樣記憶歷史——「一打三反」四十週年反思》。

<sup>23</sup>張郎郎：《關於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

作。1968年11月下放到遼寧盤錦「省五七幹校」。12月，同一幹校的女幹部告發了她的「現行」問題，就被關在幹校的「學習班」裏。此後張志新口頭、書面發表了一系列的言論，被多次批判。她在〈對「文化大革命」有關問題的觀點、看法〉中寫道：「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的錯誤，所以沒能總結吸取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經驗和教訓。」「我認為當前我國進行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那種『左』傾政治路線錯誤的繼續、擴大和發展。是毛主席在建國後應用馬列主義學說處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時發生的『左』傾教條主義性偏差、錯誤的繼續和發展。先是發生在經濟建設上的錯誤，進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領域。」「歷史事實本身就否定了從1967年以來，存在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資產階級地下司令部。（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所列舉的路線鬥爭史事件，是不真實的，違背歷史本來面貌的。」1969年9月24日張志新被逮捕。1970年5月被判處死刑，當時遼寧省的最高負責人陳錫聯發話：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8月20日，改判無期徒刑。此後，張志新在極度摧殘中神經錯亂，多次書寫「打倒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標語。1973年11月16日，張志新參加「批林批孔」大會，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等口號。1975年4月4日再次判處死刑，慘遭殺害，時年45歲。幾個大漢，把張志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刀子割斷喉管。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 遇羅克

遇羅克上學時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自1957年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兩次參加高考都因家庭出身而沒有錄取，他只好在人民機器廠做學徒工。在困境中，他苦讀中外哲學名著，對文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把這些想法寫在日記上。在恐怖的「紅八月」中，這本閃爍着思想光輝的日記被抄走了，作為「變天帳」放在「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上。他也被帶進了「學習班」。1966年9月他從「學習班」上被釋放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他開始



林昭塑像，1968年4月29日以「反革命」罪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張志新因反對個人崇拜被判「反革命」罪，1975年4月4日遭槍決。

向猖獗一時的「血統論」宣戰，寫下了〈出身論〉。

〈出身論〉分三部份：(1)「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2)「重在表現問題」；(3)「受害問題」。前兩部份從理論上分析「血統論」的荒謬，第三部份列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的情況，痛斥了社會生活方面的出身歧視，然後說：「『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甚麼區別呢？」，「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妄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偽裝的特權階層，以至反動的種性制度，人與人之間新的壓迫」。文章最後大聲疾呼：「一切受壓迫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出身論〉寫成後，他先寄給中共中央，沒有回音。他自刻鋼版，油印了幾百份散發，大批受「血統論」迫害的人如得甘露，傳抄，議論，深思。贊同〈出身論〉的北京四中的幾位學生辦起了《中學文革報》，全文刊載〈出身論〉，第一期印了3萬份，一搶而空。很快重印6萬份，又一搶而空。接着，難以數計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飛來。這些信表達懇切的支持，憤怒的控訴，使遇羅克激動不已。1967年下半年，他又寫了〈工資論〉，提出工齡工資作為基礎，其餘按貢獻分配。1967年底，遇羅克寫了〈1967年總結〉，又寫了1968年讀書計劃（要讀104冊書）。寫完總結的第五天，遇羅克被捕了。面對無理的強權，遇羅克沒有恐懼，沒有妥協。他在獄中寫的〈贈友人〉中寫道：「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10萬人的宣判大會上，遇羅克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被剃光頭、身掛大牌的遇羅克昂然挺立，不肯低頭。一顆罪惡的子彈奪去了這位思想者的生命，時年27歲。<sup>24</sup>

## 蔡鐵根

蔡鐵根生於1911年，1936年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了平型關戰鬥。1949年後在中央軍委軍訓部任職。

<sup>24</sup>王晨、張天來：〈劃破夜幕的隕星〉，載《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三），華夏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253-282頁。

1955 年授予大校軍銜，1956 年調任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

1958 年的 5 月至 7 月，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批判劉伯承、蕭克的「教條主義」。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蔡鐵根也受到批判。批判會氣氛恐怖，有些高級軍官甚至對被批判者破口大罵：「媽了個 X，反革命！槍斃他！」

蔡鐵根問軍事學院政委鍾期光：「政委，你說還有沒有真理？黨內難道就不講真理了嗎？」鍾期光苦笑着對蔡鐵根說：「我的同志，難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蔡鐵根據理力爭，有人衝上台來，七手八腳地動手扯掉他的肩章領章，把他連推帶搯地拉下台來。

1958 年 10 月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降為 14 級，放到常州一家公司工作。接着是幾年大饑荒。他對這場人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記中記錄了大饑荒時「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慘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領袖、所有制和社會制度。他寫道：

「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可真稱得起是『亙古一人』，他能夠幹出古今中外各個歷史時期的統治者都辦不到的事——統治思想。」「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小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一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一些卑鄙，惡濁，不惜一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於是一些懷着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圖的人們，便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據說只有他或他們才是正確的，於是便要求人們喊他或他們萬歲！」「……為了篡奪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袖，他要求全黨都成為他的『馴服工具』，他把一切持有不同意見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反黨集團』等等的封號。他把黨章踐踏得狗屁不值，把黨內民主消滅得乾乾淨淨，還企圖消滅黨內外一切不同意見和異己。」「這些年來有那麼多人『犯錯誤』。只有一個人是永遠正確的，那就是毛先生。不過一切錯誤的罪魁禍首其實就是他。可是沒有人敢說他不對。因為他有比上帝更大的無限的權威，因而他也就是真理。」「他 1958 年曾吹牛說『再過一年便可吃飯穿衣不要錢』，



結果吃穿不僅要錢，而且還要許多種形式的『錢』，比鈔票更貴重的『錢』（指各種票證——引者註）。」「社會主義革命使一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一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制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注意的小玩藝，竟會使 6 億人民都失掉自由。」「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要國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甚麼都要管，（但只要他們一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一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一下子宣佈一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6 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sup>25</sup>

在常州期間，蔡與一些有獨立見解，對時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一樣被從軍內處理到地方的某部團級幹部吳翼等。他們的言行引起了有關方面注意，先是列為「政治案件」，後來上升為「反革命集團」。蔡鐵根作為「首犯」入獄。獄中他曾三次絕食抗議，並曾想逃出監獄赴京告狀，被察覺後被戴上了沉重的鐵鐐。

1969 年 11 月中旬，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將與蔡有牽連的 15 人，以辦「學習班」名義集中審查。「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整個案件驟然升溫。3 月初，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作出判決，以「蔡鐵根、吳翼為首糾合反革命活動」之名，將蔡鐵根、李業舫（同案者，常州市

<sup>25</sup> 蔡金剛：〈大校右派蔡鐵根〉，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9 期。

果品公司科長，40年代從事革命的老地下黨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吳翼死緩。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時40分，蔡鐵根、李業舫於常州市西門外公墓刑場被槍殺。<sup>26</sup>

### 張師亮

張師亮，河北省易縣人（一說涑水人）1930年畢業於北平大學經濟系，同年留學日本。1936年回國，先後在幾所大學校教書。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1965年秋，在學術討論中他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不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只講階級鬥爭，就丟掉了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他這個觀點一出，立即遭到歷史系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初，進駐師大的省委工作團組織群眾對他進行批判。他指責工作團把正常的學術爭論提高到政治問題，是「對我實行專政」。在歷史系的一次批判會上，他站起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工作團欲擒故縱，讓他把話說完。張教授不知道工作團的陰謀，整整講了一天。張師亮被扣上了反工作團、反黨、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1970年3月17日，張師亮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宣佈他死刑的時候，他掙扎着想站起來，但很快壓了下去。這位堅持正確學術思想的老教授，連喊一聲冤屈的權利也被剝奪了。<sup>27</sup>

### 毛應星

毛應星，生於1921年，西南農學院畢業，蘭州農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在甘肅夾邊溝勞動教養。四年後回到農校。不久夫妻雙方被下放到寧夏靜寧縣農牧站。文革開始後，看到社會上對毛越來越荒唐的神化，她說：這是「資產階級的譁眾取寵，奴顏媚骨地宣傳捧場」，「捧場者投革命之機，受損失的還是革命事業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她認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論」。因

<sup>26</sup>王銳：〈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記憶》2010年9月13日，第16期。總第57期。

<sup>27</sup>燕樹桂：〈因言喪生的老教授〉，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17-24頁。

此，她被宣佈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鬥。從她家中抄出她哥哥留下的照片和郵票，其中有蔣介石的頭像，成了罪證。抗日戰爭期間，其兄毛應鬥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與時在聯大附中任教的楊振寧（後來的諾獎得主）同住一屋。其間，曾參加西南聯大組織的假期旅行活動，與楊振寧等一起受到過地方軍政首腦接待並合影。毛應鬥喜歡集郵、收藏有一些國家領導人肖像郵票。毛應鬥赴美留學前，將自己部份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郵票）交妹妹毛應星保管。1969年1月23日，毛應星被捕，7月1日被判刑五年，關押於甘肅省第四監獄，在獄中對文革現實及中國革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寫下30多萬字筆記。這些筆記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滿。針對亂批、亂鬥的現象，她寫道，這「有利於資產階級野心家、資產階級政客，倒霉的是老百姓」。針對「破四舊」，她寫道：「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有許多珍貴的歷史遺產；誰否認這一點，就一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針對黨媒對形勢不切實際的美化，她寫道：「這明明是掩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她還寫道：「康生、陳伯達……對個人極盡諂媚之能事。林彪的文章和報告使人感到突出的就是歌功頌德，實際上是假崇拜，真醜化。」「一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對其「罪行」的認定升級，4月9日，當局派人在獄中向毛應星宣佈死刑判決。4月14日押赴刑場槍決。<sup>28</sup>

### 忻元華

忻元華1934年生於浙江，1952年赴新疆從事鐵路建設。1962年，他自學完了大學有關課程，還讀了大量政治理論書籍。1963年他任哈密水電段的經濟計劃員期間，深入思考「三面紅旗」直接引發的大饑荒，寫下了很多筆記，他在筆記中寫道：「既然錯誤和，點是全國性的，而且繼續了三年之久，這就明顯地是指導思想的錯誤。各省、市在執行中央指示上雖然也有偏差，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領導問題。」他給毛澤東寫信，在信中把毛比作太陽，希望毛「承認自己是銀河系中普通一員」，「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掙脫一切

---

<sup>28</sup>劉玉：〈寫信寫出死刑犯〉，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43-52頁。

『渴望』的魔爪，把自己放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他先後向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全國 48 家報社雜誌社，投寄了 9 封共 177 份陳述意見的信件和詩詞。1963 年 7 月 3 日，忻元華被捕。1965 年，忻元華被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改造。

1967 年 1 月 24 日，在監督改造期間的忻元華交給了哈密水電段保衛股一封信，這是忻元華寫的第十封信。信中說：「祖國的上空籠罩着個人崇拜的陰雲：產生的普遍現象。」「兩面派是在個人迷信氾濫成災的情況下必然信中說，自 1957 年反右派和 1959 年反右傾之後，「黨內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說白話而說暗語了！」「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偉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說假話的民族了。」信中說：「毛主席已經生活在歌頌的迷霧之中，脫離了現實世界，脫離了工農大眾，這是比糖衣炮彈還要厲害千倍的糖衣炮彈啊！」他堅信：「籠罩着整個祖國上空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烏雲，必將在空前覺醒的億萬人民風暴的衝擊下，迅速地被驅散，一個無限美好的祖國，已經在微笑地向我們招手。」

保衛股將信交給鐵路哈密公安段以後，第二天忻元華就被遊鬥以後拘留。在無數次審訊中，他把審訊廳變成宣傳他的思想的場所。1970 年 5 月 13 日，上面批准了對忻元華的死刑判決。5 月 30 日，他們對忻元華作最後一次審訊。忻元華鎮定自若，堅定地說：「誰是誰非，歷史將作出正確的結論！」1970 年 5 月 30 日，忻元華在新疆被槍決。<sup>29</sup>

## 丁祖曉

文革中，掀起狂熱的造神運動，開會前跳「忠字舞」，講話前向毛澤東「表忠心」，每天站在毛澤東像前瞻「早請示」、「晚彙報」。<sup>30</sup>在

---

<sup>29</sup>吳鐵宣：《轟動全新疆的忻元華「反革命案紀實」，載韓尚於編《文革沉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 年，第 53-64 頁。

<sup>30</sup>1967 年 11 月 1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 8341 部隊給毛澤東送上〈關於北京市針織總廠支工情況的報告〉中介紹，工人們說：「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後向毛主席彙報，檢查工作和思想。生產中看看車頭鏡（語錄牌），幹勁猛增長；交班交語錄。互相關心互相幫。」與這個報告同時送給毛澤東的，還有北京針織總廠革命委員會 1967 年 11 月 11 日給毛澤東的報喜信。11 月 15 日，毛澤東對這兩個報告作了批示：「看過，很好，謝謝

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家家升起了「忠字旗」，戶戶掛起了「忠字匾」，村村樹起了「忠字碑」，過去安放神龕的地方變成了「寶書台」，供上了「紅寶書」。還把「早請示」、「晚彙報」等表忠心的五項宗教式的程序稱為「五個第一」，要求大家每天必做。女社員丁祖曉和她姐姐丁祖霞不滿意這些作法，寫傳單散發，批評「忠」字運動：「這『五個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像封建社會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帝王，天天朝拜。」「每天喊7億或14億聲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也不會真的活到一萬歲。」「吃飯時也做『五個第一』，把飯菜盛齊擺上，做了『五個第一』再吃，這又好笑又好氣，毛主席還沒死，就把他當死神來敬奉，太不應該了。」她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不要甘心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曉被捕，不久，她姐姐也投進了監獄。下鄉女知青李啓順，得知丁祖曉受到殘酷的折磨，就刻印了〈告革命人民書〉，為丁祖曉辯護，說丁祖曉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先鋒」，並和她妹妹、17歲的李啓才深夜到縣城散發。李氏姐妹很快被逮捕。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槍斃。李啓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丁祖霞被判二十年，17歲的李啓才判了十年徒刑。<sup>31</sup>

### 馬綿珍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一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藍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逮捕後她就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

---

同志們！」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這兩個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從此，「早請示，晚彙報」等荒唐活動風靡全國。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達文件說：「不要搞『早請示，晚彙報』，飯前讀語錄、向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sup>31</sup>田大業、吳兆麟〈湘西「特一號」案始末〉，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25至32頁。

一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一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最後懲罰，死時年僅30歲。<sup>32</sup>執行前，因怕她呼口號，竟給她嘴裏塞上彈簧。

### 林舜英、李立榮母子

1970年12月10日下午，南京五台山露天體育場，10萬看客又一次席地而坐。在被綁上審判台的死刑犯中有一對母子：26歲的李立榮和他60歲的老母林舜英。他們因「現行反革命」罪同時被處決。母子罪名雷同：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十年之後，南京市中級法院給這母子二人的平反結論：「經查，所謂反革命活動，並無事實，應予否定。所謂攻擊言論，主要是對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不滿，只是其中說過比喻不當的錯話。因此，原以反革命論處顯屬錯判。」

### 吳曉飛

1970年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氾濫的根源」，說文革對劉少奇的迫害是「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sup>33</sup>

### 施大偉

西安第八設計院技術員施大偉，因對林彪、江青不滿，對1957年至文革期間的一些方針、政策進行議論，1970年3月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家設計院是第一機械工業部

<sup>32</sup>鄧正新：《貴州文革大事集（第五次增補稿）》，電子版。

<sup>33</sup>《上訪通訊》編輯室編：《麵化雨集》（上），群眾出版社，1981年，第406頁。

第八設計院，位於西安和平門附近。本書作者 1970 年在西安第八設計院牆上看到「槍斃反革命分子施大偉好得很！」的巨幅標語，一筆工整的宋體字，顯然是工程設計人員的傑作。本是同根生的工程設計人員卻說同類被殺害「好得很！」，令人震驚。

### 余正常

西安市衛生宣教館美工余正常，僅因為保存部份名人字畫及自己創作的寫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保存黑畫、利用黑畫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由，按反革命罪處以死刑。

### 陳耀庭、謝聚璋

陳耀庭，江蘇吳縣人，江西贛南醫學專科學校教員。從 1966 年到 1967 年，他與妻子謝聚璋一起匿名寄出十多篇文章，批評文革。1967 年 7 月，他們寄出的信件被定為「特大反革命案件」在全國各地追查。1967 年 12 月，陳耀庭被捕，1968 年 2 月，謝聚璋被捕。1967 年 3 月 16 日，陳耀庭被判處死刑，四天後被槍決。謝聚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71 年 7 月 11 日死於江西勞改農場。<sup>34</sup>

### 石仁祥

石仁祥，1942 年生於安徽和縣，1964 年參軍，1966 年調西藏某部隊任文書。他對林彪的「5.18」講話寫下了評語：「這個講話舉出了一些中外政變的例子，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隨意解釋，存在着『英雄造時勢』的反動觀點，是一個變相的在革命詞藻的掩蓋下的反革命『白皮書』。」1968 年 4 月退伍到安徽和縣水利局工作。他寫了〈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關於林彪問題的彙報〉，列舉了林彪的 28 條罪狀，信中说：「林彪打着紅旗反紅旗，耍弄反革命兩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他在信的末尾無畏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戰士石仁祥。在毛的生日 1968 年 12 月 26 日，他將這封信分別寄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和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他

<sup>34</sup>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4 年，第 46 頁。

原來所在的部隊。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軍保衛部派出2名軍官到安徽，向省革委會和人保組傳達吳法憲對石仁祥信的口頭指示：「這是一個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組織專人立即偵破，及時查清，查清後必須依法懲辦，並查清這封信的擴散面，肅清流毒，不准再擴散。」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獄中在牆上寫「打倒林彪」的口號。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審處決時他的喉管已被割斷，鄉親們聽不到他最後的聲音。<sup>35</sup>

### 徐惠昌

上海人，因為他家只有這一個兒子，家裏不讓他上山下鄉，在家待業。他喜歡音樂，學油畫，讀俄國和歐洲的古典作品，他把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本書全部抄下來。他聯繫當時的社會現實，思考了一些問題。他收聽了台灣「中央電台」的廣播，裏面說你們如果有甚麼情況要反映的話，可以寫信到香港的XX號信箱。十八、九歲的徐惠昌，不知道信寄不出去，按照廣播上講的地址寫了三封信，內容是關於上海街道和一些部門為了接待黑格<sup>36</sup>，準備尼克松的到訪，清理街道，要求基層對地富反壞右和精神病人嚴加控制，把他們集中起來管理，把出身不好的流放邊疆，……寫的都是事實。署名「李明」。

信寄出後很快被截獲，被定為「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洩露國家機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當時不過就是向海外新聞媒體投稿，他的所作所為屬於新聞自由範疇的權利。

周恩來知道此案後要求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下令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于桑親自到上海破案。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發給每一個單位，叫大家查對筆跡，十三天就把案子破了。

1972年9月30日，在虹口體育場對徐惠昌和其同案犯進行了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後沿着四川路、南京路、當時的西藏路，再轉到天

---

<sup>35</sup>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年，第253-255頁。

<sup>36</sup>黑格，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1972年1月，黑格率領先遣人員飛往北京，為尼克松訪華「破冰之旅」打前站。



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後到閘北射擊場槍斃。徐惠昌在一輛卡車上，被兩個警察架着。車上架着機關槍。徐惠昌掛着一塊很大的牌子，寫着：「現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個字上打了一個叉叉。他的頭頸被尼龍繩勒住，舌頭吐出來，臉漲得像豬肝那樣的顏色。

徐惠昌被捕後，他父親為了救兒子的命，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說是他自己寫的，他父親被判刑十年。後來死在監牢裏。他母親本來就是癱瘓的。他有個姐姐，姐夫原來是在空四軍工作，因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離婚了。<sup>37</sup>

### 方運孚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職工，在文革中，他向人坦露自己的觀點：「劉少奇是對的。他主張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有甚麼錯？」「劉少奇打倒了，但這些主張打不倒。」「彭老總的萬言書字字閃金光，他的行為將與日月同光輝，與天地共久長，千秋萬代受人崇拜。」「一打三反」中，方運孚被捕。經辦者擬判十五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二十年，最後還是被槍殺。<sup>38</sup>

###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多人被殺

1970年春節剛過，寧夏首府銀川破獲了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吳述樟、吳述森、魯志立、陳通明、張維智、張紹臣等13名青年被捕。這個「反革命集團」就是「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這13位年輕人在1966年、1967年曾經滿懷熱情地參加文化大革命，隨着運動的深入，他們感到迷茫，從運動中退出來埋頭讀書。他們是中學生，1968年都成了插隊知識青年。吳述樟在寧夏山區西吉縣玉橋公社範溝二隊。他在小屋門前貼出了「茅屋通天下，殘書達萬里」的對聯。每到夜深人靜，青年們就聚集在小茅屋裏讀馬列著作。他們表示：「我們決不隨波逐流，決不意志消沉！」1969年11月23日，他們以「認識真理、堅持真理，為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為目的，成立了

<sup>37</sup>張敏：〈言論獲罪殺身的徐惠昌——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載《民主中國》1999/3。

<sup>38</sup>《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大眾出版社，1981年，第107頁。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在兩年時間內，他們帶着文革中的現實問題，閱讀了《馬恩選集》、《資本論》等著作，在他們的《學刊》上有 20 多篇讀書心得。他們在〈甚麼是法西斯主義？〉中寫道：「禁止一切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壓制人民의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取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地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一部份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經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他們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確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他們說，林彪像當年袁世凱一樣利用文革篡權。他們在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旁邊批「放屁」二字。「共產主義自修大學」13 人中，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徐兆平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張維智被判處八年徒刑；張紹臣被判處三年徒刑；其餘 6 人受到拘捕關押和在本單位隔離、批鬥。22 歲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殺身亡。<sup>39</sup>

### 福建「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30 多人被殺

福建省龍岩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1938 年生，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一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 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 400 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幫人打鐵，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裏妻子離去，孩子餓死。直到 1961 年搞「三自一包」，龍岩的農民才有了一條活路。在文革中，他聽說大饑荒救命的「三自一包」是劉少奇搞的，就對被打倒的劉少奇充滿了同情。1966 年 10 月，他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進行秘密串連。讀過中學的青年農民謝永祺 1960 年幾乎餓死，積極響應。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

<sup>39</sup>陳川：〈共大血案〉，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 年，第 33-42 頁

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1967年5月，他們印發的口號是：起來，爭自由爭幸福！堅決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對統購統銷！擁護繳公糧，擁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幸福委員會萬歲！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劉主席萬歲！萬萬歲！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堅持執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幸福會」幾乎成了半公開的組織，近300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着「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當局從1970年3月立案，列為打擊對象。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殺身亡，8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sup>40</sup>

### 山西「中國共產主義聯盟」13人被殺

1970年3月28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機關軍管會貼出佈告，宣佈了對所謂「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刑事判決。佈告說，這個「反革命集團」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他們「公開承認南修綱領和蘇修路線」，「先後書寫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詩詞300多首、反革命書信179件，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惡毒地攻擊、誹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極其瘋狂地污蔑、咒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徐關增、王汝強、任大熊、劉世廣、鮑明、常瀛清、任宗正、白微錄、

<sup>40</sup>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89年，第315頁。

陳威權、曹介弘、吳國廷、湯福璽、關煥章，共 13 人。其他人都判了長期徒刑。<sup>41</sup>

他們的主要成員都是在押的政治犯。徐關增，1960 年因組織「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62 年改判無期徒刑。王汝強，1958 年任英國駐京記者辦公處翻譯，「因向英帝記者提供我國政治、經濟情報，攻擊、誣蔑我黨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任大熊：1957 年時為北大數學系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反右時 3 人都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劉世廣：1957 年反右時為清華大學學生。被打成右派後，於 1958 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官方意識形態強力灌輸、毒化了很多人的靈魂，加上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在家中講一些和政府不同的看法，有的親屬也會舉報。1970 年 2 月 13 日，安徽省固鎮縣方忠謀和她的丈夫張月升、16 歲的兒子張紅兵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方忠謀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為劉少奇翻案」。張月升和張紅兵非常恐懼，立即對方忠謀進行批判鬥爭。張月升對她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方忠謀寫完一張紙，張月升就拿着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的門縫。揭發材料的末段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軍代表接到舉報後來到張家，對着方忠謀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倒地上。然後像捆糶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響聲。剛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後槍決。張紅兵回憶說：「當時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1979 年。看到報紙上報道張志新的事情後，他們父子意識到：「我們做錯了。」1980 年 7 月 23 日，

---

<sup>41</sup>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刑事判決書》，1970 年 3 月 28 日；（70）軍刑字第 29 號。

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張紅兵為此悔恨終生。<sup>42</sup>

### 三、無辜的受害者

有一些「一打三反」運動的受害者不是思想者，卻因一些荒唐的原因慘遭橫禍。

貴州榕江縣忠誠小學教師莫定欽，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利用業餘時間，閱讀、抄錄、剪貼了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中、美、英、蘇、法五大國首腦人物的照片、簡介，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詩詞和重要歷史資料。他將這些資料編成了一本集子，並命名為《黃金難買》。這本資料放在小學辦公室的桌子上，老師、學生爭相翻閱。1970年4月，在「一打三反」高潮中，《黃金難買》成了反革命罪證。小學裏貼滿了大字報，批判《黃金難買》。廣播中吼叫着莫定欽的「滔天罪行」。接連幾個月，莫定欽遭到多次批鬥，頭髮被揪掉一大把，遍體鱗傷。他忍受不了批鬥，就偷偷出逃。三個月後一天夜晚潛回家，一群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人衝進屋子，用泡過水的麻繩緊緊地將他網住。縣政法負責人立即趕到宣佈正式逮捕。1979年9月29日，莫定欽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在莫定欽勞改期間，回鄉女知青、莫定欽的學生張友珍，幫助莫的愛人給莫寫過幾封家信，被扣上「勾結反革命」罪，多次被批鬥。<sup>43</sup>

1968年6月10日，安徽宿縣石油公司一名副科級幹部酒醉後臥床吸煙引起火災，被燒成重傷，搶救無效，次日死亡。當時結論是災害事故。1970年「一打三反」開始後，派到該單位的工作組認為石油公司「清理階級隊伍」不徹底，需要補課，說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燒死的，是「大貪污集團殺人滅口行為。」石油公司73%的幹部職工受到殘酷的刑訊逼供。全公司43人，22人被長期關押，3人被活活打死。經過兩年審查，沒有查出一分錢的貪污事實，專案組並不死心，

<sup>42</sup>新京報記者朱柳笛：〈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弑母」〉，2013年8月7日星期三，新京報。

<sup>43</sup>錢榕：〈編書被判二十年〉，載韓尚於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178-183頁。

強令石油公司從銀行貸款中提出 2,965.58 元，冒充贓款，證明貪污集團存在。<sup>44</sup>

湖南黔陽縣高陽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想搞出點成績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後，向公社報告說狗被人毒死。公社書記正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馬上批評大隊支部書記右傾，並責成副書記主持破案。副書記在大隊部架起一挺機槍，將社員抓去過堂。他聲稱揪出了一個 16 人的「反革命集團」，槍殺 1 人，逼得自縊身亡 2 人打殘二人，受株連者 115 人。<sup>45</sup>

#### 四、製造全民恐怖

「一打」文件規定：「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為了殺人時給旁觀者留田下可怕的印象。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殺害被害者之前，對受難者進行殘酷的折磨和羞辱。

方子奮是南京「三六公判」大會上被判刑的「現行反革命」之一，倖存下來的他，四十年後在回憶中寫道：

在公判大會主席台上，當主持人宣讀死刑判決後，我記得身旁那 11 位被綁得面孔紫黑的受難者們臉上的那種憤懣、痛苦、恐懼、無奈、絕望的神色；

從主席台押往刑車停放處的通道上，受難者們因為捆綁過緊、難以呼吸而發出的那種不忍卒聽的呻吟，那已經不屬於人的聲音，完全是一種動物被宰殺前從喉嚨裏擠出的淒慘低嚎；

刑車緩緩行進的遊街示眾途中，街道上空返蕩的那的警笛，正在向整個城市傾洩恐怖，正在折磨每一個聽者的神經；

那插入受難者頸背高高豎起的 11 支白色亡命標牌，隨著輛

<sup>44</sup>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隊」檔案揭秘》，《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

<sup>45</sup>丁抒：〈風雨如磐的日子：1970 年的「一打三反」運動〉，載《華夏文摘》343 期（2003 增刊）第 1-14 頁。



60年代末處決現行反革命的現場。

的顛簸在輕輕搖曳，就像地獄中伸出來的天線一樣，它們正在向人世空間發射死亡信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臉上那種混合着驚悸、恐怖、疑慮的情，刑車經過之處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由驚呼、嘆息、竊竊私許匯成的低頻聲浪：……那時我就在第7部刑車上，這些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親身所感的可怕場景伴隨我一直走到了今天，走了40個年頭！<sup>46</sup>

北京市的「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的一個多月裏，被分成小組，天天拖着沉重腳鐐，戴着緊鎖的手拷，分別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一次又一次鬥爭、示眾。有的單位沒有揪出反革命，就「借」別的地方的反革命到本單位開鬥爭會，肆意摧殘。上海煤氣公司青年技術人員桑偉川寫文章為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辯護，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此後，全市各單位都向煤氣公司「借鬥」桑偉川，桑偉川被各單位遊鬥了290多次，然後押送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sup>47</sup>

## 五、殘酷地扼殺最後的聲音

不僅是在民主國家，就是在專制國家，在執行死刑前得讓他留最後的話。有的還提供紙筆，讓他寫下留言。而在「一打」執行死刑時，執行者卻害怕死者發出最後的聲音。為此，採取了種種令人髮指的作法。

用麻繩勒喉管：蔡鐵根1970年3月11日執行死刑前，他剛要申辯，執行人員就勒緊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說不出話來。這是各地殺人時常用的辦法。

竹筒塞嘴：1970年10月，海南島白沙縣女醫士官明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被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

<sup>46</sup>方子奮：〈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記憶》2010年9月13日，第16期，總第57期。

<sup>47</sup>1978年5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周而復發言。第1-10頁。



「壓舌板」：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一塊木板緊壓舌頭，使其無法喊叫。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了壓舌器，嘴巴外再扣上一隻口罩。

割喉管：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也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遼寧在處決張志新前，監獄當局割她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在下達處死張志新的命令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 六、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

1971年初，新華社天津分社向記者們傳達了一條最高指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毛的這句話使大家震驚，震驚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聯繫到「一打三反」的現狀，殺人太多了！另一個是對毛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毛真的反對殺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殺人，毛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當然這只是心裏想的，不敢說出口。

後來查到了一個文件，即〈中央批轉《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的通知〉「中發（1971）20號」（1971年2月26日）。在這個「會議紀要」的第一部份中有這一段話：「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對公安工作非常關懷，會前，毛主席提出了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重要指示。」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於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開了整整兩個月）。毛的這段話是在公安會議之前說的。12月月3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會議的彙報。周說：專政機關不專政比甚麼都嚴重，但殺人也不可過多，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sup>48</sup>看來，周恩來是轉述毛的話。

---

<sup>48</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第417頁。

毛下達這個指示的時候，九屆二中全會剛開完不久，他面對新的對手是林彪集團。他的這個指示是防止殺人過多干擾了對林彪集團的鬥爭。他的指示一下，「一打三反」就降溫了。

斯大林對反對者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後果嚴重。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延安整風審幹時毛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但並不是不殺人，在 1950 年代初期，大規模「鎮反」時，毛親自代中央多次草擬電令，讓各地加緊「鎮反」，甚至給地方規定處決指標。但毛澤東對殺人還是比較謹慎的。1959 至 1960 年，信陽地區餓死 100 多萬人。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農民痛恨在農村作惡的基層幹部，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sup>49</sup>王任重說：「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一批不可。」<sup>50</sup>但在毛的干預下，一個也沒殺。原來決定只殺一個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毛澤東卻讓判死緩。

毛澤東不主張殺人，但他締造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是「殺人」的，而且是大批「殺人」。

「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最高指示下達後，「一打三反」的勢頭削弱了，但「殺人」並沒有停止。就在中共中央轉發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在肯定這場「一打三反」的成績的同時，要求「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要加強調查研究，分析敵情，總結經驗，克服麻痹鬆勁情緒，深入發動群眾，打擊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把運動搞深搞透。結合『一打三反』運動，認真抓好社會上特別是城市街道的清隊工作。」

---

<sup>49</sup>楊繼繩：《墓碑》，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第 10 版（2012 年），第 78 頁。

<sup>50</sup>同上，第 81 頁。

## 第十九章

# 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



「四類分子」被視為賤民，受到嚴酷的管制。

這裏說的集體屠殺，是指在文革中成批處決沒有抵抗能力的平民。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基層的黨團骨幹分子。因此，可以說這是基層政權的統治者對他們治下的臣民的殺戮。

在 1967 年的「二月鎮反」中，有些地方發生過集體屠殺，如本書介紹過的青海軍區趙永夫對群眾組織「8·18」的大屠殺。此外，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為了儘快建立和保衛已建立革委會，為了清理階級隊伍，又發生過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利用縣誌對文革中的集體屠殺規模進行了分析研究。他將一次殺死 10 人以上定為集體屠殺。1966 年的中國大約有 2,250 個縣。他選取廣東、廣西和湖北 3 省共計 235 個縣作深入研究。廣西自治區所轄縣共計 83 個，他選取了樣本縣 65 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 78.3%；廣東省所轄縣共計 80 個，他選取樣本縣 57 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 71.3%；湖北省所轄縣共計 72 個，選取樣本縣 65 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 90.2%。

在他所掌握的廣西 65 部縣誌中，有 43 部（占 66%）記錄了該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有 15 個縣記錄的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又以武鳴縣為最，死亡總數高達 2,463 人。廣西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 526 人。他研究的廣東省在 57 個縣誌中有 28 個縣（49.1%）記錄了過集體屠殺，其中有 6 個縣的被害人數超過一千。廣東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 278 人。湖北省有 38 個縣誌（在他研究的樣本縣中占 60%）報導了受迫害期間挨過打的人數過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終生殘疾。但未導致集體屠殺。<sup>1</sup>

縣誌是官方的出版物，是經過嚴格政治審查的。很多縣誌掩蓋了大屠殺，即使記載的大屠殺數只能是最低數。蘇陽依據縣誌的研究結論，當然是最低數。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沉痛地指出：「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了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識無睹，這是另一重恥辱；對這恥

---

<sup>1</sup>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當代中國研究》2006 年第 3 期（總第 94 期）

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恥辱。」為了洗刷恥辱，讓我們回顧這段痛史，總結集體屠殺的慘痛教訓。

## 一、北京郊縣大屠殺<sup>2</sup>

1966年8月，北京老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迅速由城裏擴散到郊縣，在北京的昌平縣和大興縣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1966年8月27日，昌平縣公安系統傳達謝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分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富治「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開始行動了，由最初打殺「表現不好」的「黑五類」分子，發展到消滅一般的「黑五類」分子，直至亂殺家屬。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紅衛兵負責人開會，佈置「掃四舊」。會上宣讀並印發了西城糾察隊「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全公社統一行動。當晚，燕丹磚廠傳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動，為防止暴動，打死了「黑五類」分子4人。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趕赴現場表示支持。

28日、30日，公社兩次召開電話會議，逐村公佈打死人的數字，宣稱「『破四舊』進展順利，打死『黑五類』大快人心」。回龍觀行動不力，在電話會議上受了批評，於是連夜打死30餘人。到9月6日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殺「黑五類」的消息傳到黑山寨公社以後，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隊在中學操場打死「四類」分子2人。同一天，經公

---

<sup>2</sup>本節資料除注明出處外，均取于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遇羅文：《北京大興文革屠殺調查》，網文2010年5月4日

安員<sup>3</sup>批准，辛莊大隊打死 9 人。隨後打殺之風蔓延到望寶川、南莊、北莊等大隊。殺人者提出了「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婦女則被逼改嫁。到 9 月 4 日止，全公社共打死 67 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 18 人。

大興縣殺人數比昌平縣少 3 人。從 29 日到 31 日，共殺死 324 人（男 232，女 92）。被殺者，最大 80 歲，最小的才 38 天。殺死「四類」分子 175 人，子女 137 人，其他 12 人。涉及 171 戶，有 22 戶被殺絕。由於 31 日殺人最多，故後人稱之為大興「8·31 事件」。

大興縣有 13 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殺人的藉口是馬村的「階級敵人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實際上，「階級敵人暴動」子虛烏有。

大興縣的打殺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縣公安局根據謝富治的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在局務會議上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繫紅衛兵。

8 月 26 日下午，張某在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參加者有河北林校、黃村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和黃村鎮鎮長、黃村派出所民警等共 9 人。會上張某介紹了 27 家「四類」分子的情況，成立了指揮部（設在黃村派出所），劃分了戰鬥組，對屠殺對象的居住地區進行了分片包乾。

8 月 27 日下午，黃村開始「破四舊」，當天就打死 2 人。

同一天，黃村公安派出所指導員和公社武裝部幹部聯合召開黃村公社各大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會議，派出所指導員在會上說：「『四類』分子不老實，打死就埋。要狠批、狠鬥、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為強。」29 日，黃村公社「文革」小組組織四個大隊的紅衛兵去李莊子大隊打殺「四類」分子，公社管委會主任則親自去東磁各莊大隊「點火」。

8 月 30 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 100 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審隨殺，隨殺隨埋，「一條龍」行事。最後還是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

---

<sup>3</sup>生產大隊負責治安的專職人員，直接對公安局負責。有的地方稱為治保主任。

委劉紹文、張益三趕到，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 34 人，救出 108 人。

大興縣動手最晚、殺人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這個公社指揮殺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遭殺。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岱，其中黎明殺人最多。

8 月 29 日晚，在公安局張某的支持下，高福興和胡德福召開全公社 17 個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秘密會議。會議由 9 人小組主持，會上制定了殺「四類」分子的計劃，胡德福當場宣佈：31 日夜間 10 點半統一行動，是「拔尖子」還是「一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最後要求與會者宣誓：嚴守秘密，不做叛徒。

31 日夜，全公社有 9 個大隊殺了人，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個大隊同時行動。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宏升殺得少（殺 2 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 11 戶、56 人）。這天夜裏全公社共殺死 110 人。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棍棒打、鋤刀鋤、繩子勒，對嬰幼兒更殘忍，用腳踩住一條腿，用雙手抓住另一條腿，使勁往上一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地殺人的程序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大辛莊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鋤刀鋤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累得癱倒了。鋤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幾天後，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葦塘，然後把井填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葦塘拖，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鏟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北臧公社的屠殺行動要早于大辛莊，從 66 年 8 月 27 日就開始了。

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殺死 53 人，馬村殺死 34 人，六合莊殺死 11 人，共計殺死 98 人。

屠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審問者兇神惡煞，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西白疇大隊的幹部反對屠殺。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參加了公社「九人小組」召開會議，會上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 280 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 200 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世代貧農，又當過「八路」，說話硬氣。本來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昌平和大興的濫殺無辜，震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9 月 1 日北京市委秘書長馬力向全縣做了廣播講話，市、縣又向殺人的社隊派了工作組，事態才基本上得到控制。<sup>4</sup>9 月 2 日，市委下達「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9 月 5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此後的北京，雖然還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規模的打殺風潮總算遏制住了。

事後，對殺人兇手的處理得很輕。大辛莊公社的禍首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 8 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 14 年，在「幹校」的 6 年抵刑期，而且提前釋放），出獄後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 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 8 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

---

<sup>4</sup>《戚本禹回憶江青》一文中說：「康生有個孫女，叫張力，在那裏當團委書記。張力給我們詳細地說了亂殺人的過程，那手段是非常殘忍的。她說這都是聯動的人過來佈置的，還說有些來的人看去年紀已經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學生。而且還有警察帶他們來的。我馬上就給北京市委的馬力打電話，要他趕緊出面制止。馬力第二天就帶人下去。並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殺人，否則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執行。

## 二、湖南道縣大屠殺

1986年，我的湖南朋友譚合成由於工作關係，接觸到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此後，他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士，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這場大屠殺關鍵人物。譚合成寫成了書稿《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應他的請求，我為這本書寫了前言並介紹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出版。我認為他的書是可信的，這一節的資料來源是他這本書。

湖南道縣有一條的河叫瀟水，瀟水穿過道縣縣城流進雙牌水庫，再流入湘江。1967年8月，大屠殺的高潮時候，每天有幾百具屍體流過道縣縣城，有人統計，平均每分鐘1.6具。惡臭的屍體進入雙牌水庫，擁堵大壩水道，水電站半年不能發電。屍體使水庫變了顏色，水面上浮看一層腥紅的油膜。水庫惡臭薰天，幾裏外都能聞到。一具具腫脹得像水牛一樣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單獨漂流，有的被繩索或鐵絲串在一起。有十幾具屍體圍成一個圈浮在水面上，遠遠望去像水上開了一朵花。原來這十幾具屍體是被一根鐵絲穿琵琶骨串在一起。

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3個公社，占當時區、社總數的100%。死亡人數4519人（其中自殺的326人）。被殺絕的有117戶。按當時階級成份分，被殺的4519人中，四類分子<sup>5</sup>占41.4%，四類分子子女占49.9%，貧下中農占8% 其它成分占0.7%。按職業分，農民占95.2%，教員占3.19%，國家幹部占0.38%，其他為醫生、工人等。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的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

---

<sup>5</sup>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

十多種：1，槍殺；2，刀殺；3，沉水；4，用炸藥炸死；5，丟進岩洞或廢棄的礦井；6，活埋（很多是埋在廢棄的紅薯窯裏）；7，棍棒打死；8，用繩子勒死；9，火燒死；10，摔死（主要用於孩子）。這十種還不能包括殺人者的創造性和殘忍性。開膛剖肚、挖眼割舌、先奸後殺，乃至將梭標捅到陰道裏、將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處死等，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將一名富農分子捆起來丟進一個廢棄的石灰窯裏，蓋上生石灰澆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過程發出的熱將他燒死，還說這叫「石灰燒雞蛋」。

壽雁公社壽福大隊有一個叫何明德的人，因搞「投機倒把」被定為「壞分子」，殺何明德的頭一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代表大隊黨支部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找何明德的兩個兒子何昌保、何一功談話：「明天要殺你老子，你敢不敢革你老子的命，殺了他？」何昌保膽小，嚇得混身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何一功馬上表態：「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一功親手將他父親處決。楊家公社鄭家大隊也有威逼地富子女親手殺死生身父母的案例。

道縣在文革中出現了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一個是「紅聯」，另一派是「革聯」。「紅聯」與當地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中的多數人出身好，是既得利益或者是歷次政治運動的依靠對象，傾向於維護政權。所以，「紅聯」擁有當權者和整個鄉村政權的支持。「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和少數幹部組成，有不平遭遇經歷的人比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具有反抗精神。「革聯」在縣城的勢力比較大，第二中學是他們的據點。「紅聯」在縣城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握著道縣的政權和廣大農村。「紅聯」將總部從縣城大院搬到營江公社，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營江和二中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個中心。

「紅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他們把鬥爭矛頭對準四類分子。嚴懲四類分子，符合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沒有風險。當時還謠傳「四類分子要造反，8月大組織，9月大暴動，10月大屠殺」、「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殺一半。」還造謠：革聯總部二中是四類分

子的窩子，二中裏掛了蔣介石的像，遊行時喊「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臺灣的空降特務躲在二中裏指揮。這些謠言是通過正規渠道向下面傳播的。於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導思想。道縣屠殺四類分子還有一個背景，那就是 1962 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時候，道縣拾到過臺灣空投的傳單。大屠殺前，縣裏開了三次會，縣委領導提出：凡是有風吹草動，就把四類分子統統殺光，讓蔣介石的人來了找不到一個帶路的。

1967 年道縣派性鬥爭雖然激烈，也發生過武鬥，但是，縣、區、公社、大隊的權力組織依然存在，大體上也能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著解放軍的身份，處於支左的地位，實際掌握著大權。縣級領導幹部和武裝部暗中支持甚至鼓動殺人。8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營江的「紅聯」總部召開「政法幹部工作會議」以後，8 月 28 日到 9 月 1 日，形成了殺人高潮。唐家公社這五天殺了 100 多人。殺人前得到營江負責人的同意和鼓勵後，各大隊召開了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民兵隊長、貧協主任「四巨頭」<sup>6</sup>會議，一方面講階級鬥爭，部署殺人，一方面部署「雙搶」<sup>7</sup>工作，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

各公社在殺人之前，都有一個動員和醞釀過程，動員和醞釀都是基層政權主導的、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運作方式進行的。8 月 26 日，午田公社午田大隊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 13 人集中控制起來，其中一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死賴著不走，就當場殺死了。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打電話請示公社書記熊禮衡，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擬定了要殺的人的名單。他還把這些人的成分一一作了彙報。熊禮衡回答前先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然後說：「你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但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子女和分子分開。」朱報生放下電話就召開有 11 人參加的民兵、幹部會議，決定對五個子女寬大，對其中一個平時不聽招呼的子女朱牛仁殺掉，共殺 6 人。27 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將要殺的 6 個人捆綁跪在臺上，朱報生主持大會，宣佈 6 個人的罪狀，然後發揚民主，讓大家舉手表決。他念一個名，問大家：「同意不同

<sup>6</sup>有的大隊還有治保主任、共青團書記參加，稱為「六巨頭」。

<sup>7</sup>「雙搶」：搶收夏收作物，搶種秋季作物。為了不誤農時，要在幾天之內完成。

意殺？同意就舉手。」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舉了手。民兵就將這 6 個人牽到後山上用鎗打死。

梅花公社殺人具有典型性，一是緊跟上級，營江開一次會，梅花公社就殺一次人；二是殺人時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被殺者進行批鬥，由貧下中農協會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佈「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8 月 29 日，梅花大隊最後一批殺了三個人。在決定殺人的會上，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桃安和大隊幹部吳德學三人提出了殺文尚易和他的兒子文守福。為什麼要殺文尚易？因為在四清中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為了防止文尚易的兒子文守福將來報仇，就將文守福一起殺掉。但文尚易是貧農，只殺貧農不好交待，於是就搭上了富農莫德生。殺文尚易時何桃安有點猶豫，就請示公社領導廖隆國，廖回答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sup>8</sup>，該殺的還是要殺。」吳德學、何國慶等將三個要殺的人捆在一起，中間放好炸藥。點火以後轟的一聲響，文尚易和莫德生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上去把文守福的兩個眼珠挖了出來塞進了文的嘴裏。

到了 8 月 29 日，小甲公社已有 12 個大隊殺了人，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隊還沒有動手。這是因為，8 月 24 日開會討論貫徹公社的「殺人會」精神時出現了不同意見：一是，殺豬還要上面批個條子，殺人恐怕也得有個文件，等上面來了文件再動手也不遲，反正四類分子已經圈起來了。二是，把四類分子都殺光了，以後派工就難了，那些沒有人願意做的事派誰去做？8 月 27 日，小甲大隊治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殺人的電話後，又開了一次會，意見還是沒有統一。幾個大隊幹部甚至說：「公社要殺，讓他們來殺，我們不殺。」公社領導氣壞了：「這還了得！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竟出現了『土圍子』！」第二天，公社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由武裝部長廖隆久親自帶隊，幫助小甲大隊「革命」。將 12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繩子捆在一起，中間放上一大包修水利的炸藥，一點火，轟的一聲，大塊大塊的血

---

<sup>8</sup>「紅色保險箱」是當年黨組織教育出身好的人的常用語，提醒他們防止「資產階級思想腐蝕」。

肉像雨一樣落下來。沒有炸死的哭爹喊娘，滿地亂滾，廖隆久命令民兵用鋤頭、大刀一頓亂砍……小甲公社共殺死 237 人，讓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和預備黨員到階級鬥爭第一線「刺刀見紅」，爭取「火線入黨」。

祥霖鋪區有一位「鐵姑娘突擊隊隊長」，她身材高大，膀闊腰圓，力氣大，幹活從不偷懶。1965 年在修西源水庫時，她帶領「鐵姑娘突擊隊」在勞動競賽中超過了男人，成為全區、全公社的標兵。1967 年 8 月，大隊開殺人會議時，領導說：「這個任務就交給鐵姑娘突擊隊吧！」鐵隊長站起來說：「保證完成任務！」為了完成任務，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鋒快。但到殺人時，其他鐵姑娘都退縮了，她只好一個人上陣。被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在殺場上一字排開，等待她處決。她走到一字長蛇陣的右邊，舉起大砍刀，稍微比劃了一下，手起刀落，「嚓」的一聲，一顆人頭應聲落地。人倒下去了，鮮血從頭腔裏噴出，一點沒有濺到她身上。一會兒功夫，十多顆腦袋都滾到地上。這時，刀卷了口，越殺越不順手，殺到第 16 個時，刀被骨頭卡住了，連拔兩下拔不出來。鐵隊長用腳蹬住這個「階級敵人」的肩背，用力提刀，刀拔出來了，一股血直沖她腦門噴過來，弄得她滿頭滿身都是血，頭髮都被血沾成一塊。兩個還活著的「階級敵人」早已嚇倒在地。鐵隊長一手抓住他的頭髮，一手揮刀，像砍柴一樣，把腦袋砍了下來。鐵隊長殺了 18 人的時候，刀從手上滑落，全身無力地癱在地上。後來，鐵隊長的男朋友在部隊裏當了幹部，結婚以後，她作為軍人家屬到了廣西。1980 年代「處遺」工作組把她從廣西找了回來，問及當時殺人的動機，她回答說：「我覺得這跟生產隊裏出工一樣，不能出工不出力！」

唐家公社唐家大隊有一個殺人兇手，名叫雷康古，用馬刀砍了 36 顆人頭，奪得了全縣殺人冠軍。處遺工作組進場後，發現這個數字有浮誇，經逐一落實，他只殺了 18 個。他為什麼要浮誇呢？是為了多領「手續費」。當時道縣每殺一個人給劊子手 2 元到 5 元的報酬，也有記工分的。

唐家大隊有一個 23 歲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賢，人比較老實，幹活也很賣力氣。當時生產隊幹部說：「這個就不殺了。」但他妻子長得

漂亮，惹得一些人眼紅。一個名叫熊天苟的貧農老光棍看上了她，堅決要求殺胡祥賢，這種殺人奪妻的事情在道縣有 40 多起。胡祥賢被殺以後，熊天苟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官，有兩個貧農光棍跟他爭奪這個漂亮女人。熊天苟說：殺地主時你們躲在鵝毛山上，現在分果實了，你們下山摘桃子。<sup>9</sup>三個人差點打起來了，熊天苟一生氣，一刀把女的殺了。

有的基層幹部利用這次鎮壓階級敵人的機會實施報復。清塘公社月岩大隊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貧農女社員曾保保揭發過貧協主席陳智才等人的問題，在「殺人風」時，陳智才等人將曾保保殺害。當時曾保保懷有 6 個月的身孕。曾保保向陳智才等人苦苦哀求，請他們等孩子出生後再殺。陳智才說她是緩兵之計，一刀剖開了曾保保的肚子，胎兒翻了出來還在蠕動。

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貧農社員唐從蛟，在 1964 年的四清運動中揭發了大隊支部書記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第六生產隊隊長唐進學等人貪污集體財物、多吃多占的問題，在 1967 年「殺人風」時，唐共求、唐福洪、唐進學等人藉口唐從蛟之子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 9 口人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孕即將分娩的兒媳。

1967 年 8 月 19 日，上關區富塘公社主任丁天志參加了區裏的「戰備會議」後，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地主兼歷史反革命」熊貫益抓起來。8 月 23 日，用炸藥讓熊貫益的身體變成了「天女散花」。殺死了熊貫益以後，目標就是 19 歲的美女梁先蓮，她是地富子女，不僅漂亮，而且聰明伶俐。8 月 18 日，上關區武裝部長劉厚善等人說梁先蓮參加了「反動組織」革聯，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務（其實，她沒有參加「革聯」，也沒到過二中），把她抓到上關區民兵自衛隊審訊。審訊沒有結果，區裏就將梁先蓮交給東陽大隊處裏。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決定判處梁先蓮死刑。8 月 26 日，梁先蓮慘遭多人輪奸之後，身體捆綁炸藥點火做了「天女散花」。

8 月 26 日上午，蛇壩公社沿河塘大隊文革主任賀新昌讓民兵將

---

<sup>9</sup>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山上，抗戰勝利後下山摘桃子，熊天苟套毛澤東的話，但把峨眉山錯說成鵝毛山。

21名四類分子捆綁起來，押送到一處叫葫蘆岩的地方。這裏有一個深不見底的石灰岩溶洞。賀新昌叫一個名字，民兵就牽一個到洞口，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標、棍棒之類將人打昏後，丟進溶洞。有的人丟進溶洞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喊。賀新昌讓人將稻草點燃丟進洞裏，還不放心，就拿來一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後丟進洞裏，一聲沉悶的巨響以後，賀新昌等才放心離開。他們接著議論著：「地富分子都殺了，他們留下的老的小的怎麼辦？」「讓生產隊養他們，那不是負擔太重了？」「留著小的，將來報仇怎麼辦？」賀新昌請示公社和區裏以後，決定將這些老的小的全部殺掉。這一次不是丟溶洞，而是沉河。他指揮民兵準備了一條大木船，每個老人和孩子身上吊一塊大石頭，將船劃到河中間，一個一個丟進了河裏。沿河塘大隊共殺死52人，最大的74歲，最小的才56天。這個56天的孩子還沒有起名字，他母親叫張秀華。她72歲的婆婆、37歲的丈夫、13歲和3歲的兩個兒子全都被殺，只剩下她和56天的小兒子。祖宗三代是貧農的蔣癩子想讓張秀華作他的妻子，就向領導提出：「是不是把秀華留下來？」周書記同意，還表示：「凡是嫁給單身貧下中農的，給改成份。」周支書這個土政策一出臺，村裏好幾年年輕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蔣癩子保住了張秀華這條命，現在該享受勝利果實了。他闖進張秀華家裏，拖著張秀華上床，張死死抱著孩子。蔣癩子覺得這個孩子礙事，就從張秀華手裏奪走孩子，一口氣跑到河邊，嗆的一聲將孩子投進了河裏。張秀華早已嚇呆了，像木頭人一樣任他擺弄。

1967年8月28日，油湘公社躍進大隊黨支部書記何芳乾從公社裏開會，公社領導批評在「抓階級鬥爭」中，油湘公社落後了。他領導的躍進大隊只殺兩個人，拖了全公社的後腿。何芳乾的工作過去是不落後的，公社的批評對他震動很大，回來當晚就召開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會議。會議決定將6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殺掉。一下子殺這麼多人，怎麼殺法？石頭山水庫附近有三眼窖，把這些人放進窖裏一填土就行了。第二天一早，何芳乾帶隊押著61.5個被殺對象（其中一人是孕婦，算一個半人），向石頭山水庫走去。到了目的地，簡單地開了一個群眾大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佈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人死刑。然後用大刀一陣砍殺，不論死活，

推下窖裏。又將稻草淋上煤油點燃投入窖裏。燒了一陣蓋土掩埋。事後，何芳乾非常興奮，到處表功：「老子殺得混身是血，成了個血人。」這個「血人」後來被提升為公社書記。

道縣愈演愈烈的大屠殺在湖南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中共中央、湖南革委會籌備小組和支左的 47 軍開始關注。省革籌、47 軍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道縣「紅聯」營江指揮部於 8 月 26 日到 28 日，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屠殺問題。然而，這個會議卻變成了動員屠殺的會議。會後出現了又一次殺人高潮。在會後五天內全縣共殺 2454 人，占殺人總數的 54.5%。因為這個會議還肯定成績，說前一段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是「民主革命補課」。會上提出「不准濫殺」，「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有的公社聽說要制止殺人，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要殺就快殺，不然就沒機會了。」

1967 年 8 月 29 日，47 軍 6950 部隊（炮兵團）進駐道縣制止殺人。9 月 27 日，47 軍和湖南省革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通告說：「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其主謀者要嚴加追究，依法懲辦。」緊急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並用飛機拋撒。47 軍還派出多個工作組到各地制止屠殺。到 9 月下旬基本沒有殺人了，最後一個被殺的是仙腳區橋頭公社上壩大隊中農何余祥。因為大隊長易長進想占何余祥的房子，何余祥又同民兵隊長唐貴庭為一些小事結過仇。易長進和唐貴庭二人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10 月 17 日，他們二人把何余祥拉到馬鞍橋，用烏銃把他打死了。

### 三、江西瑞金大屠殺<sup>10</sup>

江西省一些地方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一級，稱為「民辦槍斃」。公社、大隊幹部想殺誰就殺誰，不必立案，不要證據，不必

<sup>10</sup>此節除另有注明外都引自汝其：《支左日記（1967—1968）》，載《天涯》1999 年第一期。



審批。根據可靠統計，興國縣殺了 270 多人，瑞金縣殺了 300 多人，於都縣殺了 500 多人。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等。

196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瑞金縣一個幹部到支左指揮部反映 22 日縣裏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廣東一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敵人很猖狂，他們要殺我們，我們怎麼辦？要拿出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23 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 7 個人。他說，這個殺戒一開，不得了。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對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幾天之內，可能全部殺光。

196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瑞金縣今天繼續來人向支左部隊反映該縣搞「民辦槍斃」，亂殺多人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3 日、24 日兩天之內，全縣各公社、大隊大約殺了 120 多人。大多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暗殺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真是駭人聽聞！

196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群眾專政組組長慶賀一行三人，去瑞金縣調查「民辦槍斃」，亂殺人的問題，共去了 10 天，昨晚歸來。

他說，瑞金縣各公社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7 日上，共殺了 177 人，年齡最大的 70 歲，最小的只有 11 歲。有 40 多人是地富子弟，50 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四類分子。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

9 月 23 日，殺 34 人；24 日，殺 90 人；24 日晚，縣革委會徐主任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即召集各公社幹部開會，叫堅決制止，但沒有制止住。又連續殺了 3 天。25 日殺 15 人，26 日殺 16 人，27 日殺 19 人。到 28 日才基本刹住車。

瑞金縣這次搞「民辦槍斃」的，共有 8 個公社一個鎮。其中殺得最多的是律陽公社，共殺了 89 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一半。這個公社從解放到現在才槍斃 34 人。這次殺人相當於過去的兩倍半還要多。

## 四、廣西大屠殺<sup>11</sup>

中央調查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著文說：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作組行將結束，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數字是，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000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二萬余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sup>12</sup>也就是說，89700人當中，有79000多人是有組織的集體屠殺的，占死亡人數的88%。這還沒有考慮失蹤和無名無姓的死者5萬人。自治區黨委調查研究室楊志慶向中央調查組反映，商業部門發佈票，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萬人，區直屬機關一些比較負責的同志說死亡20萬人。也有人說全區死亡四五十萬人。中央調查組認為死人最少在十萬以上。<sup>13</sup>就按十萬人計算，就有8萬人是被集體屠殺的。

據中央調查組的統計分析，死人的情況是：有組織的屠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造反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死僅4人。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只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餘1862人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死的「4·22」群眾。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一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在農村颳起「紅色風暴」，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殺了一批「地、富、反、壞」分子和「4·22」成員。

1967年10月3日，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營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76人，集體坑殺於蛇

<sup>11</sup>這一節的資料來源除了已注明外都來自《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sup>12</sup>晏樂斌：《廣西文化大革命——參加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此文在《炎黃春秋》2012年11期，發表時有刪節，這裏引用的是晏樂斌給本書作者的原稿。

<sup>13</sup>中央紀律中央組織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年7月15日。

形黃瓜弄。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和的貧農出身的妻子有兩個分別為1歲和3歲的孩子，劉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營長黃天輝求情：「天輝，我有兩個仔。政府能不能把一個判給我老婆？我抱一個跳下坑，留下一個給我老婆。」黃天輝說：「那不行！」結果兩個孩子全部活埋。<sup>14</sup>7月至12月各公社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859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sup>15</sup>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集民兵統一行動，把全大隊地主、富農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殺死。<sup>16</sup>

除了對「四類分子」這些政治賤民進行大屠殺以外，廣西大屠殺規模最大、殺人最多是與廣西文革進程有關，為了建立一派掌權的革委會，以中央「7·3佈告」為號召，大量屠殺「4·22」這一派群眾。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名義實行有組織的大屠殺，本書「全國山河一片紅」這一章的「廣西：血湧邕江」一節中已有介紹。

廣西殺人的手段駭人聽聞。據1981年廣西區黨委辦公廳向中央調查組彙報，武宣縣被分屍吃肉、吃心肝的有38人。《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記載：從6月15日至8月底，武宣縣「造反大軍」及其觀點的幹部群眾，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吃掉。女民兵班長黃文留，不僅吃過人肝，還親自割下五個男性生殖器泡酒喝。她因立場堅定，當了縣革委會副主任。據不完全統計，武宣縣的國家幹部和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和人肝。上思縣百包公社提高大隊那審生產隊，全隊一百多口人，被殺30多人，男人都殺光了。小學教師劉智和商店出納員李文興，被背靠背地綁在木樁上，兇手先挖出劉的肝給李看，再挖李的肝。武鳴華僑農場共批鬥560人，整死107人。被打死的人，有的被剖腹割頭，有的被挖肝割肉，參加吃肝吃肉的有20多人。柳州鋼鐵廠和柳州第二化工廠將「4·22」成員身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人就炸得血肉橫飛，說這叫「天女散花」。<sup>17</sup>柳州鋼鐵廠「天女散花」的發明者之一岑國榮由於殺人有功，被提為廣西總工會主

<sup>14</sup>《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07.00

<sup>15</sup>《全州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7頁。

<sup>16</sup>中紀委、組織部等六部委《關於廣西落實政策情況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

<sup>17</sup>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廣西在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1981年7月15日。

席，任中共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直到 1985 年才開除黨籍。

7 月 1 日晚，同情「造反大軍」的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學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第二天早晨黃佩農、張繼鋒等挖他的肝，剝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著一批人在學校宿舍屋簷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焦味腥風在學校飄蕩。

7 月 17 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廖金福、鐘振權、鐘少廷等四人，他們把廖天龍等四人殺死後將屍體拉到平沼碼頭，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 23 人。

在貴縣，縣醫院副院長劉子凌夫妻、兒女四人被殺，在殺死女兒前，還當著她未婚夫面前輪奸。覃礦李多才夫妻被殺後，其妻腹中的胎兒還在蠕動。<sup>18</sup>

被殺人的家屬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和「被殺家屬」加以歧視。而殺人有功者卻升官晉級。殺了 45 人（其中 36 人是被抓後的俘虜）的劉慕忠被提為柳州鋼廠黨委副書記，後又提為廣西總工會副主席。根據「處遺」一整黨總結時統計，當時全廣西共有近五萬黨員在「非武鬥」狀態下參與殺人，其中 20,875 人是入黨後殺人，9956 人因殺人「有功」入黨，17,970 人「與殺人有牽連」。<sup>19</sup>

## 五、雲南沙甸事件<sup>20</sup>

沙甸是回族聚居的村寨，有 1500 多戶、7200 多人，是昆明至個舊、蒙自的必經之地。在其相鄰處還分佈了大莊、茂克、新寨等較小的回族聚居村。

<sup>18</sup> 中紀委中組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廣西落實政策調查報告附件之六：來信來訪摘要》

<sup>19</sup> 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開放》2013 年 10 月號，75-78 頁。《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人當中，有 20,000 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 9,000 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 19,000 多人」

<sup>20</sup> 這一節資料除了注明外均取自周康：《駭人聽聞的雲南沙甸慘案》，載《炎黃春秋》，2007 年第 7 期。

「四清」運動中，工作隊強行關閉了沙甸當時僅有的三所清真寺。「文革」初期，沙甸就圍繞著清真寺的關與開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有的人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應該打開清真寺；有的人認為清真寺是「四舊」，打開清真寺就是否定「四清」運動的偉大成果。沙甸村全是回族，98%的群眾都強烈要求打開清真寺。於是，清真寺被打開了。沙甸絕大多數人屬雲南的「炮派」，少數人屬雲南的「八派」。「炮派」支持打開清真寺，「八派」反對打開清真寺。

雲南省軍管會和 1968 年 8 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搞「劃線站隊」，沙甸大多數群眾被劃為「站錯隊」。全省範圍內，凡站錯隊的頭頭、骨幹都被揪鬥。沙甸「站對隊」的人很少，「站錯隊」的人沒有人整他們。於是，附近市縣「站錯隊」的頭頭為躲避揪鬥、遊街，紛紛跑到沙甸躲避，並寫大字報和派人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派人來解決「劃線站隊、支一派壓一派」的問題。省革委會把沙甸視為「馬蜂窩」。

1968 年 12 月上旬，省革委會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名，派出一個加強營編制的軍人宣傳隊到沙甸「捅馬蜂窩」。

沙甸回民大眾寄希望於軍人宣傳隊，以為他們進村後能認真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12 月 8 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支左部隊進村，並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給解放軍。令回民失望的是，軍人宣傳隊進村後，挨家挨戶搜查躲在沙甸的外地「炮派」的骨幹，給這些人掛上「滇南挺進縱隊」的黑牌。被所在單位的民兵五花大綁地帶走，去接受各單位的殘酷的批鬥。沙甸的軍人宣傳隊還把回民 200 多人集中起來進行吊打批鬥，其中 84 人被扣上「反軍亂軍黑幹將」罪名，使用種種刑罰，造成 14 人被迫害致死。

軍人宣傳隊進村後，駐紮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關閉。軍人在清真寺裏吃豬肉，把豬骨頭丟在清真寺水井裏；在清真寺禮拜大殿裏唱歌跳舞亂踩亂踏。軍宣隊在沙甸搞「以信教不信教劃線」，他們宣佈：「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對做禮拜、把齋者，一經發現就成為批鬥對象。

軍宣隊一面反宗教，一面清理階級隊伍，兩百多人分別被打成「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樑小丑」、「趙氏小爬蟲」（趙

是指當時受迫害省委領導之一的趙健民)，遭到慘無人性的批鬥，捆綁吊打。在一次批鬥會上強迫一位回民把豬頭掛在脖子上，並要他用舌頭去舔，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在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鬥會上，強迫60位回民掛上「宗教復辟的急先鋒」的牌子遊街批鬥後，把他們押到一個廁所旁，強迫他們學豬用嘴拱廁所牆，學豬爬，學豬叫，還說這是「豬拱長城」。後來又強迫50多位回民學豬滾，即從十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滾。一位有孕的婦女因學豬滾當天就流產。這樣的批鬥、侮辱長達一年，沙甸回民心靈中埋下了憤怒之火。

1973年10月，沙甸群眾推舉代表向沙甸大隊黨總支請求打開清真寺，供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群眾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絕後，於1973年10月強行打開沙甸金雞寨清真寺，1974年2月又打開沙甸大清真寺。紅河州、蒙自縣的當權者認定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是「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宗教復辟」，並立即派出由70多人組成的州縣工作隊再次進駐沙甸。工作隊關閉清真寺的行為被多數群眾阻止，就放廣播干擾群眾的禮拜活動，過開齋節會禮被誣陷為「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工作隊隊員在群眾進行肅穆禮拜的時候，跑到大殿裏「宣傳中央文件」。對宗教的褻瀆，激起回民強烈不滿。

1974年4月「批林批孔」運動中，工作隊又揚言「批林批孔要結合批清真寺」，並點了沙甸代表馬伯華、馬紹華等人的名，逼得他們進京上訪。5月10日，他們到京後即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希望中央責成雲南省委撤走駐沙甸的工作隊，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將此信摘報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問題對雲南省委明確指示，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周興親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實，並把有關情況報告中央。

周興即按照中央要求親自到沙甸調查處理，召開各種會議，聽取民眾意見，民眾提出四個方面意見：1、落實民族宗教政策，打開被關閉的清真寺。2、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對被批鬥民眾給以平反。3、清理生產隊工分賬目，撤換多拿多占的基層官員。4、將沙甸改為經濟作物區，增加口糧供應，解決民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周興對開放清真寺，准許回民進入清真寺內做禮拜和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問題沒有表態，對另兩個問題則表示可以解決。但他答復可以解決的問

題也沒有兌現。

周興卻向中央報告：「沙甸問題已經解決。」1974年9月雲南省委發出(1974)45號文件，文件指出，打開清真寺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已經關閉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開作宗教活動場所，已經強行打開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礎上，由群眾自行關閉。」文件還對伊斯蘭教作出了十條管理規定，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蘭教的高潮。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號文件，幾百人到昆明上訪，隨後又有紅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眾1000多人到昆明遊行，並兩次爬上開往北京的火車，要求赴京告狀。周興等人將回民到昆明上訪定性為「鬧事」、「反對黨的領導」。

在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地方當局又採取了進一步激化矛盾的措施。1974年11月底，在距沙甸僅一公里多雞街成立了「雞街地區民兵聯合指揮部」。軍隊發槍給民兵，民兵荷槍實彈進行示威遊行。以後經常組織民兵在雞街、沙甸周圍巡邏。在雞街地區民兵的威懾下，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民兵團」。從此兩個民兵組織劍拔弩張，大有決一死戰之勢。不到半個月就在開遠、蒙自、建水等地發生群眾搶奪軍隊槍支，發生武鬥，造成人員傷亡。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等回民代表10人與省委領導等一起到北京解決問題。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等一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此間，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中發【1975】2號文件）。雲南省委成立了收繳槍支執行小組，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繳了，而「民兵指揮部」的槍並未上繳。

3月5日，部隊按命令包圍了回族村鎮納家營和玉溪大營。部隊在玉溪、峨山、通海三縣收容審查了上百名回民，幾百名回民被強制進了學習班，幾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搶罪」判了刑，其間大搞刑訊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傷致殘。

1975年5月，部隊和工作隊又強行進駐沙甸。沙甸群眾對1968年部隊進村「捅馬蜂窩」的情景記憶猶新，他們表示：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來就不讓工作隊和部隊進村。成千群眾在村口阻攔部隊和工作隊進村，部隊和工作隊只好在雞街糖廠等地駐下。隨時準備進駐沙

甸。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會發佈通告。通告稱，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協助下進駐沙甸。不許任何人抵制工作隊進村。

1975年7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軍幾個團奉命對沙甸實行了軍事包圍，同時拉斷了整個村的電源。凌晨3點，一支偵察部隊「摸掉」回民的哨兵，悄悄進入大清真寺後院——沙甸民兵團的辦公地點，想捉沙甸民兵的頭頭。不料一位住寺人員發現有武裝軍人深夜進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樓三樓敲鐘報警。「叭叭叭」一排槍聲，敲鐘人應聲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槍聲驚醒，整個村子一片漆黑，村民們驚恐不已。

凌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藉地形熟悉，利用自製的武器向佔領大清真寺的武裝人員反攻。經過激烈的交火，沙甸回民奪回了大清真寺，並從對方手中奪得了一些現代武器。在漆黑的夜晚，軍隊和沙甸回民展開巷戰。天亮時，回民奪回了部分民房據點。但同時付出了幾百人的生命代價。看著數百名回民被打死，群情憤怒，他們憑藉奪來的幾支步槍、機槍、幾枚手榴彈和自製的土武器奮起抗爭，頑強抵抗。

中午，部隊開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幾乎同時被炮擊。入夜，炮火雖有所減弱。但哪里有亮光，炮彈就轟炸那裏。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毀燒光。這場戰鬥進行了七天八夜，炸毀民房4400多間，回民死亡900多人，傷、殘600多人。部隊也有傷亡。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列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一齊開火，一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五名倖存者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能打死的。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被打死。<sup>21</sup>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

---

<sup>21</sup>人民論壇：《雲南「沙甸事件」概述》。



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 1600 多人，傷、殘近 1000 人。其中開遠市新寨的傷亡比例最高，超過了沙甸。

事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行進學習班的數百人。

1979 年 2 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合下發了（1979）7 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經黨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但是，這個「平反通知」認定沙甸事件責任是「譚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出動野戰軍鎮壓是中央決定的。當時周恩來生病住院，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內政、外交、軍事都由鄧小平全權處理。派出幾個團的野戰軍進行武裝圍剿，沒有鄧小平的首肯是不行的。2007 年，《炎黃春秋》第 11 期發表了周康先生的《駭人聽聞的雲南沙甸慘案》，這篇文章雖然也把責任加在「四人幫」身上，當局還是嚴厲批評，指責不該發這篇文章。

## 六、其他地方的大屠殺

現存資料證明，對普通平民的大屠殺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

1968 年 1 月 5 日，廣東省陽江縣程村公社中平大隊黨支部書記、治保主任黃某主持召開群眾大會，自立法庭，宣判槍殺兩名地主。3 月 31 日，新洲公社龍潭大隊槍殺了一名地主。同期新洲公社東安大隊槍殺了幾名所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5 月 11 日到 15 日，湛江地區在海康縣召開會議，以反右傾為主題，提出在農村要把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各地貫徹海康會議精神，陽江縣個別地區的亂打亂殺演變為全縣性的亂打亂殺。各公社革委會主任回去以後，迅速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佈置對四類分子摸底排隊，對表現不好的開展批鬥、毆打、屠殺。至 6 月 1 前的不完全統計，全縣被被殺死的地、富、反、壞、右人員 178 名。6 月 1 日，縣軍管會召開 2,800 人的四級幹

部會議。會議強調，要主動地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會後，各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落實貫徹。到7月23日，全縣亂打亂殺致死573人，其中。槍斃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殺95人。7月下旬以後，軍管會開始制止屠殺，屠殺有所減少，但一些地方還在屠殺，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亂打亂殺持續了13個月，共致死909人。屠殺手段極度殘忍，有槍殺的，有用鋤頭鋤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頭砸死的，有用煤油燒死的，有推入河中淹死的，還有活埋的。

22

## 七、集體屠殺的總體情況和根本原因

從上面介紹的情況可知，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有幾個特點：第一，屠殺規模大、殘忍無比，殺人方式的野蠻程度令人髮指；第二，被殺者是無辜平民，純系冤殺；第三，集體屠殺以當局長期灌輸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思想基礎，屠殺前捏造罪名，傳播謠言；第四，集體屠殺的組織者是基層政權，如縣武裝部、革委會（或革籌）、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領導機構。

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殺有三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1966年「紅八月」，是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的旗幟下進行的，還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sup>23</sup>的「血統論」背景。這次屠殺高潮一些地方都有發生，以北京昌平和大興兩縣的大屠殺為代表。第二個高潮是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前後，一些地方以清理「階級敵人」為名，清除軍政官僚集團的反對派。這次高潮發生的地方比第一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縣大屠殺為代表。第三個高潮是屠殺反對革委會或軍管會的群眾組織成員，是軍政官僚集團對反對派的屠殺。這次高潮是打著「掃除『大聯合』、『三結合』的障礙」、「保衛新生紅色政權」的旗幟下進行的，這次高潮發生在很多地方，以廣西大屠殺為代表。其中，第三個高潮中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造反派「五大領

<sup>22</sup>陳寶德李學超：《陽江「亂打亂殺」事件始末》，載《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sup>23</sup>1966年7月30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清華大學十名學生時的談話，本書作者是十名學生之一。

袖」時發出警告：「堅決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要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有了這個「最高指示」，本來對造反派不滿意的支左部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大開殺戒。

無論是哪一種大屠殺，除了「階級鬥爭」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層幹部挾嫌報復、殺人奪妻、殺人奪財的行為。

屠殺對象主要有幾種人：一是文革前確定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對他們的屠殺常常採取斬草除根的殘酷手段。二是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革籌」）的群眾組織成員。第三種屠殺對象是宗教信仰者，這只發生在少數地區，如雲南沙甸。對宗教信仰者的屠殺既有「破四舊」（認為宗教信仰是「四舊」）的藉口，也是對軍政官僚反對派的鎮壓，如沙甸的回民絕大多數是反對雲南軍政權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風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這些整農村幹部的運動中，揭露和批評過基層幹部的普通農民，也有一些被殺害。綜合各方面情況估計，在文革中，被集體屠殺的總數不低於30萬人。

直接鼓動和組織大屠殺的是極權制度的基層政權，即縣以下的農村政權；制止大屠殺的是省以上的政權。基層政權的屠殺行為是對高層政權歷來政策的繼續和極端化。中央和省級官員不斷對過火的暴力行為發出警告。只要下面傳來集體屠殺的可靠消息，上級政府總是予以批評，派出官員或派軍隊前去制止。但這並不能排除高層權力對大屠殺的責任。權力末梢橫行無忌，大屠殺暢通無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根源。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高層政權造成的。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下，中國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會分層還是沿用毛澤東1926年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那種敵我兩分的思想。農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從經濟上消滅了階級，但卻強化了政治上的「階級」（這裏打引號是因為在馬克思那裏階級本來是一個經濟範疇）。政治上劃分「階級」的標準就是對「革命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革命時期已經過去了，卻還把革命時期劃分的敵、我、友作為一種政治身份固定下來，並給以敵、我、友的政治待遇。有地、富、反、壞、右、資政治身份的個人和子女，就是政治賤民。文革前中國的政治賤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1959

年 10 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一個文件<sup>24</sup>中透露，全國達 2000 萬人。按一家四口人計，政治賤民群體總數為 8000 萬人。文革前 17 年，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一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在文革初期保衛官僚的群眾組織（當時稱為「保皇派」、「保守派」），為了表現其革命性，就把屠刀指向政治賤民，屠殺政治賤民不僅不會遭到抵抗、不會受法律懲罰，還可以表現「階級覺悟高」。

極權制度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政治賤民，也造就了一大批政治愚民。信息壟斷、真理壟斷和長期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使得人們不僅對現代文明一無所知，也拋棄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他們只能知道政府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讓他們相信的。在嚴酷的極權制度下，政治愚民也處於恐懼之中，一不小心他們也會成為政治賤民。無知和恐懼使他們絕對聽從政治權力的指揮，政權指向哪里，他們就打向哪里。1980 年代，到道縣處理大屠殺遺留問題工作組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屠殺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屠殺。當然，屠殺政治賤民的兇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還有流氓、地痞。痞子歷來是中共政治運動衝鋒陷陣的力量，政治運動離不開們，毛澤東早年就肯定了「痞子運動」，認為他們是「革命先鋒」。<sup>25</sup>

---

<sup>24</sup>謝富治將浙江省公安廳總結該省諸暨縣楓橋區對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關於十個好人包夾改造一個壞人，矛盾不上交社會改造的經驗》，上報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與肯定，遂向全國進行了推廣，由此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五類分子的運動」。

<sup>25</sup>《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66 年版，第 19-29 頁。

## 第二〇章

# 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 清除劉少奇



劉少奇遭批鬥的一個場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中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五年一次。但是，自八大以來，已經十多年了沒有開黨代會。1966年8月12日，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明年一個適當時候再開。」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意見的通知，說毛主席最近提出什麼時候召開九大的問題。1968年9月，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召開「九大」再不能拖延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任務就是為「九大」做準備，周恩來秉承毛的意志，為全會作了精心的準備和組織。

毛澤東主持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1968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在開幕式上，周恩來介紹了出席會議的人員情況。由於許多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97名八屆中央委員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人，其中有一些是從被關押地點放出來出席會議。因不夠法定人數，周恩來宣佈，「通過無產階級司令部商定」，從候補中央委員中挑選出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10人為中央委員。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占97人的51%。再加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擴大」了進來，共133人參加會議。<sup>1</sup>周恩來宣佈這次會議的議程有四：一，「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二，「九大」上要通過的新黨章草案；三，國際國內形勢；四，專案審查工作，主要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 一、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九大」以前必須徹底解決劉少奇問題，這個任務落在十二中全會上。自1966年8月以來，已經對劉少奇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 從政治上搞臭劉少奇

八屆十一中全會褫奪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排名從第2位降到

---

<sup>1</sup>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68年10月13日。

第8位，但還沒有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劉少奇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6年10月1日，劉少奇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本書前面已作介紹，毛、劉之間不僅有權力之爭，更有政見之爭。清除劉少奇是文革的一項重要任務。雖然毛說過，要選劉少奇當中央委員，但這只是一個姿態。毛不是讓他的政敵王明當中央委員嗎？要當可以，先得從政治上搞臭。「大批判」是搞臭劉少奇的重要手段。

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官員沒有退出機制，劉少奇不當接班人了，不當中央領導人了，能不能退居山林過著退休生活呢？不可能。下臺的人必須徹底打倒、徹底搞臭。因為最高領導人下臺是「路線鬥爭」，「路線鬥爭沒有調和的餘地」，即要明確勝利者為「是」，下臺者為「非」。路線鬥爭還必須肅清下臺者的影響，包括思想影響和組織影響，不這樣，勝利者就無法順利地推行他的路線。要徹底搞臭，就必須加上種種罪名。在臺上時對他大力歌誦，把他說得完美無缺，他的一舉一動都被奉為楷模，他不管講什麼話都是「重要講話」。他一旦下臺，就罪惡萬端，一無是處，他過去的「重要講話」都是「大毒草」。為搞臭劉少奇，毛澤東親自出馬。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5期《紅旗》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據戚本禹說：1967年初，江青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對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批示：「寫得很好」，還親自加寫了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在戚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裏增加幾句。」戚照做了。戚文中把一個歷史人物的名字寫錯（把「趙舒翹」誤寫做「趙

舒饒」)，毛澤東改正了。<sup>2</sup>周恩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都是經過討論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文中批判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sup>3</sup>一看就知道是指劉少奇。文末向劉少奇提出八個質問，然後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戚本禹提議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周恩來說，社論或編輯部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覺得江青認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這個意見。<sup>4</sup>

劉少奇從報紙上讀到戚本禹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一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sup>5</sup>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5期還發表了《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的本刊評論員文章，是王力、關鋒撰寫的。毛親自審定，並在文章最後加上了這樣一段話<sup>6</sup>：

千萬不要上《修養》<sup>7</sup>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

<sup>2</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sup>3</sup>閻長貴：《戚本禹閻長貴說「文革」》，《往事》第119期。

<sup>4</sup>閻長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全國重大黨史題材寫作筆會」上的發言。

<sup>5</sup>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載《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一卷，華夏出版社，第16-17頁。

<sup>6</sup>閻長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重大黨史題材寫作筆會」上的發言。

<sup>7</sup>《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頁。

<sup>8</sup>即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傳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1967年5月8日，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對劉少奇的這本書大加撻伐。此後，批判「黑修養」成了一股浪潮。連美國人李敦白也到處作批判「黑修養」的報告。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來京群眾代表時講話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當時群眾都認為她是傳達毛澤東的意思。

此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從黨刊、黨報、軍報到遍佈全國的紅衛兵小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鋪天蓋地、連篇累牘。1967年8月15日又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嚴厲譴責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對這篇文章送審稿的批示是：「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引證，不足以說服人，請再加考慮」<sup>8</sup>發表稿是根據毛的意見修改的。

### 批鬥王光美和「揪劉火線」

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召見蒯大富。張對蒯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

<sup>8</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第397頁。

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明白了：中央佈置我們打倒劉少奇。後來，王力告訴蒯大富，張春橋這次召見蒯大富是毛的意思。<sup>9</sup>12月19日，在中央領導人再三督促下，清華大學三個造反派群眾組織（井崗山紅衛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聯合成「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聯合起來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打倒劉少奇。12月25日，清華井崗山組織6000人冒著嚴寒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聲討「劉鄧路線」。學生們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同時將「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刷遍全市。為了侮辱劉少奇，將「奇」字橫過來寫成「狗」字。12月30日，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表示對「12·25行動」非常滿意。

打倒劉少奇從王光美入手。王光美是清華工作組的顧問，而清華工作組又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將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清華學生要求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這個要求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一直沒有落實。12月的一天晚上，井崗山兵團組織數千人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集會，一遍又一遍地齊聲高喊：「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十多天后，電機系「捉鬼隊」戰鬥組演出了「智擒王光美」的鬧劇，1月6日，劉少奇之女劉平平在師大附中作檢查，「捉鬼隊」不讓她回家，並以公安局名義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車禍，已送到北京第二醫院。王光美不相信，讓劉少奇的警衛員和劉平平的妹妹劉婷婷來看。「捉鬼隊」讓劉婷婷按他們的意思打電話，劉少奇和王光美兩人都來了。「捉鬼隊」讓劉少奇走了，把王光美揪回清華。劉少奇回去後向中央報告，周恩來給蒯大富電話指示：1，可以讓王光美到清華作檢查；2，不要打她；3，不要侮辱她；4，檢查後讓她回去。晚上，在西大操場讓王光美站在體育館的陽臺上檢查，當時我在操場觀看。王光美是見過世面的人，「捉鬼隊」的幾個學生哪是她的對手？她說：你們問吧，我回答。學生問什麼，她回答什麼，對答如流，滴水不漏。讓她「交待」的問題一點也沒有「交待」。她完全占了主動。提問的學生再提不出問題來了。周恩來派秘書孫岳把王光美接回去了。對「1·6」行動，清華井崗山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剛聯

---

<sup>9</sup>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64-165頁。

合進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反對。我也是反對的，覺得這樣欺騙的手段不光彩，效果也不好。

19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蒯大富給周恩來寫了一個條子：「總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響了向資反路總決戰的衝鋒號，我們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強烈要求批鬥資產階級分子王光美。」周恩來看了之後就遞給陳伯達，又傳給康生、江青，他們幾個人都點了點頭。然後，周恩來對蒯大富說：「可以，你們準備一下，我們溝通一下。」<sup>10</sup>4月10日，清華大學在主樓前搭台批鬥王光美。參加批鬥會的30多萬人擠滿了清華大學。北京市調來一千多名警察來維持秩序。井崗山總部讓我們非核心派的人參與維持秩序，沒有機會進入主會場。那天我在南校門一帶引導來校客人。事後得知會上作批判發言的有：蒯大富：《糞土當年萬戶侯》；被工作組整得臥軌自殺而致殘的學生朱德義控訴了王光美對他的迫害；原工作組長葉林反戈一擊，作了題為《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劊子手》的揭發和批判；河北省桃園大隊代表發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惡》。國際反修戰士李敦白也作了發言，他說：揪出劉少奇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一害，立了一功，我們感謝你們！」陪鬥的有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和200多名清華幹部。在批鬥王光美時對她極盡羞辱，讓她穿上當年訪問印尼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鍊。

1966年8月3日，劉少奇曾到北京建工學院的「八一戰鬥團」講過話。劉少奇被打倒的風聲傳出以後，這一講話成了他的「罪證」。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一直要求劉少奇做檢查。劉少奇在1967年7月8日寫了一份《向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及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劉少奇哪里知道，「新八一團」是從老「八一團」分裂出來的。劉少奇只向「新八一團」做檢查，老「八一團」怎肯罷休？於是，7月9日，老「八一團」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派人到中南海西門外架起帳篷，安裝高音喇叭，聲稱「不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鬥臭誓不罷休」。

建工學院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陳伯達說：

---

<sup>10</sup>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24頁。

「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揪劉少奇是當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確的嘛！」北京建工學院帶了頭，其他學校不甘落後，紛紛在中南海周圍搭起了帳棚，建立了各自的「揪劉」據點。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也紛紛仿效。短短幾天功夫，府右街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號聲此起彼伏，大字報貼得層層疊疊。據說，當時中南海周圍有 7000 多個棚子，500 多個高音喇叭，3000 多面旗子。他們的口號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學生無知，真正的皇帝是毛澤東，劉少奇算什麼皇帝？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市的「揪劉火線」。在清查「5·16」時，參與「揪劉火線」是「5·16」的一條罪狀。

## 二、將劉少奇定為叛徒集團的頭子

在中共，要將一個領導人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確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鐵板釘釘。對劉少奇也是這樣。為把劉定為叛徒，毛蓄謀已久，分三步走。第一步，大造揪叛徒輿論；第二步，將 61 人重新定為叛徒集團；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

### 第一步：大造揪叛徒的輿論

在美國，規定交戰中彈盡援絕幾個小時後即可投降，以保全將士生命，被俘後被強迫作出的言行不予論處。中國古代，對那些為了保全生命而暫時投降敵方的人，也是比較寬容的。三國時代的關羽在敵方曹操那裏住了很長時間，受到曹操的優待，但因「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人否定他對劉備的忠心。《四郎探母》歌頌的是投降對方的楊四郎回國探母，沒把楊四郎當叛徒。列寧在他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冊子中也談到，如果遇到強盜攔路打劫，不要同強盜對抗，把財物給他以求脫身。

但是，在共產黨內卻沒有這種寬容精神。早在 1963 年到 1964 年，中國史學界有一場關於忠王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一位重要領導成員，被洪秀全封為「忠王」。1864 年 7 月 19 日（同治 3 年 6 月 16 日），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即南京）被清軍攻陷。李秀成護著洪秀全的兒子沖出重圍。三天後李秀成被俘。在關押中寫了一些文

字，曾國藩將這些文字編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述》講了李秀成一生的經歷，涉及太平天國的歷史，也總結了天平天國失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其中有一些自汗和對曾國藩阿諛奉承的話，「自述」沒有出賣革命。1864年8月7日，李秀成被殺害于南京。在這之前，中國史學界主流一直對李秀成持肯定態度。1963年8月出版的第4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戚文認定李秀成是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在周恩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20多位歷史學家討論戚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sup>11</sup>江青把這期《歷史研究》連同《北京晚報》、《光明日報》對這篇文章的報道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完戚的這篇後，讓秘書找來其它有關資料。其中有臺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這是一本藍色封皮線裝書，是張春橋從香港買來的。毛在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江青對戚本禹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要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毛讓江青把《李秀成供狀》給戚，讓戚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sup>12</sup>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此文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

批判李秀成的第一個受害者是已故的瞿秋白，他在被敵人槍殺之前寫了《多餘的話》，其中表達了對革命的厭倦和無奈。毛澤東說：《多餘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sup>13</sup>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於8月停辦。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談到「保持晚節」時說：「蓋

---

<sup>11</sup>雷頤：《毛澤東評點【多餘的話】：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

<sup>12</sup>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紅色參考》，2015年7月29日。

<sup>13</sup>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轉自雷頤：《毛澤東評點【多餘的話】：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



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批鬥的一個場景

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無恥的。」紅衛兵將周恩來的話變成了行動：八寶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蘇州忠王府也遭到破壞。瞿秋白已死了三十多年，和毛早無權力之爭。搞瞿秋白只不過是為搞當代「叛徒集團」作鋪墊，因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

## 第二步：確定「61 人叛徒集團」

劉少奇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在他周圍有一批在白區工作的領導幹部。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從事革命活動，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被捕後如果真正堅貞不屈，就可能被處死。如果要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妥協是必要的。本來，妥協和叛變應當是能夠分得清楚的。山東省革委會曾發了一個文件，文件規定：革命者向敵人自首，出賣同志、出賣組織、出賣黨的機密者，均為叛徒。在敵人威逼利誘下，履行了一般的登記悔過手續，沒有罪惡的，應視為妥協、變節行為，不以叛徒論處。<sup>14</sup>毛澤東將李秀成、瞿秋白定為叛徒以後，一些妥協行為也當叛變。「61 人叛徒集團」就是這種情況。

1936 年，為解決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 61 位被國民黨政府關押的人的問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只要履行一個不反共不發表的普通手續，犯人即可出獄。」張聞天同意了。<sup>15</sup>薄一波等寫的《反共啟事》，在當時官辦的《華北日報》上發表了，出獄前還舉行「自新儀式」。1936 年 8 月到 1937 年 3 月，被關在草嵐子監獄的人分 9 批辦了手續出來了。事後，為了明確此舉的性質，1937 年 7 月 7 日，中央組織部做出《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其中第三條規定：「凡在獄中表示堅定

<sup>14</sup>山東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清隊的文件，1968.11.28；魯革發[68]第 306 號。

<sup>15</sup>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第 368 頁。

坐滿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辦自首手續，或填一般反共自願書，才能出獄。如他們曾經組織允許填寫這類文件後出獄的，得恢復其組織。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經組織允許者，經過工作中考察後，亦得恢復其組織。」<sup>16</sup>中組部這個事後的決定顯然比張聞天同意的三個條件要寬一些。廖魯言在《華北日報》上發表的《反共啟事》寫道：「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作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這種聲明可能是國民黨寫好讓他們簽字的，但在文革中拿出來，紅衛兵難以接受。劉格平當時和他們是一個案子，不願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就沒有出獄。到文革前，這 61 人中仍健在的有 41 人，其中 22 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

這 61 人沒有出賣同志、沒有出賣組織和機密，如果這 61 人安排一般的工作，可能爭議不會那麼大。可劉少奇把其中的一些人安排在重要崗位上，就難免產生一些非議。邱會作回憶說：「八大在組織上安排得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白區工作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sup>17</sup>康生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sup>18</sup>1962 年春天，林彪曾對高崗<sup>18</sup>夫人李力群說：「劉少奇從華中回來，七大後當了第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sup>19</sup>

文革開始以後，天津南開大學「8·18」紅衛兵和衛東紅衛兵調查校領導人高仰雲的歷史問題，在舊報紙上發現了劉瀾濤的《反共啟事》。紅衛兵把這個材料送到周恩來那裏。1966 年 11 月 24 日，周在批復中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的同

---

<sup>16</sup>《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釋 145

<sup>17</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233 頁。

<sup>18</sup>高崗，陝北根據地創始人之一，建國後任國家副主席，1954 年因反對劉少奇，在受批判中自殺身亡。

<sup>19</sup>陝西省橫山縣高崗與中國革命研究會編：《憶高崗同志》，大眾文化出版社，北京，2010，第 87-88 頁。



學說明，他們發現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佈和追查。」周將電報稿送毛審批，附信說明：劉瀾濤等同志出獄事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在當天批復「照辦」。<sup>20</sup>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毛澤東看到紅衛兵的揭發材料後改變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中提到：「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開大學兩個紅衛兵組織進一步調查，1967年1月中旬，他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恩來、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一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sup>21</sup>文革後把揪叛徒的事完全歸罪於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其實，周恩來也是支持的。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群眾代表時講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一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sup>22</sup>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說北大揪叛徒活動「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sup>23</sup>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7]96號）明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團。這些叛徒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

<sup>20</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93-94頁。

<sup>21</sup> 《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們是如何揪出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1967。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22</sup> 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sup>23</sup> 《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2頁。

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出獄後，由於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其中有少數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sup>24</sup>

61人被正式確定為「叛徒集團」，是劉少奇讓他們「叛變」而後重用他們的，劉自然就是這個「叛徒集團」的頭子。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中發〔67〕200號），「通知」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揭露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長期包庇的叛徒集團，為挖出了一批混進黨內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個通知對抓叛徒問題作五項政策性規定：「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佈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佈材料。」「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他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要把有一般歷史問題的幹部同叛徒，特務，嚴格區別開來。」等。這個中央文件肯定了群眾抓叛徒的行為，因而在各群眾組織中出現了很多抓叛徒調查組，成千上萬的人被當作叛徒揪了出來。

### 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劉少奇曾三次被捕，毛澤東懷疑他有變節行為。1953年初，毛讓東北黨政一把手高崗調查劉少奇 1929年在奉天（即現在的瀋陽）被捕的情況。高崗把任務交給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張秀山讓組織部副部長郭鋒辦這件事。張向郭交待任務時，對查閱的對象沒有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更沒有對郭說是調查劉

---

<sup>24</sup>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材料的批示。

少奇，只說調查那個歷史時期所有的叛徒。<sup>25</sup>郭鋒調查中發現其中有一個叫趙之啟的招供了不少材料，還向張學良寫了認罪書，稱張為「再生父母」。郭鋒不知道趙之啟是誰。<sup>26</sup>

1968年10月18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八屆十二中全會提交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構陷劉少奇的？今天怎樣看這些指控？

### 「一，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5年11月，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從上海潛逃長沙。當時，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恒惕正在厲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12月16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過審訊，趙恒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這時，劉少奇的後臺，紛紛出動。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長洪廣揚和省府會計、趙恒惕的至親楊劍雄，夥同軍閥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少奇的胞兄劉雲亭出面，進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劊子手趙恒惕，向劉少奇這個「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條件。劉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接著劉少奇於1926年1月16日，奉趙恒惕的旨意，捧著趙恒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劉少奇接受了什麼條件呢？即趙恒惕對楊劍雄說的：「你要他迅速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裏亂搞。要庶務股去買一冊四書五經送給他。好好去讀。」<sup>27</sup>這個條件既沒有出賣同志，也沒有出賣機密，這當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審訊時被定為「斬決」，說明審訊中劉沒有與趙恒惕合作，沒有叛變。<sup>28</sup>

<sup>25</sup>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頁。

<sup>26</sup>高崗之女李潔同楊繼繩談話，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在《炎黃春秋》編輯部。2001年10月4日，高崗秘書趙家梁同本書作者也談到這件事，見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論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3年，第98頁。

<sup>27</sup>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的罪證之八：反革命分子楊劍雄1952年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親筆供詞。

<sup>28</sup>《戚本禹回憶錄》第512頁稱：1952年全國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楊劍雄在長沙被捕，他寫信給劉少奇求救，信中談到當年舊事。劉少奇在信上批示，說沒這回事，要當地政府將楊劍雄立即處決了。

「二，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7年6月，「劉少奇適應國民黨的反革命需要，與汪精衛，陳公博進一步秘密勾結，並被指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充當特務，向國民黨提供「工運情報」。劉少奇向陳公博獻策：（一）調走武漢工會骨幹，使「幹群脫節」；（二）解散工人糾察隊，「防止暴動」。劉少奇並且利用他竊據的職務，實行了這個極其惡毒的陰謀，解散了在革命鬥爭建立偉大功勳的工人糾察隊，於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槍支彈藥，甚至連童子團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齊齊，裝上卡車，拱手交給了國民黨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說的：「所謂1927年當內奸一事，證據只是丁覺群的證詞。丁在1927年時曾任漢口特別市國民黨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1928年被捕後脫離共產黨。1967年夏，他被監押起來，專案組逼他寫誣陷劉少奇的偽證。」<sup>29</sup>實際上，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除了提供丁覺群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董鋤平、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成柱周、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候補執行委員張登平等人的證明，這些人在文革期間都在監押中寫的證明，不足為憑。

其實，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和蔣介石合流以前，汪精衛還是國民黨內的左派，共產黨人和汪精衛還有很多合作。上述劉少奇的這些活動，是在7月15日以前。他的這些做法是否恰當，值得討論，但說他是「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還需要研究。

### 「三，劉少奇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9年8月21（或22）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趙之啟）與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在奉天（今

<sup>29</sup>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瀋陽市)紗廠被大軍閥張學良逮捕。劉少奇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是省委組織部長，供出省委委員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丁君羊，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出賣了滿洲省委所屬東滿，北滿，旅大，撫順等十多個特(縣)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個支部。當敵人要劉少奇帶著特務去抓人時，他積極出謀獻策說：省委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如果將他「釋放出獄」，他就可以「搜集共產黨的情報」，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三省地方黨組織。大軍閥張學良對劉少奇的獻策，頗為讚賞。於是將「共產黨案」改為「工潮案」，並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將劉少奇「釋放」。劉少奇奴顏卑膝地給大軍閥張學良寫信說：「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解釋這段歷史的：「1929年劉少奇在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任內，確曾被捕過。但因為堅決鬥爭，身份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證據不足而取保釋放。」「江青一夥卻逼使當時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與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做了偽證。雖然孟用潛在關押期間寫了20多次申訴材料，要求推翻偽證，但一律不准上報，《審查報告》中只選了偽證。」<sup>30</sup>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審查報告》除了孟用潛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十多個旁證。不過，這些證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提供的證詞。高崗秘書趙家梁和高崗女兒李潔曾對本書作者說，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和1953年郭鋒的調查材料是否相符，無法核對，不能斷定。如果劉少奇被捕後承認了自己的身份、職務，還供出了其他省委領導人和滿洲省委所屬組織，這應當算是變節行為。不過，敵人要他帶特務抓人時，他找一個藉口沒有去。以後他一直努力為共產黨工作，要不要定叛徒，還是可以討論的。和他同案的孟用潛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1949年以後只是一個司局級幹部(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文革一開始就被外交部黨組拋了出來批鬥。可

<sup>30</sup>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76頁。

見 1929 年這段歷史決定了孟用潛的終生命運，而對劉少奇以後的升遷卻沒有影響。這是值得繼續研究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與會者一致聲討劉少奇。林彪說：「把暗藏了四十幾年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這一夥子人挖出來了，這是重大的勝利。」「把這些傢伙挖出來，可以說，是給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權第二次生命。」<sup>31</sup>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對劉少奇的批判用「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稱，這次會之後，就直接批判劉少奇了。在全國各地，每個單位，每次開會時都要高呼「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各省、各單位，在劉、鄧、陶的後面，還要加上本省、本單位被打倒的人。如，山西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衛、王、王！」<sup>32</sup>，到縣一級，還要加上本縣被打倒的人，得喊一長串的「打倒」。新華社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吳、朱、王！」<sup>33</sup>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是審查高級領導人的專案組。主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總負責人是周恩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下設三個辦公室：一辦、二辦、三辦。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楊尚昆、陶鑄等國家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這一級的人，歸一辦審查。被打倒的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一批軍隊將領，歸二辦審查。被打倒的中央、國家機關副部以上、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人士，歸三辦審查。（清查「5·16」也歸三辦負責）。

江青在劉少奇的專案中起了重要作用。1968 年 9 月 16 日，江青審閱了劉少奇的「罪證材料」後批示：「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滑、最歹毒的

<sup>31</sup>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68 年 10 月 26 日。

<sup>32</sup>衛恒、王大任、王謙。

<sup>33</sup>吳冷西、朱穆之、王敏昭。

階級敵人。……」<sup>34</sup>看了劉少奇專案材料，周恩來給江青的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註著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江青閱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sup>35</sup>據說，周恩來在對劉少奇的處理報告上還寫「此人該殺」但沒有看到可靠資料。在全會上，周恩來親自宣讀長達數十頁的劉少奇罪證，本來不一定要他親自宣讀的。<sup>36</sup>林彪對這個報告是什麼樣的態度呢？1968年9月中央專案組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江青的批示後，林彪聽秘書講過這份文件後，並沒有任何表態，只是用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意思是同意。葉群聽說林彪只是表示劃個圈時，便立即驚叫起來：「怎麼不提醒首長呢！這是十一樓（指江青）親自掛帥的專案，是中國第一大專案呢！主席非常重視，十一樓親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勞啊！大家都表態了，首長怎麼能只劃一個圈呢？」接著，葉群就喊：「李根清，過來。」李根清是模仿林彪筆跡代林彪簽署文件的工作人員。等李根清走過來，葉群已經替林彪想好了批語：「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sup>37</sup>

親歷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對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在表態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出義憤填膺的樣子。開除

<sup>34</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47-248頁。

<sup>35</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50-251頁。

<sup>36</sup>程光：《心靈的對話》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191-192頁。

<sup>37</sup>李根清：《我仿林彪字體批文件》，《炎黃春秋》，2014年2期。

劉少奇黨籍時，出席會議的只有 50 名中央委員有表決權。當時會議是一致通過的（陳少敏投票時是什麼樣子沒有印象，事後才知道她不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這 50 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後來被打入另冊的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 6 人外，還有 44 人中，半數以上去世後都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sup>38</sup>會上，葉劍英在批劉的同時，對朱德了發表了系統的批評意見。王震批劉少奇也相當厲害。還有不少人對劉少奇利用職權打擊老幹部表現出極大的憤恨！<sup>39</sup>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中發 [68] 155 號）傳達到基層。

劉少奇住院就醫的時候，得知八屆十二中全會將他永遠開除出黨，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開始嘔吐，血壓、體溫陡然升高。」從此他再沒有說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直到 1969 年 11 月逝世，<sup>40</sup>在最後的歲月，他面容憔悴，身體消瘦，頭髮、鬍子又長又髒，常常是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為了防止他自殺，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

<sup>41</sup>1969 年 11 月 12 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囚禁處——銀行金庫地下室含冤而死，終年 71 歲。送火化場時說是一名「烈性傳染病人」，火化單上填寫的是：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九大」以後，中央專案組又提出王光美是美蔣戰略潛伏特務，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決定，對王光美判處死刑，呈報毛澤東，毛說留下活口，做劉少奇反動罪行的證據。早在 1955 年肅反運動中，在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上羅瑞卿等研究幾個重大案情時，曾有王光美是特務的揭發。毛主席批示，大意是：除劉少奇外傳閱，以免造成思想負擔。<sup>42</sup>

---

<sup>38</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600 頁。

<sup>39</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 601 頁，程光：《心靈的對話》，第 194 頁。

<sup>40</sup> 黃崢：《劉少奇與文化大革命》，載《黨的文獻》，1998 年第 5 期。

<sup>41</sup> 高皋、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178 頁。

<sup>42</sup> 程光：《心靈的對話》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195 頁。



### 三、再批「二月逆流」

批判「二月逆流」是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全會公報指出：「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大勝利。」

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一起集中揭批「二月逆流」，你一言，我一語；你揭發，我補充，指名道姓地揭發批評。<sup>43</sup>林彪10月26日的長篇講話中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他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鄧、陶翻案。並且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

在批判「二月逆流」時，周恩來重點批評幾位元帥。他說：「聶榮臻在科學院、國防科委鎮壓群眾」、「聶榮臻同志硬把趙爾陸同志逼死，還說趙爾陸是自殺的，經化驗，服過安眠藥，但不至死的程度。他們是怎樣保護老幹部的？」、「聶榮臻同志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百團大戰，他很積極；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也很積極，大量裁軍，不按毛主席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辦，其惡果使晉察冀邊區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時還沒有恢復起來。」

周恩來重提1966年11月13日、27日幾位元帥接見軍事院校學生的事，他說：「林副主席不同意，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八次接見了紅衛兵，但他們背著林副主席還是接見了。」「在會上，他們把長春獸（醫）大（學）的李基才大罵了一頓，葉、陳、徐、聶都講了話。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他們還把他搞出去，擺在第一位講了話。」<sup>44</sup>「聶、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還說：『要燒，要燒焦。』

<sup>43</sup>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一小組會上的講話，1968.10.17，宋永毅等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sup>44</sup>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1

群眾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

周說：「兩個元帥帶頭大鬧懷仁堂，葉劍英在一個小時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藉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浙江軍區張學倫的兒子領著省軍區、省委、人委的高幹子女組成一個連，到處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兒子送來，他不送來，給粟裕打電話，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沒理他。高幹子女作壞事，就是高幹縱容的。」

周恩來批評葉劍英，說他女兒「沖軍事科學院，他是知道的，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的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後的全國綁架。」

周恩來發言中還談到，討論「軍委八條」時，幾位元帥和中央文革有爭論，散會後葉劍英說：「今天是舌戰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說：「不愧為元帥葉參座。」「軍委八條」出來了，葉劍英說：『有了上方寶劍就好了。』周恩來說：「把『軍委八條』當成鎮壓群眾的『上方寶劍』是非常錯誤的。」

周恩來還批評葉劍英參與四川鎮壓群眾：「16日大鬧懷仁堂後，17日甘渭漢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

談到青海事件，周恩來說：「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把《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卻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二月開軍委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到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劉賢權同志被軟禁後，1月8日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報告他被看管起來了、電話也不通等情況，到2月26日（信）

---

月29日蕭華、陳毅、劉志堅、葉劍英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四位元帥嚴厲批評了軍事院校的造反派。見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

還被徐向前扣壓著。當時徐向前是全軍文革小組長，23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裏查了出來。」<sup>45</sup>

周恩來的批評，幾位老帥都認了，他們都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比別人批評他們的調子還高，給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sup>46</sup>陳毅站起來誠懇地說：「過去的幾十年裏，我總的來說是擁護毛主席的，是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今後我再也不反了，用九大的標準來衡量，我恐怕不夠格．．．」毛澤東打斷了陳毅的話，說：「你可以當個右派代表嘛！」陳毅挨了當頭一棒，愣住了，尷尬地站在那兒。<sup>47</sup>周恩來讓與會代表將會上批「二月逆流」的情況向軍隊裏的軍以上、地方省、中央部委常委會上傳達。<sup>48</sup>傳達以後，「右派代表」就成了陳毅、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的代名詞。

在十二中全會以前，毛澤東對「二月逆流」講了很多話，講得老帥們灰溜溜的。等這些人徹底承認錯誤以後，毛在十二中全會上說：「這件事情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因為他們有意見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黨內生活是許可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是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嘛，就證明他公開出來的。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在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

「窮寇莫追」，毛澤東懂得這一點。他知道如果把事情做絕，把元帥們得罪光了，把老幹部全得罪了，文化大革命也很難進行下去。他找機會轉圜。在這次會上對「二月逆流」再次猛批以後，他又做好人，採取寬容的態度。

批「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肯定文革。林彪在26日的講話中全面、高調地肯定了文革，他說：「我過去曾經講過，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現在，這個損失是越來越小，是比過去說那個話

---

<sup>45</sup>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1968. 10. 載宋毅主編《中國方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sup>46</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571頁。

<sup>47</sup>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03頁。

<sup>48</sup>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02頁。

的時候還小，而比過去說那個話的時候的成績越來越大，將來還要更大，這是可以斷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這個損失和收穫，實際上是等於一換百，一換千、一換萬，是一本萬利的收穫。」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引用毛澤東的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公報還肯定了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央文革正是參與「二月逆流」的元老們攻擊的對象。公報一發表，更加鼓舞了文革中的激進派。全國各地都敲鑼打鼓地歡迎、慶祝。

林彪的講話也有使毛澤東和江青不滿之處。林彪拿歐洲文藝復興和文革作比，以讚揚文革。毛認為貶低了文革，不高興。江青認為文藝是她的「領域」，林講話沒有和她商量。江青說：「這樣大的事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嘛。」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復興問題）有意見時就說：「我就是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為自己了不起！」<sup>49</sup>直到九大以後，江青還和姚文元批註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主要針對歐洲文藝復興一些看法。他們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來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sup>50</sup>

10月31日，毛在閉幕式上講話。他在講話中為鄧小平等一些幹部說了好話：「打倒的譚啟龍、江渭清，過幾年以後，大家氣消了，也可以做點工作嘛。」「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參加就是缺點。所以我們還是推薦各地把他們選作代表。陳毅同志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派嘛。你對九大代表三個條件中的第二條不那麼符合，可以協商嘛。有少數人參加有好處。」他還為幾位著名知識分子解圍：「馮友蘭你不叫他搞唯心主義一套，我看也難。還有一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毛澤東一方面保了鄧小平，一方面推出政治新星

<sup>49</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09頁。

<sup>50</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50頁。

王洪文，這是為他身後做出的人事預設。他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應該說，鄧小平同劉少奇有區別。事實上也有點區別。」他讓王洪文站起來亮相：「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看。上海工總司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這次會，有年青的同志參加很好。」

從十二中全會以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逐漸變了。林彪對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毛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一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是必要的。」原來以為毛對江是公事公辦，直到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等才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夥，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林彪不讓江青一夥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裏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以後，為了防止江青一夥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一樣嚴格。<sup>51</sup>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在這次會議上初露端倪。在文革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邱會作的觀察，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沒有人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的賬的，即使是假的，也是要買賬的。<sup>52</sup>

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這個文件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領導的起草小組起草的。在新黨章第一稿中有「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提出把「接班人」刪去。康生說：「林彪同志很謙虛，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sup>53</sup>九大開幕之前，林再次向毛提出刪去這句話，毛說：「一個人過分謙虛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幹，就不能說服人了。」在起草黨章時，除了寫林彪以外，張春

<sup>51</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10頁。

<sup>52</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11頁。

<sup>53</sup> 康生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四小組的發言。

橋還寫了「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康生說：「你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丟得一乾二淨。」所以江青的名字沒上黨章。<sup>54</sup>

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是「充分民主協商，高度集中」，實際上代表都是指定的。這種由黨委指定黨代表的作法，一直延用到文革以後的若干年。

全會公報說：「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份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

<sup>54</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14頁。

## 第二章

# 「九大」 從團結到分裂的大會



中國九屆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及陳伯達。

1969年3月3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開九大，會期十天左右。談到九大以後的機構設置時，毛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sup>1</sup>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準備工作。同時把下放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找來，他安撫幾位元老說：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老同志參加到九大各代表團中去。二月逆流，政治報告中不講。我們還是按過去的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人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毛說：就在四月1日開大會，議程就三個，通過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不要什麼都搞。<sup>2</sup>

毛想將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產生一個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然後逐步結束文革。

毛澤東在「九大」開幕式的講話中提出要「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九大」真的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嗎？

## 一、高度集中的秘密會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黨員選舉產生的，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裏還沒有恢復黨組織，以軍人為骨幹的「黨的核心小組」起決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一個秘密的大會。事先沒有公佈開會時間，不邀請外賓，也不准記者採訪。

為了保密，除極少數軍政高級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兩三個月，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到省裏的一個賓

---

<sup>1</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1頁。

<sup>2</sup>同上，第237頁。



館，切斷了與外面的聯繫，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到北京出席大會。

三月下旬，參加「九大」的代表陸續住進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各賓館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能打開，晚上必須拉上窗簾。那麼多人從賓館進入會場怎樣保密呢？住各賓館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車，每車 45 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後每隔三四分鐘，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這般，每個賓館只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開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 1 公里，行車時間只需兩、三分鐘。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前門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入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地由便門進入會場。4 月 1 日的大會，自始至終沒有一人從人民大會堂正門進入會場。會場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sup>3</sup>

3 月 27 日，「九大」代表齊集北京，開始醞釀主席團名單，當然也是秘密進行的。毛指示，主席團不設常委，設正副主席及秘書長各一名。<sup>4</sup>這樣，就突出了毛、林、週三人。

「九大」於 1969 年 4 月 1 日開幕。出席代表 1512 人。通常大會是上午 9 時開始，而「九大」開幕式卻在下午 5 時，這是按毛的作息習慣安排的。一切以毛為中心，「九大」的開會時間也得順從毛個人的生物鐘。

主席臺上排的座次很有講究。以毛為中心，毛的右邊有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毛的左邊有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當時的說

<sup>3</sup> 逄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載《炎黃春秋》，2003 年第 3 期。

<sup>4</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238 頁

法，右派都在右邊，左派都在左邊。緊靠毛左右的林、周，一個是主席團副主席，一個是秘書長（雖然此時還沒有選出，但是明擺著的），當然不在此例。

大會開始，毛澤東宣佈了大會議事日程。第一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選舉大會主席團，早已內部確定的 176 人的名單已提前發給全體代表。毛澤東問大家贊成不贊成？下面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於是舉手通過。

選舉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秘書長時出現了一個令人玩味的場面。毛澤東說：「我提議林彪同志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趕緊把嘴向擴音機前湊了湊，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來，笑著對大家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代表們笑著高高舉起右臂，林彪高喊：「通過！」會場又響起熱烈掌聲，接著是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毛澤東接著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當主席團副主席，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再次舉手，鼓掌。毛澤東又說：「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又舉手，鼓掌。毛澤東高興地說：「好，通過！」

「九大」再一次將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澤東致開幕詞，口號聲此伏彼起，講話二十幾分鐘，竟被打斷數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澤東講到哪里，甚至一句話還沒講完，便站起來領呼口號。那時的口號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領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帶標點符號不到 800 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毛的開幕詞主要是講中共的歷史，從「一大」講到「八大」。在其他人在發言中，借講歷史進一步神化毛澤東。周恩來 4 月 4 日的講話中說，只有懂得了黨的 48 年歷史，「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

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四個「才能懂得」歸納起來一句話，才能懂得毛澤東的光榮、正確、偉大。黃永勝在 14 日的發言中說：「我黨、我軍幾十年的鬥爭歷史，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倒退，就失敗，就喪失一切；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前進，就勝利，就有了一切。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用鮮血換來的經驗。」

「九大」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黨內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讀的「九大」政治報告集中闡述了這個理論，並得到大會通過。這個理論，就是「九大」確定的政治路線。

14 日大會，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號。毛說今天大會有三項議程：一是要通過林彪同志的報告，是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二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還有幾個同志講話。

毛澤東已經 76 歲，接班人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九大」的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八大」黨章曾經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是因為毛向中央建議，在一定的時候，他當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讓劉少奇接班。1961 年，他對英國客人蒙哥馬利說：「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sup>5</sup>「九大」黨章取消了設立「名譽主席」的規定，這表明，只要毛澤東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過人的林彪不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這中間就蘊藏著危機。

會議的前兩項議程很順利完成了，發言的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尉鳳英等。周恩來的發言除了歌頌毛澤東、贊成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外，還大力讚揚林彪。他說：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

<sup>5</sup>熊向暉：《毛澤東主席對蒙哥馬利談「繼承人」》，載《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53 頁。

毛主席，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這裏，周恩來用林彪取代了眾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義時林彪只是一個排長。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的餘部在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井岡山會師時，21歲的林彪只是一名連長。紅四軍建立後，才是一名營長，以後升為28團團長。周恩來接著說：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是林彪。按照慣例還應該有一個修改黨章報告。如果要作這個報告的話，這個人理應是周恩來。然而九大的議程中只有「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卻沒有修改黨章的報告。而在1973年的十大時，又恢復了修改黨章報告的議程，由王洪文來作這個報告。可見，九大沒有修改黨章報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來，也許這是周恩來自己安排的。

## 二、政治報告起草中的爭論

政治報告是歷屆黨代會的重頭戲。但是，在九大，代表們對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暢有點遺憾。他們那裏知道，圍繞政治報告毛、

林之間開展了一場鬥爭。這場鬥爭直到 1973 年林彪摔死了以後才由周恩來公開。

1973 年 8 月 24 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談到「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他說：

「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

周恩來這個講話說明，「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一個是林、陳稿，一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春橋、姚文元稿）；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毛稿主張「九大」以後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林、陳稿最終被否定。此時林彪摔死快兩年，周恩來把起草政治報告作為林彪的一條罪狀。

下面具體介紹是周恩來事後披露的這一情況。

1969 年 2 月 1 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毛澤東指定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陳伯達負責，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陳伯達當天就同他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談了政治報告的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抓生產了，經過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他讓秘書收集經濟建設方面的資料。<sup>6</sup>2 月 7 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談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毛提議陳伯達牽頭，林彪掛帥，春橋、文元參加。會上商定 2 月 20 日搞出初稿，九大 3 月 15 日開幕。會後，陳伯達向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要北京市經濟方面的資料，謝富治不給，還說：「伯達同志，你可別怪我

---

<sup>6</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 年，第 137 頁。

呀，中央文革向我要材料，要多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sup>7</sup>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已經很僵了。陳伯達乾脆甩開張、姚，自己一個人幹起來了。但力不從心，不能按期交稿。19日，毛催促陳伯達。3月3日，仍然沒有消息，毛很生氣。7日，還沒有消息，毛更不滿。13日，毛提出換人。說：「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毛明顯點出報告的主題：「總之，要寫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鬥爭，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3天后，毛說：「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sup>8</sup>張姚二人於16日起陸續將報告稿分批送審，毛澤東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林彪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以後，他一方面約陳、張、姚三人到他家裏商量了一次，委託他們代勞。說報告內容由陳考慮，他就不多過問了。另一方面找秘書們準備一個口頭講話稿（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做。<sup>9</sup>

陳伯達從林彪處回到辦公室後，寫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面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一次，回來後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秘書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毛。<sup>10</sup>

毛圈閱退回陳伯達的提綱以後，他就甩開張姚二人自己寫了起來。姚文元來電話，他也不接。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會向上報告的。」陳回答說：「不管他，中央決

<sup>7</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38頁。

<sup>8</sup>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的談話，1969年，3月12日、15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38-1539頁。

<sup>9</sup>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210-212頁。

<sup>10</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37頁。

定主要由我來寫，他們就是想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寫完了第一部分，就送毛。送上的稿子沒有回音。九大開完以後，陳伯達處收到了毛主席處退回的一袋文件，就是陳伯達寫的政治報告第一稿，陳的秘書吃驚地發現，毛未拆封看過。<sup>11</sup>陳伯達用了一個月時間，只剩下最後一點了，他的稿子被否決了。他非常痛苦地對周恩來說：我的稿子只剩一點了，怎麼辦？周說：那你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sup>12</sup>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以後，葉群給陳伯達打電話安慰：「不用你的稿子沒關係，他們要搞就讓他們搞去，林彪同志是瞭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sup>13</sup>

周恩來讓陳伯達先拿出寫完的稿子交中央文革碰頭會。會上，張、姚說陳的稿子鼓吹唯生產力論。陳伯達說張、姚的稿子：「這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在陳伯達和張、姚爭論中，毛是站在張、姚一邊。在毛決定使用張、姚的報告後，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一次批評陳伯達的會。說他搞唯生產力論。毛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陳伯達，他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你腳踏兩邊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邊船，你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批准，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一把？」<sup>14</sup>毛對陳伯達發這麼大的火，可能是看到陳的稿子把經濟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偏離了繼續革命思想。

「腳踏兩邊船」，延安時是指張聞天和毛澤東，現在是哪兩邊？只有毛、林了。也就是說，在政治報告、也就是「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這個重大問題上毛、林產有分歧。

---

<sup>11</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40頁、第144頁。

<sup>12</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40頁。

<sup>13</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41頁。

<sup>14</sup>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的講話，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0—271頁。高書說是毛在3月7日講的，不對，可能是在3月中旬到九大前。

對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毛澤東在 1969 年三四月間作了多次修改<sup>15</sup>，每修改一次都送林彪那裏。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頂多只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sup>16</sup>報告前，張春橋要林彪政治報告稿上簽名，林彪一口回絕。林彪放棄了作口頭報告的打算，只念毛定稿的文本，還念得結結巴巴。<sup>17</sup>這表明，林彪不僅是對張姚寫的報告不滿，還包括對毛的不滿。

毛從什麼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鵬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的不同態度，是重大轉折之一。<sup>18</sup>

### 三、選舉和選票

4 月 24 日下午，是第三次全體大會，也是最後一次全體大會，大會的任務就是選舉。會場劃分為七個區，每區設一個票箱，主席臺上單設一個票箱。由於主席團成員比大會場其它區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臺上的投票先行結束，主席團成員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個排隊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選票投入票箱後，沒有跟隨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卻轉身快步向主席臺走去。但見他雙手扶著主席臺的前沿一撐，兩腿一蹬，便輕鬆地躍上主席臺，然後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領袖們自然都一一與他握手。這位代表的成功舉動，使得許多青年代表從投票的隊列中或從座位上向著主席臺跑去。原來躲在大幕後面的警衛人員紛紛出來阻攔，還是有不少人成功地沖到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面前，如願以償，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後，臺上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在台前組成一道人牆，才使局面得以控制。當時認為和毛主席握手是最最幸福的人，他回去後暫時不能洗手，大家要和他握手，讓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大會結束時，再次出現了狂熱的「表忠」場面。林彪宣佈大會閉幕，毛澤東等坐在

---

<sup>15</sup>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1998 年版，第 11—18 頁。

<sup>16</sup>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北京，1988 年，第 213—215 頁

<sup>17</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741 頁、742 頁。

<sup>18</sup>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647 頁。



第一排的中央領導人剛剛離席，坐在會場前部的許多青年代表，幾乎在同一時間蜂擁而上，一瞬間把主席臺上領導人用過的茶杯、鉛筆、紙張全部搶光。<sup>19</sup>

到會代表 1510 人，僅有 2 人請假。分兩次投票：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彪獲得 1508 票，會後有權威人士透露，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得 1509 票。風頭正健的江青獲得 1502 票，少了 8 票，江青認為有人背後搞鬼，要求調查。<sup>20</sup>

江青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這兩個權力很大的機構「貌合神離」，經常發生互相拆臺的事。吳法憲和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承認軍委辦事組的幾位在選舉中搞了名堂。

選舉前，葉群對吳法憲等人說：「林總講，現在江青太猖狂了。張春橋、姚文元過去都是榜上無名的小卒，現在的威望這麼高，看來當中央委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使他們的選票少幾張，不讓他們得全票，以殺一殺他們的銳氣。」在這以後，吳法憲等人作了佈置，指定軍隊裏有的人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sup>21</sup>午飯時，黃、吳、李、邱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黃永勝和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談。談完以後，袁升平開玩笑說：「哦，原來不是給自己拉票呀。」公佈選舉結果時公佈每一個人的票數，江青少了 8 票，張春橋、姚文元可能少了十多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的票比中央文革的人多。<sup>22</sup>江青聽到票數後就退席了。選舉後邱會作和肖勁光、粟裕閒談。邱說：「選舉的中心問題是當選和落選的問題，多幾票少幾票沒有意義。」粟裕說：「對一般人沒意義，對特殊人物意義就大了。」在閉幕當晚的中央碰頭會上，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搞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

<sup>19</sup>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載《炎黃春秋》，2003 年第 3 期。

<sup>20</sup> 陳伯達的秘書回憶，正式選舉前有預選，預選時江青得了全票，她很得意。正式選舉時陳伯達沒有投江青的票，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 年，第 143-144 頁

<sup>21</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2008 年 2 月，第 3 版，第 744 頁。

<sup>22</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645 頁。

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而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姚文元也提出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黃永勝感到不安，對李作鵬和邱會作說：「可能惹禍了，你們看出來了沒有？」江青一夥要查選票的事，周恩來向毛彙報了，毛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違反黨章的大合唱。」<sup>23</sup>4月25日下午，周恩來對邱會作說：「你回去同吳、黃說一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麼擔心。原則問題你們要堅持，在些小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辮子，要吃大虧的。軍隊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這次關於選舉的問題有人給我寫了一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這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sup>24</sup>

毛澤東在4月11日講話中說：「我提議幾位老同志，就是你們講的幾個老機會主義，都選進去。」「幾位老師，李先念、李富春要選。」（許世友插話：應當選。）「王明他們（江青插話：王明不同。）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麼要緊！（許世友：他們反了幾十年，選進去了，他們還是要反，怎麼辦？）我們就永遠準備他反。（許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選。）那不就成命令主義？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嘛！朱德、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選進去。（董老：幾個老師選進去是可能的，張聞天、王稼祥要選進去有困難。）」<sup>25</sup>4月23日，毛又打招呼，說明天選舉把這些人選進去。

但是，把這些「對立面」選進中央委員會，並不是無條件的。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既要保證這10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受領任務：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面」的票，落實到「人頭」；各代表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後，必須以「三忠於」的高度、以黨性保證，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團不敢馬虎，由代表團領導親自動員、佈置，有的還作了演練。大會秘書處還不放心，

---

<sup>23</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47頁。《吳法憲回憶錄》第745頁認為，周恩來將查選票的事告訴毛澤東，毛聽了沒有說話。

<sup>24</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47頁。

<sup>25</sup> 九大毛澤東講話錄音記錄稿，1969.04.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4月23日晚以大組為單位進行了預選，對結果感到滿意。<sup>26</sup>

24日選舉結果，這些人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當選：朱德 809票；陳雲 815票；李富春 886票；陳毅 867票；徐向前 808票；聶榮臻 838票；葉劍英 821票；鄧子恢 827票；李先念 922票；張鼎丞 1099票。

「九大」選舉中央委員 170名，候補中央委員 109名，共 279人，其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 53人，占八屆中委和候補委員 167人（死亡者除外）的 31.7%。

在九大剛剛閉幕到九屆一中全會之前，發生了一件事，這就是「李必達事件」。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他發現黃、吳、葉、李、邱在「九大」前後經常秘密集結，議論江青。他還在電話中竊聽了這些人反對江青的言論。1969年4月26日，他寫好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共 20多頁，一式三份。一份走機要，一份請副總參謀長溫玉成轉交，一份走地方郵局。李曾當過溫的秘書，他知道黃永勝與溫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溫玉成把信轉送中央。溫玉成看完信，經過一番考慮，沒把信交給中央，而交給了葉群。葉群立即告訴了黃、吳、李、邱。4月28日，黃永勝命令他的警衛參謀李學金逮捕了李必達。4月30日，吳法憲派了一架專機，將李必達押送到廣州。在飛往廣州的飛機上，李必達在《毛主席語錄》最後一頁紙上寫下：「因為我揭發反革命集團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幫助我向毛主席報告。」機組人員在飛機上拾到語錄本，交給吳法憲，吳法憲交給葉群，葉群又把黃永勝和項輝芳叫到毛家灣研究對策。李必達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

李必達通過郵局寄的那一份，被黃永勝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過機要的那一份送到了中央。事後，黃永勝打電話試探江青的反應。江青對黃說：「你要來抄我的家嗎？」江青也曾給周恩來打電話：「我可能要遭到暗殺。」

李必達這件事會使毛澤東瞭解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私下裏有反對江青的秘密活動；李必達給毛寫信，卻受到秘密迫害；李必達被關在黃永勝長期管轄的廣州軍區；秘密迫害李必達的是軍委辦事組的

<sup>26</sup>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集體行動。這是高層政治鬥爭的重要動向。毛對這一重大動向深藏於心，毫無表露。

軍隊裏的人為何反對江青？幾位軍頭的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反對文革。因為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就是政治正確。實際不完全是這樣的。軍人反對江青和文革小組有幾個原因：一，在文革中，代表中央辦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軍委辦事的就是軍委辦事組。這兩個權力最大的小組的意見時常對立，而且有權力之爭。江青想插手軍隊，軍委辦事組「像防賊一樣防著她」；二，江青憑藉毛夫人的地位指手劃腳，令人討厭。一些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將軍們怎能看得起她？三，作為「大內主管」的汪東興，對性格乖張的「主婦」不敢怒不敢言，就向軍人們散佈毛、江關係不好的假信息，變相鼓動軍人反對江青。

4月28日，舉行了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只有一個副主席，就是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在公佈的名單的排列方式上，極力突出林彪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周恩來的名字排位由通常的第三降到第四。宣佈後，周立即從臺上走下來，坐到第台下第一排，毛把他請上了台。這樣的排名方式，可能是周恩來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不投江青的票的那幾個人，在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時，照樣沒有投江青的票。這印證了張春橋的那句話：「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也就是說，不投江青票的幾個人都在新選的中央委員之內，當然是軍委辦事組的那幾個人。陳伯達也沒有投江青的票。

在軍隊方面，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有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8人為軍委辦

事組成員。實際上，林彪通過軍委辦事組掌控軍隊，五位元帥只是掛名而已。軍委辦事組權力大了，中央文革小組逐漸取消了<sup>27</sup>。幾位老帥不參與軍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不存在以後，在政治局內部，文革派和軍委辦事組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兩個集團。

「九大」以後，周恩來的權力加強了。「九大」前的「碰頭會」周恩來僅是召集人，「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是名符其實的主持人。在毛確定的大框子內，周恩來是執行過程中的決策人。他將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半個國家主席（董必武代國家主席不管事）的權力集於一身。多年來，毛一直凌駕於政治局之上，周恩來主事以後，這一情況更加明顯了，政治局集體領導要向毛澤東個人請示工作，聽他的指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說：「那時中央裏發生的重點的事，沒有一件不是毛主席決定的，沒有一件不是周恩來辦成的。」<sup>28</sup>

#### 四、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屆一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指定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三人小組，委託這個小組為九屆一中全會提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名單。三人小組除了毛、林的電話以外，其他電話一概不接，不與外界聯繫。

黃永勝事後對吳、葉、李、邱說：「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曾經定了7個人的名單：毛、林、周、陳、康、黃，還有江青或張春橋。但是我推掉了。」<sup>29</sup>黃不願當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當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當常委。我不能給他這個機會。」<sup>30</sup>江青曾放言：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sup>31</sup>

---

<sup>27</sup>1969年夏天以後，中央文件中署中央文革越來越少，直到1969年9月12日，中央文革最終停止運作，麥克法誇爾：《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中文版，星克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300頁。

<sup>28</sup>程光：《心靈的對話》，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80頁。

<sup>29</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50頁。

<sup>30</sup>黃正：《軍人永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241頁

<sup>31</sup>《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第114頁。

三人小組第一次上報的政治局委中名單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葉劍英、謝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 23 人。

黃永勝說：「我開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應講功勞，但不一定要當政治局委員，這是為了大局，為了主席。康生一聽就火冒三丈。會後，周總理對我說：『你太不懂了！』不懂什麼？總理沒有說。」<sup>32</sup>

4 月 26 日下午，毛看到了上報名單。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加上了葉群。在王效禹、葉劍英名字下了一個杠。後來毛說，王效禹就不考慮了。

林彪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大叉，但沒有加上江青。邱會作認為，「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是什麼態度。」

在三人小組會上，周恩來說：「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的名字，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都列上，這也是從當前大局來考慮。」這樣，又加上了江青、葉群的名字。<sup>33</sup>

在新的名單，毛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了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一樣，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林彪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參加會議，一向由葉群出面。作為林辦主任，葉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林彪，電話由葉群接，林彪的意見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提出「更好」的意見林彪也會接受。江青不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這兩個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態。所以，周恩來為這兩個人進政治局大傷腦筋。

26 日晚上三人小組繼續工作，主要是討論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一定

<sup>32</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650 頁。

<sup>33</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650—651 頁。

要進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彙報，12時後向林副主席彙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27日上午10時，三人小組到了毛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選人名單。」毛說：「你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麼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三人小組到林彪家裏，周對林說：「關於葉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問題，從現實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一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黃永勝說剛才到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康生也提出了請求。林說：「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最後，在毛處開會把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定下來了。毛、林、周、康、黃五個人在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sup>34</sup>

黃、吳、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幾次向他們講什麼是「中央政治」以及關於「中央政治」的範圍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周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邱會作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後，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會作後來對「中央政治」的理解是：一，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而是和主席聯在一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sup>35</sup>實際上，毛是想讓江青進政治局的，他劃掉江青，加上葉群就是為江青進政治局作鋪墊：江青的資歷和政治影響力都在葉群之上，葉群進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進政治局？

江青在有些時候很難相處，周恩來對她委曲求全。黃永勝對他兒

<sup>34</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51—652頁。

<sup>35</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80—681頁。

子黃正說：就我親眼看到的，周恩來在政治局簡直就是一個受氣的小媳婦。江青整他，他就是逆來順受，一句都不敢反駁。有一次開政治局會議，有重要的議題要研究。會還沒開始，江青就鬧，說：「總理，你要幫我解決一個嚴重的問題，不然就要出大事情！」周恩來問：「江青同志你有什麼嚴重的事情？」江青說：「我房裏那個馬桶現在天冷不敢用，太涼，一上廁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見毛主席，怕傳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鬧大病，這個問題還不嚴重啊？」周恩來說：「怎麼辦？我開完會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幹，說：「總理你對我沒有階級感情，階級敵人恨不得我快點死！」周恩來沒辦法，會也不開了，就帶著我們幾個到江青那裏去。周恩來對著江青那個馬桶，用手托著下巴，這樣看看，那樣看看，想來想去，最後說：「江青同志，這樣好不好，我們沒有技術把這個馬桶的墊圈加熱，但可以用保暖的東西把墊圈包起來，外面再用軟和的布料包起它來，就可以臨時解決了。」江青同意了，周恩來馬上叫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做好。<sup>36</sup>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凡是有毛澤東出場的場面，江青的位置總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情況下，江青總是同林彪並肩出場，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後；凡是周恩來領頭的場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單獨出場，江青總是走在前頭，後面的人還要跟她保持一段距離。有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要吃藥，護士拿來了一杯開水，周恩來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sup>37</sup>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毛主席的特殊關係，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賬的。<sup>38</sup>

## 五、「九大」以後林彪、江青的關係

江青和林彪的關係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一方面，江青這個人有時做事不得體，令人討厭。特別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軍隊內的造反派，林彪要穩定軍隊，在

<sup>36</sup>黃正：《軍人永勝》（下），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57-258頁。

<sup>37</sup>《邱會作回憶錄》，第578-579頁。

<sup>38</sup>《邱會作回憶錄》第611頁。



觀點上就有衝突。因此，從軍隊支左開始，文革派和軍隊就有矛盾。

吳法憲回憶，1967年2月中旬，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在京西賓館開一個小型會議。會上陳伯達批評肖華，把很多問題引到軍委頭上。陳伯達說：「肖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政治工作引到資產階級的軌道上了。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清規戒律多，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一路過三座門（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裏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進這個三座門。」陳伯達這番話使在座的軍隊幹部憤憤不平。就在這幾天，肖華的家被北京軍區文工團和一些軍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搶走了一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葉劍英向林彪彙報了這些情況。林彪聽了勃然大怒，讓秘書打電話把江青叫來。說：「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就罵肖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除我的一切職務。」林彪說話時，江青想插話解釋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憤怒之下，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參謀備車，要和江青一起找毛澤東。葉群在兩人中間，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還在林彪面前跪下來，抱著林彪的腿，不讓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毛主席那裏去呢？」在林彪罵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葉劍英、徐向前，讓他們兩人主持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即「抓肖華，抄肖華的家，搶檔案是不對的。讓肖華寫個檢討過關。」並通知肖華本人參加會議。結果，中央文革只有關鋒一人參加會議，說：「陳伯達昨晚講話之前是因為喝了點酒，糊裏糊塗亂說的講了一些錯話，江青在中央文革會上批評了他，陳伯達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先沒有和江青同志商量。」關鋒說完後，引起了軍人們更強烈的批評。<sup>39</sup>

<sup>39</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651—656頁。

在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不久，軍委辦事組就和中央文革之間發生了碰撞。1968年夏，軍委辦事組向毛報告，建議凡涉及到部隊戰備、調動等重大問題的軍委文件，主送毛、林、週三人審批後即執行。毛批准了這個建議。這樣，中央文革就不能過問軍事。江青說黃永勝封鎖消息，讓黃檢討。黃沒有檢討。1968年秋，中央決定由黃永勝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阻止黃出國，還怒罵黃永勝：「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你們搞軍閥專政。你們戴五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衣，不受黨的領導，不覺得恥辱嗎？」毛還是讓黃率團出國。江青更加不滿。<sup>40</sup>

九屆一中全會以後，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頭會照常開。江青到會最早，她坐在周恩來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她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一個問題，現在有人在搞陰謀，一切事情都不告訴我，連電話都不打一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以為文化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麼委員就保險了？你們的歷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櫃裏，有種的，我們來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這段狂言後就走了。<sup>41</sup>邱會作認為，江青說的搞陰謀就是周、康、黃三人小組提名單時沒有跟她通過氣，實際是她知道了李必達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會堂召開中央政局全體會議，周恩來傳達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sup>42</sup>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取代了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

邱會作認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彪勝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勝利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九大」以後的鬥爭更激烈了。<sup>43</sup>

---

<sup>40</sup>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42-643頁。

<sup>41</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56-657頁。

<sup>42</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57-658頁。邱會作可能忘了謝富治。

<sup>43</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58頁。

「九大」以後，黃永勝幾乎沒有一天不議論江青這些人的事。<sup>44</sup>黃、吳、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關於林、江關係，他們四個人無話不說。黃永勝對李作鵬、邱會作說：「我們是一根繩上的蚂蚱，出了什麼事，我們一個也跑不了的。你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sup>45</sup>黃、吳、李、邱說江青有宗派，其實他們自己也結成了宗派。他們這個宗派談起江青總有說不完的話。「九大」期間的一天，黃、吳、李、邱四人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裏從晚上八時談到第二天早晨六點，整整談了十個小時，集中談林、江關係。<sup>46</sup>

「九大」以後，江青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具體的分管部門。江青先到毛澤東那裏要求分配工作，毛沒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葉群藉口林彪身體不好，擋了五、六次駕。最後實在不好再擋了，就讓江與林彪談了一次話。江青說：「請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說：「政治局委員就是工作。」江青說：「一點權力也沒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說：「在集體領導中，你贊成或者反對就是權力！」江青急了，說：「現在我在政治局裏是多餘的人！」林彪說：「像我們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多餘的人！」說完就閉目養神，不再開口了。<sup>47</sup>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謝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處釣魚臺11號樓開會，李德生也參加了。江青一氣講了3個小時，講她的革命經歷，以及在延安和毛結婚的前前後後，然後就逐一評論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三位常委。說周恩來有行政能力，勤勤懇懇，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看得不准，決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體工作。還說「這與他這個人在歷史上走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歷史上他就是東風來了擁護東風，西風來了擁護西風，跟著王明跑，蘇區損失很大。……」說康生「有理論水平，同修正主義鬥爭很堅決，是有功的，但他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少。」說伯達「是書呆子，不會辦事，沒有主張，經常講錯

<sup>44</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552面。

<sup>45</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581頁。

<sup>46</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582頁。

<sup>47</sup>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香港北星出版，2011年，第288頁。

話我們都給他擦屁股。整個中央文革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sup>48</sup>聽到江青這些不得體的話，黃永勝離開了會場，吳、李、邱也跟著走了。他們認為江青講這些話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說了這件事。林讓黃永勝、吳法憲兩人到毛主席那裏去，據實向毛主席報告，並讓葉群親自打電話給毛處聯繫。<sup>49</sup>由於馬上要參加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他們兩人向毛作了簡短的彙報。毛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sup>50</sup>吳法憲回憶說：「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的彙報不感興趣。」「毛澤東聽了我們的彙報後若無其事，好像江青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似的。毛澤東當時的這一態度，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sup>51</sup>

事後，吳法憲、邱會作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把整個過程都說了。周當時很激動，連眼眶都有些濕了，他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理解大事的！」<sup>52</sup>

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關係密切，軍委辦事組的人討厭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就經常向汪東興摸底。汪也討厭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動軍委辦事組的人反，所以盡說毛對江不好的一面。後來黃、吳、李、邱發現，他們上了汪東興的當<sup>53</sup>，毛是很看重江青的。毛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1日的南巡講話中，談到路線鬥爭時還表揚了江青。毛說，江青直接參與的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與伯達和那個人（那個人是誰沒有點名，聽者都知道）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

---

<sup>48</sup>《李作鵬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45頁，《吳法憲回憶錄》第754頁也有江青的談話，兩本書大同小異。

<sup>49</sup>《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44-646頁。

<sup>50</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83頁，《吳法憲回憶錄》第六53-756頁，也講到這件事，大同小異，基本一致。

<sup>51</sup>《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756頁。

<sup>52</sup>劉志勇：《邱會作同志談話記錄》，2000年6月10日16:00至18:00，豐台區總後幹休所9號樓5單元。此記錄由餘汝信提供給本書作者。

<sup>53</sup>有人分析，汪是毛安在林彪集團中的臥底，除非有可靠的史料證明，我不相信這一說法。

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當向她學習，你們也應當向她學呢。<sup>54</sup>軍委辦事組的人上了汪東興的當以後才明白：「其實，主席和江青關係很深，毛從來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歷史的人會發現，毛每次講江青的壞話，都不是動真格的。<sup>55</sup>

## 六、毛澤東對「軍事官僚專政」的憂慮

「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是軍人的勝利，是林彪的勝利。「九大」產生的 21 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軍人 11 人，占 52.4%，其中林彪勢力占主導地位；在九屆中央委員（170 名）和中央候補委員（109 名）中，軍人占 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絕大多數是「支左」的軍隊幹部。以天津為例，當時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軍隊幹部共有 4035 人，其中有 3172 人參加了地方政權和企、事業單位領導班子。全市區、局黨委書記 60 人（60 個單位）中，軍隊幹部 44 人，占 73.3%，市級機關一級組（當時稱「組」，即現在的部、委、辦）組長 11 人當中，軍隊幹部就有 10 人，占 90.9%。<sup>56</sup>和其它省、市、自治區相比，天津軍人比例不是很大的。擔任江蘇黨、政、軍一把手的許世友，將當地的行政權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軍隊幹部手中。截至 1970 年，軍方的集權統治已達到如下程度：江蘇全省 14 個專區的黨政一把手全部是軍隊幹部；而在全省 68 個縣裏，有 61 個縣的黨政一把手也都是軍隊幹部。<sup>57</sup>當時的中國，頗有「軍天下」之趨勢。毛在九屆一中全

<sup>54</sup>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687 頁。

<sup>55</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727 頁。

<sup>56</sup> 本書作者 1972 年採訪天津市革委會筆記。

<sup>57</sup> 周志華《批判吳大勝同志等人分裂主義的幹部路線》，《省級機關批林批孔大會發言》，轉引自董國強、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會上說：「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麼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產黨人》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雖然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但不排除他內心深處的憂慮。

九屆一中全會以後不久，5月31日，毛澤東到達武漢，隨行攝影記者錢嗣傑看到：「毛澤東抵達梅嶺一號，走進過廳，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走廊的毛主席照片上；隨後，他走進客廳，又走進書房，再到臥室，看到了更多的照片和語錄。毛澤東的臉色越來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員立刻將語錄和照片統統摘下！」<sup>58</sup>毛主席語錄是林彪一大發明，也是他的政治資本。毛澤東下令摘掉是出自「偉大的謙虛」？顯然不是，毛主席語錄掛遍全國已多年了，遲不摘，早不摘，為什麼九大以後摘？為什麼是摘的時候臉色不好看？這也是奧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後，不僅林彪集團（黃、吳、李、邱等）和江青集團（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澤東對林彪的猜疑也逐漸加深。林彪一直韜光養晦，千方百計地避免毛對他的猜疑。但百密總有一疏，有一件事加深了毛對他的猜疑，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

1969年，是中蘇關係最為緊張的一年，1969年3月2日發生了珍寶島事件<sup>59</sup>。8月13日，在新疆發生了鐵列克提事件<sup>60</sup>，中蘇邊境形勢全面惡化。為緩和兩國緊張局勢，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見了從越南回國路經北京的蘇聯政府領導人柯西金，雙方舉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可是，柯西金回國後，蘇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卻沒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隨後，中方要求兩國政府換文，確認周、柯達成的諒解，被蘇聯拒絕。當時中國領導人確信，蘇聯有

---

<sup>58</sup>錢嗣傑顧保孜：《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308頁。

<sup>59</sup>1969年3月，中蘇因對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的珍寶島主權歸屬問題的爭議而發生武裝衝突。據稱，蘇聯軍隊幾次實施武裝入侵，並向中國岸上縱深地區炮擊。中國邊防部隊進行反擊。

<sup>60</sup>1969年8月13日，在中蘇邊界西段、中國新疆裕民縣的鐵列克提爭議地區，蘇聯出動直升飛機、坦克、裝甲車對中方一支38人且只攜帶輕武器的邊防巡邏隊發動突然襲擊，造成中方邊防隊全部陣亡。

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10月5日，林彪在黃永勝、吳法憲等陪同下，乘子爵號飛機勘察張家口一帶的地形，並檢查了部隊的戰備工作。從張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分析中蘇關係的發展趨勢，研究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而這時，柯西金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建議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來，告知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根據「布拉格事件」<sup>61</sup>的教訓，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蘇聯進攻的時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準備。

由於要準備打仗。1969年國慶節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緊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先後被「戰備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剛剛「疏散」到蘇州才兩天的林彪，向黃永勝發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讓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記一記，向部隊傳達。閻仲川讓作戰值班室參謀整理出一份電話稿。為應對蘇聯襲擊，成立了前線指揮部，這是開設前線指揮部以來第一個首長指示，所以就標「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這個號令18日用電話向下傳達，共6條：一、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是19日、20日應特別注意。二、各軍區特別是「三北」<sup>62</sup>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立即疏散隱蔽。三、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防止美帝、蘇修可能突然襲擊，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執行情況，迅速報告。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讓秘書加了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東興同志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指示為準。」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主席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麼意見。<sup>63</sup>根據「第一

<sup>61</sup>1968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在蘇捷雙邊會議時突然發生的。

<sup>62</sup>三北，即華北、東北，西北和蘇聯接壤的地區。

<sup>63</sup>《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67頁。

個號令」，當時 95 個師、大約 94 萬士兵、4100 架飛機和大批坦克火炮、600 艘艦艇都進行了疏散隱蔽。<sup>64</sup>從「第一個號令」產生的情況來看，這是林彪應該做的事，但「第一個號令」影響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權旁落」。19 日，在武昌的毛澤東看到汪東興給他「急傳閱件」的「電話記錄」，一臉不高興地說：「燒掉！」汪東興以為是讓他燒掉，毛自己劃根火柴給燒了。為了留下傳閱件的編號，汪東興把信封留下了。<sup>65</sup>1971 年 12 月 11 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明確指出這「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9·13 事件」後，閻仲川因「第一個號令」關押了 7 年。

多年有一個傳說，由於林彪的「一號命令」，1969 年黨政軍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嚴重後果，劉少奇死在開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 年 10 月 17 日，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成員，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當前形勢估計作出決定：在京老同志于 10 月 20 日或稍後戰備疏散到外地。周恩來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到廣東；陳雲、鄧小平、王震到江西，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去開封。<sup>66</sup>劉少奇送到開封，陶鑄送安徽合肥。周恩來說「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專機或專列。」「一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住處均保留不動。」<sup>67</sup>毛澤東 14 日去了武漢，林彪 16 日去了蘇州。黨政軍元老疏散外地是戰備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與林彪「一號命令」沒有關係。

毛澤東搞文革有一個總目標，就是實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但在具體實施上卻是走一步，看一步。說是「偉大戰略部署」，實際上還是問題導向，相機而動。毛澤東哪里會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劉少奇以後，發現林彪是一個比劉少奇更難對付的對手。這完全打亂了毛召開「九大」來鞏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漸恢復穩定的

---

<sup>64</sup>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第 125 頁，轉引自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中文版，第 322 頁。

<sup>65</sup>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第 14-15 頁。

<sup>66</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67》6，第 270-271 頁。

<sup>67</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第 32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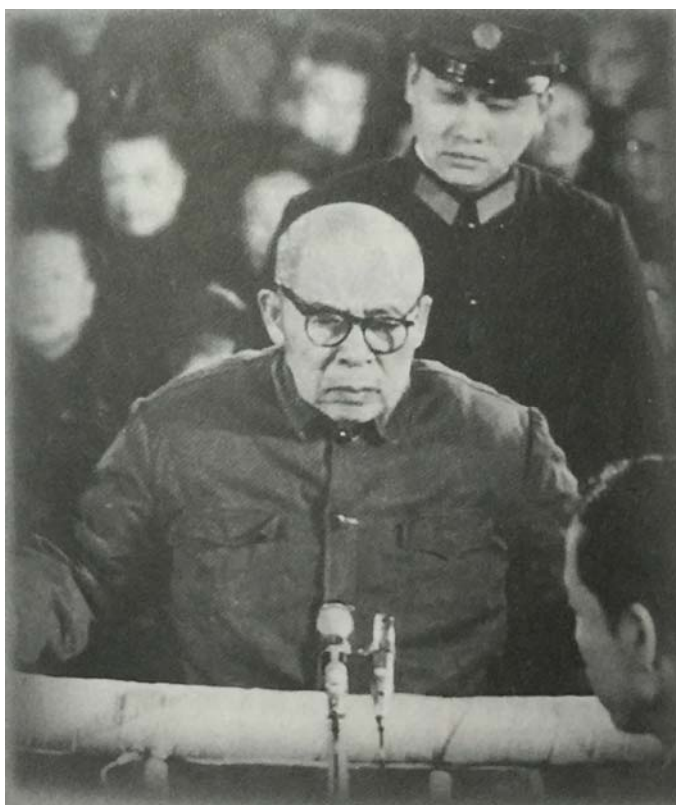
戰略部署。「九大」閉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揚鑣開始之時。毛澤東建立新秩序設想成為泡影。

全國各地敲鑼打鼓地歡慶「九大」勝利召開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發酵之時。15個月以後，在1970年秋的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毛、林之間的衝突終於爆發。



## 第二二章

# 霧鎖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毛、林博弈，陳伯達被毛拋棄，下台。

廬山，坐落於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內，聳立于長江中游的鄱陽湖畔，風景秀麗，夏天涼爽宜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廬山出現了英、俄、美、法等18個國家不同風格的別墅近千幢，20世紀30年代，廬山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與雞公山、北戴河、莫干山並稱中國四大避暑勝地。一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於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廬山是一個多事之地。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加劇了正在發生的大饑荒；1970年的廬山會議，又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然而，這場鬥爭的真實情況，一直被蒙在廬山的迷霧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委員100人。上山之前，雙方的鬥爭就很激烈，毛澤東察覺到高層湧動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警告：「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

在新的一場鬥爭中，一方是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sup>1</sup>，還有陳伯達，他們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臺是林彪，通稱林彪集團；另一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員，即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也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臺是毛澤東。這兩派的鬥爭，也稱釣魚臺（中央文革辦公地）和三座門（中央軍委辦事組辦公地）的鬥爭。陳伯達本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他在中央文革裏是一個受江青等欺負的角色，葉群出於政治目的，在陳伯達被釣魚臺冷落時，給以關照。陳伯達發現林彪集團有反江青的傾向時，逐漸向林彪靠攏，希望借此鞏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後還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團的幾位骨幹，在戰爭年代是一個山頭的（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在1967年「5·13事件」中，他們對文革又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他們支持軍隊內的保守派，打擊軍隊內的造反派，從而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sup>2</sup>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以後，他們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林

---

<sup>1</sup>黃永勝，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軍委辦事組副組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葉群，林彪妻子，軍委辦事組成員；李作鵬，軍委辦事組成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邱會作，軍委辦事組成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主任。

<sup>2</sup>見本書第12章中的「‘5·13事件’：美女轉乾坤？」

彪的秘書張雲生記載，1970年夏，毛家灣（林彪住地）接待的客人有一個很窄的範圍，經常就是那幾個人：陳伯達和黃、吳、李、邱。他們相聚的時間大都在晚上，力圖避開釣魚臺（中央文革）的注意。例如，陳伯達到毛家灣來，通常是從釣魚臺出發後，先在市內其它地方兜圈子，然後再轉向毛家灣。黃、吳、李、邱到毛家灣「看電影」，也是對釣魚臺嚴加保密的。有一次，吳法憲在毛家灣看電影，江青要找他接電話，吳法憲的秘書告訴江青，吳不在家，江青問吳去什麼地方了，秘書說不知道。其實秘書知道吳在毛家灣。等江青放下電話後，秘書急忙掛電話找吳法憲，吳法憲不是在毛家灣給江青回電話，而是坐車到三座門回電話。<sup>3</sup>如果林彪集團中的一個人和中央文革的人發生衝突，馬上向其他人通報，共同商量對策。

在沒有議會上爭論和傳媒開放的專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現朋黨之爭。沒有桌面上的公開辯論，必定有背後的秘密鬥爭。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共，「反黨集團」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出現，其原因蓋出於此。

## 一、上山前的第一輪博弈：要不要設國家主席

九屆二中全會是為召開四屆人大作準備。1964年12月召開三屆人大到這時已經6年了，超過了五年一屆的期限。時至1970年，中學紅衛兵到農村插隊，大學生紅衛兵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群眾組織已經解散，毛放出的「孫悟空」們已壓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亂」的局面已經結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會，地方黨組織正在重建，現在該是重建政府機構的時候了。

重建政府機構面臨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這個禮儀性職務好幾年了。董必武已84歲，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誰當國家主席？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如果不是黨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則是沒有權力的空銜。毛一向厭煩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也不願意承擔行政事務。他已經大

---

<sup>3</sup>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382頁。

權在握，沒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國家主席這個職務。當時，除了他以外，只有一個人選，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三支兩軍」以來，軍隊進入了各級政權機構，林彪勢力空前強大，毛擔心軍隊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經出現裂痕，他對林彪的信任程度大減。

站在林彪的立場來看，讓林彪當國家主席是名正言順的。他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是副統帥，而他的行政職務還是國務院副總理。這個職務是1954年安排的，一直沒有變動。林彪處於一個名實不符的狀況。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屆和第三屆人代會，毛的接班人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按這個先例，作為接班人的林彪自然該當國家主席。毛任中共中央主席，接班人擔任國家主席，這是當年毛澤東向劉少奇逐步交班的模式。現在，毛廢除了這個交班模式，不讓林彪擔任這個職務。從林彪的身體狀況和性格而言，他不一定在乎國家主席這個職務。但是，湖北蠻子的強勁，毛越是不讓他當，他越是要較勁。因為他知道，讓不讓他當國家主席，是測量毛對他信任度的試金石。他在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和毛較勁，逼出毛對他的真實態度。由此，就國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間你來我往，進行了六次拉鋸式的博弈：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汪東興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的意見和建議。<sup>4</sup>

周恩來讓葉群向林彪轉達毛的意見，3月9日，在蘇州的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5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問題給毛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毛審閱後明確批示不設國家主席。<sup>6</sup>

3月17日到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黃永勝、吳法憲等堅持設國家主席，會上為此激烈爭論。

---

<sup>4</sup>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6頁。

<sup>5</sup>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0頁。

<sup>6</sup> 同上。

周恩來打電話給汪東興，讓他把會上的爭論向毛彙報。毛聽完彙報後說：「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你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林彪通過他的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沒有理會，只讓秘書打個問候性電話。<sup>7</sup>

4月11日晚11點半，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給中央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他三點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建議仍然由毛主席擔任，這樣作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sup>8</sup>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同意林彪的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擔任的意見。政治局向毛寫了報告。毛當天看了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sup>9</sup>但林彪仍然堅持己見。《周恩來傳》說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

<sup>10</sup>

4月下旬，毛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孫權讓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我放在爐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sup>11</sup>再一次表達了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5月17日下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林彪家，談起毛說的「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由林彪來當」時，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

<sup>7</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第285頁。

<sup>8</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1頁。

<sup>9</sup>《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60頁。

<sup>10</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970頁。

<sup>11</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1頁。

不合適。」<sup>12</sup>

邱會作認為，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同意設國家主席，都是從國家體制去考慮。毛說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也許毛把設國家主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一起考慮了。<sup>13</sup>吳法憲認為，林彪也不想當國家主席。其理由是：國家主席是虛位，林彪現有的職務都是實的，沒有必要爭這個虛位；林彪身體不好，又不喜歡出頭露面。林彪不存在「急於搶國家主席」的想法。<sup>14</sup>

毛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是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林有沒有野心；林堅持設國家主席，也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毛對他的態度：讓他當接班人是真還是假。於是，國家主席就成了一個焦點。當然，這個焦點是外表，其核心還是毛對他的接班人已經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換接班人不會引起激烈的衝突，但在專制制度下，換接班人，對林彪就是災難，劉少奇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鑒。毛、林這個鬥爭焦點就要在廬山會議上反映出來。毛後來說「設國家主席」是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反黨綱領」。從接班人這個鬥爭焦點來說，毛的這個說法的確點中了要害。

## 二、上山前的第二輪博弈：關於「政治武器」

在新的一場政治鬥爭中，林彪集團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圖先聲奪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經過多年煉成的。神化毛澤東，從延安整風時就開始了，中共「七大」時就成了定規。經過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陶鑄、柯慶施等黨內高層人物的大力吹捧，經過 20 多年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營造，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政治氣氛：對毛澤東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判別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崇毛，就是政治正確；不崇毛，就是政治錯誤。誰一旦被打成「反毛」，就會身敗名裂。幾十年崇毛輿論的薰陶，對反毛者血腥鎮壓的恐怖，

<sup>12</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第三版），第 778 頁。

<sup>13</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681 頁。

<sup>14</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第三版），第 778 頁。



中國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發生了變化：崇毛就感到安全，聽到反毛的言論就感到不安和恐懼。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崇毛的主動權，誰就站在「政治正確」的制高點。林彪主持軍隊工作以後，就搶佔了這個制高點。他大張旗鼓地、千方百計地神化毛澤東。他這一作為，不僅為他地位上升撈得了政治資本，也把崇敬毛、忠於毛的政治氣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將「崇毛」這個政治武器煉得更加威力無比，一旦祭起這個武器，就能夠攻無不克。

毛澤東早期需要個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劉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一系列崇毛的作為。以毛之精明，他不會陶醉於十億人對他神一樣的崇拜，只是利用別人對他的崇拜實現他的政治目標而已。一旦發現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一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討厭。毛察覺到林彪集團已將「崇毛」作為政治武器來使用，他就不聲不響地拿掉了林彪集團這個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領神會，審慎地緊跟。而軍人們對他們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還渾然不覺。為了保衛他們得心應手的政治武器，他們和文革派抗爭。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憲法修改小組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開始爭論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雙方相持不下。接著，吳法憲主張在國務院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康生、張春橋說：「再寫上重複，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張春橋還說：「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地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的、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林彪的話。吳法憲質問：「張春橋，你解釋清楚，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吳法憲說張春橋「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陳伯達在衛生間聽到了聲震屋瓦的爭吵，出來後站在吳法憲一邊。還對吳說：「今天的事情不簡單，你應該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向周總理和黃總長反映一下。」吳法憲聽取了陳伯達的意見，首先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表示支持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吳法憲又給葉群打電話，向她彙報了會上爭吵的情況。

一個小時後葉群回電話：林彪說吳法憲的意見是對的。<sup>15</sup>

8月15日上午10點半，在徐州的李作鵬接到黃永勝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修改憲法小組發生很大爭論，吳胖子很孤立，你趕快回來。」當天下午，李作鵬回到北京到黃永勝處，黃向他介紹了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還對李作鵬說：「現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sup>16</sup>

林彪是一個精明並且工於心計的人。旁人看來，他一直是緊跟毛澤東。但是，緊跟只是在公開場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門城樓，林彪總要比毛早到一兩分種，在電梯前迎候毛。這是葉群精心安排的。葉群對林彪的警衛處長李文普說：「上天安門城樓，首長不能搶在主席前半步，但到達城樓下的時間，首長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鐘。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嗎？」大家都知道林彪「語錄不離手」，其實，林彪每一次參加群眾集會，都是由李文普拿著語錄本，到了現場李文普才把語錄本交給林彪。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拿起語錄揮動。口號聲一停，語錄本又回到李文普手裏。<sup>17</sup>在表面上看，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說毛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的真實想法卻相反，他私下寫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毛「最大的憂慮是在表決時能否佔有多數」毛搞「小幫幫」「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套。」基於對毛看穿，林這自己定的對策是：「不建言，不批評，不報壞消息。」「最迅速地響應他的每一個新的倡議，因為他正迫切地等待著別人的態度。」「不提不同的主張，永遠不會出亂子，聽命。」「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聽他先說才可一致。」<sup>18</sup>在中共所有領導人中，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質。

---

<sup>15</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780-783頁，吳法憲說吵架是8月14日是記錯了。

<sup>16</sup>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57頁。

<sup>17</sup>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30-232頁。

<sup>18</sup> 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載《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極權政治制度是兩面派、陰謀家的肥沃土壤。在這種制度下「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語）。林彪將兩面派做到了極致。他這樣做毛澤東不可能一點沒有察覺，在他需要的時候，容忍並接受了這些虛偽的吹捧，時間長了也會反感的。所以，毛澤東一方面自己主動地「反對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對軍隊的指揮權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刪掉「三個副詞」。「三個副詞」即「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斯列寧主義」，最早見於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的講話，後來寫進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1966 年 12 月 16 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又寫進了這「三個副詞」。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毛澤東圈去《黨章》中的「三個副詞」<sup>19</sup>。因此，「三個副詞」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和新《黨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團的成員渾然不覺。為了保衛這句話，還和文革派爭吵。直到廬山會議上他們慘遭失敗後的 8 月 27 日早上，林立果送給吳法憲一本「九大」的黨章，說是林彪讓他送的，讓吳法憲看一看，還說：早在「九大」黨章中，就沒有這三個副詞。吳法憲一看，果然如此。上午，吳法憲拿黨章，問周恩來：黨章中三個副詞為什麼刪掉了？後來周恩來讓辦公廳的人查，結果是，毛在審閱黨章時自己圈掉的。<sup>20</sup>1970 年 6 月 11 日，毛在接見外賓時，曾兩次以諷刺的口吻談到，蘇共 21 大決議把赫魯曉夫的報告稱作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sup>21</sup>

二，1970 年 7 月 27 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一刊」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沿用了好幾年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句話中加了四個字，改為「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加上了「毛主席和」這四個字，就不是林副主席一個人直接指揮了。陳伯達與張春橋發生爭

<sup>19</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 卷第 207 頁：1968 年 10 月 13 日，毛在審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10 月 12 日報送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時刪去了這三個副詞。

<sup>20</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年，第 3 版，第 804 頁、805 頁。

<sup>21</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5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 836 頁的注。

執。陳主張把「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在報刊上的標準提法中沒有這四個字，如果突然加了這四個字，會引起外界議論。張春橋則堅決不讓。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設法調解。他們專門作了調查，才發現上一年的「十一」社論中已經增加了這四個字！<sup>22</sup>這四個字是張春橋、姚文元加的。張、姚沒有這個膽量，顯然是毛澤東的意圖。毛在一年以後的南巡講話中就明確地點出來了：「難道締造就不能指揮嗎？」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斯諾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厭！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斯諾問：「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毛答：「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1971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中共中央將這次談話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sup>23</sup>聽了這個文件的傳達，人們自然想到林彪。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在同政治局同志談話時，批評了形式主義的種種現象。他說，你們最好把人大會堂的語錄統統取下來，不把那些東西取下來，我再也不進人大會堂。他讓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辦這件事。李德生就把人大會堂、京西賓館的所有語錄都取了下來，換上了圖片或國畫。<sup>24</sup>當時，全國各地，從單位到家庭，從牆壁到報紙，毛主席語錄無處不在。

### 三、上山前的第三輪博弈：誰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帶著張春橋等到蘇州看望林彪。<sup>25</sup>毛澤東親

<sup>22</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284頁。

<sup>23</sup>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的通知，中發〔1971〕39號，1971年5月31日。轉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sup>24</sup>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70頁。

<sup>25</sup>《毛澤東年譜1949—1967》6卷，第294頁：4月25日，毛從上海到蘇州。官史為尊者諱，沒有介紹毛看望林彪及談話內容。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自看望林彪，確實少見，必有要事。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林彪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毛談周的接班人是繞彎子，接著進入實質，毛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林彪開始沒有回答，過一會兒，林彪借談反修防修的問題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sup>26</sup>他說的小資產階級，暗指張春橋。文革前夕，毛對劉少奇不滿意，曾考慮讓林彪或鄧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對鄧小平欲除之而後快。現在冒出來一個張春橋，林彪怎能容忍？顯然，毛澤東不是想用張春橋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讓張春橋當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體不好，一旦確定了張春橋是林彪的接班人，隨時可以替代。回過頭來看，如果毛不想讓林彪當接班人，讓林彪體面地過渡幾年，然後將權力交給對毛的思想領會最深的文官張春橋，也不會出現「9·13」悲劇。然而，無論從思想上和經歷上，林彪和張春橋沒有多少共同的東西，林彪對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慮。

在東方專制國家，最高專制者讓自己的兒子接班是常事。毛澤東著意培養他的長子毛岸英，對他嚴格要求。1936年，14歲毛岸英被安排到蘇聯，開始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以後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讓他到農村上「勞動大學」，給他創造瞭解農村的機會。朝鮮戰爭一開始，又把毛岸英交給彭德懷，讓他經歷戰爭。人算不如天算，毛岸英死在朝鮮。如果林彪上臺，很可能交班給他的兒子林立果。九大之後，林彪將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讓兒子接班的意圖。這不僅否定了毛澤東隔代指定張春橋接林的打算，更是刺中了毛澤東心靈深處的隱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他姐林立衡1962年上清華大學自控系，因嫌數理化負擔重，轉到北京大學文科）。北大物理系是6年制，文革開始時林立果是三年級學生。1967年，林彪、葉群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排在空軍司令部。

---

<sup>26</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6版，第276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88頁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對林立果大力栽培。他先把林立果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還讓黨委辦公室的科長周宇馳和劉沛豐「傳幫帶」。吳法憲還向党辦主任王飛交待：「林副主席把他的獨子交給我們，我們一定要把林立果培養成才。」林立果進入空軍半年就入了黨。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提拔林立果的同時，周宇馳、劉世英也被提拔為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這時王飛已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吳法憲當著王飛、周宇馳的面對林立果說：「你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這種拍馬屁的話雖然不可能成為現實，但確實大大提高了林立果在空軍的地位。

據和林立果在一起工作過的陳昭說，「在我印象中，林立果是個有才華、有思想的青年人。他跟人談話，要求對方談出思想和觀點來。」「他是個有魅力的人。口才很好，講話很吸引人。他還愛好科技，搞過空軍雷達天線的改造。毛澤東對此還專門有過一個批示，說是不能叫作發明，叫作技術革新。」<sup>27</sup>毛的批示無疑是對林立果的勉勵，林彪趁勢把林立果推出。1970年7月23日，林彪帶著林立果到一家大型軍工廠視察。進入廠區，林立果緊隨林彪之後，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接受軍隊的夾道歡迎。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長達7個小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報告》。林彪聽了「講用報告」的錄音，得意地說：「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軍常委決定在空軍系統「三代會」上放林立果「講用報告」的錄音。吳法憲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林立果是「偉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sup>28</sup>林彪對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勵。有資料說，毛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在私下對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還沒死呢，林彪同志身體不好，有點迫不及待地準備自己的接班人了。<sup>29</sup>

---

<sup>27</sup>陳昭：《毛澤東不怕林彪、怕林立果》，多維新聞記者李劼對陳昭的採訪，文華博物館第918期。

<sup>28</sup>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1.12.11；中發〔1971〕77號。

<sup>29</sup>高華：《「林彪事件」再調查》，網易評論綜合，2008-08-01 16:32:18。

林彪不同意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在新的一場鬥爭中，張春橋成為林彪集團的攻擊對象。

#### 四、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1970年8月18日下午1點，毛澤東乘坐的專列火車到達九江（毛外出都是兩列火車，前一列是警衛部隊，後一列是他的座車），汪東興是隨毛一起到的。吳法憲和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楊棟樑到九江迎接。吳法憲到機場再接其他人，程世清和楊棟樑送毛一行上了廬山。汪東興對程世清說，這次開會，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擺。毛的隨從汪東興說的這話，人們以為是毛的意思。<sup>30</sup>「林副主席往哪里擺」這句話本來出自汪東興之口，後來加在葉群頭上，說是葉群對吳法憲說的。「9·13」事件以後，專案組在審查吳法憲時，吳法憲只好按專案組的要求承認了，在他出獄以後寫的回憶錄中否定了這個口供。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處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確認了議程。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希望毛擔任黨的主席兼國家主席。毛聽了很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毛還嚴厲地說：「要把這次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失敗的會。」<sup>31</sup>

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佈會議議程，康生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康生講完後，毛澤東宣佈：請林彪同志講話。林彪講了一個半小時。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

<sup>30</sup> 《程世清訪談錄》，轉引自《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第788頁。

<sup>31</sup>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64頁。

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 30 條中間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林彪還講到天才問題。「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毛主席的著作中間所發揮的，所具體化的，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他們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他說：「關於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我有一點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延安召開「七大」時提出來的。……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好像天才論不對。這如果是下面的人這樣說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講的，就會影響到全國，就會引起混亂。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提出多年了，這個問題是不能動搖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刪了這「三個副詞」，他說「中央的同志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是批評否定「三個副詞」的張春橋。與會者多數人聽不明白，講話博得了大家的熱烈鼓掌。林講完後康生說：「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講了毛主席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運動中間的偉大歷史地位，以及對憲法的說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擁護。」並且說，在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康生講完毛澤東就宣佈散會。這時，不僅軍委辦事組的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很多人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sup>32</sup>

吳法憲回憶，會前，葉群兩次告訴他，林彪在會上不講話。<sup>33</sup>林彪為什麼突然講話呢？陳伯達告訴邱會作，8月22日晚，陳伯達到

<sup>32</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792頁。

<sup>33</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790頁，791頁。



林彪處對林彪說：「九大以後，無休止地運動，不但沒的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伯達非常希望林彪講講話。林彪被陳伯達說動了。<sup>34</sup>會後，吳法憲從葉群那裏得知，23日開會前的常委碰頭會上，毛曾問林講不講話，林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紹了在憲法修改小組上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毛說：「這個要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林說：「想講兩點，一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二是講一講天才問題。」<sup>35</sup>林彪還對毛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春橋的名。」<sup>36</sup>官修《毛澤東傳（1949—1976）》說林彪講話「事先沒有打過招呼」，「到全會臨開幕的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幾個常委提出『要講幾點意見』」。<sup>37</sup>官史也承認，會前林和毛及常委談過，這印證了葉群的說法，但毛林交談，不是「一刻」，而是「時間不短」，當事人陳伯達回憶說：「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裏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一房間裏等待，等的時間不短。」「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你的講話是不是事先向毛主席講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sup>38</sup>這裏需要研究的是，葉群說毛同意林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是不是真實。毛為什麼同意林批評張春橋？是不是像有的歷史學家說的「引蛇出洞」？如果是「引蛇出洞」，林彪被引出來了，毛應當高興。但是，毛的警衛隊長陳長江說：「出席會議的代表都為林彪的講話鼓掌，只

<sup>34</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91頁。陳伯達回憶錄裏沒有提到他勸林彪講話的事。

<sup>35</sup>《吳法憲回憶錄》第793頁。《邱會作回憶錄》第687頁、《李作鵬回憶錄》第660頁，也講了這一情況。他們三人的情況都是來自葉群。

<sup>36</sup>1993年11月18—25日高文謙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91頁。《邱會作回憶錄》，第697頁也有這個內容。

<sup>37</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65頁。

<sup>38</sup>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修訂版），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406頁。

有主席沒鼓掌，表情悶悶不樂，宣佈散會。主席沒有像往常一樣與各位握手，就從側門出來，乘車回到住處。」<sup>39</sup>毛的服務員張玉鳳說：「下了會場，主席就很不高興。吃飯時間一推再推，飯菜一熱再熱。再讓他吃，他就發火。」<sup>40</sup>

林彪講話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這只有瞭解高層鬥爭內幕的人才懂得。多數人是聽不出來的。

## 五、「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林彪講話不點名批評了張春橋以後，吳法憲、葉群、邱會作等人很興奮。23日晚8時，邱會作給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打電話：「山上熱鬧，你知道了嗎？」黃說：「剛才吳胖子來過電話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說了，真高興啊！晚上還多吃了一碗飯。」<sup>41</sup>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天天給黃永勝打電話，通報山上的情況。<sup>42</sup>晚上，邱會作和李作鵬讓吳法憲到葉群那裏瞭解一下情況。吳從葉那裏回來說：葉群講，開會前主席和林交談了很久，林向主席反映了一些情況，主要是吳法憲和張春橋吵架的事。主席說，張春橋的後臺是江青。主席說林彪可以在會上講一講，但不要點名。然後，陳伯達、吳法憲、邱會作等在吳處談到24日凌晨3時才散夥。談話內容主要是張春橋。

43

8月24日上午，葉群同吳法憲等商定採取統一行動；各組討論時，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要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發言，擁護林彪講話，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極力煽動「揪人」<sup>44</sup>。

---

<sup>39</sup>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第134頁

<sup>40</sup>訪問張玉鳳記錄，2000年11月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66頁

<sup>41</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96頁。

<sup>42</sup>《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807—808頁。

<sup>43</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97頁。

<sup>44</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67頁。

8月24日下午，吳法憲到西南組對成都軍區政委謝家祥說：「你叫梁興初一起到我那裏去一下。」晚飯後，謝、梁二人到了吳法憲的住處，吳法憲問：「你們發言沒有？」謝說還沒有發言。吳說：「你們是老同志了，你們應該發言，這是保衛毛主席嘛。」他說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張春橋。並告訴我們「要保密」。第二天，謝、梁就發了言。<sup>45</sup>邱會作也到東北組和王輝球和王秉璋串連，要他們發言支持林彪的講話，要他們批評張春橋、姚文元。

邱會作24日下午參加西北組的小組會，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姓汪的來電話說，他已經發言了，叫我們快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它軍隊同志發言。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今天發言表示你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今天發言很重要。要儘快發言。」邱會作說：「姓汪的指揮到我們頭上了。」吳說：「人家也是好心嘛！語錄你拿到了嗎？這是汪主任親自給我的，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臺先得月。」邱說：「對，對，對，知道了。」<sup>46</sup>24日晚，汪東興逐個給吳、李、邱打電話，詢問他們發言情況，汪很亢奮。汪東興的發言是全會發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議設國家主席」，並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筆桿子壓槍桿子」，提出要揪人。<sup>47</sup>

全會按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組。24日下午，在連續收聽兩遍林彪講話錄音以後開始分組討論。與會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講話指誰，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會錯，擁護副統帥林彪的講話不會錯。多數人隨大流，說林彪的講話好，跟著喊讓毛當國家主席，說毛是天才。能看出來揪張春橋的只是少數人。

陳伯達在華北組首先發言，他一開始就大力讚揚林彪的講話，接著大講天才。他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

<sup>45</sup>謝家祥：《我的檢查和交代》，1972.06.20，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sup>46</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99頁。

<sup>47</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03頁。

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陳伯達引用林彪幾年來說毛是天才的話，然後攻擊否定天才的人。他說：「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中全會公報上就是這樣寫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汪東興在華北組發言先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既吹捧毛，又吹捧林。然後說：「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氾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插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陳還手舞足蹈地模仿。）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參加會議的吳德回憶說：「當時，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慮，汪東興一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話。」<sup>48</sup>汪東興在發言中還說，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是中央辦公廳和 8341 部隊的意見。

汪東興在回憶錄中寫道：「本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一職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還是我傳達的。但是，我當時沒有看出林彪、陳伯達等人積極主張設國家主席的險惡用心。在華北組討論會上，我一聽陳伯達的發言就激動起來，沒有認真分析考慮

---

<sup>48</sup>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117頁。

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的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sup>49</sup>毛是很難捉摸的人，他公開說的話不一定代表他的意思，連他身邊為他傳話的汪東興都理解錯了<sup>50</sup>。

華北組由於有汪東興和陳伯達的高調發言，氣氛最熱烈，態度最激烈。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鄭任農、吳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及陳毅都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陳毅說：「現在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偉大的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我陳毅一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後發表這樣的言論，是一種罪惡，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背後講的。說這種話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交群眾批判。他們是什麼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義憤。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別以為我靠邊站我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這次我可要堅決與他們鬥！他們已把我打到陰溝裏，我還是要努力和他們鬥！」<sup>51</sup>華北組解學恭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陳毅以極左的面貌發了言，……他的發言，引起同志們的反擊，指出他的立場不對，言不由衷。」<sup>52</sup>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汪東興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設國家主席、讓毛當主席、林當副主席，在當時有相當的合理性，這是得到當時多數人支持的一個原因。

24日晚12時正在夜餐，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催要簡報簽發。李雪峰簽了字。解學恭覺得帽子太多，李雪峰說中央會議，有聞必錄，如實反映。解說，陳毅同其他同志並列一起不好，李雪峰、吳德說勾出來，解勾了出來，寫了一句，其他未動。李雪峰說趕快拿去發吧，解簽

<sup>49</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44-45頁。

<sup>50</sup>有學者不相信汪東興這種表白，認為汪在會上的表現，是毛讓他在林彪集團中當臥底。

<sup>51</sup>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617頁。

<sup>52</sup>《解學恭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日記》，《炎黃春秋》，2015年第6期。

了字，吳德也簽了字。<sup>53</sup>李雪峰是華北組組長（河北省革委會主任）、吳德是華北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解學恭是華北組副組長（天津市革委會主任）<sup>54</sup>他們簽發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印出，第二天上午發到各組。這份簡報介紹了華北組討論的情況，主要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內容，肯定了林彪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簡報寫道：

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聽秘書念了六號簡報以後說：「聽了這麼多簡報，數這份有分量，講了實質問題。」<sup>55</sup>六號簡報在各組引起了強烈反應，各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拿著陳伯達選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西北組、西南組作口徑統一的發言。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竟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這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就肯定下來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的了，怎麼能

<sup>53</sup> 《解學恭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日記》，《炎黃春秋》，2015年第6期。

<sup>54</sup>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後，解學恭向天津市革委常委傳達了全會的情況，列席常委會的新華社天津分社領導人任豐平回來向記者作了傳達。當時我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常之處。後來記者申啟方到向總社內部工業組轉述了任豐平的傳達，總社編輯于友海作了記錄，後來筆記本丟失了。新華社軍管組長張紀之彙報到周恩來那裏，周十分緊張：「他傳達了什麼？」一方面動員北京市公安局尋找筆記本，一方面讓張紀之處理失密的編輯記者。結果，給于友海、申啟方停止看機要文件半年的處分。

<sup>55</sup>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九洲出版社，2013年，第114頁。

不寫？不承認，就是推翻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六號簡報發到各組以後，有些人知道，簡報裏說的「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那個人就是張春橋。全會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人們對揪張春橋這麼大勁頭，表面上是說他反對毛主席，實際上是對文革中自己被揪鬥的不滿。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對文革的怨氣只能撒在張春橋身上了。早在 1958 年，張春橋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就得到毛澤東的欣賞。毛親自寫按語肯定了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報》發表。自開展文革以來，張春橋是毛的堅定支持者，毛澤東對他很信任。毛知道揪張春橋，就是反文革；出於保文革，他也必定保張春橋。但軍人們以為張春橋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記者」，沒有想到毛澤東會鼎力支持他。

8 月 25 日下午兩點，在華東組，許世友宣佈大組討論開始。很多人手裏都拿著六號簡報。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第一個發言，他說：「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說毛主席是天才，都憤怒地斥責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陰謀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時炸彈」，有的發言者直接引用六號簡報中的話。一位中央委員慷慨激昂地發言說「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這時坐在張春橋旁邊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打斷了這位中央委員的發言，站起來沖著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全場為之震驚。張春橋臉色非常難看，眼光躲開陳勵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煙。會場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省一位穿海軍服的候補中委索性站起來帶領大家高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全場隨之高呼，聲震屋宇。<sup>56</sup>

當時，贊成「天才論」，高調歌頌毛澤東思想，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成了一個政治代名詞，其真實內容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那幾個

---

<sup>56</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 213-214 頁。

人。因此，已經被邊緣化了的陳雲、陳毅了站在歌頌毛澤東思想這一邊，站在林彪這一邊。

邱會作回憶說：從 24 日那天下午開始，廬山的戰火確實燒得很旺盛。這實際是對中央文革進行討伐！在二中全會上，並不只是陳伯達、汪東興，吳、葉、李、邱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的要員，而是相當多的中央委員共同的思想行動。<sup>57</sup>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各寫一封信給毛、林、周。要把「犯錯誤的人」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sup>58</sup>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聽許世友一講他立即響應，說：「我也給這個鱗魚眼（指張春橋）補一槍。」周恩來收到這三封信時政治風向已轉，周把三封信給葉群，叫葉不要向上送。<sup>59</sup>李作鵬回憶說：「討論一開始，中委們就見爭先恐後地報名要求發言，每個人的發言聲音大，調子高，措詞激烈，『機關槍』、『大炮』、『刺刀』、『手榴彈』同時使用，群情激憤地一定要揪出陰謀家野心家，揪出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sup>60</sup>看來，毛澤東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在廬山，毛終於發現了林彪軍事集團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江青張春橋等人持如此強烈的否定態度

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這場鬥爭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過周恩來、姚文元、毛遠新透露出來。解學恭日記寫道：9月3日，總理參加華北組討論，他在會上說：「主席說，八月『順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陳合流。」<sup>61</sup>二陳是指陳伯達和陳毅。在 1971 年 4 月的「批陳整風」會議上，毛遠新說「廬山會議是一次未遂政變。」<sup>62</sup>

---

<sup>57</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705 頁。

<sup>58</sup>許世友先寫了一封信，後來許世友說，「犯錯誤的人」是指陳伯達，說毛告訴了他陳伯達是壞人。韓先楚和楊德志看了許世友的信，也「照貓畫虎」地寫了信，他們二人以為「犯錯誤的人」是指許的對頭張春橋。這封信本來是要送毛、林、周，中辦副主任王良恩交給了周恩來，周送到林那裏被扣下沒送給毛。林彪事件後從林彪家裏抄出了這三封信。在批林整風中王良恩受到牽連，是他自殺的原因之一。

<sup>59</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717 頁。

<sup>60</sup>《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663 頁。

<sup>61</sup>《解學恭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日記》，《炎黃春秋》，2015 年第 6 期。

<sup>62</sup>《李作鵬回憶錄》，第 681 頁



## 六、毛澤東拋出了陳伯達

通過「三支兩軍」，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革命委員會，都被軍隊控制。而軍隊又控制在林彪的親信軍委辦事組這幾個人手中，軍人防江青「如同防止盜賊一樣嚴格」，不讓她沾邊<sup>63</sup>，毛在九屆一中全會中提出了「軍事官僚專政」的問題，江青也說：「蔣介石搞了一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一個軍黨，軍國。」<sup>64</sup>「軍事官僚」們在廬山會議上聲勢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員張春橋，毛澤東能容忍嗎？

8月25日早上，張春橋到江青住處談了半小時。張春橋走後江青就讓秘書楊銀祿找來六號簡報。先是說到總理那裏去，卻直接到了毛澤東住處。江青從毛那裏回來表現出洋洋得意的樣子。她沒有進樓，就到總理那裏去了。江青從總理處回來以後，還是那副高興的樣子。26日晚上，江青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4個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們通報情況。他們走了以後，江青好像打了勝仗一樣高興。<sup>65</sup>

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一書記載了26日晚上在江青住所，江青和張春橋向王洪文和徐景賢談向毛告狀的情況：

江青說：「25日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麼搞的，一直開到主席那兒去了。……」「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張春橋在一旁補充說。「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準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

---

<sup>63</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610頁。

<sup>64</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810頁。

<sup>65</sup> 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黨史博覽》 2006年第1期。

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sup>66</sup>

1967年2月16日，軍頭們「大鬧懷仁堂」，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向毛澤東告狀，促使毛反擊「二月逆流」；1970年8月24日，軍頭們的「八月順流」，也是這幾個人告的狀。林彪集團不跟毛打招呼，在自己眼皮底下揪文革的堅定支持者張春橋，還有這麼大的號召力，連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這些不是一方面軍的將領也支持林彪的講話，毛必須扭轉局勢。

8月25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各組一個召集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大發雷霆，他重複了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堅決表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還說：「你們要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去鬧，等你們鬧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辭掉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提出：停止討論林彪報告；收回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人作出檢查。<sup>67</sup>26日宣佈休會。

休會以後，一般中央委員白天遊覽廬山，晚上看電影。但周恩來十分忙碌。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來找吳法憲、李作鵬、康生、汪東興到他那裏開會，周說：「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況搞清楚。」為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調集了各大組的會議記錄，發現吳、李、邱等人在各組的發言內容相似。這說明他們事先有串連。周恩來和康生一起找吳、李、邱談話，追查他們統一口徑的情況。還查清了陳伯達編選的、汪東興印發的《恩格斯、列寧、毛離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出籠經過。<sup>68</sup>

8月27日，周恩來、康生到林彪處，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一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林彪說：「吳法憲這

---

<sup>66</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218-219頁。楊銀錄和徐景賢說的不一。楊說是江青自己去的，徐說江青率張、姚去的。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認為，徐說的較可靠。

<sup>67</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6卷，第327頁。

<sup>68</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216頁。

個人我瞭解，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造過謠。8月14日的爭論你也在場，怎麼是造謠呢？」8月28日，周恩來讓吳法憲作檢討，替「副統帥」擔責任，保護「副統帥」。晚飯後，吳法憲向林彪談起此事，林彪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彪還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話不該講。」<sup>69</sup>

8月27日<sup>70</sup>下午4點，陳伯達約吳、邱和李作鵬到他住處談一談，吳、李、邱對去不去有點猶豫。陳說，是主席讓他找幾個人的。他們去了，談了約一個小時。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裏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還說：「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我準備你陳伯達殺我的頭。」臨走時，陳伯達說：「我犯了錯誤，從此中斷聯繫！」<sup>71</sup>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上山，是毛讓他上山的，毛安排李德生回北京替換他。要批判軍委辦事組，讓組長黃永勝留在北京掌握軍隊是非常危險的事。黃永勝雖然在北京，但和廬山上的吳、葉、李、邱天天有電話聯繫。黃還讓軍委辦事組宋誠為他寫了一個發言稿。黃一上山，毛就找他談話。毛說：「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要搞他幹什麼？」毛還對黃說：「你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黃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槍林彈雨我都是跟主席的，都是擁護主席的。」毛說：「現在問題解決了，不要把問題帶下山去。今後主要是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大家都要執行九大路線，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徹底！」<sup>72</sup>毛澤東同林彪的談話中也談對張春橋要再看兩年。吳法憲回憶說，8月28日，林彪告訴我：「毛主席和我談了話，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sup>73</sup>

<sup>69</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805-806頁。

<sup>70</sup> 《吳法憲回憶錄》第802頁說是8月26日。邱會作說是8月27日。

<sup>71</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10-712頁。

<sup>72</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17-718頁。

<sup>73</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807頁。

毛還對黃永勝說：「一方面軍的幹部不如四方面軍的幹部好。四方面軍的幹部比較謹慎，一方面軍的人驕傲自大。」<sup>74</sup>關於黃永勝上山後毛還對他談了什麼，黃永勝出獄以後，和他兒子黃正有一段對話。黃正問：「他跟你說了些什麼？」黃永勝說：「他要是明說，我倒也會聽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說，就是繞著彎讓我猜。一會兒講井崗山，一會兒講幾次路線鬥爭，一會兒又講文化革命的重要性，還有林副主席怎麼怎麼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對，哪里哪里對。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倒是猜到一點點，似是而非。可這樣的事是能靠猜測來處事嗎？萬一猜出問題就是天大的事！」黃正說：「你知道了毛澤東要搞林彪，你就聽他的嘛。」黃永勝說：「他能讓我聽出來他要搞林彪？那不是等於就下指示了？他的話就是在江青、張春橋身上繞，這兩個人又是我討厭的。張春橋是個叛徒，文件我們原先都看過，最後呈到毛主席那裏。我就說：主席，張春橋是個叛徒，你也知道。該怎麼處理，請明示我。他不講怎麼辦，又把話繞開。」<sup>75</sup>

為了瞭解毛同黃永勝談了些什麼，吳、李、邱在黃永勝住處等到下半夜。黃永勝從毛處回來後，他們一直談到30日凌晨4點。後來葉群也來了，黃、吳、葉、李、邱商量的幾條原則：一是各自檢討，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沒有聯繫，檢討不涉及林彪、黃永勝；三是不揭發陳伯達和汪東興，以便保護他們。吳法憲說：「現在周總理要我作檢討。我是副組長，由我來作檢討承擔責任，以保護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吳的意見。<sup>76</sup>黃永勝強調說，一個是要保護副帥，叫吳法憲檢討自己，不要扯別人；一個是要保護陳伯達和汪東興，問到自己頭上就實事求是地說。老夫子也是手無寸鐵；山上山下沒有聯繫，山上幾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不承認我們是一夥。<sup>77</sup>

在休會期間，林彪等毛表態，沒有主動要求見毛。毛卻主動要求林彪找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說，

<sup>74</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809頁

<sup>75</sup> 黃正：《軍人永勝》（下），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67-268頁。《邱會作回憶錄》717頁說黃從毛那裏出來先看了林彪，和葉群一起到吳法憲處。

<sup>76</sup>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3版，第808-809頁。

<sup>77</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19頁。

他們犯了錯誤，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就解決了。從 28 日開始，林彪每天找這幾個人開兩小時的會，只說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第二天開會，林彪調侃地說：「你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你們為什麼在同一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一句話，也沒有主動向毛報告他們開會的情況，只是讓汪東興去彙報。<sup>78</sup>

從 25 日到 31 日，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們個別談話。他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8 月 31 日，他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文字：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

---

<sup>78</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713-714 頁。

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sup>79</sup>

周恩來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三天以後才寫出來的。<sup>80</sup>9月1日，周恩來將毛的《我的一點意見》稿送給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個別文字修改，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陳伯達閱。<sup>81</sup>

陳伯達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蔣介石「清黨反共」時，即共產黨最危急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當年，中共送陳伯達到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後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1934年以後，他和艾思奇等人發起「新啟蒙運動」，將「五四運動」開創的啟蒙運動的「科學、民主」的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1937年陳伯達到延安。1939年經毛提名調到毛身邊工作，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實際成了毛的政治秘書。對毛的理論體系的建立作出了貢獻。1948年4月，毛澤東一行住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被國民黨軍隊察覺。一天，國民黨的轟炸機飛臨上空，毛正忙碌著。陳伯達把毛喊了出來。毛剛離開，炸彈準確地命中了毛澤東的住地。陳伯達救了毛的一命。在《我的一點意見》中，毛澤東把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說得一無是處，將陳置之於死地，但卻緊緊拉住林彪。說：「我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實際上，這件事毛、林完全

---

<sup>79</sup>抄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頁。這個批語是寫在陳伯達整理的天才語錄空白處的，題目是毛在審定這個批語騰清稿時加上的。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同時發了這個批語。

<sup>80</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92頁。

<sup>81</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91頁。

不一致。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陳伯達是一起的，但把林陳二人切割開來，先穩住林彪和軍隊，把「手無寸鐵」的陳伯達拋出來痛打。毛不僅把林彪從中切割出來，也把與「軍事俱樂部」沒有關係的汪東興等人也切割出來。在廬山會議上，汪東興起的作用比陳伯達大得多，但毛認為他是忠於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團的人。6年以後，汪東興成了抓捕他妻子的主要人物，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周恩來明明知道這場風波是林彪講話引起的，陳伯達只是一個替罪羊，但他還是按照毛的意圖，極力避免把火燒到林彪身上。他勸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他對吳說：「現在要保護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作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並給吳出主意說，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的講話「理解錯了」。<sup>82</sup>全會轉入批判陳伯達以後，西南組把矛頭指向了吳法憲，周恩來立即到西南組坐鎮，對凡是涉及到吳法憲的發言，周立即以「主席的指示要重點批陳」為由擋了回去。<sup>83</sup>

林彪、葉群上廬山後的頭幾天，葉群還經常給毛家灣留守的秘書們打電話，後來好幾天沒有信息。突然一天，和林彪一起上山的李春生打來電話，他說：「首長和主任讓查一個典故。有一句古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出在何處？」留在毛家灣的學者楊尚奎查出，這句話的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壞。」毛在講話中用了這句話，林彪、葉群聽不懂，就讓家裏查。<sup>84</sup>廬山出事後，林立果給秘書張雲生打電話，說：「我告訴你，廬山這裏出事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了一場大亂子。陳伯達帶頭跳出來，被主席抓住，已經挨批了。主任和李、吳、邱、都在會上作了檢討。他媽的，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車，我從心裏高興，但他媽這個代價太大。連首長的威望也受損失。· · · · ·」<sup>85</sup>葉群的兒子林立果、女兒林立衡都稱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親的關係很

---

<sup>82</sup>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稿，1983年11月18-2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003年第298-299頁。

<sup>83</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299頁。

<sup>84</sup>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396頁。

<sup>85</sup>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397頁。

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親。

9月4日，毛在他的住處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講話，說陳伯達是託派，是叛徒<sup>86</sup>，是國民黨特務，一貫追隨王明。但他說：「對陳伯達還要看一看，如果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葉劍英突然發言，說：「我看陳伯達的事不能就這樣完了！」毛聽了葉的話，就決定對陳伯達進行審查。<sup>87</sup>9月10日成立的陳伯達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組成。專案組委托葉劍英到福建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sup>88</sup>廬山會議以後陳伯達回到北京，在飛機上沒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和餘秋裏的坐位挨著，對餘秋裏說：「你在會上說劉少奇把房子讓給了我，這件事你不大清楚……」話還沒有說完，餘秋裏板著面孔說：「你不要說了，就是那麼回事，你不要說了。」<sup>89</sup>在陳伯達挨批之前，餘秋裏經常往陳伯達那兒跑，還用手拍著陳的秘書王文耀的肩膀說：「小王呀，伯達同志有事你常給我打電話啊。」<sup>90</sup>9月5日，在廬山上，毛找陳伯達談了一次話，回北京後，陳伯達三次求見毛澤東都被拒，不久就被軟禁，1971年「9·13事件」一發生，他就被關進秦城監獄，從67歲一直到85歲，18年刑期滿釋放（後幾年是保外就醫）。

9月4日，毛同林彪談了一次話，《毛澤東年譜 1049-1976》6卷第332頁講了這件事，但沒有透露談話內容。這應該是影響毛、林關係的一次重要談話。

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其中當然不設國家主席。閉幕式的主席臺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消失了。本來穿軍裝的林彪卻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臺上，臉色煞白，一聲不吭。<sup>91</sup>毛澤東在閉幕式上講了話，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時，毛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

---

<sup>86</sup>實際上，陳伯達從北京草廠子監獄出來時沒有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因為他病重快死了，一個同鄉（山西軍閥）用錢贖出來保外就醫的。《王力反思錄》（下），第113頁。

<sup>87</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22頁。

<sup>88</sup>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頁

<sup>89</sup>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7年第396頁

<sup>90</sup>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天地圖書，香港，2014年，第146頁

<sup>91</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第227頁



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毛大講團結：「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所謂講團結是什麼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毛在講話中還出人意料地說這次廬山會議上「二陳合流」，他是指陳伯達和陳毅。<sup>92</sup>四天以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會議公報，對廬山鬥爭的情況一個字也沒有透露，還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最後的口號是：「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對普通百姓而言，廬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濃霧緊鎖著。

9月6日下午，葉群打電話給黃、吳、李、邱，約他們去看望江青。他們一行到了江青住處，葉群對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麻煩楊秘書，請你報告江青同志，就說我請求江青同志見見我。你們做秘書工作的知道不少情況，不怕你見笑，我是請求江青同志批評幫助的。謝謝你，楊秘書。」楊銀祿通報後，江青故意端架子，遲遲不答應會見。見面只有半個小時，江青打鈴叫楊銀祿送客。楊銀祿看見她們二人肩並肩手挽手高興地走出辦公室。在走廊裏，葉群對江青說：「江青同志今天見了我，使我很受感動，您對我的幫助，我一輩子也忘不了。」<sup>93</sup>邱會作回憶說，江青讓我們足足等了半小時才穿著睡衣下來，邊走邊說：「我歷來是反對陳伯達的，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過去你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今後聽主席的話就是了。主席和我對你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是一樣的。你們主要是上了陳伯達的當。」五人從江青那裏走出來，異口同聲地說：「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sup>94</sup>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緊握手，面面

<sup>92</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第227頁

<sup>93</sup>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黨史博覽》2006年第1期

<sup>94</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23頁

相對，一句話也沒有說。黃、吳、李、邱到九江機場為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大家合影。林彪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多向總理報告。」<sup>95</sup>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一直等林彪檢討，沒有說出他對廬山鬥爭的看法，直到 1971 年八九月間，他在南巡講話中，他才嚴厲地談到廬山會議：

1970 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指林彪、陳伯達瞞著毛、周、康——引者注），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林立果對廬山會議上的這場鬥爭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對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考慮，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sup>96</sup>這表明，林彪集團的青年激進派們不僅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不甘心失敗，還要拋開他們的父輩，採取獨立的、極端的行動。

---

<sup>95</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第 723 頁

<sup>96</sup>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1972.07.02；中發〔1972〕24 號。

## 第二三章

# 從批陳整風到林彪出逃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出逃，結果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使毛澤東看到了林彪集團的勢力，看到了這股勢力採取集體行動的那種聲勢。為了扭轉軍人集團尾大不掉的局面，毛從「手無寸鐵」的陳伯達身上下手，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逼林彪集團的幾個人認錯，徹底對他臣服。同時採取「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的辦法瓦解林彪集團。

## 一、華北會議和改組北京軍區

廬山會議「六號簡報」來自華北組，毛既然說「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華北當然是追查的重點。毛將 38 軍的一份報告當作「石頭」甩了出來，引出了華北會議。

38 軍在朝鮮戰爭中被稱為「萬歲軍」。朝鮮戰爭結束以後，38 軍駐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 年 2 月 15 日，軍委電令 38 軍換防河北保定地區，由瀋陽軍區調歸北京軍區建制，代號改為 4800 部隊。原駐防河北省的 69 軍調往山西。

1967 年 1 月，河北省軍區和 69 軍在保定地區支左。在全國的「二月鎮反」的潮流下，支左部隊宣佈有三萬餘人的「河北省工農榮複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一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一總部」）為反動組織，取締了「八一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抓了 1200 餘人。38 軍換防保定以後，成為保定支左部隊的主體。1967 年 4 月，中發[67]117 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各地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為造反派平反。自 1967 年 4 月以後，以「八一總部」平反與否為爭論焦點，保定造反派組織重新組合成「工總派」和「工籌派」兩大派系。較穩健、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得到 38 軍的支持。

38 軍與河北省軍區在支左中各持己見，最後導致水火不容。北京軍區站在省軍區一邊，對 38 軍的支左持批評看法。保定兩派群眾組織各恃有軍方支持，衝突四起，武鬥不斷。

1967 年 12 月至 1968 年 1 月間，陳伯達在當時的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視察，為省革委會的成立

清除障礙。陳伯達在天津支持穩健的「五代會」，使天津比較穩定。他在河北也支持穩健的一派，就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壓制了 38 軍支持的一派。1968 年 11 月，省軍區機關隨省會搬遷，由保定移駐石家莊。1969 年 2 月，北京軍區新任政委謝富治召 38 軍政委王猛到京，當著鄭維山的面宣佈：保定問題由 38 軍負全責，北京軍區和河北省革委會不要介入。38 軍統管保定以後，對兩派都採取了嚴厲的高壓政策，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武鬥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1968 年秋保定地區實現了「大聯合」、「三結合」。

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挨批，李雪峰、鄭維山因六號簡報受到牽連。1970 年 12 月 10 日，38 軍黨委向軍委辦事組並中共中央報送了《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這個報告說「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說「陳伯達在處理保定問題中，大搞分裂，挑動武鬥，鎮壓群眾，破壞大聯合、三結合」。<sup>1</sup>加在陳伯達身上的這些罪狀是言過其實的。1970 年 12 月 16 日，毛澤東在在 38 軍的報告上寫下致林、周、康及中央、軍委的批語：

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使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 38 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

楊成武倒臺後，由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委會的任務很重。為了解決各省的問題，儘快成立革委會，由周恩來主持做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華東。康生參與內蒙、山西。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後來山西、內蒙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又讓

---

<sup>1</sup>中共中央轉發三十八軍黨委《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1970.12.16；中發〔1970〕76 號，

陳伯達負責。<sup>2</sup>這是「陳伯達在華北到處亂跑」的起因。他作為中央領導人，華北的軍政領導人接待並隨同調研，不能說是把陳伯達當「太上皇」。陳伯達倒臺了，中央沒人出來說他分管華北的事。中央文革內部的分工又沒有形成文件，毛這樣批示，沒有人敢說事實真相。1970年7月，陳伯達到華北之前，給毛寫了一封請示信，是毛批准的。7月21日，陳伯達結束華北之行，兩天後，他給中央寫了一封彙報信。<sup>3</sup>毛在38軍報告上的這個批示與實際情況不符。

12月19日，周恩來給毛寫報告說：昨晚政治局討論了主席對38軍報告的批示，大家一致擁護主席要北京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的建議，認為這次會議應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人要多一些，時間要長一些。周還談了這個會議的安排。毛對周的報告當即批示「照辦」，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參加會議。黃永勝、李作鵬同李德生、紀登奎一道參加這個會議，後稱華北會議。

4

1970年11月13日，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黃永勝等參加。外賓走後毛把黃永勝留下，批評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的辦事組。」<sup>5</sup>毛說的「一統天下」，是指林彪、黃、吳、李、邱，都是來自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紅雙一」）。從井岡山開始，「紅雙一」一直是毛澤東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又是林彪帶領這些人從東北打到海南島。1949年以後，「紅雙一」的領導人大都佔據了軍隊的主要位置。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又是依靠這些人。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聯繫密切，形成了「一統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勢。毛對此懷著極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來由張國濤<sup>6</sup>領導的四方面軍中尋求幹部，謝富治、

<sup>2</sup>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修訂版），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360頁。

<sup>3</sup>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29-340頁。

<sup>4</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88頁。

<sup>5</sup>《吳法憲回憶錄》，第830頁。

<sup>6</sup>張國燾，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32年前在中央機關工作。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為根據地的第一把手、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紅軍長征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毛澤東統領的不足一萬人。會師後因和毛意見不一，被說成分裂紅軍。到延安後，他的部下

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軍的人，成為他打破「一統天下」、制約「紅雙一」的力量。

1970年12月19日，請假回安徽檢查工作的李德生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要他立即回北京，說毛主席有事情找他。李德生是12軍軍長，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他因對蕪湖事件<sup>7</sup>的處理得到毛澤東的賞識，成為「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4月30日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還兼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2月20日，他一到北京就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住地見毛。毛鄭重地對他說：「我和恩來商量了，確定你到北京軍區去擔任司令員。」<sup>8</sup>這說明，華北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就決定改組北京軍區，周恩來參與了改組的準備。毛澤東把改組北京軍區叫做「挖牆腳」。他對付林彪集團採取了三手，另兩手是，「甩石頭」，即拋出《我的一點意見》和批轉38軍的報告；「摻沙子」，即派李德生、紀登奎參加由「紅雙一」獨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為了解決林彪問題，拱衛首都的北京軍區必須完全可靠，毛澤東提前下手，防患於未然。毛澤東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對他們說：「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像粘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一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麼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sup>9</sup>

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到會的有北京軍區、華北各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華北有關部門負責人共449人。會上首先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學習38軍的報告。除了揭露批判陳伯達以外，還讓李雪峰、鄭維山作自我批評。毛澤東認為這個會「批陳不痛不癢」，同時召開的軍委座談會也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sup>10</sup>軍委座談會是軍委辦事組主持的。從1971年1月9

---

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託派分子，於1938年初殺害，張國燾感到不安全。1938年4月4日，他利用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機會，脫離中共。從此，成為搞分裂的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

<sup>7</sup>蕪湖事件是指1968年夏天蕪湖發生武鬥，在大造中央制止武鬥輿論的基礎上，李德生到武鬥現場說服了參加武鬥的人員，沒有動一槍一彈，平息了武鬥，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十二軍黨委向中央報送了《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中發〔68〕120號向全國轉發了這個報告。

<sup>8</sup>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60、161頁。

<sup>9</sup>紀坡民：《上臺下臺任職辭職聽父親談往事》，共識網，2013-10-1。

<sup>10</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

日起，出席軍委座談會的 143 人也參加華北會議。周恩來親自主持，會上按毛澤東的調子對李雪峰、鄭維山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華北會議期間，毛澤東又甩出一塊「石頭」：1971 年 1 月 5 日，濟南軍區政治部向中央軍委報送《關於學習和貫徹毛主席關於「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 1 月 8 日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說：「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軍隊支左以後，權力膨脹，一些支左人員胡作非為，佔用民房、大搞特權，群眾敢怒不敢言。毛澤東這個批示對當時現實有針對性，也是向林彪集團施加壓力。

1971 年 1 月 24 日，周恩來在會議結束前作了講話。<sup>11</sup>他在講話中羅列了陳伯達的一系列「罪行」，然後列舉李雪峰、鄭維山的錯誤：「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背著中央，同陳伯達勾結在一起，把他捧為太上皇，擴大他的影響。」「鬧宗派、拉山頭，搞獨立王國，在組織上犯了嚴重錯誤。」「追隨陳伯達、楊成武，打擊和陷害三十八軍」等。周恩來說：「中央認為李、鄭兩同志繼續留在北京軍區和河北省擔任原來的領導工作是有困難的」，他宣佈中央決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紀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謝富治同志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同志任第二書記，紀登奎同志任第三書記。周恩來這個講話於 2 月 25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6 號）發到縣團級。此時，謝富治已病重，1972 年 3 月逝世。

李雪峰免職後即被押送至安徽關押審查。1973 年被定為「林彪集團」成員開除黨籍。1982 年才為其平反恢復黨籍。鄭維山免職後被押送安徽部隊農場隔離審查，直至 1979 年 12 月中央下發《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時平反，1982 年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受李、鄭牽連的還有不少人，池必卿是其中之一。池必卿本來是華北局書記處書記，「九大」後不久在天津市抓工業，為了打好電子工業基礎（陳伯達主張發展電子工業），1970 年他主持「單晶爐

---

<sup>11</sup>周恩來這個講話事先寫好提綱 22 日送毛審閱，23 日毛約周談話商議提綱，周據毛的意見作了修改，再送毛審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第 203-204 頁。



會戰」，搞得有聲有色。在這期間我一直跟著他採訪。後來他突然消失了。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池必卿是拿著鄭維山寫的一個條子到天津的。此後，池必卿沉寂多年，文革後是貴州省委書記，在貴州做了不少好事，退休後貴州人對他的評價很好。

## 二、批陳整風，毛等待林彪檢討

廬山會議結束後，林彪沒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北戴河，在那裏住到九月下旬才回北京參加慶祝紀念活動。1970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毛澤東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門，林彪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還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國慶節後，開始了批陳整風運動。

批陳整風，開始一段時間叫「批修整風」。陳伯達的問題在全黨公開以後，就叫「批陳整風」。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轉發了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這個文件開始發到地、師級，後來傳達範圍不斷擴大。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罪行材料》，指出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的「一系列罪行」。報刊上把陳伯達稱為「劉少奇一類騙子」，進行連篇累牘的批判。對普通黨員幹部來說，批陳整風運動只是學習、開會，學習中央指定的馬、恩、列的六本書<sup>12</sup>和五本毛主席著作<sup>13</sup>。開會是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唯心主義先驗論」。「唯生產力論」是針對陳伯達為林彪起草的政治報告，「唯心主義先驗論」是指林彪的「天才觀」。在高層，毛澤東和林彪正在暗中較勁。

據吳法憲回憶，1970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澤東約林彪到他那裏談了一次話。在談話中有換掉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的意思，林彪盡力保護吳法憲。從毛那裏回來，林彪對吳法

<sup>12</sup>馬、恩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還有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

<sup>13</sup>《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憲說：「過去我不同意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贊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的爭論再向主席說一遍。今後空軍的情況，你要直接向主席彙報。」吳法憲三次求見毛澤東，毛都不見。<sup>14</sup>從過去的情況看，受到批評的高級領導人一旦毛不再見他，他就完了。吳法憲把毛拒見的情況告訴林彪，林說：「那就沒辦法了。」吳法憲準備寫書面檢討，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吳法憲的檢討送到了毛那裏，10月14日，毛在吳的檢討上十個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說：「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軍委辦事組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報告，又是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我從來沒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sup>15</sup>毛在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中還說：「我願意看到其他宣講員的意見。」「其他宣講員」是黃、葉、李、邱，毛逼他們作檢討。

1970年10月13日，葉群給毛澤東寫信，檢討她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10月15日，毛就在檢討信上寫了很多批語。<sup>16</sup>葉的信中說：「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在「是路線性」下劃杠，寫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葉群信中講到黃永勝、吳法憲1970年8月中旬給林彪和她打電話，反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上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情況時說：「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他們當時是出於熱愛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澤東在「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下面劃杠，寫了「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葉群寫道：「由於自己沒有提到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來認識這個問題，總以膚淺之見勸林彪同志不生氣，和稀泥，力求息事寧人，結果幫了倒忙」。毛澤東在引文和「結果幫了倒忙」一句下劃杠，寫了「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

<sup>14</sup> 《吳法憲回憶錄》，第827—828頁。

<sup>15</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37—142頁。

<sup>16</sup> 以下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43—146頁。

『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了。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葉群在信中講到 8 月 24 日晚她參加中南組的發言中引用了天才論語錄時，毛在下面劃了杠，寫下了「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討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葉群的信中寫道，「由於自己路線覺悟政治水平低，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毛澤東在「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下面劃杠，並寫：「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麼會去同他鬥爭？」毛澤東在葉群的信上最後批示：「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像對待吳法憲的檢討一樣，毛澤東將他批示的葉群的檢討信送林彪、周恩來、康生及其他有關領導人閱。

拿到毛澤東對葉群檢討的批示，黃、吳、李、邱將毛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比較了一下，認為「毛澤東對葉群的批評更厲害，批葉群直接關係到林彪，只不過給林彪一個面子，沒有點林彪的名。」<sup>17</sup>毛在葉群檢討中提到的「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是什麼？應當是陳伯達起草的、被毛否定了的九大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林彪也有責任。

「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在軍隊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1970 年 11 月 6 日，在毛澤東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屬政治局直接領導。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的單位包括：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紅旗雜誌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等。組長為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sup>18</sup>康生有病，後來李德生調往瀋陽軍區，中央組織宣傳組就控制在江青等人手裏，實際上就在毛的直接

<sup>17</sup> 《吳法憲回憶錄》，第 830 頁。

<sup>18</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403 頁。

控制之下，成為對抗軍委辦事組的重要力量。中央組織宣傳組所管轄的單位中，一些重要的單位已經軍管，現在，就從軍隊的控制轉為毛澤東直接控制。

毛澤東認為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是一次路線鬥爭。他既然認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窮追猛打。但是，毛還是希望林彪主動檢討，和緩地解決問題。在批陳整風會議期間，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處釣魚臺請江青照了一張照片，林彪光著頭拿著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將這張照片題為《孜孜不倦》，署名「峻嶺」，發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軍畫報》和《人民畫報》上。這是林彪最後一張半身免冠照，離「9·13」只有三個月。對此，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解讀。有人說是毛為了麻痺林彪（高華）；也有人說是毛想把林穩住（丁東），江青的秘書楊銀錄是這次照相的當事人之一，他說，實際上都不是。江青給很多人照過相，有小護士，有周恩來。江青跟陳伯達還照過一張兩人一塊的照片。楊秘書但是，他想的是否過於簡單？在激烈的政治搏鬥中，林、江間還有這樣和諧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剛過，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去，說：「你寫句話掛在葉群臥室」，接著口述：「說到底，壞不到哪里去。」他想安慰正在發愁中的葉群。<sup>19</sup>這說明林彪的心態是平和的，認為毛澤東不會把他怎麼樣。

1971年2月19日，毛澤東對批陳整風運動批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加強了對陳伯達周圍人和事的揭發批判。

3月21日，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寫了書面檢討。毛將三人的檢討送周恩來等閱，讓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23日，周、康、江三人商量決定開一次批陳整風彙報會，讓黃、吳、葉、李、邱在會上作檢討。並將黃、李、邱三人檢討送還毛。3月24日，毛在黃永勝的檢討上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都

---

<sup>19</sup>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sup>20</sup>

3月24日下午，毛約周恩來、康生、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談批陳整風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廬山會議的事就出在沒有調查。同意召開一次批陳整風彙報會。吳法憲、葉群二人需要重寫檢討。讓周恩來把黃、李、邱的書面檢討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閱。要求在場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車到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彙報，時間在林彪看完黃、李、邱的書面檢討之後。<sup>21</sup>親歷者邱會作回憶，毛對他們很熱情，微笑著，說：「早就要請你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毛說：「中央準備開一次會，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你們之中的一些同志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是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你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黃永勝立即表示擁護這個決定。<sup>22</sup>雖然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都寫了檢查，可林彪一直沒有任何表示。毛澤東希望林彪就廬山會議問題表態。

毛是讓周恩來一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書面檢討。讓犯錯誤的人做書面檢討，是毛控制下屬的常用辦法。向他交「檢查」，就是交「認罪書」，就是繳械投降；讓人自己將錯誤記錄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舊事重提。對林彪這樣的人，更需要他作檢討。這是因為，林彪作了檢討，表示林彪集團主帥投降了。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檢討，就掌握了解決林彪問題的主動權：如果在檢討中真心誠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換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況，就為把林彪換下來提供一個依據。

1971年3月29日，周恩來帶領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6個人乘專列到北戴河。他們乘坐的是周恩來的專列，周除了有專列以外，在空軍和民航還各有一架專機。夜深了，吳法憲從走廊到周恩來處，看到女服務員正在為周剪指甲，周問：「你怎麼還不睡？」。吳說：「我不知道檢討怎麼寫，想請示一下總理。特別是林立果的『講

---

<sup>20</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374頁

<sup>21</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374-375頁。

<sup>22</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754-759頁。

用報告』寫不寫。」周說：「這不要寫，越寫越複雜。」<sup>23</sup>

3月30日、31日，周恩來等人在林彪的住處開彙報會。屋子裏放著暖氣，林彪面色蒼白，毫無表情。周向林彙報了批陳整風的情況。周對林說，中央準備下月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他們幾位也好把廬山的問題在小範圍內向大家有個交待。周還委婉地說：主席建議，請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在會上講幾句話。林彪聽完彙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自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對黃、李、邱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絕沒想到」陳伯達問題那麼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林彪還為他在廬山會議上講話事作了辯解，但林彪沒有表示參加會議，更沒有作檢討的意思。<sup>24</sup>

4月1日，周恩來一行到毛澤東處，向毛彙報北戴河之行。毛聽了周的彙報很不滿意，當面指責黃、吳、李、邱，嚴厲地批評說：「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sup>25</sup>邱會作回憶說，我們進去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吳、葉、李、邱的檢查。接著談路線鬥爭問題，還說：「你們幾個人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毛不想同林彪周圍的幾員大將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說的「到了懸崖的邊沿」，實際是指林彪。

軍委辦事組的人一直過不了關。有一次，邱對黃說：我看現在的溫度（指毛的指責）比山上還高了，「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可能是空話。黃說：完全是空話。他們商議，建議林彪作一點自我批評。他們向葉群提了這個建議，過了三天，葉轉達了林彪對這個建議的意見：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式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說：「不

---

<sup>23</sup> 《吳法憲回憶錄》，第837頁。

<sup>24</sup> 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172-173頁；《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447頁，

<sup>25</sup> 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73頁。

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與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sup>26</sup>

毛等林彪的檢查，林彪就是不檢查，毛、林之間形成了僵局。林彪認為毛是有意整人，周恩來向毛呈上了關於批陳整風彙報會安排的請示報告，毛批「同意」，林卻一反以往畢恭畢敬的態度，讓秘書代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還公然寫上「遵囑代寫」四個字。<sup>27</sup>

一天，葉群讓內勤李根清把毛澤東的一個批件給林看。葉念了毛澤東的批語，然後拿著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動，說：「你看看，這不是沖著你來的嗎？」林彪對葉群怒吼：「你不要在這裏煩我了！你走，我要休息！」此時的林彪的心境沒有年初那樣平靜，他煩躁不安了。

<sup>28</sup>

批陳整風彙報會於1971年4月15日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軍政領導幹部99人。毛澤東特指定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參會加會議。黃永勝、吳法憲作了檢討性發言。會議前7天主要是討論黃永勝等人的書面檢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後幾天是揭發陳伯達，交流各地批陳整風經驗。

4月18日，毛指示「會議時間（原定7天）不夠，應延長。」毛在延長中等林彪的態度。

開始林彪不回北京來，是特意回避這個會議，周恩來讓黃永勝每天給葉群打電話。會議中間，王輝球、王秉璋揭發，廬山會議上邱會作到東北組串連與鼓動。這是原來不知道的新情況，林彪怕把事情鬧大，4月19日急忙趕回北京。周恩來給林彪送去會議文件和毛的有關指示，並請林彪在會上講話，林彪表示「堅決不講」，也沒有到會的

<sup>26</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779—780頁。

<sup>27</sup>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第26版，第316頁

<sup>28</sup> 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意思。<sup>29</sup>主持彙報會的周恩來還希望緩和局面，4月24日，他在會議情況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林已回北京還不出席會議，毛豈能屈尊？他表示：「我這幾天不出門。」周的報告中提出：「主席如有新的設想，亦請批告，如能約我們一談，更所盼望。」毛批示：「可以不要談了。」

30

兩位主角不上臺，周恩來只好唱獨角戲。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託，他在會上按毛的調子作總結講話，他在講話共四個部分：一，會議的過程和評價；二，國民黨反共分子、託派、叛徒、特務陳伯達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三，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的錯誤，是方向路線錯誤；四，今後辦法。周說：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還說：經過會上同志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志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他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sup>31</sup>周恩來還是和稀泥。

批陳整風彙報會一結束，就趕上了五一國際勞動節。當晚，天安門廣場照常舉行焰火晚會。出發時間到了，林彪表示請假不去。葉群再三勸說，他仍舊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一動不動。周恩來來電話催促：「主席已經出發了，請副統帥動身吧，今晚的活動不參加不好。」林彪還是無動於衷。葉群雙膝跪在林彪前哀求：「你去吧，你不去，我們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說：「沒有那麼嚴重嘛！」他還是緩緩起身，穿上內勤遞過的大衣，出門乘車了。跟林彪上天安門的內勤小畢說，林彪坐下不一會兒，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許，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灣。<sup>32</sup>在現場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毛澤東率先走向城樓的平臺。他坐在中間圓桌的東首，緊挨

<sup>29</sup>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74頁

<sup>30</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6卷，第380頁。

<sup>31</sup>《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54頁

<sup>32</sup>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著的是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側。林彪靜靜的坐著。毛澤東略略地抬了抬頭，朝對面的林彪瞥了一眼，又側過臉來和西哈努克說話，仿佛根本沒有看到什麼！林彪帶著一幅萎靡不振的樣子出現在人們視線裏，一句話也沒有說，和近在呎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甚至沒有看一眼。5月的天，林彪披著一件軍大衣皺著眉，雙手抄在袖筒裏，一臉枯寂的樣子。董必武探過頭去，關切地問林彪：「身體不大好？」林彪拉著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著桌面回答：「不好。」……林彪雖然沒有正眼看誰，但他用眼睛的餘光觀察著周圍的一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相應令人不易察覺地震動一下。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一切舉措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對他正眼望一下。林彪的濃眉顫動過幾次，陰鬱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一下亮，那裏透出一股銳氣和火氣。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剎那，他驀然站起，轉身，旁若無人的揚長而去。<sup>33</sup>

五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到跟前，說：「下午總理要來，你找一張大紙寫幾句話貼在這裏。」他走出客廳，指著客廳門口南側的牆壁說：「這裏。」接著口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戰爭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說完，林彪用雙手比劃了一個大圓圈：「字要寫得大一點。」<sup>34</sup>林彪想通過周恩來向毛傳達什麼信號？

林彪堅持不認錯，卻給毛寫了一封信，向毛提出了條件。「9·13事件」以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清查林彪住處毛家灣時，發現了這封沒有發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寫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內團結和相當於

<sup>33</sup>顧保孜杜修賢：《毛澤東最後風雨十年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第63-64頁。王海光認為，杜修賢的回憶不確，林彪走時，給毛打了招呼。

<sup>34</sup>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我要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現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並盼主席能找總理談一談，由總理採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後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後（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塗的人和冒險家採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紊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到了以下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實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後，現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評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對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

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或相當於中央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令，如果他們藉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令，則其本人應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決不可託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

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華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

第四，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以調往別處，換一個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我想，為了防止萬一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

關於第一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佈，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複向士兵傳達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後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幹部。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盡可能免除副作用的發生。

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麼時候有時間，請約我一談。  
此致  
敬禮

吳忠說：信寫完了以後放了三天，林彪考慮不送了。林彪和總理說過此事，總理說：有這個必要嗎？<sup>35</sup>李根清回憶，這封信是林彪向秘書于運深口授的。於運深把信稿交給李根清，讓李騰清後送林彪簽發。後來，這封信始終沒有交給李根清通過機要渠道送發。<sup>36</sup>

怎樣解讀林彪的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體不好，已經精疲力竭，想找一個臺階下來？「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至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在中共的路線鬥爭中，高層領導人沒有退出機制，這是不是為他自己設計的退路？林彪要退下來，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護「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林彪「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換一個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

---

<sup>35</sup> 吳忠談「九一三」事件，吳忠 口述 陳楚三 李大震 整理，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一期，吳忠口述的林彪這封信由於「磁帶有些地方聽不清」，存在一些誤差。本書根據餘汝信：《「林彪信稿」的本來面目》一文中提供的文本作了修改。

<sup>36</sup> 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宜。」把自己指揮過的部隊調離首都，這是向毛澤東表示，我已「解除武裝」了，你可以放心了。

周恩來不讓將此信送到毛那裏，可能認為毛是不會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一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令林彪陪同。林彪開始說出汗不能去，毛執意要林去，林彪還是不想去。後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在會見時賓主剛剛寒暄完，林彪隨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大廳的角落裏，一直到會見結束。<sup>37</sup>這是毛、林這兩位「親密戰友」最後一次見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來、熊向暉等人，在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後到毛處彙報。熊向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曾經多年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此時的熊向暉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毛撇開中美關係這樣的大事，卻關心黃永勝在總參謀部的表現，他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回答沒有。那「五個大將」的檢討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臺。」周恩來當時以自己歷史上也犯過錯誤打圓場，毛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sup>38</sup>毛這裏不僅是指出林彪問題的嚴重性，更是拉攏周恩來。在同林彪的鬥爭中，必須讓周站在自己這一邊。

7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後一個多月，林彪、葉群在毛家灣住地搞起了裝修。林彪本人則因毛家灣大興土木，搬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居住。此外，林彪、葉群還加緊籌辦兒女的婚事。這是林彪沒有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迷惑毛的假動

<sup>37</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第26版，第322頁。

<sup>38</sup>熊向暉：《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第30-33頁。

作？

1971年8月3日，葉群回北京，因醫生懷疑她有乳腺癌，找醫生檢查身體。來前向周恩來請示，是經周同意的。檢查結果排除了癌症。8月6日，葉群向毛的秘書打電話，報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況和準備很快回北戴河去，請秘書代她請示一下，看毛主席對她有什麼指示要交待。按過去的作法，這是要見毛澤東。但這次等了兩天，毛那裏沒有動靜，她被毛拒絕了。葉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sup>39</sup>葉群在京期間，黃、吳、李、邱到毛家灣探視。

### 三、毛澤東南巡，將火直接燒向林彪

在批陳整風中毛把林彪切割出來，批陳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檢查，徹底臣服。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檢查沒有觸及林彪，批陳整風運動也沒有追溯到林彪那裏。林彪絲毫沒有認錯的意思，毛澤東徹底失望，他安排了從組織上解決林彪問題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國慶前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確定由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三人組成籌備小組。這個小組由林彪反對的張春橋主持，林彪集團的幾個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南方視察。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工作，並準備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帶了一個中隊100多人隨行保衛。每人兩枝槍，一隻手槍，一枝步槍，還有機關槍。<sup>40</sup>毛在南巡中雖然講「對犯錯誤的同志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但林彪集團的人反應很強烈。吳法憲事後認為，「他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作準備。」<sup>41</sup>

8月16日，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彙報工作。周向林通報，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

<sup>39</sup>程光：《心靈的對話》第577-583頁。

<sup>40</sup>《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78頁。

<sup>41</sup>《吳法憲回憶錄》，第860頁。

緒，周的通報，進一步給林彪增加了壓力。

毛澤東南巡主要是向領導幹部打招呼，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統一思想，防止各地高級幹部跟著林彪走，以免再出現二中全會上的情況。

8月16日，毛到達武昌，住東湖客舍。直到27日離開。當天就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談話，17日同河南軍政領導人劉建勳和王新談話。25日同華國鋒談話。汪東興等參加了這些談話。離開武昌前跟劉豐談話說：「全國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軍隊了。我光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我就不相信。」

8月27日到達長沙，住到31日。毛在長沙談話到會的有：華國鋒、韋國清、汪東興、丁盛、劉興元、葡占亞。毛和在場的人一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軍政領導人「一切行動聽指揮」。

8月31日晚到達南昌，毛在南昌談話到會的有：許世友、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楊棟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對毛說：空軍周宇馳兩次到南昌，讓江西仿造水陸兩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談了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要他不要同林彪一家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毛若有所思，沒有講一句話。

<sup>42</sup>，

9月3日凌晨到達杭州，毛在杭州談話到會的有：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白崇善。毛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談話中，感覺到陳沒有講真話。<sup>43</sup>

9月8日晚，毛提出轉移專列停放地點，9日凌晨，專列從杭州笕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一條支線上。

9月10日下午4時<sup>44</sup>，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駛向上海。離開杭州前，讓汪東興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讓南京的許世友到上海，準備同他們談話。晚10點前到達上海虹橋專用線，因許世友不在南京，沒

<sup>42</sup> 《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第188頁，說的是「江西省一位負責人」。

<sup>43</sup>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第151-152頁。

<sup>44</sup> 《張耀祠回憶錄》第189頁說是18時離開杭州，21時到達上海虹橋支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61-162頁說是下午4時離開杭州走了5個多小時，晚10點前抵達上海，11日上午10點鐘許世友才來。該書第164頁說毛等許快15個小時了。這兩位毛的隨從說的時間都不準確。

聯繫上，毛說等許來了一起談。

11日上午10時，毛在專列上同許世友、王洪文、馬天水談話。12點30分專列離開上海，經濟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濟南讓汪東興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台支線開會<sup>45</sup>。

9月12日下午1時10分，毛的專列抵達北京豐台，在車站支線找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汪東興在場。<sup>46</sup>毛先講中共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接著談到廬山會議。吳德記憶中說，整個談話的內容，總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點意見》上的內容。他記得最清楚的有兩點：一點是要搞唯物論，不要搞唯心論；另一點是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吳德意識到陳伯達後面還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談話結束時，陳先瑞還高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sup>47</sup>

一路下來，毛到底談了些什麼呢？<sup>48</sup>

他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他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他說：「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麼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他講了中共歷史上的路線鬥爭，他說，歷次路線鬥爭中企圖分裂黨的人都沒有得逞。他把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放在中共歷次路線鬥爭之後，說：

---

<sup>45</sup>汪東興回憶錄第168頁說是在濟南通知，張耀祠回憶錄第190頁說是在天津通知的。

<sup>46</sup>毛南巡的時間及召見談話的官員，除另有注明外，取自《毛澤東年譜1949-1976》6卷。

<sup>47</sup>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反思與分析》，中共黨史出版社，1009頁

<sup>48</sup>下面引用的毛講話，除另有注明外，都是引自國防大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的《毛主席在各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麼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毛澤東對劉豐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上這個問題要講清楚。」「在廬山會議以來，有的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大人物不開口，其他人即使講，也是講無關重要的問題。」<sup>49</sup>

在廬山巡講話中還說：「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這把林彪和歷史上犯路線錯誤中「為首的」放在一起了，雖然說「對林還是要保」，但說「改也難」，不抱希望。他在談話中直接批評林彪：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

---

<sup>49</sup> 《邱會作回憶錄》，第784頁。



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表示了他繼續鬥爭的決心：「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他說華北組六號簡報「是一個反革命簡報」，「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他說的黃永勝，實際就是指林彪。他還批評，在林彪領導下，軍隊「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毛澤東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他在長沙對廣州軍區領導人劉興元、丁盛說：「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怎麼得了呀？」

毛澤東南巡，一路走一路談，越談越嚴厲。對林彪，從旁敲側擊到公開點名，從簡單說說，到把問題越說越大。原先毛還說「對林彪同志要保護」，說只是對廬山的事「負一定的責任」，後來這個話不提了，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分裂」、「不光明正大」、「陰謀詭計」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斷派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恩來，讓他瞭解最新動向。周恩來知道毛林間的一場惡鬥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對手。他審時度勢，由原來的和稀泥轉而堅定站在毛這一邊。雖然在九大以後中國怎麼走的問題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沒有站在林的一邊。專門研究周恩來的高文謙說：周是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sup>50</sup>

8月底到9月初，吳法憲連續給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報告毛澤

---

<sup>50</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339頁。

東在武漢、長沙、南昌的行蹤。掌管飛機的吳法憲知道毛澤東到了什麼地方，專機接了誰，但不知道談話內容。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經毛同意，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召開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大會，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偷偷在香煙紙上作了些記錄，9月5日晚上，顧同舟和於新野在電話上講了劉興元的傳達，但沒有提到直接與林彪相關的內容。此間，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武漢，從劉豐那裏得知毛談話的一些內容。李作鵬9月6日回北京同黃永勝談起此事。當晚，黃永勝就電話告訴了葉群。9月6日一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下午駕直升機帶著15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sup>51</sup>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讓顧同舟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顧同舟向王璞借來傳達記錄本，親自動手，連夜整理出長達50頁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專機送到北京。<sup>52</sup>

#### 四、「小艦隊」紙上談兵

在毛向林彪集團步步緊逼的時候，林彪還是蟄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認錯以外，抱著一種消極態度。據知情人說，林彪得知毛南巡講話以後，最初的想法是什麼也不做，哪里也不去，擺出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勢。9月11日12點30分內勤聽到林彪對葉群說：「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sup>53</sup>林彪這種態也許是一種較好的選擇。從力量對比上，他不是毛的對手。他不是說「大不了是彭德懷第二」嗎，如果他消極挨整，只不過是挨批，下臺養病。憑他的戰功，日後會給他相當的地位，不致於落到全家死無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極等待挨整的時候，他的老婆葉群和兒子林立果卻不甘

---

<sup>51</sup>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22-123頁。

<sup>52</sup>1982年2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顧同舟資敵案公訴詞，轉引自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sup>53</sup>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632頁，轉引自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下）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997頁。

心失敗。年輕氣盛的林立果認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對他姐姐林立衡說：「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一線希望！」<sup>54</sup>林立衡阻止他冒險。

葉群是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擔任科長，1942年林彪從蘇聯返延安後和葉群結婚。葉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讀書，有較高的悟性。毛澤東讓她代替林彪參加政治局會議。林彪身體不好，事事依賴葉群，也相信葉群的判斷能力。她控制著林彪的信息來源，她給林彪的講話和批示文件「把關」，防止林彪的意見「走火」。她以林彪的名義聯絡親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一樣，葉群是軍委辦事組也是說一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軍羽翼漸豐，憑藉他是林彪兒子的地位，目空一切。他認為廬山會議上的失敗是老軍人無能，他要擺脫這批老軍人另起爐灶。在林立果還沒有當作戰部副部長的1968年，根據王飛和周宇馳的提議，王飛、周宇馳、林立果等成立了一個「調研小組」，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合小艦隊」的雛形。「小艦隊」這個詞，本來是空軍黨委辦公室一些人聊天的時候一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後，空軍有25人被認為是林立果「小艦隊」的人，關進了秦城監獄）。面對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狀況，林立果決心破釜沉舟，奮力一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密謀對策。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和平過渡，被人搶班，自己提前搶班。最後傾向是提前搶班。「提前搶班」有兩個辦法，或是把張春橋一夥搞掉，保持「首長」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或是直接謀害B-52（他們用作毛澤東的代號）。但B-52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盡可能不這樣幹。他們商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讓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爭取「和平過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最後又討論了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sup>55</sup>

<sup>54</sup>張寧：《塵劫》，明報出版社，第193頁。

<sup>55</sup>《李偉信筆供》，《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1972.01.13；中發[1972]4號）。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一個「571工程」紀要。這個紀要還沒有成形，只是於新野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看來是一個討論稿。「9·13事件」以後十多天，這個筆記本才在北京他們的一個據點找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沒有看過「571工程」紀要，林彪、葉群是否看過不得而知。這個紀要把黃、吳、李、邱的軍委辦事組定為「借用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見，沒有讓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參與武裝起義。「571工程」紀要有9個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是對形勢的分析。說廬山會議以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說：「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他們分析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時寫道：「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紀要還說，毛「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紀要提出的口號：「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

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571 工程」紀要中的一些內容一針見血，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當時我聽傳達時，會場一點聲音也沒有，人們屏住呼吸靜聽，會後人們默默走出會場，不敢評論。「571 工程」紀要表現了青年軍人的銳氣。但是，其中也表現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樣，這份文件是對社會現實深刻的批判，是抨擊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最強音。林立果祭起反對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旗幟，準備採取「刺秦」的行動，「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這反映了當時中國一些人的意願，「天下苦秦久矣！」

「571 工程」紀要說：「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一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9 月 6 日，「小艦隊」得到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加緊了行動策劃。事後的官方文件說，9 月 8 日，林彪親筆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9 月 8 日晚上 21 時 48 分，林立果與劉沛豐等人從北戴河飛回北京，密謀刺殺毛澤東。

奇怪的是，就在 9 月 8 日這一天，林彪派人給江青送一筐四個西瓜，放在釣魚臺 10 號樓的前廳。12 日江青要到頤和園去玩，叫服務人員帶上西瓜。江說：「我請大家吃海南西瓜，這是林副主席送的！」還說：「把中間那個瓢拿出來，外面那一層你們吃啊，我吃中間那個芯。」<sup>56</sup>毛的南巡講話 9 月 6 日就傳到林立果手裏，林立果已經佈置「刺秦」行動，送西瓜是為「刺秦」行動作掩護，還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刺秦」活動？江青 12 日遊頤和園，說明她不知道當晚將發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對她來說是突然的，可能對所有人來說也應該是突然的。

8 日深夜至 9 日凌晨，林立果分別在空軍學院和西郊機場工字房

---

<sup>56</sup>鄭仲兵、李宇鋒訪江青的保健護士周淑英、趙柳恩：《保健護士談江青》，《往事》第 120 期，2013 年 10 月 30 日

召集「小艦隊」成員開會，參加人有周宇馳、江騰蛟等人。會上商議謀殺毛澤東的辦法：一是用火焰噴射器和四〇火箭筒打火車；二是調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打火車；三是要王維國乘主席接見時動手。後來周宇馳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辦法」，即在鐵路、橋樑上放炸彈；「把碩放機場的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乘混亂之際動手」。但是，在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都被一一否定。在束手無策時，他們把原來在林彪辦公室工作過的、時任洛陽步兵師政委的關光烈叫來，希望得到他的幫助。9月10日晚上，關光烈乘10次特快列車到北京，周宇馳給關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的豎寫的，而是橫寫的），提出調兩個營攻打釣魚臺，調一個噴火連到上海。關光烈說：「別說一個連，一個排也不行。個人無權調動部隊，除非軍委下令。而且調動部隊手續很多，一級一級上報，申請火車皮，由軍運部門調撥，才能坐上火車。」<sup>57</sup>林立果說：「冒充軍委下令呢？」「呼號頻率不一樣，還要配密語，更不好辦。」看來確實不行了，林立果決定，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餘地了。

12日19點30分，林立果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準備次日早晨直接飛到廣州。行前，他把王飛等召集到空軍學院讓他們作南逃廣州的準備。

晚8點，周宇馳到空軍學院，他對等候在那裏的王飛、江騰蛟、於新野、李偉信宣佈：首長決定，立即轉移到廣州，到那裏另立中央，實行割據。周宇馳對他們說：明天上午8點鐘林彪等從北戴河直飛廣州，北京的這些人明早7點鐘起飛，用林彪名義通知黃、吳、李、邱上飛機，如果不願去，就強迫他們上。他們還安排一架伊爾18飛機到上海江灣機場，接上海小組到廣州。他們沒有想到，周恩來已經控制了飛機，南逃廣州是閉門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議論的武裝起義的計劃，都是不著邊際的空想，被指定的執行者都退縮不幹，最後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紀要，只是紙上談兵，紙上也是一個草稿，根本沒有行動。在「9·13事件」

---

<sup>57</sup>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轉引自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以後的長時間嚴格的清查中，沒有找到他們行動的實物證據。九大以後的林彪雖然不願意跟毛「繼續革命」，很難說他有「刺秦」的意圖。如果林彪也參加了「刺秦」行動，以他的軍事才能和他在軍隊裏的影響力，也許是另一種結果。直升飛機上迫降後俘獲的李偉信在審判林彪集團法庭作證：「571 工程」紀要「這事與首長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劃。」首長是指林彪。學界一直懷疑李偉信的證詞。<sup>58</sup>

既然「小艦隊」沒有採取危害毛澤東的實際行動，即使毛澤東的信息再靈，他也不會得到他將遭到謀殺的信息。一些著作濃墨重彩地描繪說毛如何機警地躲過了林立果的暗殺，都是為了「坐實」林彪集團「搞反革命政變的罪行」。其中一些細節都是出自汪東興，難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東興的敘述中，毛躲過暗殺的行動，都是汪東興實施的。

不過，在與林彪這個龐大的軍事集團處於尖銳對立的情況下，警惕性極高的毛澤東當然有所戒備。

9 月 10 日下午 4 時左右，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駛，晚 10 點前到達上海，依靠在飛機場附近的支線上。毛卻沒有下車，讓上海市的黨政軍領導王洪文等人到火車上來談話。

9 月 11 日上午 10 點，毛與許世友、王洪文在專列上談話。到吃飯時間，毛澤東說，我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王洪文你請客，陪陪這位老將軍喝幾杯酒，你們都去，我在這裏等候你們。他沒有等候許、王，12 點 30 分，專列離開上海。

18 點 35 分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專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 and 檢修，僅用了 15 分鐘，便又啟動了。從上海乘飛機趕回迎候的許世友，沒有讓他上車見面。

9 月 12 日凌晨 5 點，專列到濟南。毛讓汪東興給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等到豐台站。毛澤東專列從濟南開出後，7 時 40 分抵達德州，停車 20 分；11 時 15 分抵達天津西站，停車 15 分。

---

<sup>58</sup>多年來，官方始終沒有公佈關於林彪授意和批准這個「571 工程」紀要的直接證據。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沒有看到過「571 工程」紀要。

12日中午1時10分，專列在豐台站停下。毛同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到3點多鐘。毛不進直接進北京，他對北京的安全狀況還沒有把握。談話結束後，毛讓李德生留下，鄭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從38軍調一個師到北京郊區南口。第二天，按照調兵程序，周恩來與黃永勝、吳法憲、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完成了這個師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點零5分，專列到達北京站，毛乘汽車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這關鍵的兩天「小艦隊」是怎樣活動的呢？請看魯瑁的回憶。<sup>59</sup>魯瑁，1952年12月5日，在朝鮮戰場上打下了美軍飛機F-86（佩刀式），成為戰鬥英雄。「9·13」前夕是空軍作戰部長，他回憶了那兩天的幾個關鍵時刻：

1971年9月11日晚約8點半，我被江騰蛟用汽車拉到西郊機場的平房裏。林立果看到我就說：現在要進攻啦，副統帥有令，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周宇馳拿出一張硬白紙，林立果遞給我。我看到的是用紅鉛筆寫的「按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林立果說，現在的情況很緊張，馬上要開三中全會，全會一開，林副主席就不佔優勢了。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讓魯部長的第二次進攻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一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

魯瑁對他們說：我空戰次數不少，可沒有在陸軍幹過，對炸藥從來沒有擺弄過，甚至連看也沒有看過。有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呢？這是魯瑁的托詞，聽說要謀害毛主席，他頭都炸裂了。但在那幾個佩槍者面前，他不能說「不」。

討論沒有結果。于新野傳來一個電話：毛主席已經離開上海。林立果便倉皇宣佈：情況有變化，今天的議論全部作廢，就當沒有發生

---

<sup>59</sup>「魯瑁不堪回首話當年」，見宋群：《背影依然留在心中》，北京時代銘語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第158-165頁



什麼事，什麼話也不能傳出去，不然就會殺頭。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魯瑆害怕了，想辦法擺脫林立果等人。當醫生的妻子想出了辦法。當時正流行「紅眼病」，用濃鹽水、過期金黴素抹在他的眼上，一會兒雙眼赤紅，住進了空軍總醫院。

但他沒有擺脫。9月12日晚8點多，王飛電話通知他：立即到辦公室來，有重要文件傳達。（林立果已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魯瑆按王飛的要求到了辦公室，見氣氛十分緊張。王飛說：「時間已經很緊迫了！林副部長已經到了北戴河，來電話要我們立即組織一批可靠人員，護送黃、吳、李、邱幾位首長，明天由西郊機場起飛，去廣州。現在的任務是，立即擬好名單，編好組，做好一切行動準備！」於新野在旁邊記錄，逐個核對名單，分別編組，記下名字。第一組王飛、魯瑆等23人，共6個組。

大約晚11點鐘，一個電話傳來，王飛臉色煞白，他慌裏慌張、語無倫次地說：「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大家趕快回家睡覺！」原來是周宇馳來的電話，說：「暴露了，不搞了！」原來是南下廣州的飛機被周恩來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裝起義」簡直是兒戲。

## 五、林彪葬身溫都爾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謀害毛澤東不成，就到廣州。9月12日下午4點多，周宇馳讓胡萍安排6架去廣州的飛機。當晚7點，胡萍通知34師副政委潘景寅，要他親自駕駛三叉戟256號，當晚送林立果到山海關機場。潘景寅讓給飛機加油16噸，實加15噸，比平日飛行多加了3噸。<sup>60</sup>到廣州的6架飛機，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點40分，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號飛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關機場。晚8點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9點左右，他們就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領

---

<sup>60</sup>時念堂：《歷史將揭開林彪案件的更深層面——空軍專機師師長的回憶》稱：這個加油量說明飛機是直飛廣州的。飛往蘇聯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噸，飛機從北京飛到山海關後只剩12.5噸，可見一開始飛機不是準備飛往蘇聯的。

導人休假地的 96 號樓。

這時的北戴河，正在為慶祝林立衡和張清林的訂婚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賀之後，就到葉群臥室同葉群密談。大約晚 10 點，林彪、葉群、林立果一起密談。林立果此時和林彪談了些什麼，是決定林彪下一步行動的關鍵。如果林立果將他策劃並實施的「刺秦」行動失敗的情況告訴了林彪，林彪肯定會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可能當第二個彭德懷了，他的下場比劉少奇還慘！所有的歷史資料都沒有林家父子在這個關鍵時刻的對話（林立衡說，她讓內勤偷聽，隱隱約約聽到了林彪說「我是個民族主義者」，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內關門密談，能聽清多少？）。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說在這之前林立果可以瞞著他父親；現在「刺秦」行動已經失敗，情況萬分危急，他必須如實告訴父親，必須和父親商量對策。南下廣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對策，他已就此對策向周宇馳等作了佈置。然而，毛南巡講話的內容已傳到林彪那裏，知道廣州軍區已將毛的講話傳達到師以上幹部。廣州軍區能不能支持他們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廣州軍區支持另立中央，在強大的毛澤東面前，也維持不了多久。在作戰中力求十拿九穩的林彪，應當不會同意南下廣州的。他們的決策十分困難，逃跑是唯一的決策。跑得越快越好！

「刺秦」失敗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帶回的消息對林彪來說是突然的。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決定是倉促的。毛澤東的接班人逃跑，絕大多數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的官兵）是不可思議的事。「9·13 事件」是突發事件。當然，這個突發事件是醞釀已久的。

9 月 12 日晚，林立果告訴林立衡馬上去廣州（這是在和林彪、葉群密談之前）。林立衡決定馬上報告警衛部隊。她來到 8341 部隊 2 大隊駐地 58 號樓，找到大隊長姜作壽、副團長張宏，說：「葉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飛機已停在山海關機場。」要他們立即向中央報告。22 點 20 分，張宏打電話給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辦副主任張耀祠<sup>61</sup>，張耀祠立即報告汪東興。汪東興馬上打電話告訴在人大會堂

<sup>61</sup> 《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第 193 頁。

開會的周恩來。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9月12日晚9時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在北戴河負責林彪警衛的領導電話報告，說林彪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過了一會兒，又接通到報告說：「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乘專機從北京來，這架飛機就停在山海關機場。」<sup>62</sup>周恩來的電話通常都由紀東接，此時周恩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紀東他在中南海西華廳周的辦公處值班。23點多鐘，張宏給張耀祠打電話說：「林立果、葉群正在商量要挾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還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張耀祠副團長報告，保衛好毛主席。」<sup>63</sup>林立衡沒有向張宏說「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這句話，張宏不可能擅自加這句話，這可能是張耀祠把當時的猜測寫成了事實。周恩來知道林家母女關係緊張，怕林立衡把家庭糾紛摻進來。但周恩來還問吳法憲，是否知道有架飛機飛到北戴河去了？吳法憲說不知道。周讓吳法憲查證。汪東興通過張宏瞭解到，山海關機場的確有一架飛機。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的機場，晚11時整，周打電話向海軍政委李作鵬查問，李作鵬晚11點5分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明後回報了周恩來：的確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李作鵬回電話是紀東在西華廳接的，他向周轉告時周只說「知道了」，紀東從電話中感到，周沒有回到會場，一直守在電話旁邊，這是很反常的。<sup>64</sup>

吳法憲向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查證，胡萍說，是一架剛改裝好的三叉戟，試飛山海關。周恩來立即指示：「這架飛機立即飛回北京，飛機上不准帶任何人。」胡萍立即將周恩來追查飛機事告訴周宇馳，並要他轉告林立果。還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周恩來追查飛機的事，還統一口徑，說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飛不回來。周恩來聽說飛機有故障後，讓他們修好後立即飛回，不准帶人。

晚11點30分左右，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sup>65</sup>，問林副主席身體好

<sup>62</sup>紀東：《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21頁。  
《周恩來年譜1049-1976》下，第480頁說是22點左右，張耀祠說是22點20分。

<sup>63</sup>《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第194頁

<sup>64</sup>紀東：《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22頁

<sup>65</sup>汪東興、李作鵬和郭玉峰回憶說是周恩來打給葉群的（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5頁；《李作鵬回憶錄》第698頁；閻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國

不好，葉回答說很好。周問葉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專機，葉開始說不知道，停了一會，她又說：「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來的。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要上天轉一轉。」周又問：「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回答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裏天氣有些冷了。」周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說：「晚上不飛，明天天氣好了再飛。」周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周恩來進一步試探，對葉群說：「需要的話，我到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葉群急忙說：「你到北戴河來，林彪更緊張，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66

周恩來從葉群說話支支吾吾、前後矛盾中斷定，北戴河那裏的確出了問題。他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對這架飛機作出安排。李作鵬記錄下四點：第一，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等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我的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飛行；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sup>67</sup>11點35分，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傳達總理命令：「這架飛機要聽總理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能起飛。」13日零點6分，李作鵬再次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重申四人中一人指示才能放飛。周恩來後來說，他指示周、黃、吳、李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後來李作鵬為自己辯解說，是他將總理的電話理解錯了。

周恩來的追問三叉戟飛機，還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這使得林立果、葉群方寸大亂。晚11點40分，葉群對李文普說：「快點

---

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第55頁）。張耀祠、吳法憲、邱會作回憶說是葉群打給周恩來的（《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第195頁；《吳法憲回憶錄》第862頁；《邱會作回憶錄》第793頁）。林立衡說是葉群打給周恩來的。1972年8月26日周對林立衡說，葉群打電話是說他們請假去廣州，（《林立衡關於「9·13」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載餘汝信編《「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45頁）。當年中央警衛局有關人員的記錄整理稿上記載的是11時22分，葉群給周總理打電話。

<sup>66</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205-206頁。

<sup>67</sup>《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9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81頁。

調車，越快越好。」葉群又對李文普說：「快點吧！什麼東西都不能帶了，有人要來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啦。你快去調車。」林立果又對李文普說：「老李，快點吧！有人要來抓首長。我給周宇馳打個電話，你在這裏看一下。」他通知周宇馳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

晚 11 點 50 分，警衛秘書往 96 號樓（林彪住處）調車，現場一片混亂，葉群披頭散髮，林立果跑來跑去，劉沛豐手上提了 4 個提包十分著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兩個皮包走到外邊。楊振剛把車開上來，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李文普一一登上了大紅旗轎車。林彪汽車跑出約 200 米，李文普急叫停車，並從車裏出來。這時連響兩槍，李文普左上臂負傷。晚 11 點 55 分，汽車離開 96 號樓直向山海關行駛。

零點 22 分，林彪汽車高速駛入機場，停在三叉戟飛機左後方。葉群第一個下車，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林彪第二個下車。他們急急忙忙跑到飛機艙門下，順著駕駛艙的工作便梯一個個地爬上了飛機。佟玉春此時剛從場站調度室奔向專機，正要向機長潘景寅傳達不准起飛的命令，但沒有見到潘，便告訴了正在停機坪給調度主任打電話的機械師邵起良。邵聽後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槍督促邵最後上的飛機。飛機緊急啟動，強行滑出，右機翼的端部碰在還沒有完全離開油車頂部的把柄上，刮壞了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隨後乘吉普車趕來的 8341 警衛部隊的人，還沒有來得及採取有效的阻攔飛行的措施，飛機就緊急起飛了。<sup>68</sup>零點 32 分，在起飛條件不充分的情況下，飛機在黑暗中強行起飛。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等機組人員都沒有上飛機。

山海關機場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三叉戟 256 號飛機強行起飛了。李作鵬立即打電話告訴周恩來。周讓李作鵬查飛機的航向。李作鵬向機場詢問以後電話告訴周恩來：航向西北。<sup>69</sup>這時已是 13 日零時 55 分。周恩來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的雷達監視這架飛機，並要調度

<sup>68</sup> 康庭梓：《專機副駕駛親歷「9·13」》，中青出版社，2013 年，第 60、68、69 頁，轉引自王海光：《「9·13 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女士的【「9·13」十大謎團】》

<sup>69</sup>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697 頁。

員向這架飛機呼叫，要林彪等飛回來，告訴他們：「不論飛機在何處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但飛機上一直沒有回答。<sup>70</sup>

9月13日零點32，汪東興分別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林立衡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說飛機已經起飛了。汪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大會堂到主席那裏，我從中南海南到主席那裏，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他們兩人幾乎是同時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彙報。<sup>71</sup>

周恩來、汪東興向毛彙報時，吳法憲來電話請示：飛機已經飛了30分鐘，即將進入內蒙古，<sup>72</sup>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毛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sup>73</sup>1點55分，林彪的飛機越過中蒙邊境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漸漸在雷達的屏幕上消失了。由於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襲，經周恩來安排，毛從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會堂118房間暫住。

為了防止再有飛機外逃，防止有人調動飛機來危害中央，周恩來和毛商量後下了禁飛令：從現在起，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黃總長、吳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一架飛機都不准起飛。1點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達完畢。周恩來派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跟蹤；派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派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從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說：「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下午，周召集副總參謀長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人到人大會堂新疆廳參加政治局作戰會議。他鄭重地說：「我現在考慮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還是打仗！」<sup>74</sup>周恩來擔

<sup>70</sup>《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998頁。

<sup>71</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207-208頁。

<sup>72</sup>《吳法憲回憶錄》第864頁說：「飛機到了赤峰附近的時，那裏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下來。周說要請示主席。」

<sup>73</sup>《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208頁。

<sup>74</sup>紀東：《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25頁、

心林彪出逃到蘇聯以後，蘇聯乘機進攻中國。

在下達禁空令的同時，又向全軍發出命令，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周恩來要海軍艦隊和各地空軍直接聽各大軍區指揮，讓陸軍進駐重要機場。這樣就把海軍司令部和空軍司令部的指揮權解除了。這是出於對吳法憲和李作鵬的不信任。

周宇馳接到林立果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的電話後，帶著 34 師直升飛機大隊副大隊長陳士印到北京沙河機場，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騙了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於 13 日凌晨 3 時 15 分劫持了 3685 號直-5 型直升飛機。凌晨 3 點 15 分，北京沙河機場緊急報告：飛走了一架直升飛機。機上有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和副駕駛員等 5 人。周恩來下令，派飛機攔截，迫降。不聽就打下來。直升飛機飛到張家口上空時，駕駛員陳修文覺察他們要逃跑，就想往回飛，周宇馳察覺後，用槍逼迫他繼續北飛。陳修文東轉西繞，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9 月 13 日 6 點 47 分，在懷柔縣沙峪迫降。陳修文被周宇馳開槍殺害。<sup>75</sup>北京衛戍司令吳忠命令警衛三師派出機械化部隊包圍現場，同時發動民兵包圍。周圍群眾和民兵聽到直升飛機降落聲和槍聲從四面八方趕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從飛機上下來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盡停下來，發現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一，二，三」同時開槍自殺。周宇馳和於新野自殺死亡，李偉信抬高槍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虜，被俘的還有陳士印。

9 月 14 日中午 12 時 20 分，外交部收到駐蒙古大使館特急電報：今天上午 8 點，蒙古副外長約見中國大使許文益，通知有一架中國飛機於 13 日凌晨 2 時 30 分左右，在蒙古境內墜毀，機上 9 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議。後來得知飛機墜毀的地點是東經 111 度 17 分、北緯 47 度 41 分，一個叫溫都爾汗的地方。下午兩點，周恩來的秘書紀東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電話：「外交部收到我駐蒙古使館的特急報告，要送總理。」不一會兒，王海容到人大會堂北門，將一個大牛皮紙信封交給紀東。紀東交給周。紀東在現場觀察到：「開始，

---

126-127 頁。

<sup>75</sup>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211 頁，李德生說他派 8 架殲 6 攔截與事實不符。一說直升飛機是燃油耗盡才迫降的，沒有開炮。

只見總理眉頭緊皺，隨著目光在文字間移動，臉上的神情逐漸舒展開來。他拿著報告的雙手微微顫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周還對紀東說：「我要到 118 號房間主席那裏去報告，你也跟著我。」說完，周恩來換了衣服，帶著紀東和高振普向大會堂 118 號房間毛住處走去。紀東和高振普在走廊等著，20 分鐘後，總理回來了，紀東看到他步履輕鬆多了。<sup>76</sup>

在三叉戟飛機上 9 人全部死亡。他們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楊振剛（林彪專車司機），潘錦寅（機長），李平（主管機械師），邵起良（特設機械師），張延奎（機械師）。從壓在屍體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 9 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燒死的。

9 月 14 日傍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宣佈了林彪等機毀人亡的消息，在會上分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

整整三天三夜，73 歲的周恩來只睡了三個小時。得知林彪摔死以後，政治局委員們集合在人大會堂福建廳，會場一片輕鬆。周恩來說，要好好吃一頓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舉杯歡慶。還破例喝了茅臺酒。短暫的輕鬆以後，周恩來卻當著李先念和紀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最後還說：「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紀登奎和高文謙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國思想不同，經濟建設的思路也不同。<sup>77</sup>毛、周的不同會怎麼樣呢？林彪死後，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輪到他和毛髮生摩擦了，所以說「還沒有完」。

張春橋聽到周恩來宣佈林彪死亡以後，親自到外邊服務台拿來一瓶茅臺酒和幾個酒杯，笑嘻嘻地對大家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幹一杯！」他給每人斟了一杯酒，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做

---

<sup>76</sup>紀東：《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第 128-129 頁。《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 212 頁說是周恩來讓汪東興到人大會堂向毛彙報林彪摔死的事，不是周直接向毛彙報的。

<sup>77</sup>高文謙訪問紀登奎紀錄，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 358 頁



好工作。」<sup>78</sup>

9月17號，黃永勝在西山前敵指揮部，他站起來對著牆上巨大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軍用地圖，憤憤地大聲說：「跑什麼跑？！真是害死人呀！」<sup>79</sup>黃永勝認為林彪出逃是下策，還要牽連很多人。在以後的揭批運動中，一大批軍隊幹部被清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成員都判了重刑。軍隊幹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于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sup>80</sup>為了減小林彪出逃對社會的震動，這個文件先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幹部，9月28日傳達到地師級，10月6日，通報到縣團級。

## 六、「9·13」事件迷團重重

雖然中共中央對「9·13」事件作了結論，但是很多疑團沒有解釋，一些重大問題存在爭議：

第一，林彪是否參與了謀害毛澤東的軍事政變？

官方認為，林彪參與了謀害毛的政變，證據是他親筆寫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 林彪 9月8日」。

一些研究者認為林彪沒有參與政變。「九八手令」是別人摹仿他的筆跡寫的。林彪簽發的文件不少是讓別人用他的筆跡代簽的。林立果、周宇馳都曾練習過林彪的字跡，毛家灣也有人練習過。事後發現「九八手令」有三個：第一個是9月13日清晨，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被周宇馳撕碎的紙片。經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紅筆寫著：「盼照……宇馳同……的命……林，

<sup>78</sup>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796頁

<sup>79</sup> 《黃春光邱路光對話「9·13」》，2011年7月20日，《記憶》第75期 2011年9月13日

<sup>80</sup>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1971年9月18日，中發〔1971〕57號

九月八日。」是豎寫的。寫在一張 16 開白紙上。<sup>81</sup>第二個手令是 9 月 16 日，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等在北戴河的 96 樓清理出一張 32 開大的白紙，上面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九月八日。」<sup>82</sup>第三個手令林立果給關光烈看的，是「橫寫的」。<sup>83</sup>林彪不可能寫三個手令，摹仿者多寫幾張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裝政變為什麼不動用軍委統帥部的指揮機構？為什麼不動用他的親信黃、吳、李、邱？林彪是大軍事家，在他指揮的戰爭中總是十拿九穩，務求必勝，林立果等搞的那一套像兒戲，和林彪作戰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動出逃還是被葉群、林立果挾持？

主流意見認為，林彪是主動的出逃的。林立果「刺秦」失敗，匆忙來到北戴河。他們都知道，出逃是一條生路。如果能在廣州抵抗一陣，也許有點希望。但周恩來已下禁飛令，廣州去不了了，國內已無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這一行動將使他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在進退兩難的抉擇中，最終考慮一家人的生命，還是順從了葉群、林立果的意見。

李文普回憶：大約 23 點以後，葉群叫我到林彪臥室，她先進去跟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說：「今晚反正也睡不著了，準備馬上夜航到大連去，到大連一個星期就回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sup>84</sup>林彪內勤陳占照證明：23 點 50 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一起到林彪客廳。過了一會兒，葉群和林立果走出來。林彪又打鈴，對我說馬上夜航去大連，不休息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夠用就行了。到大連住一個星期就回來，回北京過國慶節。<sup>85</sup>兩人證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藥被綁架走的。林彪自己從簡易舷梯上爬進機艙說明林彪不是被綁架的。

---

<sup>81</sup> 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第 230 頁

<sup>82</sup> 武建華《林彪叛逃後我奉命做的幾件事》，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5 期

<sup>83</sup>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第三版，第 481 頁

<sup>84</sup> 《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sup>85</sup> 《林彪內勤公務員陳占照關於「9·13 事件」的揭發材料》

另一種意見認為，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騙走的。邱會作認為，葉群對林彪封鎖消息，一切都由她決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挾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sup>86</sup>「9·13」發生的當夜，邱會作在與李作鵬在京西館聊天時說：如果林彪決心要走，臨走時下幾命令，在短時間內，也會大亂的呀！看起來是高明夫人腦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塗透頂了。邱會作在回憶錄中還認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sup>87</sup>

邱會作只是分析。林立衡和提出了一些證據。也有人提出了證據。張恒昌回憶：首長吃了安眠藥，比平時晚睡了 15 分鐘。是從床上拽起來。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沒有一點自主動作，完全由我們倆擺佈。<sup>88</sup>林彪衛生員小張（恒昌）給林立衡愛人張清林電話：「他們（指葉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長，情況十分緊急！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車再有十分鐘就開動了！你們快。快，快呀……」

<sup>89</sup>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內勤服務員陳占照、張恒昌在「9·13」後給專案組寫的證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藥睡下後被葉群拽起的情節。<sup>90</sup>

第三，官方意見說，林彪等要在廣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據。很多人對此質疑。

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釋》一文中指出，「所謂『南逃廣州』僅僅是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和王飛的自說自話，無證據證實這是林彪本人的意圖，「『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是『小艦隊』核心成員非常倉促的臨時決定，未及付諸行動便已夭折。」質疑者問：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得有點準備吧？這種

<sup>86</sup>《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787頁

<sup>87</sup>《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1年，797頁

<sup>88</sup>《林彪內勤公務員張恒昌關於9·13事件的揭發材料》，轉引自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654-655頁。

<sup>89</sup>《林立衡關於「9·13」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載餘汝信編《「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42頁。

<sup>90</sup>王海光：《「9·13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女士的【「9·13」十大謎團】》。

準備工作當然是廣州軍區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林彪在四野時的部下）來做。丁盛說：「當時，我是廣州軍區司令，主要負責人之一。劉興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負責任地說，當時所有人都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鄭重聲明：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軍區領導同志都不知道，我的秘書、辦公室主任、作戰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為沒有的事情，從哪兒知道啊？沒有嘛。至於林立果，他寫的那個《571 工程紀要》提到什麼廣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寫的關我們什麼事？他愛怎麼寫，寫了就是我們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許世友在清查林彪死黨時，也沒有查到廣州軍區接應林彪南逃的證據。<sup>91</sup>丁盛在這本書中還講了修建南湖賓館的情況，這是汪東興讓廣東給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修的。花了 6000 多萬。「9·13 事件」後硬說是給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後到這裏住的。為此，丁盛在廣州給汪東興寫信：你親自坐鎮，三番五次來。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說話呀？韋國清到廣州以後，才肯定房子是給主席修的，不是給林彪修的。<sup>92</sup>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報告葉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領導人為什麼沒有阻止？

李作鵬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 256 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李作鵬還認為，周恩來在處理山海關機場「9·13」事件的過程中，有重大失誤。既未及時指示北戴河的 8341 部隊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沒有採取諸如關閉山海關機場，控制三叉戟飛機，軟禁空軍機組人員等措施<sup>93</sup>李作鵬還推測：周恩來「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

---

<sup>91</sup>《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第 216 頁

<sup>92</sup>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年，第 205—210 頁。

<sup>93</sup>李作鵬的申訴《不平則鳴》（之二），《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 年，890-891 頁。

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迷團。」<sup>94</sup>

1980年3月20日，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和女婿張清林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一個材料，這個材料記述了9月12日晚，他們向8341部隊和北京的張耀祠五次請求，請求用部隊阻止林彪一行從北戴河逃走的情況，但部隊沒有阻止。中央讓林立衡和張清林也跟著上飛機，跟著走。<sup>95</sup>

據林立衡這個資料和李作鵬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認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一個大的政治陰謀。林立衡從北戴河的報告到汪東興那裏，毛第一時間就知道此事，有意讓林彪充分暴露。周恩來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抓住那架飛機窮追不捨，只是虛晃一槍，說要到北戴河看林彪。這使葉群更加倉促，卻沒有採取阻攔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陰謀說」。因為林彪一行出逃是突發事件，這事出於毛、周意料之外。多年來一直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不瞭解上層政治鬥爭內幕的部隊官兵，沒有中央的明確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張耀祠回憶說：23時40分，張宏報告：「『林彪他們調動汽車了。』我問張宏『你們準備好了沒有？』張宏說：『準備好了。』我對張宏說：『他們走時，你們要跟上他們，特別要注意他們去的方向。』」張耀祠沒有讓張宏阻止林彪車隊逃跑。為什麼？張耀祠說：「這事還沒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沒有指示，我只能向張宏交待注意林彪去的方向。」<sup>96</sup>

第五，林彪想叛逃蘇聯嗎？

官方意見認為，林彪就是叛國投敵，是漢奸、賣國賊。另一種意見認為，林彪沒有叛逃蘇聯的動機，「9·13事件」以後多年來，沒有證據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們與蘇聯或蒙古官方有過有關聯繫。說林彪叛逃蘇聯的證據只有李文普提供的一句話。這句話在「9·13事件」半年以後專案組審查他時交待的。他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要飛多長時間？」他才發現他們不是去大連，而是要叛

<sup>94</sup>《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792頁

<sup>95</sup>《林立衡關於「9·13」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載餘汝信編《「9·13」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新世紀出版社，香港，2013年，第25-46頁頁。

<sup>96</sup>《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96頁。

逃蘇聯，才跳下了車。林彪作為一個軍事家，那幾年又一直把蘇聯當主要敵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林彪辦公室保密員李根清回憶，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圖邊，有時乾脆踩到地圖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鏡看，看圖很仔細。特別叫我找出伊爾庫茨克，讓我拿尺子量一量，量北京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以此計算導彈飛行時間。林彪計算蘇聯從伊爾庫茨克發射導彈到天安門的位置要9分鐘，也就是說，我們有9分鐘的預警時間。<sup>97</sup>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蘇聯。林立果「刺秦」失敗，闖下了彌天大禍，林彪一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禍。到境外只有能選擇香港和蘇聯。事實上飛機就在逃往蘇聯的路上失事。當然，即使是林彪主動出逃蘇聯，也不是「叛國」，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飛機起飛到墜毀這段時間，在飛機上發生了什麼？飛機為什麼在空中繞大圈？

256號三叉戟飛機所屬的專機組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運用他對這架飛機的熟悉情況和專業知識，著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sup>98</sup>飛機在空中飛行，航向是用「度」來標示的。按照順時針方向，一周為360度。正北方向為0度（N），正東方向為90度（E），正南方向為180度（S），正西方向為270度（W）。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按照正常的飛行規則、程序，它必須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間轉彎到航線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256號三叉戟飛機外逃的航向，應該是325度），然後再繼續爬高，到達預定的高度之後，再改為平直飛行。完成這個過程，在三叉戟飛機來說，只需要幾十秒鐘的時間。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完成這個過程卻用了二十來分鐘的時間！

那麼，在這樣長的時間內，256號三叉戟飛機，又在哪些航向上穩定過呢？第一階段：飛機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一致，為244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穩定了四分鐘左右；第二階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又穩定了4分鐘左右，且平直飛行。

<sup>97</sup>舒雲採訪李根清筆記，2011年12月25日，轉引自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sup>98</sup>時念堂：《歷史將揭開林彪案件的更深層面——空軍專機師師長的回憶》《民主與法制》2005年第3期，轉引自共識網2014-01-27 01:27。

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時念堂當時正在西郊機場。從雷達員那裏獲悉這個航向後，已經認為 256 號三叉戟飛機在返回北京。第三階段：飛機的航向從 290 度越過叛逃航向 325 度而到達航向 340 度。第四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航向上即 325 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一個碩大的問號。這個碩大的問號，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1，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的時候，僅剩下了 12.5 噸的油料。這些油料僅是飛到蘇聯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林彪要去蘇聯，就得最大限度地節省油料作直線飛行。然而，飛機卻在空中繞大圈浪費油料。這是為什麼？2，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首先穩定在去廣州的航向上。林彪一夥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是否曾經想去廣州？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來已經封鎖所有機場，無法去廣州？3，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還曾經穩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飛機上是否有人曾經想回北京？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4，飛機的航向曾經從 290 度越過叛逃的航向 325 度到達 340 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幹什麼？飛機上是否發生了爭鬥？飛機起飛後，周恩來曾經通過航空聯絡系統對林彪喊話，希望他回來。林彪是否聽到了周恩來的喊話？如果聽見了，他是怎樣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匣子，這些疑團就可解決。所乘坐的 256 號三叉戟飛機是從中央發動機進氣口處炸斷的。飛機的機尾，被拋在離著陸點 500 米的地方，這是全機中最大的一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因此，可以斷定：裝在這裏面的飛機狀態記錄器黑匣子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也可以斷定：語音記錄器也不會損壞。但是，多年來最為重要和最為敏感的兩件黑匣子都不見了。潘景寅死後，先是作為林彪死黨和叛徒追查的。後來，鄧小平將其定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他有沒有企圖把飛機開往別處？鄧小平是否從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變對潘的定性？但是，據蔣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這架飛機上，根本沒比有「黑匣子」<sup>99</sup>。

---

<sup>99</sup>蔣健：《歷史不忍細究——揭開「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謎》，記憶第 119 期。

蔣健對這架飛機比這個師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還熟悉？

儘管「9·13」事件迷團重重，對林彪事件也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出逃機毀人亡是事實。這件事不僅是當代中國上最大的政治醜聞，也是當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醜聞。這件醜聞不僅給毛以沉重的打擊，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每天都宣傳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讓人們祝福他「永遠健康」的副統帥，竟然出逃摔死！這給中國人以強烈的震動。這一震動粉碎了文革以來官方製造的一切謊言。

林彪事件這樣的驚天醜聞，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會發生的，它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的產物。正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這個事件給人們留下的種種疑問，恐怕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 第二四章

# 批林整風：批左還是批右？



林彪死後，毛澤東發起「批林整風」，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結果受毛打壓。

林彪事件的震憾稍加平息，人們在迷茫和惶惑中尋找路徑：下一步往哪里走？在選擇方向的時候，兩股力量在博弈：

第一種力量是以毛為首的堅定文革派，他們不承認、不甘心文革失敗。在上層，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成員，他們處於政治局委員的高位。在下面，在「反派性」、清查「5·16」等一系鬥爭中被排擠出權力機構的群眾代表，有被軍政官僚們整得死去活來的造反派中比較激進的人們，還有一些相信「繼續革命」能給中國以新的出路的人們。他們主張繼續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將文革進行到底。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官僚腐敗的事實，恢復職務以後官員的某些表現，使文革的積極分子和一部分群眾，反對恢復文革前的官僚體制。

第二種力量是已經恢復職務和等待恢復職務的官員，掌權的軍代表中的一部分人，還有日益增多的不相信「繼續革命」的群眾以及對派性鬥爭已厭倦的人們。他們要求糾正前幾年的錯誤、恢復秩序，讓被打倒的官員儘快「解放」，已經「解放」了的官員儘快恢復職務。

經過五年的反復折騰，相當多的人對毛澤東的那一套產生懷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為什麼要謀殺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人為什麼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的形象、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力，在人們的心目中開始大打折扣，懷疑文化大革命的人多了起來。「繼續革命」難以繼續下去。

第一種力量有毛澤東的支持，掌握著組織、宣傳大權，在權力中心處於主導地位。毛澤東也不是完全不承認前五年的錯誤和造成的問題。他在不否定文革的大前提下，在政策上作一些調整。第二種力量雖然處於弱勢，他們利用毛澤東調整政策、修正錯誤造成的機會，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他們的意願。隨著文革問題日益暴露，隨著被打倒的官員的職務不斷恢復，第二種力量不斷壯大。

毛澤東之所以能把一大批革命梟雄置於自己的麾下，他善於搞政治力量平衡是一個原因。毛澤東是玩弄政治平衡的高手。不過，在搞政治平衡時，他通常不放棄自己的原則。林彪事件打破了「九大」建立的政治平衡，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他必需要對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軍政官僚們作些讓步。1971年11月14日晚，他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軍隊領導人，講話開始時葉劍英到會。毛說：你們再不

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師。老師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sup>1</sup>毛的這些話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反對文革的人也很願意聽這虛偽的話。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突然參加了陳毅追悼會。12月，毛澤東對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的來信作了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sup>2</sup>6月28日，周恩來陪毛澤東接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毛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sup>3</sup>1973年12月21日，毛在接見中央軍委全體成員時，肯定朱德是「紅司令」，說賀龍同志搞錯了，要翻案；說楊、余、傅也要翻案，說是林彪搞的；說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也是聽了林彪的話。<sup>4</sup>

毛澤東的上述行為只是在維護「文化大革命」前提下的局部退讓。他既要保護「文化大革命」，又要尋找結束文化革命的方式，以便使國家回到正常狀態。他既支持周恩來「解放」一大批老幹部，讓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來，同時又重用文革派，讓張春橋、王洪文當政治局常委，並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既批評周恩來，又批評文革派。批周恩來是帶根本性的，防止他否定文革；批文革派是策略和操作層面，希望他們不要過急，要注意策略，要他們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是保衛文革、堅持「繼續革命」，還是否定文革、恢復秩序？這是以後的五年文革的主線。以後五年，政治鬥爭雖然形式多樣，但都是圍繞這個主線展開。

---

<sup>1</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417頁。

<sup>2</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34頁。1972年10月20日，劉淑清給毛寫信反映劉建章在監獄中每天飲水只限三杯，每日放風只有30分鐘。

<sup>3</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第531頁

<sup>4</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513-514頁。

## 一、毛澤東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

林彪事件以後，原來的「批陳整風」改稱為「批林整風」。實際只有批林，沒有整風。上述兩種力量的鬥爭最初集中在對林彪的批判上。第一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右；第二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左。那時的左，就是堅持文革初期的思想和作法，也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時的右，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否定前五年的作法和造成的現狀，批判無政府主義，恢復文革前的秩序。批右的邏輯結果就是堅持文革；批左的邏輯結果就是否定文革。

從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來看，要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反對無政府主義，批判極左思潮，符合多數人的意願。1972年春天，人民日報工商部召開了工業記者座談會，讓幾位駐大工業城市和工業集中地方的工業記者彙報當時的工業狀況。主持人是當時的工商部主任馬沛文，彙報人有楊瑛（上海分社）、陳談強（北京分社）、楊繼繩（天津分社）、張行端（江蘇分社）、李玉秀（黑龍江分社）、王青海（甘肅分社）。魯瑛、王揖等人民日報所有領導人都聽了彙報。6個人每人彙報半天。彙報者集中反映了當時工人勞動積極性不高、勞動生產率下降、企業管理混亂、技術人員被迫離開了技術崗位、軍代表不懂經濟且獨斷專行等方面的情況。李玉秀幽默地介紹了「突出政治」在黑龍江造成的思想混亂。他說，《人民日報》1965年說「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受到批判；後來《解放軍報》說「政治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最近也受到批判。政治哪里也不能落實，只能端在手上了。他用手比劃著，引起轟堂大笑。我在發言中介紹了「突出政治」在工業戰線的影響：天津鐵路分局所屬一個車站，有一次「天天讀」時間雷鳴電閃，要下雨了，生產組長要職工去搶外面堆放的物資，指導員說「天天讀雷打不動」，眼看著外面堆放的物資被雨淋。群眾要求紡織品增加花色品種，而印染行業的設計人員怕搞出的新圖案「不突出政治」，只是照抄報刊上的圖案。<sup>5</sup>

林彪死後，周恩來試圖治理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

<sup>5</sup>楊繼繩：《天津市經濟工作的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人民日報《情況彙編》第2053期

一大批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老幹部，其中不少人對文革是很反感的。他們「穿新鞋，走舊路」<sup>6</sup>，恢復文革前的那一套對他們是輕車熟路，他們是周恩來的有力支持者。造反派，在「三結合」領導班子中逐漸被邊緣化，「清查 5·16」、「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批判極左思潮等運動中受到打擊。這部分造反派此時不僅有一股怨氣，還有一股「反復辟」、「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意願。他們經常對革委會提出批評，這種批評被掌權者視為極左思潮。周恩來作為恢復秩序的代表人物，勢必要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客觀上也就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

周恩來和在國務院工作的領導人，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急需建立秩序。從林彪事件發生後到 1972 年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座談會、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許多場合，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1971 年 12 月 26 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問題的彙報，明確提出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周恩來對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指示說，過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業務和訓練是錯的。他說：「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文藝質量的提高。」「現在要提倡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齊放。」<sup>7</sup>在全國計劃會議召開前，周恩來聽取彙報時說：現在我們企業亂得很，要整頓。<sup>8</sup>這是文革以來第一次提「整頓」。由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的 1972 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要整頓企業管理，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又發出關於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辦法，要從實際出發；強調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1972 年 4 月 9 日，周恩來在廣州接見廣東省領導幹部時的講話中，著重批判了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產品質量帶來的影響。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氾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他在觀看部隊文藝演出時也強調

<sup>6</sup>這是當時批評恢復職務以後，工作和生活還沿用文革前那一套的官員們的一句話。

<sup>7</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500-502 頁。

<sup>8</sup>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 2017 頁。

要肅清文藝工作中的極左思潮。<sup>9</sup>針對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傾向，周恩來批評說：「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在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中強調：「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關於政治和業務的關係，周強調政治持帥要落實到業務上。

10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批左，就是扭轉國內的政治方向，批左，勢必造成否定文革的局面。王洪文事後點破：「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sup>11</sup>

為了抵制周恩來批左造成的影響，毛讓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出馬。從此，批左還是批右，在黨內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很長一段時間沒出門，1971年11月底，毛澤東曾患重病，經醫生全力搶救，方才脫離危險，但身體一直不好。1972年1月6日，「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陳毅逝世。1月8日，周恩來審定陳毅悼詞時強調陳毅「功大於過」，毛刪去了功過評價的文字。<sup>12</sup>1月10日，陳毅的追悼會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毛突然破例地參加追悼會，衣服了來不及換，穿著睡袍罩上一件軍大衣就來了。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追悼會，不得不改為周恩來主持追悼會，成了最高規格。周恩來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負責人參加。毛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是個好同志啊。」毛還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讓陳毅家屬將毛的話傳出去。<sup>13</sup>

周恩來利用毛澤東這些安撫老幹部的政治表演，客觀上為政治上解放老幹部造了勢。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查同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戰

<sup>9</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18頁。

<sup>10</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41-542頁。

<sup>11</sup>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的插話，轉引自《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019頁。

<sup>12</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07頁。

<sup>13</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08頁。

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儘快對被打倒的老幹部落實政策。<sup>14</sup>一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官員們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除了某些「有歷史問題」的外，沒有一個被組織部門定性的「走資派」，即使是曾經被中央點名的「走資派」，也沒有一個人再戴這個帽子。

周恩來的一系列行為引起了文革派的反彈。1972年7月，根據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物理學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把北大理科辦好。還說：「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sup>15</sup>10月初，《光明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這是落實周恩來的交代。張春橋明明知道這是周恩來的意見，卻追查這篇文章的「出籠背景」，還說：「周培源有後臺，不管他的後臺有多大大多硬，就是要批！」<sup>16</sup>上海《文匯報》隨即開展了對周培源文章的批判。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張春橋不會有這樣的膽量。

1972年的國慶社論又是一次較量。起草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意圖，寫上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勾去了「批判極左思潮」的詞句<sup>17</sup>。周恩來暫時退讓，不寫批判極左，而是強調「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sup>18</sup>。落實這些政策，也是對文革糾偏。

1972年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報送《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批示同意，報送毛澤東和政治局成員。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說：「當前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

<sup>14</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21頁。

<sup>15</sup> 周培源：《學習周總理的革命精神》，載《北京日報》，1977年1月6日。

<sup>16</sup> 周培源：《學習周總理的革命精神》，載《北京日報》，1977年1月6日。

<sup>17</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55頁。

<sup>18</sup>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國慶社論，1972年10月1日。

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則直接了當地指出「批林就是要批極右，同時要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中「應該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妥協讓步，同意刪除了中聯部和外交部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sup>19</sup>

1972年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人民日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業務領導小組的幾個人談話，張說：現在有些地方批「精神萬能論」，可是毛主席說過「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有人說林彪是「唯意志論」，不對，他是「唯武器論」。張春橋說的這些話是毛的意見，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很多人以為是張春橋的看法。他們還繼續批「唯意志論」。

1972年3月，國務院業務組負責人華國鋒、李先念、餘秋裏專門約黑龍江革委會有關人員彙報情況。彙報者認為黑龍江無政府主義嚴重，一些重要廠礦紀律渙散。華、李、餘當場表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因此，黑龍江革委會寫作組寫了一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署名「龍岩」交給了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李定中。河北省革委會寫作組也寫了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也交給了李定中。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龍岩」文章的題目是《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河北省文章的題目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是胡績偉，文革前他是人民日報第一副總編。建立不久的「業務領導小組」成員王若水分管理論部的業務。

人民日報14日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記者當天就發了一條電訊，說這篇文章是為老幹部講話的，是批評紅衛兵的。有9家省、市報紙全文轉載，還有8家報紙陸續發表了自己組織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上海《文匯報》明確反對這組文章。當時上海寫作班子的主要成員朱永嘉出面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詢問作者是誰？誰組織的？給什麼人看過？他還說：「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反應強烈。」11月4日，《文匯報》的內參

---

<sup>19</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89—390頁。



《文匯情況》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說這一版文章，特別是「龍岩」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眾頭上。姚文元要求人民日報討論《文匯情況》反映的工人意見。報社「業務領導小組」討論了4次，沒有討論出什麼結果，姚文元又讓他們學習中央文件以提高認識。王若水在學習中央文件中發現，由毛澤東批發的批林整風文件中多次提到反無政府主義。王若水認為，「左」的根子就在張、姚身上，他沒有想到毛。王若水認為，張、姚這樣做，是與周恩來作對，但周恩來無法糾正張、姚的錯誤。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定曲直。12月5日，他通過人民日報的機要交通把信送了上去。

這封信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了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8月1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是，張、姚卻在8月8日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為總理講的是對的。王若水的信中還報告了《文匯情況》對《人民日報》的批評和《文匯報》對林彪路線性質的提法，說這種情況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局面。到底《文匯報》講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匯報》怎麼有那麼大的膽子？如果是，為什麼《人民日報》不知道這個中央精神？王若水在信中還表示，不同意《文匯報》說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信中還說張春橋不同意批判「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我不懂，為什麼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王若水哪里知道，不要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是毛的意思<sup>20</sup>。

王若水上書第2天，1972年12月6日，毛約見了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由他們找王若水等談話。12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傳到人民日報社。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

---

<sup>20</sup>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1972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1998年第5期

大革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麼了不起。……停止黨的生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麼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

《人民日報》的同志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麼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王若水不為這些話所動，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在那樣的時刻，把反右作為重點。

12月15日和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王若水的信。12月17日，周、張、姚到毛那裏開會，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2月19日晚，上面通知魯瑛、吳冷西及報社軍宣隊負責人一起去人大會堂江西廳等待中央首長接見。晚8點半，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共同接見了他們。王若水發現，他的信已經落到江、張、姚手中。周恩來講話說：「王若水同志聽到8月1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11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周說《人民日報》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是錯誤的。他說：「有些地方說批林就是批極『左』思潮，這就批錯了，批到群眾頭上了。」「主席認為你這封信是不好的。這篇文章不對，這封信超過了這篇文章。當然你寫過《桌子的哲學》，學了一點馬列主義，你是不是都讀進去了？」「王若水同志這封信，一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一團，象《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一樣；一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多事不贊成。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江青說：「你組織的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群眾。《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這不是對著林彪，是對著群眾！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個

感覺，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一個場合某一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這個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是批林。」江青說，《人民日報》「要開展一場大批判，就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塊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張春橋說：「就在批林的問題上分清是非。通過這場批判，《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就出來了。」當時《人民日報》沒有正式的領導班子，只有一個管業務的「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的魯瑛。

會議足足開了五個半鐘頭，從 19 日晚 8 點半開始，到結束時已是次日凌晨二時了。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王若水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

中央領導接見後，《人民日報》開展了一場大揭發、大批判。胡績偉被調離《人民日報》，王若水到五七幹校一邊勞動，一邊檢查交待。李定中也到五七幹校勞動。<sup>21</sup>主持工業記者彙報會的馬沛文也調離了人民日報社。

毛澤東態度明確：批右。從此，全國所有的報紙、電臺都掀起了批右的高潮。

從 1972 年到 1973 年，由於毛澤東有明確的態度，《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所有的報刊雜誌，都是批判林彪的右。但是，實際工作中卻糾正文革前五年的偏差，也就是用實際行動糾左。輿論和實踐這兩種不同的方向，是因為，文革派掌握著宣傳，而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握著政府和經濟的操作權。從實際工作上說，1972 年是周恩來勝利之年，這一年，他完全控制了局勢。<sup>22</sup>1972 年夏，政府機構重建工作明顯加快。1969 年有 18 個部委可以進行工作，到 1973 年底增至 31 個。國家計委於 1972 年 7 月恢復了工作。政府裏的

---

<sup>21</sup>《人民日報》批無政府主義事件的全部內容引自：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載《百年潮》，1998 年第 5 期。李定中：《人民日報批判無政府主義惹禍》，載《炎黃春秋》2013 年第 7 期。

<sup>22</sup>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朋友、英國作家韓素英持此看法，見韓素英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第 512 頁。

軍代表的比例從 57%降到 40%。1972 年到 1973 年，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除了身體和其它特殊原因之外，基本上全部恢復原職；恢復工業生產秩序，抓企業管理；在大學和科研單位，大力恢復教學和科研秩序，抓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 二、批林整風彙報會

林彪事件以後，「九大」確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週二人，在人大會堂參加常委碰頭會的政治局成員也減少了一半。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來支撐局面。周恩來處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幫助毛剷除劉少奇後，希望儘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搞經濟建設。作為國務院總理，無政府狀態給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難，他有切膚之痛。周恩來成了被打倒的官僚們的靠山，成了期待恢復秩序的人們的希望。在治國方面，毛離不開周恩來，但不相信周恩來。面對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時刻，毛對周更不放心。

毛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受了風寒，病情惡化，由肺炎轉為肺心病，1972 年 2 月 12 日晨突然休克，晨 2 時周恩來趕到。經搶救後蘇醒。<sup>23</sup>毛對周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回答：「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毛又說：「就這樣定了，你們去吧。」<sup>24</sup>毛估計自己來日無多，無可有奈何地向周恩來交班。但他不相信周恩來能實現他的遺願。他身體一度好轉過來，更加深了對周的猜忌。

1972 年 5 月 3 日，毛向周提出要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當天，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的這一提議。5 月 6 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經毛同意的《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的通知》。批林整風彙報會於 5 月 21 日到 6 月 23 日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共 312 人。這次會的

<sup>23</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 卷，第 426 頁。

<sup>24</sup>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第 529 頁。北京一些當當事人對李志綏這本書所講的事持懷疑態度，那是指關於毛對國家大事的談論，因為毛談政治時李志綏不在身邊。在談毛的疾病的事，李志綏說的應當可信。

主要內容是揭發批判林彪，按毛的意圖解釋林彪事件，挽回林彪事件的負面影響。為了證明毛對林彪「早有覺察」，會上印發了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的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sup>25</sup>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裏<sup>26</sup>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6月15日離開武林<sup>27</sup>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sup>28</sup>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sup>29</sup>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sup>30</sup>，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的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

---

<sup>25</sup> 魏文伯、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

<sup>26</sup> 指上海。

<sup>27</sup> 即杭州。

<sup>28</sup> 湖南韶山滴水洞。

<sup>29</sup> 指武漢。

<sup>30</sup> 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峢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 20 世紀 60 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多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說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黴了。

中國從 1911 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 20 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們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

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 20 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 90% 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 年 7 月 8 日

周恩來在 1972 年 5 月 21 日的講話中介紹了這封信：「主席寫這封信是 1966 年 7 月 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 7 月 11 日到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麼清楚。」<sup>31</sup>江青在《批林整風華東組和中南組會上的講話》裏也說毛主席對林彪有「英明的預見」。

歷史學家陳小雅對這封信提出了質疑，她認為：毛澤東在 1966 年 7 月 8 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一封信，但這封信不是 1972 年發表

<sup>31</sup>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2.05.21。

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謀，演出一場『三年早知道』」。<sup>32</sup>華裔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孫萬國考證，毛澤東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掩飾他對林彪的誤判誤用，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把後來的反思喬裝為事先的洞察，馬後炮成了先見之明。<sup>33</sup>

不管1972年公開出來的信是否有改動，毛澤東對不是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如此重大的問題，可見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何等信任！家事國事不分是歷代專制者的通例。

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中間，毛單獨找周談話，讓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一發言。這是讓周檢查自己在這六次路線錯誤中的責任。<sup>34</sup>

從1927年以後，中共內部「國際派」（周恩來、王明、李立三等，官史通常只說王明，實際周的作用不小於王明）和「地方派」（以毛為首）在關鍵時刻都有不同的主張。國際派模仿俄國城市革命的道路，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大失敗，中央機關在上海無法生存，只好轉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蘇區。周恩來從上海到中央蘇區，接管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在軍事問題上周恩來繼續遵循國際派的進攻路線，目標從村寨轉向城市，如贛州，結果失敗。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批毛，迫使毛離開軍隊。國際派的作為，使得「白區黨垮了百分之百，蘇區黨垮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長征」（實際是逃亡）。延安整風時對國際派進行了清算，周恩來徹底臣服。在以後的關鍵時刻，毛就用這段歷史來敲打周恩來，成了毛控制周的緊箍咒。現在，毛又念緊箍咒了。

毛又念緊箍咒的目的何在？是讓周檢討後、放下歷史包袱好接班，還是毀周的形象不讓他接班？此時，周的身體狀況比毛好得多。清末，慈禧和光緒搞生命競賽，如果光緒在慈禧死去之後再活幾年，中國有可能實現君主立憲。林彪事件結束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也進行生命競賽。毛行動困難，大部分時間在床上，除了接見外賓，連政治

<sup>32</sup>陳小雅：《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真偽辯》，發了載《重審林彪罪案》，第614-620頁。

<sup>33</sup>2013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孫萬國同本書作者的交談，孫先生的考證特長為史學界稱道。

<sup>34</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第26版，第373頁。



局常委和委員也很少會見，也極少主持會議、約人談話；服藥、吃飯、睡覺、看書、聽讀和圈閱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周恩來比毛澤東小四歲半。無論年齡還是健康狀況，周恩來都佔優勢。剩者為王，周恩來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測風雲。1972年5月12日，在對周恩來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四個紅細胞。5月18日，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意見匯總，對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意見完全一致。治療小組向黨中央寫了一份書面報告，提出應爭取早治療。如果及早治療，有80%—90%的治癒率。<sup>35</sup>

為什麼沒有及時治療呢？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周恩來工作太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還有什麼其它重要原因？張佐良沒有說。

按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的治療方案，必須經毛批准才能實施。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療小組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是怎樣的態度呢？他通過汪東興向治療小組傳達了四點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sup>36</sup>由於誤了最佳治療期，病情發展很快。

身患癌症的周恩來還得奉命檢查歷史錯誤。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他起草《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提綱。他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都穿不上了。<sup>37</sup>6月7日，周將所寫的提綱送毛審閱，並附信說：「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毛圈閱了提綱和附信。6月9日，周修改、補充了這個報告提綱，形成二稿，次日，將此稿送給中央政治局成員閱。

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連續三個晚上周恩來

---

<sup>35</sup>張良佐：《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醫生的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5頁、301頁。

<sup>36</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78頁。《周恩來傳》第2014頁與此不同，而是1972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sup>37</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375頁。

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報告。在講述黨的歷史之後表示：「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是沒有毛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我入黨五十年，沒有離開黨的隊伍。經過長期的複雜而又激烈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考驗，我還在為黨工作，繼續堅持對敵鬥爭；年老了，也還有些革命朝氣。」又說，這幾年我常說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來也並不容易。<sup>38</sup>周恩來還在發言的末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你們瞭解我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讓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sup>39</sup>毛遠新說，這是毛主席讓周講的，周講兩次王明路線他都犯了錯誤。<sup>40</sup>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最後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對1932年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事件」的情況作了詳細說明，還講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專門寫信給毛主席的報告，公佈了毛1968年1月16日為此寫的批示。並在會上宣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sup>41</sup>

為什麼周恩來對自己在路線鬥爭中的錯誤和所謂「伍豪啟事」如此認真？也許是他深知自己所處地位的危險，為了減少毛對他的疑慮，他不得不這樣做；也許是他將登大位前向全黨表明自己的清白。

---

<sup>38</sup> 《周恩來年譜》，下，第528-529頁

<sup>39</sup> 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1972年6月10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376頁。

<sup>40</sup> 閻長貴：《毛遠新談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看法》，五柳村網站，2013年6月9日。

<sup>41</sup> 《周恩來年譜》，下，第531頁。

如果毛在他之前逝世，他必登大位。

### 三、批判周恩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發生朝鮮戰爭，中美兩國一直處於對抗關係。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中蘇關係一直不好。1969年珍寶島軍事衝突以後，中蘇兩國持戈相向。毛澤東力圖走出孤立的狀態。1971年4月7日，毛澤東批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訪問，「乒乓外交」使中美關係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1971年7月9日到11日，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恢復了中斷25年的中美關係。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在1971、1972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這兩年之內有33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和中國的建交國從1965年的47個國家增加到88個國家。

在外交問題上決策權在毛澤東，執行在周恩來。身患癌症的周恩來出色地完成了繁雜的外交事務，應當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卻招來了一場嚴厲的批判。

為什麼要批周恩來？高文謙認為，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毛由此對周不滿意。作為第二把手的周恩來，內政外交都贏得了好的口碑，引起了毛的猜忌。<sup>42</sup>中共十大召開在即，讓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當接班人黨內不服，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呼聲很高。何況1972年2月12日，毛在重病時已向周有了交班的承諾。毛從來不相信周。他擔心，如果周恩來真的接了班，就有可能否定文革。敲打一下周恩來，是為了敲掉他當接班人的勢頭。

1973年6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美，同尼克松簽訂了《美蘇關於防止核戰爭協定》、《美蘇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關於進一

---

<sup>42</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51頁。

步限制進攻性核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等文件。這是當時世界上的大事。駐外大使金伯雄著文說，6月25日，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意見，約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表示：「我們對美蘇簽訂核協定等持懷疑的態度。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在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不喪失立場。」<sup>43</sup>26日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談話記錄後，贊同周恩來的表態，說「這下腰杆硬，布魯斯舒服了。」<sup>43</sup>另有資料稱，外交部起草了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審定。毛審閱時將周恩來修改的地方全部刪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杆不硬，並傳話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sup>44</sup>金伯雄是駐外大使，雖然瞭解外交情況，高文謙以看到的手稿為據，更加可信。

美蘇會談還在進行之際，周恩來就提醒外長姬鵬飛說，美蘇關係問題是個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鵬飛隨即指示美洲大洋司司長林平落實，林平召集主管美國的副處長張再和蘇歐司主管蘇聯的處長田曾佩商討、研究後，由張再寫了一篇調研文章，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上。文章簡要介紹了美蘇會談的情況並分析和評論了美蘇簽訂協議後的國際形勢，認為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sup>45</sup>

周恩來認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這篇文章，有些分析寫得不錯，要外交部參考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關於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內部通報。毛澤東從他在外交部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那裏得知情況以後，嚴厲批評了《新情況》153期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毛的批評以後，要求撤回這一期《新情況》，並檢討：「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sup>46</sup>

7月4日，毛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再次批評《新情況》第153

---

<sup>43</sup>金伯雄：《1973年周恩來為何挨批》，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sup>44</sup>周恩來致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和美女組各同志的信，1973年7月3日，手稿，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52頁。

<sup>45</sup>金伯雄：《1973年周恩來為何挨批》，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sup>46</sup>《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3頁。

期，指出：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太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又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sup>47</sup>「你們年紀還不太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sup>48</sup>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 11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恩來時，說主席談話時說的是「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姬老爺（指姬鵬飛）的賊船」，是指周恩來，因為喬冠華、姬鵬飛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sup>49</sup>在談話記錄稿送審時，毛將喬、姬二人的名字刪去了，表明是指周恩來<sup>50</sup>。

1973 年 7 月 4 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的談話內容。毛如此嚴厲的批評使得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麼事。<sup>51</sup>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7 月 12 日，周約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研究起草批評《新情況》第 153 期的文章。7 月 14 日，周恩來修改外交部起草的題為《[新情況]第 153 號錯誤何在？》的文章。15 日，周將此文送毛審定後傳部分政治局委員核閱。周附信說：「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批示：「檢討不要寫了。」《[新情況]第 153 號錯誤何在？》除發各駐外使館以外，發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sup>52</sup>至此，《新情況》153 號事件總算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3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基辛格第六次訪華，這是他首次以國務卿的身份來的，是帶著「核保護傘」來的。10 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和他的隨員洛德在人大會堂進行了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向周恩來透露了他五六月間訪問蘇聯的情況，蘇

<sup>47</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 604 頁。

<sup>48</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革」十年資料選編》下輯，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 454 頁。

<sup>49</sup>高文謙 1981 年 8 月 26 日訪問喬冠華、章含之的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 年，第 26 版，第 455 頁。

<sup>50</sup>《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2013 年，第 302 頁。

<sup>51</sup>高文謙訪問紀登奎記錄，轉引自文謙《晚年周恩來》，第 456 頁。

<sup>52</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 604 頁。

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對他說：「我們共同的責任就是防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基辛格透露，蘇聯準備摧毀中國的核能力。基辛格表示美國願意向中國提供幫助，保證在蘇聯襲擊前提前報警，減少傷亡。周不相信蘇聯會馬上襲擊中國，但還說：「不管怎樣，還是謝謝你的情報和忠告。」<sup>53</sup>11日下午，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接見基辛格並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不瞭解中國上層內部情況的基辛格稱讚周：「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馬上回答說：「這句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sup>54</sup>

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基辛格說：「我已經公開對你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指蘇聯）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毛澤東說：「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澤東的理解，基辛格這番話的用意是，如果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而不是美國深感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這使毛澤東感到不快。<sup>55</sup>

11月13日晚10時，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再次進行會談。基辛格進一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第一，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以在裝備上及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你們的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以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和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鐘內就可以把消息傳你們。」「另一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簽署協議。」對此，周恩來回答：「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開之前我將去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會談一直持續到14日零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馬上要答復，要報告

<sup>53</sup>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化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180頁。

<sup>54</sup>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33頁。

<sup>55</sup> 金伯雄：《1973年周恩來為何挨批》，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主席，立即向中南主席彙報。<sup>56</sup>據稱，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詢問毛澤東是否已經入睡。對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覺的，說什麼現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來沒有叫醒毛澤東，決定按照毛澤東已經同意過的口徑繼續同基辛格會談。<sup>57</sup>據喬冠華回憶，會談結束時，周恩來當場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明天基辛格登機前答復，然而，周沒有請示毛，在第二天早晨就答復了基氏：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sup>58</sup>

14日早晨7點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最後一次「一對一」的會談。參加者有中方的周恩來和翻譯唐聞生，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對美國協助中國的建議，周恩來只是說：「如果你們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基辛格最後留下兩份協議，一份是建立熱線的，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周恩來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sup>59</sup>

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毛讓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立即整理出周同基辛格會談記錄，並與周核實。11月17日，毛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麼軍事同盟一套。」還說：「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

<sup>56</sup>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182頁。

<sup>57</sup> 金伯雄：《1973年周恩來為何挨批》，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sup>58</sup> 高文謙訪問喬冠華、章含之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61頁。

<sup>59</sup>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183頁，史雲李丹慧稱，1999年初，美國解密了一批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其中包括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

們的職務。」<sup>60</sup>

11月17日，根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毛還讓周恩來自己主持政治局批判會。江青在批判會上指責周恩來「右傾投降主義」、「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周恩來當場拍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了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頭上！」<sup>61</sup>18日，周向毛彙報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sup>62</sup>

周恩來沒有深入檢討，毛澤東隨即下令將原來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從釣魚臺搬到人民大會堂。主持人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會議開始後，江青提議，經毛批准，成立批周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6人組成。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半年前複出的鄧小平；外交部的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足足講了8個小時。會議就根據她們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進行批評。從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續開了十幾天。與會人員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批評周恩來。<sup>63</sup>毛澤東一聲令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全都表態支持毛的意見，對周恩來進行圍攻和斥責。會上，許多批評用語和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江青稱這是第11次路線鬥爭<sup>64</sup>。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sup>65</sup>許世友還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sup>66</sup>周

<sup>60</sup>高文謙訪問喬冠華、章含之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63—46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06頁。

<sup>61</sup>高文謙訪問喬冠華、章含之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65頁。

<sup>62</sup>《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34頁。

<sup>63</sup>金伯雄：《1973年周恩來為何挨批》，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sup>64</sup>中共黨史稱，自中共建立以來，經歷了十次路線鬥爭，這十次鬥爭的對立面依次如下：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濤、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

<sup>65</sup>高文謙訪問喬冠華、章含之談話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66頁。

<sup>66</sup>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2998年，第175頁。



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臉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sup>67</sup>

令人關注的是，毛指名鄧小平參加批周的會。鄧小平雖然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還不是政治局委員。毛想用鄧小平來取代周恩來，但需要考驗。鄧小平在批周會上最後發言，他警告周恩來：「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sup>68</sup>鄧這是警告周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實，周不一定有當第一號人物的願望，但是毛對此放心不下。毛的擔心通過鄧的嘴講出來了。鄧小平話雖不多，分量很重。毛從王、唐二小姐那裏得知鄧小平發言，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時已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要決定委鄧小平以重任。<sup>69</sup>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政治局不議政」，顯然是針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軍委不議軍」，則是沖著「9·13」事件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12月1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介紹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sup>70</sup>肯定了鄧小平，毛又肯定造反派，他說：「現在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你們那個青年時期，二十幾歲，就那麼高明，我就不相信。」他這是支持王洪文等人。<sup>71</sup>

看來，毛澤東對他的身後事作了初步安排，在他和周身體不行以

---

<sup>67</sup>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0-336頁。

<sup>68</sup>高文謙訪問紀登奎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72頁。

<sup>69</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89頁。

<sup>70</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12頁

<sup>71</sup>《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667頁。

後，希望造反派王洪文、老幹部鄧小平共事，一起處理國家大事。

周恩來挨批期間，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像往常一樣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裏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一些人與他劃清界線，原來見了他熱情打招呼的人現在則盡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現冷淡。過去領導開會，領導人的秘書、警衛、醫生等隨員們互相打招呼，開玩笑，拍肩膀，都湊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周挨批期間，連周的隨員也受到冷落。多數領導人的隨員見了周的隨員，即使擦肩而過，也不理睬。只有周的隨員自己聚集在一起，默不作聲地吃完飯就離開。<sup>72</sup>

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還痛苦地流下了眼淚。在此之前，周恩來要求見毛澤東當面檢討，毛說沒有必要，就在會上檢討。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自己動手寫檢討，其它人不得插手。<sup>73</sup>周恩來向王海容、唐聞生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手發抖，想請她們幫助一下，結果被訓斥。周恩來在檢討末尾強調：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工作應當由別人來主持。<sup>74</sup>毛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sup>75</sup>

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周恩來已經威風掃盡，毛開始轉彎。12月9日，毛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後，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和王海容、唐聞生談了話。毛對他們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 11 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sup>76</sup>他對周恩來說：「總理呀，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

<sup>72</sup>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2頁。

<sup>73</sup>高文謙訪問喬冠華、章含之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74頁。

<sup>74</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475頁。

<sup>75</sup>同上。

<sup>76</sup>唐聞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給華國鋒寫的材料，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提供。

言堂]。」毛還指著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還說：「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整周，卻說是「幾個娘們」。王海容、唐聞生只能在背後發牢騷：「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77

## 四、毛澤東起用鄧小平

毛澤東和周恩來共事一生，鬥爭不止。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從來沒有相信過周恩來，卻相信鄧小平。他為什麼相信鄧小平呢？這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要堅決攻打大城市，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指導思想，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剝奪了軍權。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以後，繼續反對毛澤東的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主張。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會昌中心縣委卻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當時在中央蘇區的毛澤覃（毛澤東的弟弟）、謝唯俊、古柏，也和鄧小平一樣，反對左傾冒險的中央蘇區的領導。於是，中央蘇區的領導人就組織了對鄧、毛、謝、古的鬥爭。1933年3月5日，在臨時中央和中央派員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過了對鄧、毛、謝、古的決議，給他們以組織處分。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說：「在40年後，這個三十年代發生的事件，卻成為決定父親政治生命的相當重要因素，而且是積極的因素。」<sup>78</sup>，鄧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為他們執行了毛澤東的主張，所以這件事毛澤東記了一生。這四人中三人已經不在世，只剩下了鄧小平。

1949年以後，鄧小平繼續堅持執行毛澤東的政策和路線。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鄧小平是堅決的執行者；1958年大躍進，周恩來因反對「冒進」，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差一點辭職，鄧小平主持的書記

<sup>77</sup>《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2013，第307頁。

<sup>78</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1993年版，第318頁。



毛澤東起用鄧小平

處代替了國務院的職能，堅定執行毛澤東的政策；1963年以後，批評修正主義，和蘇聯開展鬥爭，鄧小平又站在第一線，堅定支持毛澤東的路線。

1965年秋，周恩來告訴王稼祥，毛主席委託他打招呼：「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sup>79</sup>

文革初期，鄧小平和劉少奇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違背了毛的意志，被說成「劉鄧司令部」，但毛一直將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開來。1967年5月，毛澤東剛從外地回北京，讓汪東興來看鄧小平。毛澤東讓汪東興轉達三點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毛澤東寫信。不久，毛還見了鄧小平一次。」

80

鄧小平也知道毛對他抱有希望，一次又一次地深刻檢討，一次又一次地保證「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中說：「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

1968年7月5日，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寫道：「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

<sup>79</sup>朱仲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第224頁。

<sup>80</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44-45頁。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67年7月14日以前，毛澤東沒有離開北京，可能是毛毛把時間搞錯了。

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佈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和卓琳夫婦被通知去工廠參加一個會議。他們回來後十分興奮。卓琳把女兒拉到廚房，悄悄地在女兒的手心上寫了4個字：「林彪死了」。原來他們聽了「9·13」事件的傳達。這天晚上，鄧小平全家高興地坐在一起打撲克，一直玩到深夜。

鄧小平看到了中國政治將要出現轉機。1971年11月8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除了對毛表示忠誠以外，要求給他安排工作，沒有得到毛的表態。

1972年8月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他在信中說林彪歷史上犯了兩次錯誤，「一次是在長征中，他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完全知道，象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

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 68 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

8 月 1 4 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封信作了批示：

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的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

（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講一遍。

毛澤東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sup>81</sup>

毛澤東的批示，解除了對鄧小平的禁錮。經有關部門的妥善安排，他帶著全家老小到井崗山和贛南舊地重遊，一路上受到了黨政軍要員的熱情接待。1973 年 2 月 22 日，鄧小平一家從江西回到北京。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 年 4 月 1 2 日，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盛大宴會，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中公開發光。有了毛澤東的信任，鄧小平一路高升。毛讓鄧複出的本意是讓鄧替代周。和當時中央的幾個人相比較，鄧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卻阻撓。

鄧小平多次承諾「永不翻案」，上臺以後就徹底翻案，中國人他這種作為對多有微詞。我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承諾對他的複出十分重要。」<sup>82</sup>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李湘魯，用

<sup>81</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 308 頁。

<sup>82</sup>楊繼繩：《鄧小平時代》第二章，1998 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時刪掉了這一段話。我的朋友李羅力《沉重的輝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 頁從我的原稿中引用了這段話。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為鄧小平辯解。韋伯說，政治家有兩種倫理，一種叫信念倫理，一種叫責任倫理。責任倫理同意你說「永不翻案」轉臉就翻案，因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責任」；信念倫理就是要堅守底線，堅持自己的信念。鄧小平選擇了責任倫理；趙紫陽選擇了信念倫理。<sup>83</sup>我的這段話是1995年寫的，現在看來對鄧評價高了一些，但和李湘魯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鄧小平參加了葉劍英為首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這個小組的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兩天以後又增加了蘇振華。

84

1974年3月，聯合國第6次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出席這個會議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主管外交的周恩來參加是順理成章的，據說，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聯合國，他曾不止一次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sup>85</sup>3月25日，毛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江青卻出面阻撓。27日，毛批示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sup>86</sup>

1974年10月4日，正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身在武漢的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用電話向王洪文傳達，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sup>87</sup>毛這一提議引發了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江青不答應，企圖阻撓鄧小平進入權力中樞。

在專制制度下，如何確定最高領導者的繼承人，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在中國古代，從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秦王朝開始，歷數千年，為爭奪繼承人的位置，流血衝突不斷發生。始皇崩，其小兒胡亥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蘇自盡。他登基以後，為了消滅政敵，一次就殺了12個哥哥，10個姐妹也被車裂。到最後一個王朝清，兄弟之間的爭奪和殘殺，母子間的明爭暗鬥，也是代代不絕。

---

<sup>83</sup>李湘魯：《微斯人，吾誰與歸？——追憶紫陽》，趙紫陽一直不作檢查，不承認錯誤。

<sup>84</sup>《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44頁。

<sup>85</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07頁。

<sup>86</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23頁。

<sup>87</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49頁。



為了防止因繼承人的爭奪造成動亂，專制王朝時代採取了長子繼承的方式。這種辦法排除了擇優而用的原則，用天然的、無可爭議的標準來防止爭端，甚至連最小範圍內（幾個親兄弟之間）的擇優也不允許。這個辦法也沒有避免悲劇的不斷發生。

在缺乏繼承人民主選拔機制這一點上，毛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歷代王朝有著相似之處：最高領導者一人具有絕對的決定權。這樣，在他生前，獻媚和陰謀環繞；在他身後，對立和爭奪不停。劉少奇的接班人被廢以後，林彪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九大」以後，毛對林彪不滿意，加上林彪身體不好，毛澤東曾在林彪面前推出張春橋，從而引發廬山會議上軍人倒張的政治風波。林彪死後，順理成章應是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對周不放心，曾想讓王洪文接班，張春橋輔佐，但這兩個人黨內高層很難接受，於是選定鄧小平。

毛的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離「見馬克思」的時間越來越近了，誰接他的班，成了毛最為緊迫的問題。毛雖然在選擇接班人這件事上有絕對的決定權，但他必須考慮到他選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後能不能站得住。張春橋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思想，對文革最堅定，廬山會議上的風波已經表明張春橋很難被軍政官僚們接受，毛只能安排他當副手。江青雖然在同劉、林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住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選擇了 38 歲的王洪文。王洪文當過農民，當過兵，當過工人，又是文革的堅定支持者。毛對他寄以希望，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sup>88</sup>，希望他有自知之明，要好學上進。從 1973 年 9 月 12 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開始，在會見外賓時，都是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坐在毛的兩側作陪，一直到 1974 年 5 月底，報刊上發出他們三人會見外賓的照片共 16 次。外國記者認為，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sup>89</sup>在不到兩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現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層軍政要員不願意接納王洪文，說他是「兒童團」。老幹部極力讓鄧小平進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

---

<sup>88</sup>劉盆子是漢朝劉氏宗室。西漢末年，劉氏破敗，劉盆子成了放牛娃。農民起義軍為了號召群眾，就讓 15 歲的劉盆子當傀儡皇帝，但劉盆子經常和放牛娃一起嘻戲，不好學上進，最終身敗。

<sup>89</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 291-292 頁。

第一副總理，符合才能幹部們的要求，也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人選作的安排，那時周恩來身患癌症已經兩年多了。

「十大」之後，葉劍英向毛提議，讓鄧小平兼任軍隊工作，並進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sup>90</sup>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同志任職的通知》（中發〔1975〕1號）：毛主席、黨中央決定：（一）任命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二）任命張春橋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小平在治黨、治政、治軍方面「人才難得」，也容易被上層軍政要員接受。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幾個人集體接班，分工協作，是當時的方案。周恩來住院以後，毛安排王洪文負責黨務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和外事，張春橋負責意識形態並在軍隊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鄧、張三人核心，王、張二人堅持文革路線，鄧小平主持實務，這大概是毛的願望。但是，王、張二人遠不是鄧的對手。本來鄧是排在王後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王就被派到上海「蹲點」，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和張春橋勢同水火，無法合作，毛不得不選華國鋒，希望張春橋安心當副手<sup>91</sup>。最終還是在軍政官僚集團中有深厚基礎的鄧小平取勝，但老資格的陳雲不服鄧，鄧又年紀太大，他只好放棄當一把手的名義，掌握一把手的權力。這是後話。

## 五、第十次黨代會和軍區司令互調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大之前，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從5月20日到31日。會議的第一個議程就是為十大作準備。這個會議規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額和代表中工、農、解放軍、其他勞動者、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的比例。5月26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

<sup>90</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2000年版，第284頁。

<sup>91</sup>毛遠新同閻長貴的談話，見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炎黃春秋》2012年11月。

毛澤東 5 月 25 日的講話。新華社傳達時我記了一些，我這裏將《毛澤東年譜》裏沒有的內容作上介紹：毛說：「即使路線對了，多數人不同意，你還得服從。」「要堅持原則，但事物不可能是純的。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人是有缺點的。」林彪事件以後，毛向官僚派妥協，大概是出於這一思想。毛說：「如果自己正確，被人家搞下來，你就安心讀書。」周恩來傳達這句話後說：「主席幾上幾下，從不介意，十分感人。」毛說：「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幫助青年。」這是針對老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毛還說：「只注意生產，不注意路線不對，要注意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中的問題。」「你滿腦子生產，我滿腦子路線，生產固然重要。」這是對華國鋒說的，毛要求華國鋒「要學一點歷史。」「普通黨員也要注意路線。」

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 1249 人，代表全國 2800 萬黨員。軍隊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 28% 降到 16%；幹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 12% 上升到 19%。這是林彪事件後的形勢所決定的。會議議程有三項：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宣讀的政治報告是由張春橋主持起草的。

十大是由於林彪事件而提前召開的。為了準備十大召開，中央專案組於 7 月 10 日將《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報送中共中央。十大召開前對林彪集團成員作了處理決定。8 月 20 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決議，批准中央專案組將林彪永遠開除黨籍，陳、黃、吳、葉、李、邱和李雪鋒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建議。

和九大一樣，十大也是秘密召開的。十大預備會是各省市分別開的。天津代表團團長解學恭說，我們一到北京，總理就要求保密，說這是主席的指示，一句話，一片紙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說：蘇聯派了很多特務，大使館五六十輛汽車到處轉，又騎自行車轉，還偷走了兩個郵箱，也沒有搞到我們的情況。預備會從 8 月 13 日開始，開了 10 天。預備會上討論了文件，把提出的修改意見報送中央。主席指示：會議要短，文件要短，講話要短。成立了由 104 人組成選舉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副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 7 人。主席團的任務是協商十大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成員名單，協商提名十屆中委名單，協商中委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和

政治局常委名單。是協商，不是選舉，這便於毛澤東掌握局面。

周恩來作的政治報告中全面肯定了九大，他說：「黨的九大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舉行的。」「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對於林彪事件，周恩來報告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九大以後取得的最大的勝利，是對國內外敵人沉重的打擊。」「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九大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九大路線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對於林彪集團，報告為毛澤東「用人不察」辯解：「他有一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報告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垮臺，並不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政治報告關於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抓好在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

談到國際形勢，報告說：「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並且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列寧逝世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

這次大會修改黨章。修改重點是總綱部分。毛事先多次指示<sup>92</sup>：1，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不贊成「三個里程碑」<sup>93</sup>的說法；3，黨章不要寫人名。王洪文宣讀的修改黨章報告說：「四

<sup>92</sup>引自 1973 年 6 月 7 日，新華社天津分社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本書作者筆記本。

<sup>93</sup>這是 1964 年艾思奇等左派學者提出的看法，毛並沒有反對，後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馬克主義的三個里程碑：第一個是馬克思恩格斯，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第

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一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一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爭經驗的內容，這也是各地送來的修改稿的共同特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黨運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這次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重大意義，並且明確寫上了：『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從兩個報告可以看出，十大肯定九大路線，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肯定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估計。十大沒有什麼創新，是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線，完全是九大的延續。

8月28日，選出了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李葆華、廖承志等一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成了十屆中央委員。8月30日，十屆一次中央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共9人，除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外，還有朱德、張春橋、董必武。政治局委員21人，除了常委以外，還有江青、許世友、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等。

吳德回憶說：「毛主席的確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

---

二個是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馬克思主義；第三個是毛澤東，即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後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

元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開的黨十大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裏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

94

官方文革史認為，十大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sup>95</sup>按這個說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幫」，而「林彪集團」也只存在於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續了十年。那麼，官史這一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sup>96</sup>（這裏說的「反革命集團」就是指「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就不完符合實際。

林彪事件以後，從林彪住處查出一些資料，其中有一些軍隊領導人給林彪的信。如許世友、楊德志、韓先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給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處。又發現十大剛當上黨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給林彪寫過信。還有在1967年衝擊軍隊時，有些軍區領導人寫信給林彪，發洩對中央文革的不滿情緒。毛澤東對手握重兵的軍區司令們是否忠誠深懷憂慮。解除他們對當地軍隊的控制權是最安全的辦法。「兵無常帥，帥無常兵」是中國古代防止藩鎮割據的老辦法，毛澤東對此是爛熟於心的。他決定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宣佈了這個決定。他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sup>97</sup>毛澤東建議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說：

---

<sup>94</sup>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記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頁。

<sup>95</sup>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sup>96</sup>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sup>97</sup> 《毛澤東傳 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664-1665頁。

「步調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於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便一起唱了起來。

在這次會上，毛對八大軍區司令員作了如下調動：

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到瀋陽後不久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陳錫聯，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不久又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皮定鈞到福州軍區任職後，於1976年7月7日，在視察福建沿海線時，因飛機失事而死。

沒調動的軍區司令員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





## 第二章

# 「批林批孔」中的鬥爭



「批林批孔」一副漫畫

文革敗勢已定，毛澤東不甘心，在他的生命最後時期，盡力向否定文革的力量作鬥爭。他努力向他的子民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希望後人按照這個「理論」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文革。

周恩來批左、批無政府主義的主張，被毛澤東否定。但周的主張在幹部和群眾中還有廣泛的支持者。毛善於借題發揮，在政治鬥爭中用曲筆。批林批孔，表面上是歷史、文化之爭，實際上是否定文革和保衛文革的一場搏鬥。不過，保衛文革的忠實而堅定的執行者，只剩下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各地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了。

## 一、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

林彪事件以後，厭倦政治鬥爭的人越來越多，恢復秩序是多數人的期盼。但是，由於毛澤東排斥現代政治文明，文革只有「砸爛」，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後期所恢復的秩序還是文革前的秩序，所恢復的制度還是文革前的制度。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稱這種現象為「回潮」、「復舊」，甚到稱為「復辟」。他們說的「回潮」、「復舊」，是指以下情況：

一，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恢復了職務，雖然「5·16」通知和「十六條」將「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作文革的重點，卻沒有一名領導幹部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複職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明確的政策界線，打倒他們也不是按法律程序。他們文革前即使有錯誤，有特權，是當時的制度造成的，把他們全部打倒，對他們進行人身摧殘是不應該的。被打倒的官員中，不能說沒有一個是罪有應得的，但在「落實幹部政策」的風潮中，全都一風吹了。官員們經過群眾的摧殘，心中難免有怨氣。一旦恢復職務，不僅對造反派實施報復，其中有的人私下大膽地發表否定文革言論。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文批評文革的言論，被人整理出《高揚文反革命言論》，因此，1973年12月將他從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在一家招待所裏。但他的言論得到

很多老幹部的共鳴。王震說：「高揚文的這些話我也說過。」周恩來接口說道：「是的，你說的比這些還多。」由於王震等老幹部的多方保護，高揚文的問題逐漸降溫。周恩來、鄧小平也保護高揚文，毛澤東只好批示：高揚文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王震是八屆中央委員。在九屆中央委員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繼續連任的只有18.9%。王震幸列其中，可見他開始並不反對文革，後來才對文革持否定態度。

二，自「大聯合」「三結合」以來，各地都對造反派進行了多次清洗和鎮壓。進入「三結合」領導機構的群眾代表（多數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也以種種名義被清除出去，「三結合」中只剩領導幹部和軍代表，林彪事件以後，就剩下文革前的領導幹部了。就是上海這樣由文革派起主導作用的地方，到1972年，工業、財貿所屬單位領導班子裏的「群眾代表」近一半被清洗出局<sup>1</sup>。其它地方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造反派是毛製造「天下大亂」的工具，是打倒劉少奇的「石頭」。1968年以後要實現「天下大治」，這些「石頭」必然被拋棄，已經恢復了職務的官員難免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被「造反有理」武裝頭腦的造反派們，豈能甘心？

三，在利益分配方面，官民差別明顯拉大，這主要表現在對子女的安排上。子女的安排是每個家庭最大的利益。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這是結束紅衛兵運動運動最有力的措施，也減輕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這些下鄉青年在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掙的「工分」<sup>2</sup>還不能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他們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女青年被強姦的事件多有發生。據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資料，姦污女知識青年案件兩萬多起，大部分是黨員幹部作惡。一些地方捆綁吊打知識青

---

<sup>1</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牛津大學出版，香港，2015年，第1313-1315頁。

<sup>2</sup>「工分」是農村按勞付酬的方式，農民每天勞動都記「工分」（如壯勞動力一天10分，婦女每天6分），到秋後結算，按總工分多少分配勞動成果。

年、姦污猥褻女知識青年的情況令人觸目驚心<sup>3</sup>。千萬個父母都為遠在邊遠山村的孩子日夜憂愁。而少數有權勢的家庭卻將孩子送到部隊參軍，不僅逃避了上山下鄉的苦難，從經濟上、政治上、前程上軍人都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韓先楚任司令的福州軍區，就安排了二百多個高級幹部子女。高級將領這樣做，有權力的人紛紛仿效。進入 70 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病退、頂職等名義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麼時候回城，與父輩的權勢相關：父親官大，回城就早，父親官小，回城就晚；父親還沒有「解放」的，子女就很難回城。父親一恢復職務，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兒女從苦海中撈了回去。當時下鄉知青中有「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無權兒無望」的說法。平民子弟只能在農村苦熬了。

1970 年，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這樣招收的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從這一年開始，各大學就接收軍隊和地方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能被推薦上大學的除了少數確實表現突出的以外，相當多的是利用父輩的權勢。父輩官大的可以上名牌大學，父輩官小的可以上一般大學。無權無勢的，很難被推薦上大學。1973 年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供的材料說：「走後門問題，相當嚴重，相當普遍。高中級幹部利用職權走後門更多。上行下效：招一次工，招一次生，都是各種政治勢力的爭奪戰。『官大憑官氣，官小憑關係，無官憑力氣。』『農民學大寨，幹部忙後代。』『毛主席健在，他們就這樣明目張膽地謀私，毛主席百年之後，他們不搞修正主義才怪呢！』」南京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鐘志民，是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鐘學林的兒子。他是靠父親的關係上大學的。1972 年 4 月，鐘志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時發現，班上 30 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鐘志民覺得自己「走後門」上大學不光彩，就給學校裏打了報告，要求回到下鄉插隊的江西。他真的退學下鄉

---

<sup>3</sup>新華社記者調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八團摧殘迫害知識青年的情況》，新華社 7 月 4 日編的《國內動態清樣》（第 241 號）。

了。這個事情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民日報》作了突出的報道。

林彪事件後，撤銷了軍委辦事組，由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來承擔其職責。為了穩定軍隊，為了得到軍人的支持，毛澤東不想得罪葉劍英這些軍頭，他對「走後門」採取了寬容、妥協的態度。在1974年1月25日發動批林批孔的大會上，遲群、謝靜宜在講話中批評了走後門，還說「走後門」「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江青等對葉劍英「走後門」一事窮追不捨，逼葉寫檢查，葉劍英鄭重其事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檢討，實際是告了江青一狀。2月6日，周恩來乘機向毛進言：「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對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sup>4</sup>2月25日，毛致信葉劍英，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走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sup>5</sup>毛一直以底層民意代表自居，在官僚特權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這件事上，他卻站在特權一邊。這是為了維持權力平衡。

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恢復職務以後，除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謀利益以外，在住房、汽車等方面也開始恢復原來的特權。當時商品供應緊張，自行車、手錶等都要憑票證購買。在稀缺商品的購買方面，特權也大行其道。實際上，當時特權所得到的利益和改革開放以後特權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特權不在於特權者得到利益的多少，而在於和周圍人們的差別。很多人是懷著反特權的目的參加文革的。在文革中，群眾對特權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毛澤東對此也很警覺。

到1974年，在毛澤東之下有兩股政治力量在較量：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要恢復秩序，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堅持「繼續革命」。雖然後一種力量更體現毛的意願，但毛更需要恢復秩序。「繼續革命」的支持者越來越少了。此時的周恩來成了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

<sup>4</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49頁。

<sup>5</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77頁。

物，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的權力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劉少奇，更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林彪。他事必恭親，全面處理一切國家大事。一大批恢復職務的幹部支持周恩來，已經厭倦文革、要求恢復秩序的民眾也支持周恩來。如果毛一旦去世，周恩來就會接班。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決定了毛身後中國的走向。毛清楚地知道，周雖然支持他搞文革，但很多重大問題上和他的看法不一致。毛採取了對周一邊使用、一邊敲打的方針。使用，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離開周是不行的。敲打，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周接受毛的思想路線，如果周接班，不至於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壓制周的力量，使得力量對比中，文革派比周恩來那一派強大。

毛澤東既是文革的發動者，希望通過發動文革來改造「舊政府」；他又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必須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不能像造反派群眾那樣不顧一切地「砸爛」，也不能像周恩來那樣千方百計地維護。這樣的雙重角色使他不得不在「舊政府」與「新文革」之間搞平衡：當文革派的極端行為使國家機器無法運轉時，他就壓制一下文革派；當「舊政府」的官僚們要否定文革時，毛就支持文革派。<sup>6</sup>林彪事件以後，毛的這種態度更加明顯。

到 1974 年，毛澤東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不願意在他生命的終點再出現天下大亂。他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復社會秩序。他左敲右打，駕馭兩股力量，企圖維持權力平衡。但這種平衡的維持是不容易的。當他敲打周恩來時，文革派就利用這個機會把火燒得過旺，恨不得立即將周打倒。這樣，毛又不得不敲打一下江青，抑制他們的過火行為。周恩來這股力量也利用毛敲打江青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意圖。毛澤東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實現他心中的文革目標。他從長計議，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傳下去。只要留下「火種」，不愁日後不再燃燒起來。批林批孔與其說是一場政治運動，不如說是一場宣傳運動，是對毛澤東最後意願的宣傳運動。宣傳運動是對群眾而言，上層是你死我活的搏鬥。

---

<sup>6</sup>王思睿也有這種看法，見《試析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1 年第 2 期。

## 二、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

批林批孔從 1974 年初開始，沒有宣佈結束。有學者說半年左右，實際上，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中發 [1974] 26 號）中，還強調「要繼續把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1975 年 1 月 13 日，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與毛澤東那種恃強鬥狠的草莽英雄不同，周恩來給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他隱忍克己，常常顯示出儒家的風度。毛的鬥爭哲學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是反儒的。事有湊巧，在清理林彪住處毛家灣時，抄出了林彪讓人摘錄的孔子、孟子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條幅，如寫過多次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有人認為，「克己復禮」是孔子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把「克己復禮」作為萬事中最最大的事，說明他也想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常以秦始皇自比，而林彪多次批評秦始皇，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攻擊「當代秦始皇」。這可能是激發他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聯繫起來的一個原因。

1973 年春天，毛澤東寫了一首打油詩：「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詩是批評郭沫若早年的《十批判書》。這首詩是 1974 年 1 月 27 日江青在新華社學習班的講話中說出來的。但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後來說，他曾拿這首詩問毛，毛說這首詩不是他寫的。<sup>7</sup>江青不會在大庭廣眾中編造，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不想承認。

毛在 1973 年 7 月 4 日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中，批評周恩來的外交思想之外，還談了批孔。<sup>8</sup>他說：

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什麼郭老<sup>9</sup>、范老、任繼愈、楊柳橋之類的爭論。……郭老不僅是尊

<sup>7</sup> 《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第 232 頁。

<sup>8</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67》6 卷，第 485 頁。

<sup>9</sup> 郭老是郭沫若；范老是範文瀾，他用馬克思主義重編中國通史；任繼愈，研究中國思想史

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他亂得很。早幾十年中國的國文教科書，就說秦始皇不錯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講秦始皇，開頭一大段也是講他了不起。「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一大篇。只是屁股後頭搞了兩句，「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說他還是死了。……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又和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鬥爭的情況<sup>10</sup>，指出：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主張按法家的辦法治國，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念了一首詩，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江青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彙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的資料。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澤東，附上這個資料，建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以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經毛同意，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並發出了《通知》。《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7日，姚文元轉述毛主席歷次對批孔的指示：1966年12月，毛主席同波蘭共產黨的同志談話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的專家：楊柳橋，天津的一位研究春秋思想史的學者，右派分子。和本書作者有交往。

<sup>10</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67》6卷，第490頁。



命重要任務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主席針對林彪所說「孟子的王道還好一點吧」的謬論，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麼喜歡孔夫子，我贊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隸制舊貴族，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說法，要給韓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給法家應有的歷史地位。人定勝天是荀子第一個提出來的。」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談到：「我們過去叫CHIN（秦），加上一個A，變為CHINA（中國）。秦始皇在中國是有名的，就是第一個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史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文字，修築了廣闊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sup>11</sup>

1974年1月24日，召開了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幹部會議，動員批林批孔運動。1月25日，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兩次大會，毛把江青推向前臺。1月25日大會由周恩來主持。江青、謝靜宜、遲群一一發表講話，進行批林批孔動員。在北京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大會。周恩來先讓王洪文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然後以退為守發表講話，說這個會「開晚了」，「抓晚了」，他把江青推到第一線，詳細介紹了江青給20軍防化連等單位寫信發動批林批孔的情況，帶頭喊「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在此期間，江青到處寫信，送材料，鼓動批林批孔。如給國務院文化組、外交部、中央聯絡部、中國科學院、四機部十院、河南「廣濶天地大有作為公社」、20軍防化連，空軍司令馬甯、海軍政委蘇振華等。中共中央還派還派一批記者到各大軍區和中央部委「蹲點」及時反映運動情況。我所在的新華社天津分社的孟子軍被派到濟南軍區，虞錫圭被派到北京軍區。他們穿上軍裝，列席軍區黨委常委會。他們不到，常委會不開。

批林批孔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宣講「儒法鬥爭史」。一些學者，

---

11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毛澤東年譜1949-1967》6卷，第500頁刪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這句話。

把中國思想史簡單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貫穿兩千年，一直影響到現在。儒法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內容，但總是革新與保守、前進與倒退兩條路線的鬥爭。」講儒法鬥爭史的人認為，孔子是「權勢者的聖人」，「『王道』和『仁政』是騙人的東西」，「孔子的『仁義道德』是殺人的『軟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認為儒家是「搞復辟倒退的」，是「拉歷史後腿的」。法家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歷史上有作為的都是法家。對儒家和法家的評價本來是一個古老的學術問題，毛澤東要「古為今用」，用於支持文革這個「新生事物」，反對否定文革的「復辟倒退」；反對「虛偽的仁政」，為他的暴力執政辯護。

多年崇法反孔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一下子紅了起來。經毛澤東推薦，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9月，中共廣東省委請他作「批孔」報告，有7萬多人聽講。此後，多家報紙連續發表了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全國各地都請他作報告。江青是崇法批儒的積極分子。1974年6月19日，她在天津幹部俱樂部禮堂為天津市的黨政軍幹部講儒法鬥爭史。她引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顯然是下了一番功夫。我當時也在會場聽講。看到她喝著玻璃瓶裝嶗山礦泉，不時地請教坐在主席臺上的學者。那時只有少數特權人物才能喝上礦泉水。隨同江青這次到天津有紀登奎等領導人。除了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以外，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35人組成的「理論班子」。其中有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馮友蘭在天津寫了18首詩，7月初回北京又寫了7首，合為25首。這些詩基本都是崇法批儒的。其中一首是：破碎山河複一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sup>12</sup>有人認為，馮的這首詩迎合了江青想當武則天的意圖。6月27日下午1時，江青乘專列火車到駐楊村的66軍198師。在與官兵的「同樂會」上，江青即席朗誦了一首順口溜：「六十六軍戰鬥隊，能文能武啥都會，能文超過漢隋陸，善武灌周嚇得退。」<sup>13</sup>她仿照毛澤東的字體，用鉛筆書寫，留給部隊。她

<sup>12</sup>馮友蘭：《詠史二十五首（並序）》1974年9月1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

<sup>13</sup>隋、陸、灌、周，即漢代名臣隋何、陸賈、灌嬰、周勃（絳侯），《晉書·劉元海傳》：「常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

在天津寫的一些字，高層人士視為墨寶加以收藏。我從新華社天津分社社長朱波那裏看到江青的「墨寶」，字體流暢，仿毛體幾乎可亂真。

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學者一下子忙了起來。出版社讓他們譯注了大量的法家著作，作為批林批孔的政治學習資料。各地請他們作儒法鬥爭史的報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下組織了幾個寫作班子，專門寫影射史學文章。

一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筆名「梁效」（「兩校」的諧音）。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筆名「羅思鼎」（「螺絲釘」的諧音，雷鋒的名言「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除了常用羅思鼎筆名外，還用石俞、康立、翟青、齊永紅、石一歌、史鋒、靳戈、方岩梁等筆名。三是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筆名「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四是文化部寫作組，筆名「初瀾」，取義於「青出於藍」，「青」即江青，「藍」乃藍蘋，「初瀾」及「出藍」之諧音。在一段時間內，這四個寫作組的長篇大論充斥報刊，其中「梁效」網羅了一些知名學者，如馮友蘭、週一良等，他們的文章對輿論影響最大，當時有「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之說。據統計，到1976年10月，「梁效」發表文章181篇，其中有的文章影射周恩來。<sup>14</sup>

對普通百姓來說，批林批孔運動只是一場看書學習的運動。大家讀了不少儒法鬥爭的歷史，有些人還奉命寫了一些牽強附合的批孔大字報。很多單位成立了「理論小組」，專門從事批判。雲南省騰沖縣這樣邊遠的地方，也成立了2472個「批林批孔理論小組、2111個貧下中農理論小組」<sup>15</sup>。這是應付上級的數字，顯然有誇張的成份。

在寫作班子大造輿論的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發動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起來保衛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讀書班上作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的報告。各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聽了這個報告。王洪文這個報告聯繫了現實，重新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意義」，重申了文革初期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近幾年被淡化

<sup>14</sup> 史雲李丹慧：《給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345頁

<sup>15</sup> 《騰沖縣誌》，中華書局出版，1993年，「大事記」。

了。他批評說：「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有的說，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也不要再搞了。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說法是各式各樣。」「江西省就有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位，小兵回營』；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說過，你們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嚴厲的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線，小兵提升』。」王洪文批評有些幹部「對群眾的衝擊，總是耿耿于懷，解放了，上臺了，一有機會就想整群眾」。「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鬥，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我們要向這樣的同志大喝一聲，太危險了，人民群眾欠了你什麼賬呢？」他批評一些地方整造反派：「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為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他說：「毛主席最近指示：『牛為什麼要長兩支角？就是要鬥爭』……我們就是要頭上長角、有兩支角。」他指出，「（十屆）二中全會以來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他們轉移批林鬥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造資產階級的反有什麼不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

批林批孔運動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16分子」的造反派頭頭們帶來了希望，也給被擠出了「三結合」的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帶來了希望，他們積極投入了這兩場新的運動，在各地掀起了一個一個的政治浪花。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又一次當了毛的「石頭」，在一場運動中的作為，為他們增加了新的罪名。

### 三、批林批孔中的鬧劇

在批林批也中發生了幾件事情，江青等用來大造輿論，最終成了鬧劇。

#### 馬振扶事件

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中學英語考試，學生張玉勤考得很差，還在考卷寫了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張的班主任譏諷她是「偉大詩人張玉勤」，要她作檢查。學校領導在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討論。張玉勤覺得受侮而自殺。1974年1月，江青在一個內部刊物上發現了這件事，說張玉勤之死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迫害的結果，把馬振扶事件當作「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不僅班主任和校長被判刑兩年，還借這個事件在全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

#### 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國》事件

1972年，意大利左派電影藝術家安東尼奧尼應邀到中國拍攝記錄片《中國》。1973年12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聯絡部有人給江青、姚文元寫信，說《中國》是「極端惡毒攻擊中國的反動影片」說：「攝影組是外交部和廣播局合簽批准來中國的。」說華裔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寫信，說影片很壞。」實際上，這是一部客觀反映中國狀況的電影，有的鏡頭反映了中國落後情況，不能說是反動電影。江青等大造輿論，發表批判文章。江青說：「中國人裏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江青暗指周恩來。外交部一些官員受到牽連。

#### 批判晉劇《三上桃峰》

1974年1月，在華北文藝調演中，演出了晉劇《三上桃峰》。這部劇的前身是《三下桃園》，是根據河北省撫甯縣劉義莊生產隊和大劉莊生產隊出賣病馬又贖回來病馬的故事創作的。《人民日報》曾對

此事作過報道，肯定這兩個生產隊的共產主義風格。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就在這個縣桃園大隊搞「四清」，傳言說她送給隊裏一匹紅馬（實無此事）。江青等人抓住「桃園」二字，說這部戲是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長（即劇作者之一）被撤職。

### 批判「黑畫」展

周恩來讓有關部門組織李可染、黃胄、李苦禪等名畫家創作了一批國畫，用來裝飾賓館。這些國畫掛在北京一些賓館，江青等說這些畫是「黑畫」，組織人批判。

此外，還批判了湘劇《園丁之歌》，說這部劇「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批判了「無標題音樂」等。

### 張鐵生白卷事件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的批示中說：「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所以，很多人響應號召，爭當「反潮流戰士」。敢於冒尖的人就成了「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就是其中之一。

1973年，在遼寧省興城縣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只能答3道小題，其餘都不會。他在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復習。」「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這封信中還流露出要求考官照顧的情緒。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編者按說：「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

張鐵生的信，又另加編者按語說：「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全國各地多家報刊轉載，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反潮流英雄」，還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當上了全國四屆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在江青、毛遠新等人的鼓勵下，張鐵生到處發表演講，成了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積極分子。後來，「四人幫」接受審判時，張鐵生在遼寧被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 小學生日記事件

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的內部刊物上刊登了12歲小學生黃帥批判「師道尊嚴」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信和日記反映了小學生和班主任之間的矛盾，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語言批評了班主任。根據姚文元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全文轉載了信和日記摘抄，編者按讚揚黃帥是「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閹將」。黃帥紅極一時，班主任受到衝擊。不少人懷疑這個「典型」的真實性，也不同意她的一些看法。1974年1月1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處的邢卓、王文堯、恩亞立三人以「王亞卓」的署名給黃帥寫了一封信，批評黃帥。不久，《人民日報》在「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黃帥致王亞卓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說：「在革命滾滾向前的洪流中，資產階級老爺們發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滅亡的命運。」「你的話同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多麼相似！」這封公開信顯然有人背後捉刀。內蒙的這三位青年被打成「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多次批判，送到艱苦的地方勞動。

江青等還「扶持新生事物」，她三次到天津小靳莊，扶持這裏的「十件新事」，大多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寫打油詩、唱歌之類。黨報黨刊為此喧鬧一時。《天津日報》統計，從1974年6月25日到1976年底，共發表宣傳小靳莊的稿件466篇。從1974年8月21日至11月7日，有27個省市自治區512個單位18,000餘人到小靳莊參觀。

## 四、李慶霖事件

如果說以上事件帶有鬧劇意味的話，那麼，李慶霖事件卻令人深思和苦澀，是一幕苦劇。

李慶霖，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語文教師，1969年，他的初中畢業兒子李良模到莆田山區插隊落戶，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他又一個孩子初中畢業了，又面臨著上山下鄉的問題。「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1972年12月21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講了孩子在農村的困苦：「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孩子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他在信中還揭露了一些人「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信的語言懇切、樸實，打動人心。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到李慶霖家中瞭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這是奉總社之命來瞭解情況的，回去後立即發了直達中央的「內參」。記者賴玉章走後，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面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字樣，他心裏「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是毛澤東復信的打印件（因毛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

<sup>16</sup>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第204頁。



室)：「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 1973 年 4 月 25 日」李慶霖將毛澤東的復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面。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澤東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澤東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 月 10 日，李慶霖收到毛澤東寄給他的 300 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將 300 元錢存入銀行，一直捨不得花。

毛澤東讀畢李慶霖的信後，讓汪東興從他的稿費中取 300 元匯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

4 月 27 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會議，研究下鄉知青的政策。5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復信。6 月 22 日至 8 月 7 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從此，知識青年的境遇有一定的改善。

1973 年 12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福建李慶霖那一封信，有人說那裏頭有刺，我看了相當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sup>17</sup>

毛澤東對李慶霖信的處理，平衡了他批評「反走後門」的負面影響，強化了他同情底層百姓的形象。

李慶霖被認為是「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地位不斷提升：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縣教育組副組長、福建省高考招辦副主任，直到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在批林批孔和緊接著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被很多地方、很多單位請去作報告。他站在造反派一邊，大膽地批評官僚體制。在《紅旗》雜

---

<sup>17</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512 頁。

誌 1973 年第 11 期上發表了他署名的《談反潮流》文章，顯然是《紅旗》編輯部讓他寫的。1976 年 01 月江青等四人被捕後不久，李慶霖被隔離審查，1977 年 11 月被正式逮捕，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80 年代初，一些來武夷山風景區旅遊的北京、上海知青們聽說李慶霖關押在附近，買了水果、糕點，步行 10 多裏去勞改農場探望他。這些老知青們象親人般圍住李慶霖，一一說起當年因為李老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1990 年 12 月，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法院准予給李慶霖減刑。他在勞改農場度過了漫長的 17 個春秋。1994 年 3 月出獄，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他不時會收到全國各地知青來信和匯款，有一位汕頭老知青給他匯來 600 元讓他治病用，在信中稱他是「中國知青之神」。

## 五、幾個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一些地方，那些在成立革委會以後受到打擊的原造反派們，認定批林批孔是一次重振旗鼓的機會。他們迅速行動起來，聯繫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擊造反派的實際，展開了鬥爭。一些被結合到革委會裏的領導幹部，不知道這次運動的底細，不敢冒然阻擋。下面介紹幾個省的情況。

###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 年 1 月 28 日，中共湖北省委，武漢部隊黨委召開武漢地區 10 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3 月 2 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了被關押的造反派領袖胡厚民，李想玉等人。3 月 3 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遊行，慶祝胡、李獲釋。獲釋的造反派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主持制定了湖北批林批孔運動的「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放」，就是將關押在監獄裏的造反派頭頭一律釋放。「平」，就是為被打成「5·16 分子」、「北決揚分子」、「壞

頭頭」的造反派平反。「補」，就是要對各級革命委員會「補台」，把攆走的群眾組織代表請回來。「提」，就是將造反派提拔到各級黨委、工會、共青團、婦聯等機構中去。「納」，指納新，即吸收造反派入黨。

胡厚民的「納」是有根據的。九大以後，毛澤東對整黨發出指示：「一個人有動脈和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但是，各地在恢復秩序時，領導班子大都是「吐新納故」：讓群眾代表出去，讓老幹部進來。

造反派領袖們利用各種機會大造輿論。武漢當時有一個「杜則進」寫作組。「杜則進」是體現當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這個小組有 20 多人，他們夜以繼日地寫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漢口水塔「民主牆」貼出一個整版。水塔「民主牆」有幾百平方米的面積，地處繁華的鬧市。「杜則進」的系列文章揭露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四人主政時否定工會，推翻各級革委會，全面鎮壓造反派的情況。「杜則進」的文章在武漢轟動一時。在武勝路、司門口等鬧市區也貼滿了大字報。

1974 年 3 月，武漢鍋爐廠的造反派偶然在廠黨委檔案室發現毛澤東關於湖北省清查「5·16」的講話。毛在這個講話中批評武漢清「5·16」搞過了，要剎車、糾正，要注意政策。劉豐在文件上批示「暫不傳達」。武漢重型機器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鍋爐廠、電信局裏原「鋼工總」的一些人，到武漢軍區門口靜坐要求接見。新調來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領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張玉華在武昌炮校接見了造反派代表。群眾代表將劉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對抗中央精神，長期整群眾」的事當面向楊司令作了彙報。楊得志問張玉華：有沒有這件事情？張玉華把眼鏡取下來，又戴上去，又取下來。楊得志拍案追問，最後張玉華哭了，承認有這件事。3 月 30 日，原「鋼派」群眾包圍軍區，要求交出在「清查「5·16」、深挖「北決楊」時整群眾的黑材料。早已被解散的「新派」和「鋼派」的一些人重新集結起來，要求中共武漢市委查封軍區整的黑材料。市委書記王克文接見造反派。經王克文同意，造反派留下借條，將 3 萬多份材料運到航運局的船上。過了一周，市委秘書長栗棲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運走和搶走的材

料要全部送回來。」造反群眾將材料一份不差地運回了市委。文革被否定之後，這件事被定為「搶機密檔案」，帶頭的人判了4年徒刑。<sup>18</sup>

「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部分得到落實。胡厚民、朱鴻霞、鄧金福、潘宏斌、平毅被增補為文革後剛剛恢復的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5年，根據鄧小平指示，這些補台重新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頭頭都下放到縣、公社和農民搞「三同」<sup>19</sup>。

###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湖南文革中的影響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是「長沙工聯」和「湘江風雷」。省革委會成立時，這兩大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胡勇與葉衛東成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年之後，中共「九大」召開，省革委會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在中共「十大」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樣，唐忠富一躍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一把手」。

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運動中，湖南造反派頭頭們大多被剝奪了權力，一些人挨整。「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們再次聚集起來，要求為被整的造反派頭頭平反，要求銷毀被整的材料，要求恢復原有革委會職務。當時最活躍的有三個人：胡勇，原「長沙工聯」的主要負責人。唐忠富，原「長沙工聯」核心領導人之一。雷志忠，原「長沙工聯」第三號領導人，1968年4月被任命為省革委會常委，1973年5月，被任命為中共長沙市委副書記。

「九大」以後，群眾組織已不復存在，他們只好把工會當作集結力量的障地。2月，唐忠富從北京回來後，向工會的一些領導人傳達王洪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講話，他說：「這次到北京把頭上的角磨尖了，而且還淬了火，回湖南要擺它幾下」。「要依靠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同走資派作鬥爭。」唐忠富與胡勇、雷志忠以「唐勇忠」名義編寫了《為革命造反派辯護》的傳單，鉛印散發了6000份。傳單說：對於「敵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

---

<sup>18</sup>老田：《文革親歷者訪談錄（付廉）》。

<sup>19</sup>三同，即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資派、資產階級右派。」要「把他們的權再奪回來，即使『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給他們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或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胡勇、唐忠富等將原與他們對立的造反組織如「湘江風雷」派又團結統一起來了，共同爭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由此，葉衛東、周國強等原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都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重新進入湖南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一些已入獄幾年的造反派頭頭，都被胡勇等人保釋出獄。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與胡勇、張厚等人在湖南賓館研究進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單，提出：唐忠富、章伯森當省委書記，胡勇、張厚、孫雲英等為省委常委。一些造反派頭頭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

3月11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為首的湖南省總工會和長沙市總工會聯合召開15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隨後，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級造反派頭頭，還聯合以「富勇忠」的筆名，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長篇文章。

為了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省、地、市、縣及所有企業、事業單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簡稱「運動辦」），造反派把「運動辦」，作為與省地市縣及各單位黨委交涉、向黨委討價還價的指揮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壓力團體」，當權者不得不退讓。一些在「一打三反」、清「5·16」運動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頭頭，重新獲得了職務，退還了或當場燒掉他們挨整時的材料。一大批造反派骨幹分子加入中共黨組織。

### 黑龍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黑龍江省1967年1月31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是全國第一個成立革委會的省份。主任潘復生。1968年，在全國要求恢復秩序的大背景下，黑龍江和全國各地一樣，都有「復舊」的情況。1968年早春，潘復生還堅持文革初期的理念，在造反派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右傾，反復辟」鬥爭。一大批已經解放並結合到革委會的幹部被撤職。1971年2月，對潘復生的「反右傾，反復辟」問題進行了清算。1971年6月潘復生被免職審查。接替他的是軍人汪家道。在清算潘復生的

過程中，造反派也同時受到清理。

批林批孔一開始，黑龍江省的造反派認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們上下串連，積極活動，圖謀把結合到革委會裏的一些老幹部再次打倒。原造反派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省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等人寫了「反復辟」、「反回潮」的大字報。一時，哈爾濱市大街上貼出了很多「堅決擊退右傾翻案風」、「打倒黑龍江的孔老二」的大標語和大字報。3月2日、25日，牛成山等人組織80多人強佔省委會議室，圍攻省委領導，衝擊省委機關的批林批孔會議。4月1日起，造反派又到省委鬧了6天5夜，逼省委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4月6日，牛成山、聶士榮等組織了數十名工人闖入市委書記李劍白的辦公室，將其綁架至省委107招待所進行圍攻。之後，用卡車拉著李劍白遊鬥。12月24日，省革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補選黑龍江出席四屆人大代表，造反派為阻止老幹部被選為人大代表而發生衝突。26日，造反派抬著傷員遊行，沖進省委機關大樓，設立「討還血債辦公室」和廣播站。廣播站喧鬧了一個多月。<sup>20</sup>

在1975年春開始的「全面整頓」鬥爭中，黑龍江省造反派的活動被「整頓」了下去。

###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會成立，南萍（20軍政委）為主任，陳勵雲（空五軍政委）為第一副主任。林彪事件後，浙江軍政領導人陳勵雲、南萍、熊應堂（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兼20軍軍長）被審查，1972年4月，中央決定譚啟龍、鐵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在批林整風當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批幹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一批「造反起家」的領導成員在這之前陸續被打發到基層。1973年1月，王洪文到浙江，公開指責說，浙江的批林整風是搞層層批判、檢討，是糾纏歷史舊賬，走偏了方向。為被打發到基層的造反派頭頭鳴不平。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支持，造反派頭頭們認為，省委在批林整風中整了造反派和新生事物。有些人寫信給王洪文，王洪文把這些們批給省

---

<sup>20</sup> 《黑龍江省志·第70卷·共產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頁。

委第一記譚啟龍，向譚施加壓力。<sup>21</sup>

1973年10月3日，翁森鶴（杭絲聯工人、省革委會常委）、賀賢春（杭州通用機器製造廠技術員、省革委會常委）在街頭貼出《致譚、鐵書記的公開信》，批評譚、鐵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中不重視並且壓制新幹部。」11月8日，張永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省革委會副主任）、翁森鶴、賀賢春等人向中央寫了《關於譚、鐵書記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報告》，並組織了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策劃上京告狀。王洪文來電話阻止他們上京，說：「浙江的問題就地解決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評，省委可以組織他們學習。」11月16日，赴京控告團成員住進了屏風山工人療養院，成立「省委屏風山幹部工人學習班」，集中批判「右傾翻案」、「右傾回潮」。12月上旬，在屏風山連續召開了四個半天的批判會，批判譚啟龍等省委領導人。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個人名義寫信給駐浙江部隊20軍防化連，並派遲群、謝靜宜到浙江送信、送材料，要「放火燒荒」，公開點名說譚啟龍是浙江最大的走資派。

1974年2月7日，杭州市三萬多名工人在展覽館廣場召開大會，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會後上街遊行。2月11日，以造反派為主導的「杭州市民兵指揮部」正式成立。市委發了(74)9號和12號文件和任命名單。賀賢春為民兵指揮部的黨委書記兼領導小組組長。台州、金華、溫州、寧波以至全省81%的市、縣建立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sup>22</sup>

3月2日，杭州市工代會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聯合發起召開「深入批林批孔，迎頭痛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思潮大會」，主會場在省體育館，設了多處分會場。第二天《浙江日報》報道了大會情況。在批林批孔中，釋放了在押的造反派頭頭174名，一些領導幹部又受到衝擊。

1974年3月8日，成立了批林批孔領導小組，譚啟龍任組長，柴

<sup>21</sup> 《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699-700頁。

<sup>22</sup> 《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710頁。

啟琨、張永生、華銀鳳、翁森鶴任副組長。翁森鶴兼辦公室主任。實際上譚啟龍被架空，造反派掌握了領導權。

建立革委會時，為了精簡機構，各級都以四大組（政工組、辦事組、保衛組、生產組）來取代原來的領導機構。1972年以後，各地逐漸恢復了文革前的機構。浙江恢復了專業「口」的管理機構（如財貿口、工業口等）。2月中旬，省委機關造反派聚集了32個單位的200多人，召開「沖口複組」會議，最終迫使省委同意恢復四大組。

3月17日和21日，與翁森鶴等不同造反派別的群眾組織頭頭方劍文，組織批林批孔大會和「批林批孔和批陳勵耘、南萍、熊應堂大會」，會後遊行。張、翁、賀組織民兵衝擊會場和遊行隊伍，兩次都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3月13日，溫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搶，16日中央、中央軍委給省軍區發電報，命令收繳武器。3月16日王洪文打電話給譚啟龍，主要內容是：一、浙江兩派頭頭，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陳勵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廠、農村去搞串連，搶槍、搶物資、搶車輛等。二、省委，特別是省軍區，不堅決執行中央、中央軍委的兩次收槍命令，是錯誤的，必須向中央、中央軍委檢討。三、省委裏一些主要負責人到外地養病的，應當回到工作崗位上來，同群眾一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時，要注意安排好工農業生產。

3月26日，浙江省召開中共省委全會、省革委會全會、省軍區黨委全會（「三全會」）。「三全會」從3月27日一直開到8月6日，共開了133天。會議採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方法，集中批鐵瑛、夏琦、陳偉達等以及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批判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說他們是「復辟勢力代表人物」。鐵瑛在省「三全會」上作檢查，他在檢查中說：「在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省革委會四大組和許多地區、工廠、院校以及一部分縣都成了『清查重點』。」

4月3日，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鶴、賀賢春提出的給60名「反潮流戰士」落實職務的名單進行了正式討論，市委常委會通過落實了這些職務。杭州市委發出(74)25號文件，吸收翁森鶴、賀賢春、朱香娟、倪巧雲、夏根法、王元海、謝國相、李金榮、鄭銀法、王競十人為常委。5月16日，《浙江日報》刊登了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的署名



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鬥綱領——學習中共中央「5·16通知」》。重申文革初期的思想。

翁森鶴等策劃和指揮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務管理局臨時招待所，衝擊展覽館廣場的群眾集會等。有一百多名幹部和群眾被關進私設的監牢，遭到嚴刑拷打。

1975年1月29日，省委工作會議的第一天，造反派沖進了正在舉行會議的杭州飯店小禮堂會場，綁架了第一書記譚啟龍，將他劫持出會場。警衛戰士奮力搶了回來。鄧小平得知此事後，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說「譚啟龍不能倒！」

批林批孔引起了無法收拾的混亂。根據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多次指示，紀登奎協助浙江省委召開工作會議，解決省委領導「軟、散」問題，糾正「雙突」，撤銷民兵指揮部，對翁森鶴實行拘留審查。1975年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了(75)16號文件，批轉了浙江省《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同時決定調整省委領導班子。7月下旬，將省、地(市)兩派造反派頭頭骨幹200多人集中辦學習班，一邊學習、勞動，一邊揭發張、翁、賀等人的問題。10月，張永生、賀賢春下放農村勞動。

### 江蘇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和浙江省不同的是，江蘇的造反派頭頭在軍管期間遭到徹底鎮壓，因而不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拉開序幕之時，江蘇依然處於軍隊幹部的絕對控制之下。在清查「5·16」中，十幾萬人被關押。在軍方控制之下，運動初期被打倒的老幹部沒有進入權力中心。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老幹部們打著保衛文革的旗幟，盡力為在清查「5·16」中受害的造反派說話。老幹部的代表人物就是彭沖<sup>23</sup>和許家屯<sup>24</sup>。許家屯在省委召集的

---

<sup>23</sup>彭沖（1915–2010），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為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初被打倒，後複出，批林批孔前為中共十大候補中央委員，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江蘇省委副書記，負責抓生產。

<sup>24</sup>許家屯（1916–），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為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初被打倒，1969年複出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無實權。

一次大型會議上說過：「革命小將反潮流，我們為什麼不能反潮流？」彭沖強調，江蘇的「批林」運動應該聚焦於（一）林彪在江蘇死黨的罪行、（二）清查「5·16」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和（三）查清軍方人員與「選妃」<sup>25</sup>活動的牽連。他還提出，要成立專案小組深入調查這三個問題。江蘇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鬥爭矛頭指向許世友、吳大勝、蔣科。由於許世友是毛澤東要保的，而且已調到廣州軍區，許調走以後，吳大勝代理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職務；蔣科繼續擔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主持全省行政事務。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連續發表重頭文章，其矛頭一直指向幾位軍方領導人。

江蘇的老幹部的重新崛起沒有被造反派看成「復辟」，反而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曾邦元、周錫祿、徐松林等被結合進省革委會的前造反派頭頭，在清查「5·16」運動中遭到清洗並被投入監獄，現在他們與老幹部通力合作以謀求自己的平反。要求清算軍人政權的還有一大批返城市民。在恐怖的「紅八月」、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更早一些時候，大批市民被趕到農村。<sup>26</sup>這些在農村生活無著的市民，希望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回到城市，他們返回南京持續地請願、示威，一度甚至阻斷京滬鐵路。<sup>27</sup>

吳大勝在4月中旬的一次省委會議上承認，江蘇清查「5·16」運動確實存在許多錯誤，而且省委應該為此承擔責任。他同意釋放一批被關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頭頭，其中包括文鳳來、曾邦元、朱開地、魯學智等。從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東路省委招待所舉行有各部、委、辦、局負責人參加的省級機關「批林批孔」大會。數十位「群眾代表」應邀與會——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前造反派成員和清查「5·16」運動的受害者。他們激烈地批評軍人政權。「堅決捍衛中共中央14號文件，徹底粉碎吳大勝等人的猖狂反撲」的大標語貼到了南京街頭。彭沖和許家屯多次出席省級機關批判大會，指導

<sup>25</sup> 「選妃」，即軍方一些領導人為林彪之子林立果找媳婦以此向林彪表現忠心。

<sup>26</sup> 在江蘇實施軍管後的兩三年中，全省約有350,000城鎮居民被迫到農村安家落戶，僅南京市就下放了130,000多人——董國強：《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sup>27</sup> 董國強、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群眾展開鬥爭。<sup>28</sup>。

8月15日，吳大勝承認他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參與了支持林彪集團的活動，承認他千方百計掩蓋許世友夫婦與林彪集團有牽連的事實。在8月31日會議結束時，彭沖代表省委做總結：許世友的種種錯誤應該受到批判而且必須受到批判。清查「5·16」運動，是林彪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偉大成就的復辟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sup>29</sup>8月31日，省委下發了《關於清查「5·16」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處理意見》（蘇委發【1974】91號），承認犯了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這個文件提出了對清查「5·16」的受害者的六項平反措施<sup>30</sup>。

中共中央明確支持彭沖和許家屯等人。11月13日，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包括丁盛、彭沖和許家屯——奉召前往北京。當天下午，他們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和紀登奎等人的接見。中央領導人宣佈任命彭沖為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同時擔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12月30日，江蘇省委和江蘇省軍區聯合發出通知，命令在地方黨政機構裏工作的所有軍方人員全部返回部隊<sup>31</sup>，地方老幹部接替軍人在各級政府中的黨政領導職務。

吳大勝和蔣科被停止領導職務，繼續接受批判和審查。造反派頭頭從牢房裏被放了出來，摘掉了他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老幹部一旦實現了接替軍隊幹部的權力以後，不再支持造反派，他們明確表示，造反派頭頭不能回到他們在1968年取得的領導崗位<sup>32</sup>。

### 江西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西省的造反派活躍一時。1973年12月25日，江西造反派領袖塗烈給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寫信，揭發省委一些領導人的「反攻倒算」行為，點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領導人。1974

---

<sup>28</sup>董國強訪問葛忠龍，轉引自董國強、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sup>29</sup>董國強訪問葛忠龍，轉引自董國強、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sup>30</sup>《江蘇省志·中共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頁。

<sup>31</sup>《江蘇省大事記（1949-1985）》，198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329頁。

<sup>32</sup>董國強、Andrew G. Walder：《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年2月初，造反派領袖萬里浪、張羽等人到撫州、吉安、贛州、九江等地，發動批林批孔，揭發省委某些領導人搞「右傾復辟」的行為。1974年2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組織「省、地、市上訪團」，三次與省委領導人談判，省委同意釋放在「一打三反」中被關押的224人。縣一級的造反派也有活動。1974年3月，於都縣一些「反潮流戰士」打著「反復辟倒退」的旗幟，衝擊縣委，圍攻縣委領導，查封縣委組織部、縣勞動局和縣檔案館。<sup>33</sup>1974年4月，萬載縣掀起一股「反潮流」和「上訪」熱潮，上訪者要求解決造反派「受壓」問題。<sup>34</sup>2月17日，定南縣一些造反派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組成「定南上訪團」，要求解決被打擊的問題。<sup>35</sup>

在毛澤東要求全國「走向大治」大趨勢中，這些造反派的活動只能是曇花一現。江西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焦點是李九蓮問題。

李九蓮，女，原贛州市第三中學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長。文革中成為三中「衛東彪戰鬥兵團」副團長，是個中學生造反派頭頭。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贛州冶金機械廠當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在給當兵的男友信中講了她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一些看法：「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象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列主義的……林彪到底會不會象赫禿一樣，我對現時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問題發生懷疑。」

她的男友把這封信交給了部隊領導。部隊領導把信轉到了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被抄走的日記中，發現有一些批判林彪的內容。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聽了這個專案的彙報後說：「象李九蓮這樣全面系統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國也不多見，屬敵我矛盾，要從嚴處理。」李九蓮被判五年徒刑。

林彪事件後，程世清成了林彪死黨，倒臺了，李九蓮被釋放，但

<sup>33</sup> 《於都縣誌》，新華出版社，大事記，第50頁。

<sup>34</sup> 《萬載縣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大事記，第31頁。

<sup>35</sup> 《定南縣誌》，1990年，內部發行，大事記，第37頁。

還定為「現行反革命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開除團籍，發配到江西興國縣錫礦廠。

1974年4月4日，李九蓮在贛州公園女牆貼出為自己申辯大字報——《反林彪無罪》，接著連續貼出多張大字報。在大字報前，人山人海，圍得水泄不通。夜深了，還有人打著手電看。讀者在大字報邊上寫滿了各式各樣的批語：「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學習！」「中國少的是李九蓮，多的是奴才！」「強烈要求為李九蓮平反！」還有大量批評贛州地區領導人的大字報。

贛州地委對群眾的強烈呼聲極為恐慌，經請示省委，1974年4月20日晚10點，又秘密將李九蓮逮捕，押往興國縣看守所。4月24日夜，贛州259個單位，2000多人舉行集會，簽署了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的《聯合聲明》。「立即釋放李九蓮！」的大標語迅速貼滿了贛州市街頭。會後，數千人湧向地委辦公樓，要求釋放李九蓮。凌晨，四十多卡車載滿抗議者，奔赴興國縣，請求釋放李九蓮（後被扣上「衝擊監獄」的罪名）。當地一些黨政領導，如地委常委陳萬兆，興國縣公安局長等都同情群眾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處理此案。

繼程世青之後，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的陳昌奉在江西主政，他向贛州地委發出五點指示：一．李九蓮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二．贛州某些人爭論此案，實際上是為現行反革命翻案；三．衝擊興國縣監獄是嚴重政治事件，必須立即制止；四．某些幹部，公安幹警在李九蓮問題上嚴重喪失立場，實際上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對在李九蓮問題上立場堅定，堅持原則的同志，應予表彰。

陳昌奉的五點指示公佈後，很多人聚在贛州公園，成立了「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李調會」）。極度貧窮的贛南百姓，為「李調會」捐出大批錢物，使這個組織活動了七個月之久。李調會建立廣播站，日夜廣播為李九蓮呼喚正義的文章。「李調會」六次上訪北京，在長安街，前門等處張貼大字報，請求中央解決李九蓮問題；他們在省會南昌的八一大道上貼出了很多大字報，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

1975年5月，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為李九蓮說情而被判刑，此外還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黨紀處分，全市九個中學，就有兩個中學的副校長被開除公職，三個中學的

團委書記被撤職，兩個中學的工宣隊長被退回原單位。當年第一個審判李九蓮的公安局幹部梁某，也因支持李九蓮翻案而被開除黨籍。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贛州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有的自殺，有的入獄，有的流落街頭，有的離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殘。

李九蓮再次入獄後，寧死不屈，受盡折磨。其間，她曾絕食 72 天，以示抗議。監獄強行給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蓮就將針頭拔下，獄方只好捆住她的雙手。

1977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三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名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一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場。讓她跪下，她不跪，劊子手一槍擊中其腿，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她被槍殺時只有 31 歲。在強烈的政治恐怖氣氛中，李九蓮家人不敢收屍，一個單身性饑渴、性變態男子割去了她的乳房和陰部。

在贛州市為李九蓮鳴不平的無數人中，有一位叫鐘海源的小學教師。她並不認識李九蓮。她自動到「李調會」當廣播員，每從早上一一直廣播到晚上十點半。除了播音，她還刻鋼板，抄大字報。當局規定：「凡在『李調會』工作的人，本單位一律停發工資」，鐘海源卻依舊天天來，帶著自己的兩歲女兒。

1975 年 5 月，華國鋒為部長的公安部將「李調會」定為反革命組織。「李調會」主要成員一一被捕。鐘海源在自己家裏起草了《最緊急呼籲》，《強烈抗議》，《緊急告全市人民書》等傳單，自刻自印自己散發。結果，她被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在監獄裏，她仍然繼續宣傳：李九蓮無罪，「李調會」無罪！她遭受嚴刑拷打。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拖著沉重的鐐銬，在監獄的牆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1978 年 4 月 30 日，鐘海源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

此時，南昌 92 野戰醫院住著一位飛行員，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摘取。在刑場，劊子手朝鐘海源不致命處打了一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推進附近一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鮮血滴瀉

嗒嗒地盛滿了半桶。<sup>36</sup>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批示為李九蓮平反，但當地掌權者還堅持李九蓮是反革命，因為李九蓮是造反派。1974年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當權者基本是鎮壓造反派上臺的。

## 六、中央發文件限制造反派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的行為，既威脅到已經重新掌權的官員，也違背了毛澤東實現安定團結的戰略部署。文革此時已進行了七八年了，不僅全社會不希望再亂下去，毛也不允許再亂下去。為了防止造反派鬧的勢頭過大，中共中央連連發出文件，將運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掌握之中。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1974]12號文件），要求「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一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個文件還要求不要「揪」已回部隊的「支左」人員，他們在支左中犯的錯誤由部隊解決。

這個文件下達以後，希望把批林批孔變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們很不高興。安慶市重新組織起來的「安慶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聯會」在大街上貼出「淮南在鎮壓，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標語。還大量散發口號：「中央十二號文件是修正主義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號文件的炮製者！」「打倒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矛頭直指周恩來。<sup>37</sup>

為了穩定軍隊，5月1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強調清查林彪事件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

<sup>36</sup>李九蓮的資料都取自老鬼：《李九蓮案始末》載《南方週末》，2005年11月24日。

<sup>37</sup>張萬舒：《狂熱的年代1966-1976年的紅色大陸》，香港天地圖書出版，2012年，第382-383頁。

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 1971 年八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1971）57 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党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團劃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還強調「陸、海、空軍的軍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律堅持正面教育。」

1974 年 6 月 18 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彙報當前工農業生產問題。彙報說：「由於批林批孔運動，許多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幹部挨批挨鬥，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領導和組織生產，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國民經濟重新下降。」「1974 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鐵路運輸方面。由於發生動亂，很多路段不暢通，所通過的列車比正常情況少 1 / 3 左右。……津浦、京廣、京包、貴昆 4 條重要幹線的列車不能暢通」<sup>38</sup>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用這些令人憂心的數據，阻止批林批孔運動發展為「第二次文革」。

國家計委彙報中說「幹部被打跑」，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在淮南市採訪中看到了這種現象。革委會的領導幹部們看到造反派一鬧，就躲的躲，跑的跑，整個市委、市革委就剩下革委會主任應付。張萬舒到淮北第一煤礦楊莊礦採訪得知，十多名黨委成員全都跑了，半個月不回來。<sup>39</sup>

1974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發 [1974] 21 號），這個文件指出了生產的嚴峻形勢：上半年一些地區和單位沒有完成國家計劃。一至五月，全國重點煤礦共欠煤炭 835 萬噸。徐州、長沙、包頭、貴陽等少數區段，鐵路經常堵塞，嚴重影響了全國的貨物運輸。造成不少企業停工減產。鋼鐵、有色金屬、化肥、水泥等產品的計劃和軍工生產計劃，都完成得不好。武鋼、包鋼、和武漢重型機床廠、太原重型機器廠，成都 1302 廠等，大量減產。

---

<sup>38</sup>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彙報當前工農業生產問題的彙報提綱》，1974 年 7 月 1 日。

<sup>39</sup>張萬舒：《狂熱的年代 1966-1976 年的紅色大陸》，香港天地圖書出版，2012 年，第 378 頁。



這個文件要求造反派群眾「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認真落實黨的政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廣大幹部和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面對批林批孔的強大聲勢，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官員們，一方面強調運動不能影響經濟建設，一方面在口頭上緊跟。例如1974年1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的紀要中也有這樣的話：

在經濟工作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崇洋媚外依賴外國？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還是搞「上智下愚」、專家路線？是堅持政治掛帥，還是靠物刺激？是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是維護舊事物？這些問題，有些單位，有些同志，並沒有很好地解決。<sup>40</sup>

這些，顯然不是務實派真實的看法，但還是要寫上。「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周恩來一方面表示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一方面對江青等人拋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對影射他的所謂「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不予回應。周恩來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住入醫院，但他堅決不放鬆權力，繼續過問黨，政，軍日常工作。

1974年9月30日，周恩來抱病主持了國慶25周年的盛大招待會。出席招待會的有兩千多人。出席招待會的人造反派已經很少了，多數是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幹部，其中一些被周恩來保護過的。人們都站了起來，不斷地高呼：「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周恩來簡短的致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了十多次。這種情況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如果現在公開批周，勢必引起強烈反彈，可能使形勢失控。他不得不收起了公開批周的考慮。不批周，批林批孔也就失去了目標，加上怕造反派搞亂天下，批林批孔搞了半年多以後，進入了低潮。

---

<sup>40</sup> 《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紀要》，1974年12月27日，抄自本書作者當年的採訪本。

## 七、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隔五年換屆一次。第三屆全國人大是 1964 年召開的。1970 年 3 月 7 日，毛提議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後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風波沒有開成。1971 年 8 月 12 日，毛又向周恩來提出國慶後召開四屆人大，後因林彪事件而落空。中共十大以後，四屆人大問題再一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發 [1974] 26 號），通知稱：「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宜的。」這個文件公佈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四屆人大召開在即，以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兩股政治力量開始角逐，都希望在這一次權力分配中佔優勢。這裏說的「務實派」主要是文革前的官僚集團。他們被「火燒」並恢復職務以後，不熱衷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對文革不滿，注重恢復秩序和發展經濟。隨著文革的失敗，務實派在民間的支持者逐漸增多。

1972 年 5 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1974 年 6 月 1 日，周住進了 305 醫院。周分管的工作已交給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但他在住院期間還頻繁地找人談話，關注著、參與著四屆人大的人事準備。

文革派借題發揮，製造了一個「風慶輪事件」，企圖先聲奪人。風慶輪是 1973 年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遠洋貨輪，交給了交通部遠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輕載試航中，接船方發現風慶輪主機汽缸套磨損達 0.15 毫米，質量不過關；後來雷達出現了問題。雖然造船方對這些故障進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卻認為交通部有意挑別，不願意用國產船。交通部擔心國產發動機不可靠，沒有批准這艘船遠航。江南造船廠貼出了《是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的大字報，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上海革委會還組織其它單位到江南造船廠貼大字報，批評交通部。交通部最終同意遠航。風慶輪於 1974 年 5 月 9 日從上海啟航到

歐洲，上海派了一些人上船，任命朱棟在船上任政委；中國遠洋運輸公司任命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質量問題爭論發展到政治上的爭論。朱棟組織批判「洋奴哲學」，把買船還是造船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本書作者當時從中國遠洋天津分公司聽到的情況是，李國堂不經意間說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當時中國造船能力差，從算短期經濟帳來看，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從長遠來看，這一說法違背了毛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周恩來、李先念等要求努力提高中國的造船能力，但在能力還沒上來的時候，為了滿足遠洋運輸的需要，經周恩來同意，國家計委制訂了通過買船發展遠洋運輸的計劃。這個計劃遭到文革派的批評。9月30日，風慶輪返抵上海港。上海方面寫材料，片面地介紹了船上的爭論。說李國堂等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修正主義路線」。姚文元看到這個材料後就讓新華社刊登在10月13日的《國內動態清樣》上，船上的爭論由此轉為高層爭論。江青在這期《國內動態清樣》上批示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所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張春橋批示說：「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行了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輪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一再逼問鄧小平，要他就風慶輪上的爭論表態。鄧小平開始回答說「要調查」，江青還繼續逼問鄧小平對「洋奴哲學」抱什麼態度？鄧小平厲聲回答說：「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驕橫一世的江青哪里見過這樣的臉色？就大吵大鬧起來。鄧小平說：「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就戴這樣的大帽子，這會怎麼開！」站起來拂袖而去。張春橋指著鄧的背影說：「早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sup>41</sup>

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商議，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臨行前，10

---

<sup>41</sup>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401頁。

月 18 日，王洪文給毛寫了一封信：「最近在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這些爭論也未公開化，但在個別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面化。」信後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18 日，王洪文到長沙對毛說：「我這次是冒著風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 1970 年廬山會議的味道。」「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這件事，江青和鄧小平同志發生了爭吵，吵得很厲害。」「總理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到了深夜。幾乎天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志。」「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這麼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sup>42</sup>王洪文還在毛面前說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多好話，言外之意是希望他們進入四屆人大的領導班子。毛澤東沒有為王洪文的彙報所動，要求王回去後和鄧小平搞好團結，多找總理和劍英交換意見，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毛逝世前兩年身體不好，眼睛近於失明，只能從周圍的人那裏聽取信息。王海容、唐聞生兩位翻譯是他的重要信息渠道。王洪文出發到長沙以後，江青又找王、唐兩位小姐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通過她們影響毛澤東。但兩位小姐卻到醫院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對她們做了工作。10 月 20 日，王、唐兩位小姐到長沙向毛作了不利於江青的彙報。毛要她們向中央轉述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名單。」「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還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要她們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sup>43</sup>

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讓國家回到正常局面。所以，他在肯定江青在批劉、批林的功勞的前提下，說了一些批評江青的狠話，壓制江青，防止她又鬧出新的亂子，使四屆人大又一次夭折。毛的這個態度對務實派很有利。

12 月 23 日，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和王洪文各自乘專機到長沙向毛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23 日到 27 日，毛同周、王的談話中繼續

<sup>42</sup>王洪文在最高法院審判江青時的證言，1980 年 11 月 26 日。

<sup>43</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6 卷，2013 年，第 554 頁。

壓制「四人幫」，讓他們「不要搞四人幫」，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重申讓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建議在四屆人大之前召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將他的接班人的意圖從王洪文轉向了鄧小平。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同時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全會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為了保持文革派對鄧小平的制衡，毛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任中央軍委常委，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央軍委常委和有軍隊人事任免權的總政治部主任。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大常委及國務院成員候選人名單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終於召開。在這之前有一個星期的預備會。像中共九大、十大一樣，這次會議也是在完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代表們秘密進京，不能離開駐地，不能和外面聯繫，召開大會時與會者從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記者不能採訪，會議結束以後才由新華社發消息。

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四屆人大憲法是張春橋主持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了憲法。憲法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也是四年以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內容。

政府工作報告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考慮到報告人周恩來的身體情況，只有5200多字。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念了報告的一頭一尾。這個報告的亮點是提出「四個現代化」。報告重提三屆人大提出的「兩步走」的目標：「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

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後說：

我們要在 1975 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 1980 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制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

這是文革以來把經濟建設作為全國目標的第一次，當然倍受歡迎。周恩來一念完，全場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在當時情況下，報告還是肯定了中共十大路線，還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決不能因為批林批孔已經取得很大成績而有所鬆懈。」

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佔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周恩來為總理。副總理有 12 位：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女）、王震、餘秋裏、谷牧、孫健。作為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四屆人大閉幕幾天以後，他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務實派的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餘秋裏、谷牧、紀登奎都是政治上的強勢人物，他們全盤掌握著經濟、外交。陳永貴、吳桂賢、孫健是從基層上來的，政治能量不強。張春橋分管文化、教育，權力範圍遠小於鄧小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政府裏沒有職務。在國務院所屬的 29 個部委的一把手中，除了文化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屏、國家體委離任莊則棟、冶金部長陳紹昆四人是文革中新起來的以外，其餘都是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和軍代表。

## 八、批判江青一個月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年時間內，一方面保衛文革，一方面穩

定社會秩序。這是一個二者不可兼得的兩難問題。毛只能在代表「復舊」勢力的周、鄧和堅持文革理想的文革派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反修防修」的理論。穩定社會秩序主要是遏制江青等人的極端行為，防止他們把局面搞亂。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張春橋、姚文元奉毛之命，主持選編了馬、恩、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一共33條。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33條語錄。這些語錄，強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階段，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強調按勞分配、商品經濟、貨幣交換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必須對它加以限制；等。馬、恩、列的語錄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權威依據。按照毛的指示，姚文無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文1975年3月1日發表，張文4月1日發表。全國各單位都辦了理論學習班，學習毛所指定的理論。毛發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從短期看是為了從「老祖宗」那裏尋找依據，在反文革的力量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穩住文革陣腳；從長遠看，是為了廣大群眾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希望後人繼

續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毛澤東已經風燭殘年，說話不清，行動困難。面對身邊的兩股對立政治力量的博弈，毛盡力玩平衡遊戲，以免在他生前出現大的動盪。

毛澤東臨近死亡的最後兩三年，為了使自己不在動亂中死去，不得不再一次向官僚集團讓步。1966年，毛澤東雄心勃勃，橫渡長江顯示自己健強的體魄。他要利用健康的餘年改變中國，實現他1958年沒有實現的全新的美好社會的夢想。然而，殘酷的現實，不斷破碎著他的美夢，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退讓。1967年8月的亂局，他向軍事官僚退讓，林彪事件，迫使他向整個官僚集團退讓。生命盡頭的來臨，迫使他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退讓。他最後兩三年多次吟誦「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文革的大運已去，他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只希望把「火種」傳下去，後人掌握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七八年搞一次文革。不過，退讓他是不甘心的，他利用他生命的餘熱還要搏一搏，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是瀕近死亡的文革的迴光返照，也是毛澤東生命盡頭的迴光返照。在生命盡頭，他的妻子江青是一大麻煩。

江青患有嚴重神經官能症，植物神經功能失調，一年到頭依賴安眠藥睡覺。她疑神疑鬼，歇斯底里，借著毛夫人的身份，驕橫跋扈。毛的晚年在生活上和江青很不協調，但江在政治上緊跟毛，江青是毛可靠的政治夥伴。由於江青有時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做出一些不得體的事，說出一些不得體的話，給毛惹出不少麻煩。1974年以後，為了防止文革派打破政治平衡，引發新的混亂，毛澤東說了一些批評江青的話。1974年3月20日，毛給江青寫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毛在給江青的幾封信中，多是對江青的勸戒，也有對江青的抱怨，但這些抱怨是夫妻間的抱怨，並沒有把江青看成政治上的異己。在這些信中也沒有提「四人幫」。

1974年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他批評江青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



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用模糊不清的眼睛看著坐在一角的江青說：「你也是難改呢。」毛在這次會上還說：「她也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還說：「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sup>44</sup>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在黨的最高領導層點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員中的關係，不是定性為反革命幫派。政治局裏面本來就存在著派別，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派別，比如當時就有文革派和老幹部派。毛只是要江青「注意」，沒有說已經是「小宗派」。

不管毛怎樣批評江青，都不能否定毛政治上對江青的信任，都不能否定毛對文革的堅定態度。但是，務實派將毛批評江青的話作為對付文革派的政治武器。毛澤東也為反擊務實派準備了政治武器——重提周恩來歷史上的經驗主義。但是，文革派沒有用好這個武器，反而自受其害。

1973年春，在周恩來以批左的名義否定文革的時候，毛澤東就找出延安整風時期的九篇文章。<sup>45</sup>這九篇文章是毛為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於1941年寫的，是他在中央蘇區受壓時的積怨的大發洩。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說周是「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兇」。「教條宗派」是指從蘇聯回來的「國際派」，以王明為代表。事隔三十年後，毛讓人把這九篇文章找出來，印成專供高級領導人看的大字本，在小範圍內傳閱。讓他的侄子毛遠新把涉及周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sup>46</sup>由於毛澤東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說：「毛主席發動的這次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鬥爭回潮的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鬥爭沒有解決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

<sup>44</sup>《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86頁。

<sup>45</sup>實際是1964年找出來的，這9篇文章的總題目是《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9頁。

<sup>46</sup>陳錫聯談「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罪行，中央兩案材料，1980年8月16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17頁。

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sup>47</sup>1974年6月，就在江青等大批「黨內大儒」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找出那九篇文章，重新加以修改，以備應用。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時，又提到九篇文章，說：「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sup>48</sup>實際上，直到周恩來死後，毛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給他念了一遍，並作了若干修改。<sup>49</sup>

江青大概知道毛並沒有燒掉九篇文章，也可能因為毛澤東對毛遠新說的話的影響。他們以為，借批經驗主義來批周，可能會得到毛的支持。

3月1日，新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大講「反經驗主義」。

3月1日發表的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4月1日發表的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反「經驗主義」。這兩篇文章是毛提議寫的，而且都經毛審定的。

3月4日、5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這是出自毛批周的九封信——引者注），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一再提出反經驗主義，要求政治局討論。

1975年初，鄧以第一副總理身份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路開始整頓。文革派批判「經驗主義」，雖然有毛重提「九篇文章」為依據，實際是想干擾和阻止鄧小平的整頓。鄧仗著毛此時對他的信任，找個機會向毛奏了一本。4月18日，毛會見金日成，鄧小平在座。送走客人後，鄧向毛反映自三月初以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表示同意鄧的意見。<sup>50</sup>

1975年2月3日，新華社寫了一個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

<sup>47</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8頁。

<sup>48</sup>毛澤東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談話記錄，1974年7月17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9頁。

<sup>49</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26版，第519頁。

<sup>50</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79頁。

問題的報道意見，沒有提反經驗主義，姚文元壓著不批。到三月底，姚文元讓新華社修改這個意見，加上了批經驗主義的內容。<sup>51</sup>4月20日，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說：「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sup>52</sup>

可能是鄧小平4月18日的彙報起了作用，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sup>53</sup>

1973年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葉劍英，江青氣勢洶洶地要把這場鬥爭說成「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是企圖置周、葉於死地。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周、葉等批判江青了。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毛澤東關於批經驗主義的指示。姚文元念了毛4月23日的批示以後，除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外，其他人都要求將這一批示下發。張春橋說，在其它文件上順便提一下說行了，不必單獨下發。吳德說，不下發，反經驗主義的風就頂不住。不經政治局，不請示毛主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不符合原則。反經驗主義是反對老幹部的。你們幾個人搞宗派主義。<sup>54</sup>會上，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厲批評江青、張春橋等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葉劍英說：主席講你們是「四人幫」，要你們停止活動，你們是停止活動了還是照樣活動？江青被迫作了檢討。會後，王洪文以彙報政治局情況為由，給毛寫信，說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

<sup>51</sup>新華社記者述評：《四人幫上演反經驗主義醜劇的前前後後》，新華社1977年3月2日電。

<sup>52</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80頁。

<sup>53</sup>《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26頁。

<sup>54</sup>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第160頁。

凶的謠言，並說，「這場爭論，實際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想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sup>55</sup>江青說這是鄧小平等搞「突然襲擊」，是「圍攻」。

務實派和文革派已經到了兩軍對壘，一觸即發的關頭。

4月29日，30日，周恩來先後同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王洪文談話，瞭解27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5月2日，周恩來讓秘書找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的編者按和3月2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這兩篇文章都有批判經驗主義的文字。

5月3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從醫院趕來參加了會議。關於批判經驗主義，毛澤東說他也有責任：「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對不起春橋。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這些話是為文革派緩頰。他又輕輕地敲打一下文革派：「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我看江青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他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名義，比如也不要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對兩方面的意見分歧，毛澤東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些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是重點批評江青這一邊的，但對另一邊

---

<sup>55</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703頁，王洪文說的12月會議即1973年12月批判周恩來、葉劍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也批了。毛說「不要搞四人幫」時，還說：「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sup>56</sup>這是講 1920 年到 1922 年的歷史，也是暗指現在黨內的幫派。

5 月 4 日下午，鄧小平到醫院同周商討批判「四人幫」問題。接著，王海容、唐聞生又來談了很久，談話主題也離不開批評「四人幫」。4 日晚，周恩來在人大會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如何落實毛 5 月 3 日講話。這時，毛不讓下發他 4 月 23 日批評江青反經驗主義的那個批示，理由是《紅旗》已經發表了反映了那個批示的精神的文章。

4 日，5 日，周抱病起草關於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的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意見稿強調：在過去一個多月時間內「有些報告、報刊社論、一般文章、新聞報道、內部清樣，強調反修正主義的一項經驗主義，放過了另一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也不提了，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這樣的後果是「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人。」<sup>57</sup> 5 月 8 日，周在人大會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研究落實毛 5 月 3 日講話的事。會上決定，等鄧小平出訪法國回來後（鄧 5 月 12 日-18 日訪法）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確定由王洪文通知政治局全體成員。5 月 13 日，王洪文才正式通知到政治局，周嫌太遲緩。在這以後，周找李先念、紀登奎、蘇振華、吳德、葉劍英等談話，18 日鄧小平回來以後，晚上就同周恩來談話。5 月 21 日，周恩來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寫信，指出是姚文元的文章最先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信中還提到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會議上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周建議將這封信送毛。張春橋在周恩來信的傳閱件上批道「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周恩來致信張春橋，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的來電中證明，張 3 月 1 日在總政的講話中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說：「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

---

<sup>56</sup>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 年 5 月 3 日，此件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轉引自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 年版）。《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 卷第 582-584 頁有此內容。

<sup>57</sup>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 2130-2131 頁。

確切，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身患重病的周恩來要把張春橋的錯誤坐實，為政治局批江青的會議作準備。周對譚震林、汪東興談到他的病情時說：「我估計還有半年」，他要求醫務人員把他的病情如實告訴他，以便於他安排工作。<sup>58</sup>

為什麼從毛到高層官員對反經驗主義一事大做文章？因為反經驗主義就是反對已經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反經驗主義也是反對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就是批周恩來的經驗主義。文革已經搞了九年，毛需要「安定團結」，毛離不開周恩來這一批老幹部。在反經驗主義這個理論問題上做文章，說明毛在保衛文革和恢復秩序這兩個對立的問題上進退兩難。

5月27日，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毛的談話為依據，批判江青等人。鄧小平作中心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談對毛的5月3日的談話的理解，他說，主席批評搞「四人幫」，關係到政治局的安定團結，關係到「三要三不要」<sup>59</sup>的問題。針對江青等認為4月27日對她的批評「過頭」一事，鄧說「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過頭』，談不上『突然襲擊』。」他強調江青的「三件事需要講清楚」：把1973年12月的批周恩來和葉劍英的事說成十一次路線鬥爭，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反走後門，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1975年又批經驗主義。倒是問一問，這是為什麼？不講明白，沒有好處。」鄧小平作發言時非常嚴厲，還憤怒地拍桌子。李先念在發言中也強調4月27日對江青的批評沒有過分。吳德、陳錫聯也發言要求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幫」。

5月28日，就批判「四人幫」問題，周恩來同鄧小平長談，在此前後，周同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王洪文、蘇振華等人談話，瞭解中央政治局批判「四人幫」的情況。<sup>60</sup>

---

<sup>58</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706-708頁。

<sup>59</sup>即毛在199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南巡時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sup>60</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709頁。

6月3日，政治局接著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開批判江青的會，開始有點冷場，因為大家還摸不清毛對江青的態度。葉劍英發言打破僵局。葉的發言中指出，4月27日的會議和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是不同的（江青等人認為4月27日的會和廬山會議進攻張春橋是相同的），是對的。他說，江青提十一次路線鬥爭、反走後門、反經驗主義，都沒有請示主席。葉就這三件事嚴厲質問江青等人。在多數政治局成員的逼問下，王洪文在會上不得已作了檢查，他說：「一年多來，總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發生的問題，主要由我來負責。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幫。反走後門，我是贊成的。兩次大會，我參加了。事先沒有報告主席。」<sup>61</sup>在這幾次批判江青的會議上，批判者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毛批評江青的口徑，只抓住「三件事」窮追猛打，不敢超越「三件事」，還小心翼翼地肯定1973年12月批判周恩來、葉劍英的會是正確的。可見政治鬥爭的微妙。

6月初，毛讓江青到鄧小平家找鄧談話。鄧小平後來說，主席叫她來，她不敢不來。談得不好，好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sup>62</sup>可見江青並沒有向鄧小平認錯，只是按毛的要求，緩和關係。

第一次批評會開完後，江青向毛訴苦，說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反攻倒算」，毛沒有鬆口。讓江青寫書面檢查。6月28日，江青交出書檢查。6月30日，周恩來將江青的檢查批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表示歡迎這一檢查，並建議將江青的檢查送毛主席閱。毛圈閱了此件。

據稱，檢討以後的江青，一掃以往那種不可一世的驕橫氣焰，變得異常沮喪，連續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從1975年6月下旬開始，根據毛的意見，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經毛澤東同意，從1975年7月初開始，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江青並不服氣。1975年9月，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縣召開。江青邀請新聞記者和她帶去的幾十名文藝工作者，共100多人吃飯。席間，江青說：「在北京他們整了老娘一個多月。」

對這次批判江青，毛澤東的態度到底怎樣呢？毛雖然批評江青等

---

<sup>61</sup>政治局批評「四人幫」會議記錄，1975年5月27日、5月3日。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522-523頁。

<sup>62</sup>《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3頁。

反經驗主義，但認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鄧小平是不是借機小題大做？還是周恩來真正瞭解毛澤東。1975年4月28日，在江青第一次挨批的第二天，周找吳德到305醫院談話。周心情沉重地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的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sup>63</sup>據紀登奎說，這期間周恩來找他談話時，除了注意聽外面的動向以外，還表現出對形勢的隱憂。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澤東態度，說主席還在看，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形勢可能還會起變化。<sup>64</sup>

---

<sup>63</sup>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162頁

<sup>64</sup>高文謙訪問紀登奎記錄，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75頁。



## 第二十六章

# 從全面整頓到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聲討鄧小平的群眾遊行

## 一、鄧小平全面整頓

四屆人大組閣老幹部占了優勢，江青挨了批判以後暫時認輸，不僅寫了檢討，還到鄧小平家裏示好。毛讓鄧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鄧小平順風順水，該是他放手大幹的時候了。他要幹什麼呢：他要通過全面整頓，收拾文革造成的亂局。社會要安定，經濟要發展，生活要改善，這是老百姓的要求。在任何社會，群眾都不可能持有持續的政治熱情，文革中搞了八九年，反反復復地多次折騰，原來滿懷政治熱情的人也厭惡政治。被運動折騰得疲憊不堪的人們，正希望有人出來結束亂局。在當時，鄧小平全面整頓是得人心的，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然而，毛澤東還在世，經過多年的灌輸，繼續革命理論在不少人心目中還起作用，造反派雖然被邊緣化，但勢力猶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勢必與多年宣傳的理論、與文革造成的政治格局相衝突。為了取得全面整頓的合法性、懾服反對者，鄧小平打出了毛澤東的牌子：「以三項指示為綱」。

「以三項指示為綱」是指用毛的三項「最高指示」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哪三項指示呢？一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林彪事件以後，毛多次講了要安定團結。1974年8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會上，毛在談到對跟林彪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軍都要團結。」<sup>1</sup>這表明了他要結束文革的願望。

搞好國民經濟是任何一個執政者都必須做的事。在文革中毛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但革命有時會衝擊生產，批林批孔運動一度使經濟受到負面影響。1974年10月20日，在長沙，李先念向毛彙報國民經濟的情況時，毛對李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這以後，毛又表示過要搞好國民經濟的意思。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毛最為關心的事，他講了很多話。1974

---

<sup>1</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543頁。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5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發 [1975] 5 號）。這個通知轉發了毛關於理論問題的一系列指示。

這「三項指示」中前兩項是當時的緊迫問題，後一項是毛的長遠戰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認為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小生產都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還是他 1958 年那種烏托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也包含這些內容。從根本上說，要真正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得發展商品經濟，毛澤東前兩項指示是和第三項指示是衝突的。鄧小平把這「三項指示」捆綁起來，作為「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實際上，他只落實前兩項，將「學習理論」虛置。「以三項指示為綱」實質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當時，從上到下都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種勢力在較量。文革派強調「學習理論」；官僚派強調「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官僚派的主張符合當時中國緊迫需要，所以稱他們為「務實派」。實現安定團結，就是打壓「派性」。打壓「派性」是以「建立生產秩序」的名義進行的。在鄧小平這一類老幹部心中，「派性」就是造反派對權力機構不順從。打壓「派性」的重錘，最終落到那些不順從的造反派頭上。在一些地方，打壓「派性」，成了老幹部對造反派實施報復的藉口。此時進入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多數已被排擠出來。文革中產生的革委會，已經恢復為文革前的官僚機構，還繼續留在官僚機構裏的造反派頭頭（一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都變成了官僚，再不是「群眾代表」了。

為了「全面整頓」，鄧小平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5 年 7 月 5 日設立的，是鄧小平的智囊）起草了三個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由胡喬木、鄧力群、胡績偉等人起草的。這個文件批評「打著紅旗造反」的人說：「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的階級基礎，有的本來就是地、富、反、壞、老資產階級分子，有的是從小生

產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幹部一部分中、黨員一部分中蛻變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這正是文革初期，官僚集團評價造反派、鎮壓造反派時通用的說法。還說：「如果不把這些階級敵人鬥垮，不把他們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的任務，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評「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他們熱衷於拉山頭，打派仗，長期糾纏於所謂這一派和那一派的鬥爭，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的鬥爭，所謂『儒家』和『法家』的鬥爭。有的甚至為了達到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氣。」文件向搞派性的人指出了兩種選擇：「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造反』，就要看他造哪一個階級的反，是代表哪一個階級在造反」。「『反潮流』，就要看他反什麼性質的潮流，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還是反修正主義的潮流，是反正確的潮流，還是反錯誤的潮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們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些武器來反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來反對無產階級。」這實際是否定毛澤東號召的「造反」、「反潮流」，否定毛澤東提倡的「四大」。

這篇文章於1975年10月寫成，由於政治風向已變，沒有發表。

第二個文件是「工業二十條」（即《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是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等人起草的，於1975年11月完成。這個文件規定，要堅決整頓企業的領導班子，調整那些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復舊」、「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提倡建立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大膽放手抓生產。這個文件是整頓企業的綱領性文件，但沒有下達就轉了政治風向，其精神已傳達到基層。

第三個文件是《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這是胡耀邦、李昌等人主持搞的。當時科技人員大多被迫脫離了科技工作崗位，當體力勞動者使用，頭上還戴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個文件強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真正發揮作用；強調搞好科技工作。文件引用毛的話「科學技術是生產

力」，毛後來不承認他說過這句話。這個文件也來不及下達，但在知識分子中傳開了，很受知識分子歡迎。

這三個文件雖然沒有下達，但鄧小平早就成竹在胸，全面整頓已經展開了兩個月之後的5月8日，才在整頓鋼鐵時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

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動脈，當時的「動脈」經常堵塞，鐵路的貨運量計劃完不成，客車晚點幾個小時是經常發生的事。有些路段癱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必須首先使鐵路暢通。在鄧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發〔1975〕9號）於1975年3月5日發出。文件規定，「鐵路運輸必須由鐵道部集中指揮，鐵路職工必須由鐵道部統一調配，鐵路的政治工作和運輸指揮工作必須統一起來。」這個文件將鐵路系統的幹部任免權收歸鐵道部。「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特別強調要「整頓鐵路運輸秩序，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九號文件經過毛澤東「圈閱」，是整頓鐵路的「尚方寶劍」。

拿到「尚方寶劍」的鐵道部長萬里，3月9日就到問題嚴重的徐州鐵路局，召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宣傳九號文件，果斷地調整了領導班子，逮捕了顧炳華等一批造反派頭頭。徐州鐵路局的秩序很快恢復，貨運量成倍增長。4月，萬里又帶領工作組到太原、鄭州、南昌等鐵路局，推廣徐州經驗。調整了領導班子，對派性嚴重的幹部撤職或調離。批鬥了近萬名派性嚴重的人，逮捕了2000多名違法犯罪分子，槍斃了一百多人。<sup>2</sup>大刀濶斧的整頓，鐵路秩序恢復了，堵塞疏通了，絕大多數鐵路局超額完成了計劃。這種運動式的鎮壓，難免有錯捕和錯殺的，被批鬥的近萬人中也難免有冤案。這為幾個月以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留下後患。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徐州地區貫

---

<sup>2</sup>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531頁。

徹執行中央 9 號文件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報告》反映：在整頓前，「許多領導幹部陷進了資產階級派性的泥坑。在相當多的單位中，不是用黨性掌權，而是用派性掌權。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權又整這一派。幾經反復，裂痕很深。」「近幾年來，那些用派性掌權的同志，又借各種運動之機整另一派的幹部和群眾。批林批孔運動一來，原來掩蓋的矛盾爆發了。」「壞人就趁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打著『揭蓋子』的旗號，欺騙、拉攏少數群眾，向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瘋狂進攻，妄圖趁機推翻各級黨的領導。」

江蘇省的這個《報告》總結解決徐州問題的經驗是，緊緊抓住解決領導班子問題這個關鍵，對派性嚴重的領導幹部，要敢批、敢鬥、敢捅「馬蜂窩」，限期改正錯誤，到期不改，採取組織措施。對群眾堅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擊。對極少數壞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群眾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考江蘇的經驗，解決各地區的問題。

敢批、敢鬥、敢捅「馬蜂窩」的鐵手腕，會引發一些人的反彈。政治風向一轉，在整頓鐵路中受到打擊的人紛紛到鐵道部告狀。鐵道部牆上貼出了「萬里鎮壓造反派罪該萬死」「揪出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萬里」「萬里不倒，鐵路不跑」的大標語。到鐵道部上訪人數越來越多，最多高達 400 人。萬里等人的辦公室也被上訪者佔領了。<sup>3</sup>

蘭州鐵路局和鄭州鐵路局是兩個突出的例子。

蘭州鐵路局與省委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兩家的矛盾就很尖銳。在蘭州鐵路局內部，省委支持紅三司一派，鐵道部支持紅聯一派。當時中共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時發了三個文件，表態支持紅三司，軍隊就支持紅三司，爭取和團結另一派。但是，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1975 年中央九號文件決定把鐵路局收歸鐵道部統管。鐵道部派黎光整頓蘭州鐵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紅三司這一派撤換了近千名幹部，把鐵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來了，翻了「燒餅」。矛盾重新激化了。整頓不到半年，全國搞反擊右傾翻案風。被黎光工作組整頓下去的那

---

<sup>3</sup>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記實》，新華出版社，2008 年，第 155-156 頁。

一派乘機又鬧起來了，黎光又來蘭州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被群眾圍鬥，省裏沒有支持他。1976年2月，黨中央領導人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叫洗恒漢上北京，和鐵道部一道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會上明確指示，蘭州鐵路局以整頓為名是搞了右側翻案風，黎光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蘭州鐵路局仍然交給省委管。並且把當時鐵道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檢查送給洗恒漢，讓他修改。洗一字未改送了回去。第二天，華國鋒又派人給洗送來，說鐵道部搞了右側翻案風，是「三個總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要翻案、總是要算賬）的問題，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叫洗大膽修改。同時又讓洗寫一個《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希望洗寫的具體內容（包括點鐵道部和黎光的名）。在討論蘭州鐵路局領導班子時，紀登奎和萬里說「幹部由甘肅解決。」洗說：「甘肅沒有懂這行的幹部，還是由鐵道部派人。」紀登奎和萬里說：「鐵道部派不出來，還是由趙滔搞。」，趙滔不願幹，就把他叫到北京，紀登奎和萬里同他談話，趙才表示繼續幹，但要求在省上掛一個職務。這樣，趙滔就在省上掛了個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鐵路局的班子就是在紀登奎和萬里的主持下定了下來，寫進了洗署名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中，並報毛澤東批准（蘭州軍區黨委和甘肅省委1982年11月給洗作的審查「結論」中說洗「重新奪了蘭州鐵路局的領導權」，這是後話）。

1976年2月中旬，洗恒漢帶著中央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指示，回來貫徹執行。在貫徹中，路局新成立的黨委把原來整頓中不該撤換的幹部又複了職。半年以後，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鐵路局兩派又鬧了起來，鐵路局又處於癱瘓狀態。1976洗恒漢到北京參加毛澤東的弔唁活動，對華國鋒說：「蘭州鐵路局可能要出點麻煩」。華國鋒當時說：「蘭州鐵路局問題是今年2月定的，是經過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毛主席同意的，還要繼續執行。有人找麻煩，還是照此辦。」紀登奎插話說：「中央作過結論的問題，絕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傾翻案風，堅決給以回擊。」<sup>4</sup>

---

<sup>4</sup>《洗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第二部，電子版載：「1977年6月7日、8日和9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我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加上我、韓先楚、肖華與宋平。」

鄭州鐵路局和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差不多。就在這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也被叫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他和洗恒漢兩人同住京西賓館。由於面對共同的情況，有共同的看法，他倆在一起發了一些牢騷。

在鄭州，抵制鐵路整頓的是唐岐山。唐岐山，1931年1月生，河南開封人。195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為鄭州鐵路局鄭州機務段司爐、副司機、司機。參加過朝鮮戰爭，文革開始後任鄭州鐵路局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工代會副主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他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開始，唐岐山支持百輛汽車大遊行，組織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2月8日，劉建勳、唐岐山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解決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其中說：「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主要是局黨委第一書記蘇華同志刮右傾翻案風，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這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絕不是孤立的。這是同鐵道部主要負責同志的錯誤指導思想分不開的。」還批評在整頓中「沒有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sup>5</sup>洗恒漢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也是批評鐵道部搞右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了劉建勳、洗恒漢的意見。萬里不得不作檢查。

整頓鐵路初見成效以後，又以鐵路為樣板對工業系統也進行了整頓。1975年5月8日到29日，鄧小平主持了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讓萬里介紹了整頓鐵路的經驗。29日，鄧小平講話中認為，鋼鐵工業整頓首先要建立健全企業的領導班子。還要同派性作鬥爭。他說：「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的就鬥，不能慢慢吞吞。……要發動群眾跟他鬥，寸步不讓，而且要有一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sup>6</sup>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第一次提到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這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刪除了這句話。

---

本書引用的是洗恒漢寫的這個會上的情況。

<sup>5</sup>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記實》，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150頁。

<sup>6</sup>《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頁。



鄧小平雄心勃勃，除了整頓鐵路和工業以外，他還提出「整頓軍隊」、「整頓文藝」、「整頓科技」、「整頓教育」、「整頓農業」等，這就是他的「全面整頓」。

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的幹部會上講話，傳達毛主席「軍隊要整頓」的指示。在「三支兩軍」中，軍隊幹部，派出去一批，提拔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一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幹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幹部大量超編成了突出問題。一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一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一直到基層，也都是一個正職，多個副職。「三支兩軍」中軍隊權力擴張，腐敗也相當嚴重。鄧小平抓軍隊五個問題：「腫、散、驕、奢、惰」。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軍隊調整編制體制等問題。葉劍英、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整頓」的任務。<sup>7</sup>部隊各級軍政首長，一個正職，一兩個副職，剩下的統統清理。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中央軍委發出調整配備解放軍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幹部的通知。在軍隊裏，張春橋是政治部主任，主管幹部任免。但是，鄧小平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他一當總參謀長，很快把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了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人的時候，張春橋不瞭解這些人，無法反對。張春橋向王洪文抱怨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不過是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治部上報，報告上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sup>8</sup>

在全面整頓中，鄧小平除了抓全局性的大事以外，還注意抓省一級領導班子調整，他希望一些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站在他這一邊。

1975年秋，在中共中央任命賈啟允為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之前，鄧小平叮囑他到雲南後要堅決反對派性，抓好領導班子的調整，團結、使用和依靠老幹部。鄧小平對賈啟允說：「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人家罵你搞復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

<sup>7</sup>《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59-60頁。

<sup>8</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373頁。

在趙紫陽到四川赴任省委第一書記之前，鄧小平也找趙談了話，也講了對賈啟允說的那些話。1976年3月，賈啟允在批鄧中揭發了鄧小平與他的談話，成為批判鄧小平的一顆「重型炮彈」，趙紫陽卻秘而不宣。「四人幫」被抓、鄧第三次出山以後，賈啟允被革職，趙紫陽調到中央擔任要職。可見，在政治鬥爭中「站隊」後果的嚴重性。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到上海，送走外賓後，鄧小平把馬天水請到他住的賓館，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馬天水，1912年生，1931年入黨，行政7級。文革期間，他是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員。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工業很有起色（文革期間我在天津當工業記者，聽到天津人抱怨「北京有楊壽山，上海有馬天水，天津無山又無水」，意思是天津缺乏領導工業的得力幹部，所以工業落後於上海和北京）。鄧小平說：「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一個批示。你知道嗎？」馬天水回答知道，說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記者告訴他的。鄧進一步問：「你想過沒有？他們批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的代表人物是誰？他們要揪人囉！」「有人講批林批孔是11次路線鬥爭的開始，是什麼意思？！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鄧還對馬說：以後到北京，直接找李先念、餘秋裏，「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鄧小平哪里知道，馬天水雖然是老幹部，在想法上和他是格格不入的。鄧小平走後，馬天水就向上海市委徐景賢、王秀珍等說了鄧小平和他的談話。馬天水還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交給王洪文。1976年2月，在中央的批鄧打招呼會上，在張春橋的鼓勵下，馬天水作了揭發性發言，說鄧小平「挖牆腳」，成了批鄧的「重磅炮彈」。<sup>9</sup>

「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一大批堅持「派性」的人受到打擊，生產秩序有所好轉。鄧小平把整頓的手伸進了江青的領域——文藝界。鄧小平多次向毛進言，毛澤東表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

---

<sup>9</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香港，第352-353頁。

這些，都符合群眾的要求。

到 1975 年 7、8、9 三個月，除了受到打擊的造反派有不滿情緒以外，多數人是支持鄧小平的。

但是，到 10 月，政治風向變了。

## 二、毛澤東轉變了態度

不能否定文革，這是毛的底線，誰觸犯了這個底線，誰就要倒黜。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觸犯了這條底線，毛不支持鄧了。毛是怎樣得知鄧小平觸犯了他的底線呢？他的侄子毛遠新起了重要作用。

毛遠新，1941 年生於新疆，毛澤東弟弟毛澤民之子。1942 年 9 月，在新疆主政的軍閥盛世才將在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杜重遠、林基路等百余共產黨人關押，最終將陳潭秋、毛澤民等殺害。毛遠新的母親改嫁給江西省副省長方志純。毛遠新隨母到了江西。後來在北京上育英小學、101 中學，1960 年，毛遠新進入了清華大學無線電系，一學期後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4 年，毛遠新回北京度假時，毛澤東同他有一次談話。談到「接班人的五條標準」，談到「階級鬥爭是學生的一門主課」，要求青年要不怕吃苦等。這個談話在大學生中正式傳達。所以，大學生都知道毛遠新這個人。文革開始，毛遠新在哈軍工參加組織「紅色造反團」。1974 年，毛遠新在瀋陽部隊擔任要職，後擔任遼寧省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5 年 9 月下旬，因為他父親犧牲在新疆的緣故，毛遠新隨中央代表團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典，經過北京時，9 月 27 日向他伯父毛澤東彙報了東北文革情況，10 月 10 日，毛遠新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毛澤東把他留下，讓毛遠新當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的健康每況愈下，行動困難。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的手抖得厲害，拿不住筷子，吃飯、喝水都需要人喂。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字句。中國的命運就系於這樣一個病夫的身上。

1975年9月27和11月2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情況，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特別提出：這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復。」「1975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sup>10</sup>

在毛面前說「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僅有毛遠新，還有別人。毛對鄧小平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全是毛遠新等人的影響。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就在毛遠新到他身邊之前。

毛澤東眼睛不好，請北京大學女教師蘆荻給他念古文。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點，蘆荻向毛請教《三國演義》、《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時，問毛：《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句話是不是主席說的？毛澤東說是自己在武漢說的。蘆荻問：既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麼，《水滸》還有什麼好的呢？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而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毛澤東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毛說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實。他提出：「《水滸》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11

為了儘快出版《水滸》的三個版本，當天，就將毛的談話稿送

<sup>10</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619頁。

<sup>11</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602-603頁。

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立刻向毛寫請示報告，請示報告說：接到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後，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目。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於反修防修，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姚的報告還對如何貫徹毛的指示提出了具體意見。毛批示：「同意。」8月18日，姚文元就向毛報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關於評論《水滸》的規劃，兩報的規劃都從批判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調和論以及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擬出了一些選題。毛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同意。」<sup>12</sup>從此，報刊上一陣掀起了批判《水滸》的高潮，一些單位組織了評《水滸》的「理論小組」。

文革派當然會利用毛評《水滸》的指示，江青立刻活躍起來。8月下旬，她同文化部長于會泳、副部長劉慶棠談所謂評《水滸》的「現實意義」，聲稱「《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sup>13</sup>她所說的「有人」，顯然是指周恩來、鄧小平這股力量。周恩來病重，主要是鄧小平了。九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江青和鄧小平唱起了對臺戲。鄧小平在會上講整頓：「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江青卻大談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她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和歷史評論，它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一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佔據了各重要崗位。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在醫院裏的周恩來對評《水滸》非常敏感。他讓人找來《水滸》的幾個版本進行研究，說：「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

<sup>12</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604頁。

<sup>13</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6卷，第605頁。

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作的！」<sup>14</sup>7月1日，周恩來在會見泰國客人，由李先念和喬冠華陪同，客人走後，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還沒有走，醫院工作人員要求同周合影。周恩來答應了，當排好位置、杜修賢正要拍攝時，周恩來說：「這是我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叉。」<sup>15</sup>9月20日，周恩來再一次動手術，手術前，他要來了自己於1972年6月在批林批孔彙報會上所作的關於所謂伍豪事件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簽上自己的名字，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9·20」。在進入手術室時，周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sup>16</sup>

鄧小平極力把毛關於《水滸》的談話和現實鬥爭分開。8月21日，胡喬木問他，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談話是不是特別有所指？鄧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sup>17</sup>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時，談到評《水滸》批投降派時，代表團成員問：你能不能告訴一下，現在中國有什麼投降主義的實例？鄧小平回答說，劉少奇、林彪就是。

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毛對黎筍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也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鄧小平）只有他算一個壯丁。」送走黎筍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最近工作。當談到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時，毛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此前，華國鋒向毛請示說，江青要求放她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毛指示：

<sup>14</sup>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352-353頁。

<sup>15</sup>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0-361頁。文革中，某人被打倒，就在他的名字或照片上劃××，周恩來擔心自己會被打倒。

<sup>16</sup>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裏——記病重住院的周恩來同志》，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華夏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79頁。

<sup>17</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04頁。

「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sup>18</sup>面對領導危機，毛澤東怕江青搞亂局面，他還需要鄧小平這個「壯丁」維持局面，他壓制江青。但是，他看到清華大學劉冰的兩封信後，決定放棄平衡政策，全力保衛他平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劉冰，文革前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作為他當年的學生，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他在學生中極力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在《光明日報》上還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長篇文章。我感覺他是一位堅定的、嚴厲的政治工作者。第二件事是，大概在1966年6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大禮堂前大草坪西南角處看大字報，突然幾輛小轎車從二校門開了過來向左轉向工字廳。我看到一個人從小車裏伸出腦袋大喊：「我是黑幫！我是黑幫！」這就是劉冰，他向路邊圍觀的人顯示「態度好」。他的這種表現，使我多年對他有不好的印象。讀了他2008年出版的《風雨歲月》，我才懷疑我看錯了或者聽錯了。從他的書中得知，6月28日，他被從北京飯店押回來，他寫到「從二教到工字廳」這一段路（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的情況時說：「我胸中燃燒著憤怒的火焰，我不能容忍對我人格的侮辱，我奮力大聲叫著：『你們太不像話，我抗議！』」<sup>19</sup>

文革初期劉冰被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打倒」。由於他態度好，清華「4·14」這一派1968年就想支持他「站出來」。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數萬名解放軍和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結束了兩派武鬥。196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冰被「解放」的消息，成了被「解放」的老幹部典型。1970年1月，由於劉冰「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了，成了清華校黨委副書記，1972年成了常務副書記。工宣隊進入清華後，校黨委書記由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兼任，革委會主任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兼任。1972年1月，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宣傳科長遲群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工宣隊第一把手。毛澤東的機要員謝靜宜成為校黨委副書記。他們自稱「毛主席的兩個兵」，掌握了清

<sup>18</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0頁。

<sup>19</sup>劉冰：《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第67頁。

華大學黨政大權。一些文革史把遲群、謝靜宜說成是造反派，這是誤會。他們沒有造過反，相反，他們是毛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拋棄了造反派之後，被毛派到清華去收拾反派的。他們不是造反起家，而是收拾造反派起家的。但他們的思想體系是跟著毛的，是肯定文革的。

黨委常務副書記劉冰，和遲群、謝靜宜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在工作上都格格不入。在政治傾向上，遲群、謝靜宜是文革派；劉冰傾向鄧小平。劉冰傳達鄧小平 8 月 3 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謝靜宜大嚷大叫：「我和遲群都告訴過你，凡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向下傳達時要經過我們，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就傳達呢？」劉冰看到「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一尊凶神」。劉冰回答說：「鄧小平是黨中央副主席，他的講話為什麼不能傳達？我這個主持黨委常務工作的副書記，沒有權力和義務傳達嗎？」謝靜宜無言以對，氣呼呼地甩了甩頭髮，扭頭走了。<sup>20</sup>

遲群、謝靜宜和劉冰等人的矛盾已經公開化，黨委無法工作。劉冰和校黨委副書記惠憲鈞、柳一安、黨委常委呂方正於 1975 年 8 月 13 日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告狀信，只告遲群 1 人。惠憲鈞、柳一安、呂方正三人都是 1968 年 7 月作為工宣隊的領導成員進駐清華的。

信中先是肯定了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形勢大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志在讚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作風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信後附《關於遲群同志問題的材料》。其中列了六大問題：一，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二，毫無黨的觀念；三，搞一言堂，家長式惡劣作風；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五，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說遲群「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這個問題時寫道：「十大和四屆人大後，他沒當上中央委員，沒當上部長，極端不滿，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

---

<sup>20</sup>劉冰：《風雨歲月 1964——1976 年的清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第 174——175 頁。



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一個人跑到校外的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一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鏡，摔傷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砸碎。……」告狀信的前面寫「小平同志轉呈主席」。

這封信寫成後，劉冰先是請胡耀邦送鄧小平。胡耀邦說，我現在是科學院負責人，你是清華大學的，不屬於一個系統，我幫你轉信不合適。後來，他們直接到鄧小平家門前，通過門前的警衛戰士轉給鄧的秘書王瑞林。信送上去後一個多月沒有音訊。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謝靜宜兩人。說謝靜宜「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十大以後遲群發洩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著遲群的手講一些不合原則的話」「我們期盼中央解決我們的班子問題」。這封信還附有《關於遲群同志的錯誤補充情況》。第二封信寫成後，王瑞林不願意接收，就通過教育部原副部長李琦轉給胡喬木，由胡喬木轉給鄧小平。

劉冰並不是寫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寫字的直接起因是清華工宣隊原負責人之一柳一安。柳原是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幹部，一度從清華工宣隊調往學部工宣隊。他從學部工宣隊工作又調回清華，遲群沒有給他安排工作。柳開始發起並聯繫惠、呂二人，準備聯名「上書」毛澤東，反映遲群的問題。惠、呂二人想到，寫信給毛澤東本人，還必須有一個比他們「高一位」的清華主要負責幹部署名更有力量。經過劉冰的同意，他們四人達成了寫信給毛澤東的決定。他們四人寫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澤東派人來清華大學瞭解遲、謝問題，進而最終把遲、謝從清華「搬走」。

毛澤東看了第一封信後對秘書說「先放著」。第二封信告了謝靜宜，謝靜宜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毛澤東看了第二封信後讓秘書把第一封信找出來，又看了一遍。在這期間，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彙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毛澤東聽了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

發在遲群身上。」<sup>21</sup>毛澤東早就對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言論和行為十分不滿，他需要找一個導火線，劉冰的兩封信給毛澤東以導火線。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夫人後同李先念、汪東興等談話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一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sup>22</sup>毛從說批江青轉到遲群和小謝，說明他對幾個月前批判江青耿耿於懷。毛還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sup>23</sup>

如前所說，劉冰的信只不過是導火線，真正的原因是毛對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否定文革不滿意，對鄧小平猛烈地批評江青不滿意。早在4月28日批評江青的第二天，周恩來就預言「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sup>24</sup>在周恩來看來，眼下正是今後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重病纏身，來日無多，鄧小平已經掌握實權，只要穩紮穩打就行了。當時周恩來曾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葉劍英也有同樣的看法，但鄧小平聽不進去。形勢逆轉後葉劍英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碰南牆是不會回頭的。」<sup>25</sup>

毛澤東終於反攻了，不過，開始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鄧小平，而是要他肯定文化大革命。

### 三、毛澤東要鄧小平肯定文革

1975年11月2日，聽了毛遠新關於鄧小平等對文革態度的彙報以後，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

---

<sup>21</sup>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第377頁。

<sup>22</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4頁。

<sup>23</sup>同上。

<sup>24</sup>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162頁。

<sup>25</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76頁。

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你和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sup>26</sup>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1月2日晚，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同鄧小平一起談話。毛遠新提出了11個問題，毫無保留地一一進行批評。鄧小平說：「遠新同志啊，照你這麼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囉！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sup>27</sup>年輕氣盛的毛遠新很不客氣地對鄧小平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sup>28</sup>鄧小平雖然不同意毛遠新的意見，但還是表示要檢討。

11月3日，毛遠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彙報了四人談話情況，毛澤東說：「你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你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毛遠新說，小平同志後來收回了原來的話，毛澤東聽了很高興，說：「他要有個轉彎，他開始轉彎了，小平同志態度好。」毛澤東指示，談話增加四個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毛說：「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好。你們八個人先討論，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著急。」<sup>29</sup>

11月4日晚，毛澤東聽取毛遠新彙報8人討論的情況。毛遠新說，他們對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意見很大。當彙報到汪東興講「主席

<sup>26</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9頁。

<sup>27</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0頁。

<sup>28</sup> 在批鄧期間，毛遠新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房間的講述。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第375頁。

<sup>29</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0—621頁。

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時，毛澤東點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毛遠新請示會議的開法時，毛澤東說，會議還要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就是幫助他（指鄧小平）及大家，互相幫助，搞好團結，搞好工作。毛澤東交待：會議的情況，不要告訴江青，什麼也不講。<sup>30</sup>他怕江青感情用事，打亂他的政治平衡。

毛澤東不要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要按勞分配，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實現全民完全平等的「大同」理想。1958年，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造就了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饑荒。文革中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他理想的「天國」。他已到垂暮之年，自認為這是他最後一個國慶節，他自知文革的目標肯定不能實現，但他希望把這個理想傳下去，讓後來人實現。

「八人批鄧」開始後，鄧小平判斷：主席不信任他了。於是向主席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軍職。毛主席同意了小平辭去軍職的請求，但仍然讓小平負責分管外交工作。<sup>31</sup>政治上已經不被信任，還緊握軍權不放，對自己對毛澤東都是十分危險的。林彪的結局就是前車之鑒。鄧小平明智，毛澤東也很警覺。

11月13日，為了讓更多的幹部對批評鄧小平有思想準備，以免被動，毛澤東指示向更多的幹部「打招呼」，並寫了一個批語：「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到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一情況。這一些老志要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

<sup>30</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1頁。

<sup>31</sup> 紀坡民：《上臺下臺，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共識網，：2013-10-14 10:25。

李井泉等幾十個人要打招呼。」<sup>32</sup> 主管教育的周榮鑫，主管科技的李昌、胡耀邦，參與起草「三項指示為綱」的胡喬木等，都是支持鄧小平搞全面整頓的，都處於挨批評的地位。

持續八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停止了。

11月15日、16日，按毛澤東的指示，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等列席會議。鄧小平主持會議，讓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對劉冰信的批示。列席者也被迫對寫信、轉信做出了交待和檢查。劉冰第一次聽到毛對他的告狀信批示的全文，11月2日，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清華只傳達大意。劉冰在他的書中描述了聽到毛遠新傳達時的心情：「真如晴天霹靂！我靠在沙發上，腦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律加快，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會場上什麼人再說什麼，我全都沒聽到，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說我矛頭對著他老人家，真是天大的冤枉！」<sup>33</sup> 在這之前，清華大學舉行了十多次「辯論會」，批判劉冰。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回校後，清華召開了萬人規模的「辯論會」，實際是批判劉冰的萬人大會。

鄧小平以退為進，試探毛對他的態度。11月15日，鄧小平給毛寫信說：「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時，經主席批准，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開的17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請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再說。」<sup>34</sup> 毛澤東這個批示，雖然暫時讓鄧繼續主持中央工作，但模稜兩可，看不出他對鄧的態度。

毛沒有明確的態度是因為他在接班人的問題上遇到了困難。

毛希望王洪文他能成為接班人。在中共十大上，他讓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他在工總司中有威信。他處事比一般造反派謹慎，為人隨和。工總司總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間會有所不服氣，但對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數幾個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貼的。但是，

<sup>32</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3頁。

<sup>33</sup> 劉冰：《風雨歲月 1964—1978年的清華》，當代或國出版社，2008年，第208-209頁。

<sup>34</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4頁。

火箭式的提拔，他不能在各個臺階上積累經驗，也無法建立各層人事關係。他又不是一個努力學習的人。一次接待一個外國總統，他事先沒有準備，連外交部送來的材料也沒看。接待時什麼也談不出，只翻來覆去地問那位總統：你到中國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存心記錄這些話，寫成簡報送毛，毛看了很生氣。有一次毛同王洪文講張勳復辟的事，王不知道張勳是誰，毛只好說，你自己去查。毛對王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葉劍英寫信給毛，建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批示「同意」。從7月開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sup>35</sup>

政治上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後就不打算去北京了。他對上海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說：「文化大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我這個副主席，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不承認新幹部，好多地方新幹部都被打下去。還要圍繞文化大革命鬥。你看鄧小平的講話，不很清楚了嗎？」王洪文在上海無所事事，除了視察工作，就是吃喝、打獵、釣魚、看電影。馬天水說：洪文在上海沒事幹，鄧小平這個人很能抓權，我們要勸他趕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權沒有了，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沒有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次勸王洪文回去。

11月15日，王洪文回到北京。他依舊吃喝、打獵、釣魚。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一次，王洪文又被葉劍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後，他的學習輔導員肖木同他談了三個小時，勸王洪文不要沉湎於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說：「我有我的難處，我難以展開工作，許多人根本不承認『十大』的路線，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認。只有葉帥是支持我的，葉帥叫我回來，我也不好推辭。」<sup>36</sup>

毛澤東拋棄了他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只能期待鄧小平。毛澤東最期待的是鄧小平表示支持文革，他讓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到生命最後的時刻，

<sup>35</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OXFORD 出版，香港，2015年，第1360頁。

<sup>36</sup>肖木同李遜的談話，轉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OXFORD 出版，香港，2015年，第1361-1363頁。

他最關心的是他平生做的第二件大事——發動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他希望官僚集團和文革派在文革問題上達成共識，共同接班。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即前面提到的17人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鄧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當，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sup>37</sup>

鄧小平說的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用毛澤東11月13日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上的，陶淵明原文是「無論魏晉」，毛說成「何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無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何論魏晉」。可見鄧的說法來自毛。如果這樣，那就是用毛的話來頂撞毛澤東。鄧小平真的在文化革命的評價上和毛頂牛嗎？文革被否定以後，所有寫文革的文章和書籍，對這個問題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對這個說法還需要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鄧小平一直是緊跟毛澤東的，反右派，大躍進，和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鄧都是站在前列的、態度十分堅定的主將。但他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在學生和群眾中抓「右派」等方面和劉少奇站在一起。為此，他作過多次深刻的檢查。在他向毛送上的多次檢討中，都表明了肯定文革、擁護文革、永不翻案的態度。就在毛讓他開會對文革作出評價的兩個月前，即1975年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講話中，就有對文革的一個非常合乎毛澤東口味的態度。當年新華社向編輯、記者傳達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下面是我當年的記錄：

代表團問：關於對水滸的評論，有的地方不理解。如果警告人民不要做投降派，是指國內還是指國外？

鄧答：是講國內的事，在某種意義上對國際有點用處。主要是兩點：第一點，這本小說是一部在中國影響很大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對它的評價存在著不正確的觀點。這部作品實際上是宣揚投降主義，需要在人民中澄清對它的評價。第二點，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有現實意義，但人民不要孤立地看對水滸的評

<sup>37</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25頁。

論，要從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來看。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我們的主要責任是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就是投降派。自從赫魯曉夫在蘇聯上臺以後，20年來把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搞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根據蘇聯的經驗，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國內完全復辟了資本主義，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必然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必然在世界上搞擴張主義，在世界上爭奪，必然要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特別是剝削第三世界國家。1956年蘇共20大以後，19年來，我們一直提出一個問題，即中國能否避免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道路？中國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認為必須避免，也可以避免。辦法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就是搞群眾運動，使人民都瞭解什麼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和不久前毛主席號召開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都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搞復辟，反對投降主義，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都是一個內容。現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開展對水滸的批判，也是理論學習內容之一。我們每搞一次運動，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批林批孔也好，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好，評水滸也好，國際上都要進行猜測，好像中國國內又出了什麼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人們不瞭解這是我們一貫的、至少是19年來一貫的路線。特別是自文革以來，在十年的時間內，我們用最廣泛的和家喻戶曉的辦法開展群眾運動，使人人都參加批判。有些人總猜測，是否發生了這個人同那個人的鬥爭，這一派同那一派的鬥爭？他們根本不懂，這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說中國有問題，這點不錯，中國是有問題，這就是兩個階級的鬥爭。不僅過去有，而且將貫串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今後還會有類似對水滸評論這樣的事。如果要猜就猜不完。他們可以每年猜一次或兩年猜一次也猜不完。如果人們能從毛主席制定的路線、政策來理解就明白了，就用不著每發生一件事就猜一次。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不稱霸就是要保證中國堅持社會



主義，不搞資本主義復辟。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要搞資本主義，就一定會成為社會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為此，我們就要不斷地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批判水滸就是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批判投降主義。我勸你們注意，你們別怕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你們要怕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儘管你們不喜歡社會主義。

代表團成員問：你能不能告訴一下，現在中國有什麼投降主義的實例？

答，劉少奇、林彪就是。在思想領域裏，資產階級思想總是存在的，這個鬥爭也是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

一，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代表團成員提出中國領導人繼承問題：怎樣把毛主席的路線和哲學思想繼承下去？

鄧答：我們自己非常注意這個問題。毛主席講，要培養接班人，所謂接班人，不是中央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培養千千萬萬個接班人的問題。我剛才告訴你們，包括評水滸就是幹這個事的。斯大林主要錯誤之一，就是沒有教育後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沒有搞群眾運動。所以，象赫魯曉夫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上了台，群眾雖然對他極不滿意，但也束手無策。鑒於這個經驗，我們根據毛主席的一貫教導，搞群眾運動，做到家喻戶曉，包括小孩子在內，使全國人民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什麼是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事情就好辦了。例如林彪叛逃時帶走的最大的隊伍就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婆娘。群眾有清醒的頭腦，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就提高了，這是對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可靠的保證，這些我們還要繼續做，恐怕還要做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我們每搞一次運動，世界上議論中國又再亂了。就是這亂，可有好處呢。每亂一次就提高一次人民的覺悟，就使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一步。斯大林死的時候蘇聯多平靜啊，就是這樣平平靜靜地復辟了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不平靜才能推動社會前進，社會平靜了，就死水一潭，社會不前進就死了。所以我們認為不平靜是正常的，

平靜是虛假的。

二，關於建立太平洋無核區的問題：

我們對核武器的原則立場有兩條：一是有核國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所有國家平等參加討論一起銷毀核武器。我們不提倡核擴散，但我們更反對核壟斷。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92頁，有9月5日鄧小平接見克羅斯為團長的新聞代表團的記載，但當年向我們傳達的內容，除了核武器的內容以外，一字也沒有記載。這樣的刪除，大概是怕這段文字削弱了鄧小平否定文革的堅定性吧？

毛讓鄧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決議，其意不僅是給鄧小平一個機會，希望他肯定文革以後和文革派聯手接班，還希望一些反對文革的老幹部轉變看法，然後在肯定文革的認識基礎上結束文革，在他有生之前為文革劃上一個句號。鄧小平認真考慮了毛澤東要他主持文化大革命決議的要求。他曾要紀登奎幫他起草這個決議，紀登奎開始答應，後來推掉了，鄧聽後大怒，氣衝衝地走了。<sup>38</sup>從鄧同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談話來看，鄧是可以完成毛交給他的這個任務的。

由於鄧小平沒有就文革問題向毛交上一個滿意的答卷，再加上文革派的推動，使批鄧一步一步地升級。

#### 四、全面反擊右傾翻案風

反擊右傾翻案風從什麼時候開始？應該說，從毛澤東對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明確表態時就開始了，這是1975年10月19日。從4人談話、8人談話、17人政治局會議，到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這是逼鄧小平轉變態度，逼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並向一些領導幹部打招呼，要求他們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

11月21日，鄧小平向毛報送關於打招呼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136人

---

<sup>38</sup>原副總理紀登奎的夫人、老革命王純訪談錄，載2013年第45期11月16日《週末文刊》。

的名單，並擬了一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說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是「造謠誣衊、顛倒黑白」，傳達了毛對兩封信的批示，《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寫道：「中央認為，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sup>39</sup>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鄧小平宣讀由毛澤東審定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26日，中共中央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作為1975年23號文件發到省級，劉冰的兩封告狀信作為這個文件的附件。12月10日將這個文件發到基層。從此，反擊右傾翻案風從高層會議向全國範圍內展開。

1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作了檢討，在檢討中，他檢查了整頓中的一些作法，在談到對派性，對老中青三結合，對新生事物，特別是對文化革命的態度後，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sup>40</sup>

1976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作一次檢查，其中說提出要以「三項指示為綱」這樣重大的問題，既沒有請示主席，也沒有提到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會後將檢討記錄送給毛，請求見毛一次，說「我除了繼續聽取同志們的批評幫助以外，總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面陳述自己對於錯誤的認識，取得主席的教誨，當然應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毛批示：「鄧小平同志第二次檢討，印發政治局討論。」<sup>41</sup>毛沒有同意鄧小平見他的要求。

1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再作檢查。文革派在會上輪番對鄧小平進行指責和批判。晚上，鄧小平致信毛澤東，送上白天在會

<sup>39</sup>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及附件，1975.11.26；中發[1975]23號。

<sup>40</sup>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137頁。

<sup>41</sup>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40頁。

上的發言稿，還說：「我兩次要求面見主席，除了講自己的錯誤和麵聆聽主席的教導外，確實想談談我的工作問題。」「現在，已經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准。」<sup>42</sup>第二天，毛聽取毛遠新關於 20 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彙報。毛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一棍子打死。毛遠新說，上次主席徵求幾個人的意見，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人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sup>43</sup>毛澤東選定的第四個接班人華國鋒開始登臺。

從 1975 年 11 月底至 1976 年 1 月，文革派在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進行「幫助」，實際是揭發批判。當時，張春橋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對上海來的人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麼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一言不發，就是坐在椅子裏，一支接著一支地抽煙，穩坐釣魚臺。……他說耳朵聾了，聽不見別人發言，可是，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另一邊輕輕的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哧啦一下站起來就走。」<sup>44</sup>

1975 年 11 月 2 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彙報後，轉變了對鄧的態度，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下定把鄧小平打下去的決心。毛澤東在接見重要外賓時，鄧是少數在座者之一。12 月 24 日，毛會見達科斯塔總統時，鄧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後毛接見外賓時，鄧小平再也沒有陪同過。

1976 年 1 月 21 日，在文革派的推動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1 月 28 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

1976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發出 1976 年 1 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代總理、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通知》，此件發

<sup>42</sup>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145 頁。

<sup>43</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6 卷，第 634-635 頁。

<sup>44</sup>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社，第 381 頁。

到縣團級。通知只有兩句話：「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鄧小平和葉劍英兩人都失去了權力。說葉劍英生病只是一個藉口，在批判鄧小平的緊要關頭，將主持軍委的大權交給毛信任的人才是實情。毛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毛遠新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sup>45</sup>

林彪事件以後，毛喜歡用四方面軍的人，即他當年的政敵張國燾的部下。從此，四方面軍的謝富治、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都是毛的依靠力量。陳錫聯也是四方面軍的人。抗日戰爭期間，陳錫聯任八路軍 129 師 769 團團長。1937 年 10 月 19 日，他帶領部隊偷襲日本在山西的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 24 架。22 歲的陳錫聯一時名揚天下，以後歷任軍隊要職。1955 年授上將軍銜。文革期間，陳錫聯是瀋陽軍區司令兼政委，還兼任遼寧省革委會主任。在此期間，他全力支持毛遠新，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而葉劍英不僅是「二月逆流」的幹將，1973 年和周恩來一起因外交問題挨批，林彪事件以後，力主批左。在批判江青時，也是站在鄧小平一邊。

1976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指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各級領導，要站在運動前列，特別是在右傾翻案風中，受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互影響犯有錯誤的一些同志，要帶頭揭發批判」。從此，運動的名稱由「反擊右傾翻案風」改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 月 3 日，中共中央將華國鋒的講話轉發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 [1976] 5 號）。從此，全國就公開「批鄧」了。

這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是開批判會，一些單位也寫大字報。下面是我在天津採訪的記錄摘要：

<sup>45</sup>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 1976 年情況》，《炎黃春秋》2011 年 10 期。

鄧小平下臺、公開批判鄧小平以後，幹部群眾中有不少懷疑情緒。天津冶金局黨委討論時有人說：「看來上當受騙是難免的，上了林彪的當，現在又上了鄧小平的當！」二輕局一位幹部說：「太突然了！一個多月前還主持中央工作，現在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交通局一位幹部說：「葉劍英 19 號還接見外賓，看來身體很健康，怎麼突然病了？不好理解！」百貨大樓一位售貨員說：「形勢剛剛穩定，又開始了新的一場鬥爭，真是有點人心惶惶。」

懷疑歸懷疑，從上到下的黨政系統還是認真組織運動。天津市召開了 5000 多人「工農理論隊伍學習報告會」，市委書記講話。發言者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折衷主義和詭辯論」、「上智下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天津各工業局的領導幹部到各廠發動群眾。很多工廠也開了全廠的批判大會，車間班組的政治學習也是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為中心。1975 年底，天津工交系統共有理論小組 103, 003 個，理論隊伍 913, 330 人，占職工總數的 12.1%。

<sup>46</sup>自 1976 年 2 月 11 日到 3 月 6 日，天津動力機械廠開了 250 多次批判會（其中全廠大會兩次），寫了 3, 000 多張大字報，有的車間發言人占職工的百分之八十。各單位都舉辦學習班，組織理論骨幹隊伍。逐字逐句地學習中共中央 4 號文件。工人們對「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提法反映強烈，認為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來看問題的，是為人民群眾說話的。<sup>47</sup>天津棉紡一廠設立了大字報區，也貼滿了大字報。2 月 7 日全廠動員大會以後，第二天就貼出了 100 多張大字報，寫了 50 多篇批判文章。<sup>48</sup>

在工廠裏，上述批鄧活動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多是表面文章，不像文革初期的大字報那樣批評本單位人領導人。當時有規定，大批判矛頭對準「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至今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不聯繫本單位、本地區的具體問題。不要搞戰鬥隊，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不能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所以，這場運動沒造成大的混亂。大批判中很多是形式主義的東西，上面介紹的

<sup>46</sup>1976 年 2 月 16 日，天津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介紹情況。

<sup>47</sup>1976 年 4 月 5 日採訪記錄，天津動力機廠宣傳科喬富源介紹。

<sup>48</sup>1976 年 5 月 6 日，天津棉紡一廠採訪記錄，黨委書記李寶明介紹。

大字報、批判會、批判文章的數字也是應付上級和新聞單位的，有很多浮誇成分。

多數人對批鄧持消極態度。一些政工幹部、宣傳幹部隨著政治潮流，在報刊上造輿論。表面上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有一定的聲勢，實際上跟著跑的人不是很多。

少數不怕死的人對批鄧運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重慶鋼鐵公司機修廠技術員白智清是突出的一個。1976年2月7日，他以「祖國忠誠的兒子，重鋼職工白智清」的真實姓名，在重慶解放碑貼出了題為《我愛我的祖國》的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喪盡天良的牲畜們」弄得這幾年「多少個煙囪停止冒煙，多少部機器停止運轉，多少輛火車停止運行，鋼產量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赤字上升」，大字報頌揚鄧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鋼產量是近十年來淨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全面恢復的一年」。3月4日，他又在成都鹽市口貼出了抨擊張春橋的長篇大字報。6月32日白智清被捕。（1978年7月31日被釋放出獄。2005年2月，白智清以工程師的身份從重鋼集團退休。退休後出版了《冷眼看中國》、《淚眼看中國》等著作。）

清華大學是毛澤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試點，大字報很多，到清華看大字報的人也很多。清華的《大字報選編》印了八九本，向全國各地散發。有的單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很激烈，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將軍被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主要人物之一。當時的國防科委副主任、著名導彈專家錢學森，旗幟鮮明地同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寫的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陪同張愛萍到導彈發射場時發生的事情，張曾指著地圖跟他說：「這裏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他還在批鬥會現場說：張愛萍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張愛萍當場心臟病突發住院。<sup>49</sup>

---

<sup>49</sup>張勝：《張愛萍傳記：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200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轉引自李廌：《不一樣的錢學森：說話傷人 吹捧大躍進》，《文史參考》2011年第01期

## 五、各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由於運動多次反復，每一次反復都有一部分人受到打擊。在1975年以前各次受到打擊的人們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一些原造反派負責人，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文革早期的社會地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生命最後一年的作為，隨著他向生命終點逼近，他身邊兩種政治力量，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文革派已經失去了群眾的支持，除了小部分挨過整的造反派企圖借機翻身、為數不多堅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們以外，支持文革的人很少了。官僚派由於他們恢復秩序的努力比較合乎民意，支持的人越來越多。雖然批鄧有一定的聲勢，但文革派的失敗和官僚派的勝利已經露出端倪。由於造反派利用批鄧機會再一次抬頭，一些省出現了亂象。

### 雲南省

1976年1月，「八派」負責人黃兆其（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劉殷農（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和塗曉雷等人，用「秦臻」、「姚雨」等筆名，在昆明街頭張貼了《誰是劊子手》、《雲南問題宣言》、《轉嫁危機的新陰謀》等大字報，說雲南省委[1975]26號文件<sup>50</sup>，是「對新生力量大砍大殺」，說鄧小平是「資本主義的復辟狂」、「扼殺新生力量的劊子手」；說省、市委和省屬16個部、委、辦、局的25名領導幹部是「還鄉團主要骨幹」；呼籲「把走資派把持的黨、政、軍、財、文等大權奪回來！」

雲南賈啟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參加了2月25日華國鋒主持的批鄧會議，會議期間，文革派中央領導人同朱克家個別談話。回到雲南，朱克家把文革派領導人的講話告訴黃兆其，並說中央首長要他幫助省委領導轉好彎，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證的。

朱克家是1969年到雲南省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識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篇關於他的事蹟報道，以後多家報刊

---

<sup>50</sup>中共雲南省委[1975]26號文件，是1975年年2~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雲南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形成的文件，主要解決派性問題，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落實政策。



都有報道。經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提名，朱克家成為「十大」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四屆人大代表。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同黃兆其、劉殷農成了雲南省的積極帶頭人。

1976年3月6至28日，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轉發華國鋒在2月25日會上講話的通知。在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的壓力下，省委把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擴大到638人。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朱、黃、劉等人採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一方面由他們在會內批判鄧小平和省委；一方面組織一些地、州、市的一些人，到會上揪鬥省、地、州、市黨委領導幹部，衝擊會議。

省委書記賈啟允在3月13日的會議上，作了題為《我的揭發、批判和初步檢查》的發言，揭發1975年9月21日鄧小平對他來雲南工作時的談話，檢查自己到雲南後「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他的發言成了「批鄧」的「鋼鞭材料」。此後，全省一些剛落實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領導幹部又被打成「復辟派」、「還鄉團」。

3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隊部分人，說局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刮了右傾翻案風」，要求改組交通大隊領導班子。為此，他們提出「走資派不倒，紅綠燈不亮」的口號，「集體罷崗」近7個月。

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在權力機構主持「劃線站隊」中，對「炮派」實行了殘酷鎮壓。打手大多是「八派」的人。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抓了一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開始後，在「八派」頭頭黃兆其及劉殷農、朱克家等人的壓力下，1975年3月底4月初，省委釋放了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中逮捕關押的120多人。一些地方給被釋放的人戴上大紅花，彩車接送，還安排大批人馬敲鑼打鼓、放鞭炮，擺宴席慶賀。

5月4至21日，省委召開理論討論會，學習和討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問題。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要求把會議變成「批鄧」和「揭發省委的戰場」，「同走資派鬥爭的場所」，點名要省委領導人到會檢查。還把一大批剛剛出來工作的老幹部說成「還鄉團

執政」、「復辟派掌權」。會後，有些地方召開了類似會議，揪鬥所謂的「還鄉團」、「復辟派」。

六七月間，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用手中的權力，抓緊「突擊納新」、「突擊提幹」、「調整充實領導班子」，「補充新生力量」，實行「提、補、納、調」的方針，加強了他們同一觀點的人在各級權力機構的力量。

6月，在震莊賓館開了40天常委會議，集中批判賈啟允和省委貫徹執行省委[1975]26號文件的問題，於7月25日形成了《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會議紀要》（雲發[1976]40號）。文件宣稱：「去年夏季以來，省委積極執行了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刮了右傾翻案風，犯了路線錯誤，造成了嚴重後果」。賈啟允說：「按照省委40號文件轉彎，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文件下達後，不少因派性嚴重被下放或調動的幹部又官復原職，落實政策後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又被趕下臺。<sup>51</sup>

## 湖北省

一些進入了「三結合」領導班子的造反派負責人，在鄧小平全面整頓中被下放到公社。胡厚民、張立國、朱鴻霞、夏邦銀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省委、省革委會對下面的內部指示是：這些「派頭頭」在武漢會鬧事，放下來監督。1976年2月，省委通知掛職鍛煉的群眾代表回武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農曆正月初一到初十，造反派頭頭開始串連，開始了新的一場鬥爭。他們將致省、市革委會領導人的公開信貼到市中心。將「緊跟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打倒鄧小平，消滅還鄉團！」的巨型標語貼到長江大橋上。他們組織報告團，到各單位作報告。他們要求省市領導人從思想「轉彎子」，從組織上讓造反派進領導班子，「補台」到革委會。<sup>52</sup>其中謝某從農村回來，省委書記趙修把他帶著，到鐵路各個局站介紹說，這是小謝，省委準備要補台，把他安排在武鐵分局當革委會副主任。此間，一些人為關在監獄的「鋼二司」的負責人楊道遠

<sup>51</sup>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雲南「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紀實（內部資料）》，2005.05.18。

<sup>52</sup>曹承義：《悲欣交集話文革》，自印本，2008年，第88-92頁。

翻案。<sup>53</sup>

### 湖南省

1976年春，省、市革命委員會中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原造反派負責人與骨幹成員，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以省、市總工會為大本營，發動了向張平化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擊，企圖實現權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過的強勢地位。

### 浙江省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開始，以前被處理的造反派又開始串連活動。1976年2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上浙江參加會議的五人草擬了一份貫徹打招呼會議的意見，認為1975年浙江存在右傾翻案風，批派性、辦學習班都是錯誤的。王洪文要譚啟龍留在北京作檢查，省委工作由賴可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三結合領導幹部）主持。3月，省委宣傳部組織大專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參觀學習反擊右傾翻案風經驗。

### 四川省

成都原兩派造反組織「紅成」和「8·26」雖然早已解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中，原來這兩個組織的部分骨幹成員，因為自身權利要求未得到滿足而不時聚集起來與各級黨委抗衡。此時兩派造反派之間的對立已經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於他們與各級黨委之間。雖然他們人數不多，而且已經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多為原造反組織中的知名人物，個人能量和社會影響仍然很大。他們的權利要求大體包括幾方面：一是被錯捕、錯判者要求徹底平反，二是被撤銷革委會職務者要求恢復職務，三是進入革委會者要求給予實權，四是家庭出身夠條件者要求入黨。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經聚集起來鬧了一次並解決了部分問題。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運動，又把許多造反派人員整了下去，凡是鬧派性的

---

<sup>53</sup>老田：《文革親歷者訪談錄（謝先生）》。

統統調離了領導崗位，這些造反派憋了一肚子氣。趙紫陽來到四川不久，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讓他們受到鼓舞。特別是毛澤東發出的「對造反派高抬貴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們看到了解決自身權利問題的希望，於是他們便利用周恩來逝世和鄧小平已倒的大好機會，再度活躍起來。

1976年4月2日。省委在成都錦江大禮堂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參加會議的造反派代表，紛紛指責省委對批鄧運動態度不堅決，抵制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坐在主席臺上的擔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發表了一個聲明，宣佈造會議的反。除了蔡文彬和江海雲兩個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聲明上簽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批判「二趙」（趙紫陽和趙倉壁）領導下的四川省委1975年執行了鄧小平路線，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對造反派進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儘快轉彎子，為造反派落實「高抬貴手」政策。錦江大禮堂會議後，這些造反派還把聲明貼上大街，給省委施加更大輿論壓力。

那時，大學生和中學生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鄉已經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廠正常上班，人們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謂造反派其實只剩下一些在「反派性」、清查「5·16」等挨過整的人。早已失勢的全省各地的少數造反派頭頭，首次半公開聚集起來，甚至原先屬於不同派別的人也消除對立走到了一起，形成了較大的聲勢。他們的鬥爭方式仍以大字報和大標語為主，個別地方還臨時辦起固定或移動廣播站。內容主要限於要求落實毛說的「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的最高指示，解決造反派代表的入黨、當官問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求各級黨委表態。趙紫陽認真做造反派的工作，謹慎而耐心地協調各種關係，希望通過對話來解決矛盾。

1976年3月到7月期間，趙紫陽真心實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一些品質好而且有能力的人。四川各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期，除了革委會增補群眾代表之事久拖未決外，造反派人員中的紅色出身者多數加入了共產黨，各級革委會中過去是黨員的造反派代

表，許多獲得了獨當一面的實權。<sup>54</sup>

## 六、毛把他最後的思想留給後代

不管國家領導人有多高的權威，不管國家領導人控制了多少資源，不管他的出發點是好還是壞，他要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全面變革，是很難成功的。因為一個國家是一個瞬息萬變的龐大的動態系統。對這個龐大的動態系統，人們是很難認識、很難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一人之力操縱這個大系統。何況他的希望實現的目標是一個烏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敗的結果，但他不甘心失敗，他要讓後來人繼續完成他的事業。這就要把他的理論傳給後代。所以，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傳達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號文件下發。題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據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准。）》內容如下：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

---

<sup>54</sup> 蔡文彬：《一個造反派眼裏的趙紫陽》，《昨天》，2012年第9期

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麼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麼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麼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

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麼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麼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蘇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崩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麼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兩個多月來零零星星地對毛遠新講的。其中有的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內部傳達過或公開發表過。當時毛澤東思維還清楚，但口齒不清。多年以後毛遠新說：四號文件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



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 的连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55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將是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障礙，他反對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企圖通過行政權力來實現社會公正的烏托邦思想，將成為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障礙。

---

<sup>55</sup>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 1976 年情況》，《炎黃春秋》 2011 年 10 期



## 第二七章

# 「四五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北京市民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

鄧小平 1975 年的「全面整頓」，反映了人們要求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的要求，雖然堅持文革立場的人們的不滿意，卻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因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但沒有實現毛澤東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願望，反而增加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強化了人們對文革派、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終於釀成了一場政治風暴。這場政治風暴的引爆點是周恩來逝世和對周恩來的悼念。

## 一、圍繞悼念周恩來活動的鬥爭

1976 年 1 月，在文革派步步進逼、鄧小平一次又一次地作檢查的時候，周恩來已經病危。

1 月 1 日，《詩刊》、《人民日報》和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毛澤東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這兩首詞是毛 1965 年寫的，此時公開發表，是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兩報一刊」發表題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論，其中發表「最高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這是毛 1975 年 11 月 4 日批評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時說的。之前，這句話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在黨內一定層次公佈，現在向全民公佈，表明新的一年，要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向深層次推進。

就在這一天，生命垂危、長期處於昏睡狀態的周恩來，一度清醒過來。他從廣播中聽到毛澤東的詩詞，示意工作人員買來詩詞本，並聽讀這兩首詞。聽後，要求將詩詞本放在枕邊。

1 月 8 日上午 9 時 57 分，周恩來在 305 醫院逝世，終年 78 歲。

周恩來是毛澤東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 6 年，他忠實地貫徹執行毛關於文革的一系列指示。雖然那幾年周恩來一直處於文革政治舞臺的中心，但那時人們對文革還不反感。所以，周恩來沒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後，文革的問題逐漸暴露，對文革持消極態度甚至反對文革的人越來越多。而此時，周恩來

和毛澤東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產生了分歧，對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來這一邊。雖然 1973 年上層內部批判周，但普通群眾不知道，周在公眾中的形象沒有受到損害。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周恩來處於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廣泛的同情。在全國各地，一些對文革不滿的人們，自發地開展悼念活動。

在兩種力量激烈角逐的關鍵時刻，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前，對文革派是有利的，他們一定竊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動。他們限制紀念周恩來的規模，極力減小周恩來的影響。他們當然明白，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是表達某種不滿。他們沒有想到，越是壓制，不滿情緒越是強烈。

1 月 9 日，新華社請示關於周恩來逝世的報道事宜，姚文元答復：「悼詞尚未發表，現在不組織。悼詞發表後是不是組織反映，仍應再請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來逝世後的六天裏，新華社只發了兩條有領導人參加悼念活動的消息。姚文元敢於這樣做，顯然符合毛澤東的意圖。

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太平間舉行。過去國家領導人遺體告別在太和殿、勞動人民文化宮。為什麼周恩來的告別儀式不在這些莊嚴、寬敞地方，而在這樣狹窄的地方呢？對這種有意降低規格的作法，群眾很不滿意。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獨江青，不但不行脫帽禮，甚至在遺體前東張西望。中國人對後妃幹政歷來反感，群眾對江青這幾年的作為早就不滿，她在遺體告別時的表現，激起了不少人的憤怒。

根據上級的要求，很多單位限制悼念活動，聲稱不要讓悼念活動干擾了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的大方向。在全國許多地方和單位，不准群眾戴黑紗，不准送花圈，不准設靈堂，不准開追悼會，不准掛周恩來遺像。這「五不准」使對文革不滿的人、甚至中間群眾怒火中燒。

1 月 11 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由王洪文、汪東興、鄧穎超以及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周恩來生前友好等護送到八寶山公墓火化。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的數十裏長街上，首都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在街道兩旁，肅立在寒風中，送別周恩來。緩緩前進的靈車，開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哭聲。有人跪在靈車前痛哭。人們什麼哭周恩來？周恩來對待

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個人生活也很檢點，和鄧穎超白頭到老，沒有子女，給公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後還遭壓制，引起了廣泛的同情。但這還不是根本原因，30年後鮑彤<sup>1</sup>一語道破：「不是因為他們多麼瞭解周恩來，而是因為他們太瞭解毛澤東。悼周的全部意義在於對毛失去信心。」當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層是反毛。所以，當局千方百計壓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計地保護毛。新華社記者就首都百萬群眾為周恩來靈車送行寫成長篇通訊，先是被壓縮到很少的字數，最後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報道。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眾4萬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周恩來為舉行弔唁儀式。弔唁儀式之後，周恩來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會堂。

在這幾天，姚文元多次向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下達指示，限制對悼念活動的報道，報刊上充滿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和文章。1月1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綜述，隻字不提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第一句卻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用反擊右傾翻案來轉移公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篇報道引起很多人的憤怒。

1月15日，全國下半旗志哀。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追悼會後，遵照周恩來的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東北部的黃河入海口處。由於毛澤東曾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人們期待毛澤東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毛說：「我也走不動了。」群眾對毛不參加追悼會不滿意，連北京衛戍區原司令員吳忠將軍也不理解，他在回憶中說<sup>2</sup>：說病重，可是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還不斷接見外賓呢？是多次接見外賓<sup>3</sup>。既然可以接見外賓，為什麼不能參加追悼會？不能參加遺體告別？

<sup>1</sup>鮑彤，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協助趙紫陽搞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後入獄多年，釋放後軟禁在家，但經常向境外媒體發表時政評論。

<sup>2</sup>《我經歷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吳忠口述，陳楚三、李大震整理，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sup>3</sup>《毛澤東年譜》記載毛在周逝世以後的外事活動：2月23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3月17日會見老撾訪華代表團，4月20日會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5月12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5月27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以後再沒有會見外賓。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華社原定要發表的群眾悼念周恩來活動的綜合報道。28日，江青扣壓了紀錄影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眾悼念周恩來的同時，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批判，還通過批判鄧小平影射周恩來。

當權者一旦違背民意，當權者的行為必然在民間產生逆反心理。從1月到4月，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有增無減。收集、懸掛周恩來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一種方式。周恩來晚年坐在沙發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來》，是意大利著名攝影記者焦爾喬·洛迪於1973年拍攝的。1974年，該照片榮獲美國著名的新聞照片獎——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認識世界獎」。周逝世後，這張照片在中國廣為流傳，在以後的幾年內，總印數共達9000萬張<sup>4</sup>。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的逆民意行為，引發出震動全國、影響全國的南京事件。從周恩來逝世到追悼會召開的7天內，南京共有2500多個單位的32萬多群眾到梅園新村（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曾經住過的地方，後辟為紀念館）悼念周恩來。梅園新村紀念館接到上面的閉館通知，被迫停止開放，群眾責問：「為什麼不讓我們悼念總理？」1976年3月5日，是雷鋒<sup>5</sup>紀念日，《文匯報》在重新發表當年幾位中央領導人的題詞時，只發了毛澤東、朱德的題詞，沒有周恩來的題詞。這一事件使南京人憤怒。3月21日，南京大學政治系、中文系、歷史系的學生聯名寫信質問《文匯報》：「看了你報全段砍去總理的原話，我們不禁要問：你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是誰指使你們砍去的？你們代表了誰的利益？」3月24日，江蘇新醫學院中醫系七三、七四級200多名學生和部分教職工，來到雨花臺烈士陵園，悼念周總理。一位工作人員以雨花臺不是悼念周恩來的場所為由，將花圈上的挽聯拿掉，當大家圍住他講理時，他一時心慌，稱自己是上海的記者，這更加激起群眾的憤怒。江蘇新醫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們醞釀舉行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活

---

<sup>4</sup>劉天成：《三十年前的崢嶸歲月——紀念「四五運動」三十周年》

<sup>5</sup>雷鋒，解放軍戰士，因樂於助人被樹為全國楷模。22歲就因公殉職。毛澤東同志于1963年3月5日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我國把3月5日定為學雷鋒紀念日。同時題詞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動。

3月25日,《文匯報》又刊登了一篇報道,文章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語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指鄧小平,「黨內那個走資派」顯然是指周恩來。這是在悼念周恩來的重要時刻,對周恩來「鞭屍」。數日之內,從全國各地發向《文匯報》的抗議信件和電報421件,抗議質問電話達一千多次。3月29日,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將影射攻擊周恩來的《文匯報》在校內張貼,在旁邊醒目地寫上「看一看,想一想」。校園內出現標語:「警惕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南京市民紛紛湧向南京大學校園看大字報、大標語。在3月末的那幾天裏,南京到處是緬懷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人們聚集在一起,或傳遞消息、朗讀詩文,或發表演講。「深切懷念楊開慧<sup>6</sup>烈士!」「批周必亂,反周亡國!」「打倒文匯報的黑後臺張春橋!」「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貼在南京街頭。

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南京大學有11個系的800多名學生,分成20個小組,在街頭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車身上刷標語。29日晚7時多,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機專業學生來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成都的82次列車、開往上海的405次列車上,刷上「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學校的學生來到火車站,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火車上。在十多個小時中,共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刷了198條大標語。這些大標語,隨著高速的列車,展現在全國各地人們的眼前。

4月1日深夜,在華國鋒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南京事件,會後發出電話通知。《通知》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

---

<sup>6</sup>楊開慧,1920年和毛澤東結婚,有三個孩子的楊開慧於1930年10月被捕,11月被殺害。在楊開慧犧牲兩年前的1928年,毛澤東就與賀子珍結婚。在1928年至1930年期間,毛澤東兩次率軍路過長沙板倉楊家而沒有將其母子接走。「四五運動」中群眾抬出楊開慧是針對毛的現任妻子江青。



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4月3日，中共中央的電話通知傳達到全體群眾後，南京群眾毫不畏懼，反而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遊行。僅去雨花臺烈士陵園送花圈的就有289個單位14萬多人，比以前幾天增加了一倍。在中央電話通知下達後的3天內，全市就有60萬人參加了悼念和遊行的活動。<sup>7</sup>

如前所述，在文革最後兩年，有兩種力量在博弈：一是要求恢復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因而要求儘快結束文革的力量；一是堅持繼續革命理論、保衛文革成果的力量。前一種力量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後一種力量以江青等上層文革派為代表，下面有早期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以後的幾波鬥爭中受到打壓的造反派頭頭和一些相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隨著文革的失敗，前一種力量日益強大，後一種力量日益衰減。在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中，不僅前一種力量顯示了強烈的態度，後一種力量也沒有消停。在鄭州，曾經演出兩種力量的現場搏鬥。

1976年4月初，鄭州市中心二七紀念塔下擺放了一些花圈、挽詞和貼在旁邊的匿名大字報。表面上看是紀念周恩來的，實際是攻擊的是當時正在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攻擊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有的將矛頭指向毛澤東。

鄭州市肉類聯合加工廠的一些職工，就此事展開了討論。他們認為，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必須對此事表明自己的態度。4月5日清晨，肉聯廠寫出大字報《嚴正聲明》，有幾十個人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報貼在二七紀念塔附近的鄭州市電信局營業大廳門前。這張大字報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報的立場截然不同。接著，《嚴正聲明》旁邊又陸續張貼了一些同意其觀點的大字報。

當天傍晚，新華社河南分社讓簽名寫大字報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記者說，他們的大字報連同所有簽名（約40

<sup>7</sup>南京事件內容摘自吳雪晴：《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百年潮》2002年第8期

多人)，已經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這一消息使他們受到鼓舞，他們商議後決定：把那些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了。他們將一輛貨車開到二七廣場，把一些認為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到車上，擺放在省委南院正對大門的辦公樓前。這時候，突然開來幾輛卡車，上面全是穿著軍裝的軍人，這些軍人熱情地和他們打招呼，這些受命來的軍人和他們一起收花圈，打掃現場。

收完花圈以後，這些工人們又以鄭州肉聯、鄭州紡織機械廠、鄭州交通運輸公司、503 廠等 72 個單位革命群眾的名義在二七廣場貼出《聯合聲明》，表達他們收花圈和對這一政治事件的立場，對反對文革者進行「反擊」。直至下半夜，這些人還走上街頭，刷寫表達這一立場的大標語、大字報。他們的行為受到另一立場群眾的圍攻。鄭州市電信局職工焦春亮被被圍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七廣場。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鄭州市革委追認焦春亮為烈士，並決定將打死焦春亮的劉敬判死刑。焦春亮是群毆致死，劉敬是頂罪者。「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劉敬被釋放，成了「四·五」英雄。焦春亮的烈士稱號被取消，他年幼的孩子每月 20 元的撫恤金也被取消了。當時參與「反擊」的人在以後的「揭批查」運動中遭到了清算。

8

鄭州「反擊」者的命運是由文革的命運決定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寧主義的道路實現共產主義。正如學者李廷明說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共產主義運動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力圖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改造社會，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共產主義者沒有想到，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帶來的是更強的壓迫和剝削。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做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列寧式的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成功。

官僚統治集團總是不斷地製造政權的反對派。文革前積累了不少這個政權的反對派，文革的每一波都製造了一批新的反對派。文化大

---

<sup>8</sup>何遠：《塵封的記憶——1976 年鄭州市的「清明節事件」》2005 年 10 月 7 日 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革命不僅讓各階層的人都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它的承諾卻沒有兌現。「破而不立」的現狀，使中國社會陷入了無法收拾的混亂。到文革後期，社會上瀰漫著不滿情緒：工人、市民、普通幹部不滿；自 1963 年以來，工資分文未長，工人家徒四壁，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被捲入運動的廣大群眾不滿；在多次反復中，他們被當作麵團反復揉捏；知識分子不滿；文革期間，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最為低下的時候；下鄉知識青年及其家長不滿；在「五七幹校」勞動的人不滿……不滿，不滿，不滿，不滿情緒在聚集，在擴散，一旦有了發洩不滿的窗口，壓抑了多年的不滿情緒就會奔騰而出。在文革業已失敗的情況下，各式各樣的反對派和廣大的不滿者，都在紀念周恩來的旗幟下聚集起來，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抗議運動。鄭州二七廣場的反擊者只不過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門廣場歷來是民眾抗議運動的中心舞臺。對周恩來的紀念，開始只是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3 月 19 日，朝陽區牛坊小學獻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沒收了。3 月 25 日，獻花圈的人增多。3 月 30 日，一隊解放軍來到紀念碑前獻花圈，這給違抗禁令的人們壯了膽。31 日，廣場上的花圈已達上百個，詩詞、悼文，大膽地表達了對江青等人的不滿。4 月 2 日，中國科學院 109 廠的職工組織遊行，用四輛卡車開道，抬著獻給周恩來、陳毅、楊開慧的幾個大花圈，四幅巨匾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用鋼條焊制了直徑四米的花圈，當大卡車把花圈拉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長安大道南側，廣場上的花圈從紀念碑擺到國旗杆下。大道北側，天安門下的觀禮臺上也擺滿了各種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徑超過七米。從前門通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路旁柏樹上和人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周圍的樹叢裏，白花層層疊疊，一片雪白，全是民眾離開廣場時留下的。廣場上到處是挽聯、詩詞、傳單，大多是針對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掛著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上面寫著批評文革派的詩詞。有一首題為《向總理請示》的詩，喻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要垮臺：「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這是群眾對官方的反叛，是對毛澤東的反叛。這是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面對的規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 二、廣場反叛的深層：思想的反叛

壯潤而激烈的廣場運動反映了社會民意。民意的深層是社會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在多數人隨著大勢狂奔的時候，總是有少數人讀書，思考，探索。隨著運動的發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內容也在變化，但其中貫串一條主線，那就是對官僚特權的批判，對社會制度的批判。經過八年的反復折騰，各類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原來狂熱的人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探索的人更多一些。在「四五運動」的熱潮的深層，一些與主流不一致的思潮在湧動。

由於多年思想封鎖，當時中國的青年思想者只能得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料。多年來，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模式被描述為十分美好、極為神聖。十七年的現實與所描述的社會模式相差甚遠。理想和現實的強烈反差，是很多人積極參與文革的原因之一。否定十七年是造反派中激進的一翼，其思想根源也在於此。在文革之初，青年思想者們用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來分析現實，來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 年 10 月 17 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貼出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李文博在大字報中提出了「徹底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大字報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創造了使地主階級不能繼續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的一種制度，無產階級則要創造一個使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新制度。」「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從資產階級那裏來的組織形式，是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仍然是產生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溫床。這種組織形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巴黎公社的原則主要有兩條：第一，官吏的工資不能超過熟練工人的工

資；第二，人民有權隨時罷免官吏。總之，人民需要一個廉價的、廉潔的政府。」大字報的題目是恩格斯論巴黎公社的一句話，「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指的是階級統治的國家，暴力鎮壓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李文博認為，當時中國的現實就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sup>9</sup>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出版了一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完善無產階級專政」。

從來沒有發表過理論文章的「理論權威」康生，對理論問題卻有著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覺，他批評了李文博的大字報。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sup>10</sup>毛澤東1964說過「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1975年說過「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毛對「這樣一個國家」不滿意，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一點上看，李文博等的思想是和毛相通的。但是，毛害怕「徹底」。這一「徹底」，就要觸動共產黨政權的根基，他只允許「部分地改善」。多大「部分」？是80%還是20%？沒有明確的界線。這反映毛澤東文革指導思想的矛盾。正是這個思想矛盾，才使他在文革中時而激進，時而退讓。激進時，讓造反派衝鋒陷陣，退讓時，對造反派無情地出賣。

與李文博同時的還有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生喬兼武、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劉握中、張立才（署名「伊林·滌西」）等也提出了要改變制度的要求。「紅炮班」在1966年10月下旬貼出題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大字報說，建國

---

<sup>9</sup>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這個資料裏「徹底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中沒有「徹底」二字。楊繼繩清楚地記得，當年是有「徹底」二字的。

<sup>10</sup>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10年，第100-101頁

17年來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過去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現在壓迫剝削人民的是特權階層，即幹部階層。「伊林·滌西」在在《給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17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sup>11</sup>喬兼武（原名喬俊禮）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貼出大字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認為「黨團領導政府，而黨外群眾對黨的各級組織沒有選舉權，不能實行監督，容易產生修正主義、官僚主義。」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學生的《四三戰報》上發表題為《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法權殘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仍然使財產和權力暫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派手裏。」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將「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逐漸形成的特權人物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sup>12</sup>

1967年秋冬以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對造反派的約束，「大串連」已經停止，造反運動進入頹勢。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下一步怎樣進行？很多人因找不到方向而退出了運動。武漢一些愛思考的青年聚集起來進行探索，出現了本書前面介紹的湖北省的「北決揚」，他們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他們反對革委會，認為革命委員會仍在襲用「資產階級國家體系」，將被「武漢人民公社」代替。他們支持湖北省浠水縣

---

<sup>11</sup>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10年，第101-109頁

<sup>12</sup>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

的農民造反組織「巴河一司」，寫了《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讚揚「巴河一司」頭頭王仁舟<sup>13</sup>搞的比1958年人民公社更為激進的「新農村」。王仁舟如果成功，可能是柬埔寨波爾布特式的人物。

楊曦光（即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是當時極左派的代表作。楊曦光是長沙一中高中學生。父親楊第甫，是早年參加革命的高級幹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初期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批鬥。楊曦光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的造反組織，因反對工作組被關押了一段時間。出獄後他潛心讀書思考。他後來說：我家裏有個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對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剝削了他們。我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我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於是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衝突的真正原因。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人民。<sup>14</sup>

1968年1月，楊曦光以「湖南戰馬嘶鳴」的署名寫了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並且以傳單散發。文章中說，「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裏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所以，必須「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

---

<sup>13</sup>王仁舟是北京外語學院1960級學生，愛思考，1964年被定為「反動學生」開除學籍回鄉。文革中組織農民造反組織「巴河一司」，1967年2月「巴河一司」被縣武裝部取締，王仁舟被捕。1967年武漢「7·20事件」後釋放，在家鄉搞「新農村」。他的「新農村」實際就是實踐毛澤東的烏托邦。後死於獄中。

<sup>14</sup>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中國之春》第91期，1990年12月號

權」。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康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見湖南各派群眾組織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批判了《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康生說，這篇文章不是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後面有黑手。從此，楊曦光的父母受到牽連，楊曦光也經歷了十年的鐵窗生活。改革開放以後，楊小凱留學美國，成了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家，50多歲就英年早逝。

以上這些社會批判思潮都認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制度下，新階級——特權階級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特權階級和勞動者階級是對立的兩個階級。文革初期，他們認為文革就是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文革進行了七八年以後，他們認為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有的鼓動反對革委會，有的認為要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此時，作為權力機構的革委會，必然要對反對它的力量進行鎮壓。

這類社會批判思潮在1957年「右派分子」中出現過，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過。蘇聯革命家托洛茨基曾提出過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特權階層迅速形成」、「工人階級將不得不推翻官僚」。南斯拉夫副總統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對社會主義革命後產生的「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有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文革中青年們對1957年右派言論的「老調重彈」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批判特權階級思想的隔海呼應說明，這個思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靠武裝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可能有任何權威能夠制衡它。這樣的政權，「人民公僕」變成「人民主人」是不可避免的。

當時，西方國家一些現代政治的著作沒有翻譯成中文公開出版，自由主義理論被封鎖，青年們能夠讀到的書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現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銳批判的耀眼靈光，深深地吸引著不滿現實的青年思想者。青年們只能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



解釋特權現象，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思想理想化。這樣的思潮必然是極左的。毛澤東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也屬此類。對 17 年制度的批判，對特權的厭惡，是眾多人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種思潮來自馬克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密切相關。

林彪事件給青年思想者以強烈的震撼。他們開始反思前幾年文革歷程，反思文革前 17 年的制度缺陷，這使社會批判思潮有了新的進展。它汲取了極左思潮的養料，但它再不是極左思潮；它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它不再受馬克思主義的約束。它開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後的社會思潮，雖然批判的矛頭還是指向特權，但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與法制的訴求，發出了人權和自由的呼喊。

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王申酉，卻在 1976 年悟出了超出那個時代的思想。王申酉，生於 1944 年，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文革中參加造反，因「反動日記」事，在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關押 15 個月。後在「五七幹校」勞動。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是對未來理想社會描繪的藍圖，被權力體系內的人們奉為金科玉律。而王申酉卻說，「五七指示」所描繪的藍圖，是將社會「分成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因素。」王申酉認為，與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另一條路線，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這條路線是「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評毛澤東：「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作用、歷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他主張「充分發揮利潤的作用。」<sup>15</sup>在「四人幫」被捕的那個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 年 4 月 3 日，他死在華國鋒政權的槍口之下。

---

<sup>15</sup>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433-434、436 頁。

1974年11月，廣州街頭鬧市區貼出了長篇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引起了轟動。這篇大字報署名「李一哲」，是一個集體的名稱。其中包括王希哲（廣州17中高中學生，1969年下鄉到農場勞動，1972年回城在一家工廠當鍋爐工）、李正天（廣州美術學院高年級學生，1968年因批評林彪而被關押，1972年獲釋等待分配工作）、陳一陽（廣州17中高三學生，後到農村插隊落戶，1974年春回廣州）、廣東人民廣播電臺中年幹部郭鴻志，還有其他一些支持的人。這四位核心成員在文革前三年都是廣州造反組織「紅旗」的成員。「紅旗」遭到軍隊和革委會的鎮壓後被迫解散。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一文尖銳批判特權：「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這個制度「扶植起一批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地剝奪這些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為我們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文章指出了「走後門成風、高級幹部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部分高幹子弟對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等特權」現象，指出了「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被人們稱之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文章不指名地批評毛澤東對待「走後門」的態度：「為甚麼我們要那麼回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為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文章還是按巴黎公社的要求，對失去了群眾信任的領導幹部，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法天的迫害和鎮壓，



「四五運動」，首都鋼鐵公司一名工人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

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訴求。

文章批評革委會成立後對造反派的鎮壓：「1968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文章指出，「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針對將毛澤東思想置於法律之上的現實，文章說：「『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成為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佈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群眾，便決不能成為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文章指出文革指導思想存在「極大的矛盾」：「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群眾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鬥爭的權利呢？」他們的答案是：「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sup>16</sup>

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常常會出現同樣的思想。

1974年至1975年，一位叫徐水良的青年在南京鬧市貼出題為《反對特權》的大字報，他說，所謂特權，就是指「少數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擁有特殊的權利」，「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他認為，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人的制度。他說：「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徐水良是浙江大學學生，文革初期是一個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之一。1967年以後坐下來讀書思考之後，提出了與主流意識形態不一致的看法。<sup>17</sup>

---

<sup>16</sup>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1974.11.07 引自宋永毅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

<sup>17</sup>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6-404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萬縣張闖、牟其中、劉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組織了「馬列主義研究會」，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會主義由科學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們主張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認為中國落後的生產力是「封建法西斯復辟」的經濟基礎。「馬列主義研究會」的骨幹成員曾經是造反派頭頭，他們認為，當年投入運動是為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但是，幾年來殘酷的事實打碎了我們當初的幻想，違背了我們的初衷，張闖說：「革命8年，我們被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也有兩面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由於他與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往往中途妥協，使人民遭到了慘痛的犧牲。」這顯然是批評毛澤東。牟其中說：「我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當我發現他違背了馬列主義，並頑強地堅持這些錯誤時，毛主席那種『神』的靈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極了，猶如發現紅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騙了自己一樣。<sup>18</sup>」他們批評當局「忘記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把精神的作用強調到主觀唯心主義即唯意志論的地步。」「誰否認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誰就把千百萬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蛻變為少數主觀主義者的空想。」<sup>19</sup>

1976年春，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雲南省青年陳爾晉寫了題為《特權論》<sup>20</sup>的長文。他認為特權制度就是蘇聯修正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的剝削方式與資本主義不同，它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名義上為全民所有，實際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私有物，「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佔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制的神聖袈裟掩蓋之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體壟斷共同佔有的方式反映出來。」「官僚特權階級通過政治經濟一體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權力於一身，將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高度組織、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起來具有巨大競爭力的資本積累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人民和官僚特權

---

<sup>18</sup>他是指小說《牛虻》中的故事。

<sup>19</sup>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81-384頁

<sup>20</sup>印紅標：《從新思潮到新階級——文革中青年社會思潮批判》，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第349-352頁。

階級經常處於白熱化的對立狀態。」文章說：「在特權佔有制下，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暴虐、血腥的統治迫使億萬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匯成了強烈的呼喚：我們要做人決不做牲口！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他提出，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兩黨制、保障人權的作法。」

文革中不僅有批判社會制度的思潮，也有維護社會制度的思潮。老紅衛兵思潮（如「血統論」、「聯動宣言」等）是明顯維護特權的，我的同學周泉纓主筆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所代表的思潮，是肯定 17 年的制度的。對 17 年制度的看法，不僅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分野，也是後來造反派分裂為不同派別（如清華大學「井崗山」分裂為「團派」和「四派」）的思想分野。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維護這個制度的。傳媒、課堂、會議，各種各樣的傳播方式，每日每時地向群眾灌輸維護制度的思想。文革初期，維護制度的思想（維護派，即保守派）很自然地占統治地位，「造反派」是少數派。由於毛澤東以他崇高的權威發動全民「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批判思潮逐漸佔優勢。但是，毛澤東不可能「徹底砸爛」他建立的制度，「重上井崗山」只是他一種威脅官僚的浪漫的表示。他必須向官僚們妥協。在「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時候，批判社會的思潮必然受到打壓，維護制度的思潮必然受到鼓勵。

毛澤東的「新階級論」和極左派相通，但他又害怕極左派的「徹底」，對過分強調階級論的派別進行打壓；毛的恢復秩序的願望和「四一四思潮」<sup>21</sup>相通，但又不願意接受「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實際是指造反派不能坐天下），他多次批評《四一四思潮必勝》。毛澤東是一位統治者，不是思想家。統治者注重「力量的平衡」，思想家追求「理論的徹底」

在 1976 年春天，文革的敗局已定。維護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

---

<sup>21</sup>《四一四思潮必勝》是我的同學周泉纓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肯定文革前 17 年，反對「徹底砸爛」，認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說過了」的先知者姿態站了出來，活躍起來；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轉向民主。當時的民主思想是在殘酷的現實中摸索出來的，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表現其合法性。當時，各種思潮形成了一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的徹底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sup>22</sup>→民主論。政治光譜最左面的受到當局打壓，也被渴望秩序的民眾拋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當時的主流，但受到懷疑。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的支持者增多，將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主流。民主思想只是星星之火，處於非法地位，但他們發出呼喊如夜空閃電。在這個政治光譜中，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外，其它三種聚集起來，成為一股強大的反文革的力量，即推動「四五運動」的力量。其中，人數最多的是要求恢復文革以前的社會狀態。

陳子明<sup>23</sup>認為，「四五運動」實際是兩股社會思潮合流，一部分是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老工人，他們強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 1957 年以前的狀態。另一部分是這次運動的先鋒，他們是青年工人、知識青年，他們屬於新的、民主的、現代化社會思潮。第一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種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sup>24</sup>青年先鋒分子，他們只是運動洪流中的「小糰粒」，他們「粘結」著眾多文革造就的對現實不滿的人群。聚集在廣場上的人們，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其矛頭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張春橋，其中激進分子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向毛澤東那一代人創建的制度。當時最令人震撼的呼聲：「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這是署名「黃隼」的自由體詩中的一句話。

---

<sup>22</sup>要求恢復文革前秩序的這股政治力量主要是老幹部，到 1980 年代初化為陳雲派和鄧小平派，陳雲派要求恢復到 1957 年以前的狀態，鄧小平要求建立市場經濟。二者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專政。

<sup>23</sup>陳子明(1952-2014)，政治學者，中國民主運動活動家。1976 年參加「四五運動」，成為廣場上的群眾代表，1989 年北京風波後被當局以「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判刑 13 年，剝奪政治權力 4 年。在獄中和出獄後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政治的文章，出版了 12 卷的《陳子明文集》。劉賓雁良知獎頒獎詞說：「陳子明是當代中國自由民主進程中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堅人物和殉道者。」「在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近 40 年漫長歲月中，陳子明屢屢屢起，長期身陷囹圄而無怨無悔」。

<sup>24</sup>《民主運動在中國：陳子明文集 4》，世界華文出版機構，香港，2010 年，第 122 頁。

### 三、壓制民情使抗議升級

在極權制度下，多數中國人是順從的。當權者也習慣了民眾的順從。現在，民眾反叛了，當局怎能容忍？他們要壓制。壓制進一步激怒了群眾，反叛進一步升級。

4月4日是清明節，這是中國人紀念逝者的傳統節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將整個天安門廣場淹沒。到處是詩詞、悼文，擁擠的人們爭相抄寫，大聲朗誦。

親歷者陳子明回憶說，在這場運動中，主動者是少數人，大部分人是追隨者。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追隨者也會成為主動者。陳子明是北京化工學院的學生，因「反動言論」受到懲罰，經過半年多的批判勞改，1976年4月2日，學校當局宣佈開除他的團籍和學籍，遣送永樂店農場勞動。在被遣送之前，有了難得的幾天自由活動時間。關心政治的他，當然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看。他以「帶罪之身」，本來想當一個旁觀者。4月4日，在紀念碑西南角貼出了一篇聲討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他正在看著，後面有人焦急地喊：「請前面的同志念一念！」於是，有一隻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讓他念。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就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齊聲朗讀這篇檄文。他們念一句，周圍的幾十個人齊聲重複一句。由人群組成的「擴音器」發出的吶喊聲在廣場上回蕩。人們歡呼著，呼喊著：「寫得好！」「再念一遍！」「江青不要臉！」「人民信賴鄧小平！」陳子明嗓子念啞了，另一人接替他繼續念。<sup>25</sup>

吳忠回憶說：4日到晚上確實有一兩個人，在紀念碑西南角，離我們小紅樓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裏演講，公開罵江青。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圍得水泄不通。罵江青嗓子都啞了。<sup>26</sup>吳忠說的演講，大概就是陳子明和另一位青年念《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吳忠

<sup>25</sup> 《民主運動在中國：陳子明文集4》，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香港，2010年，第140-141頁。

<sup>26</sup> 《我經歷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吳忠口述，陳楚三、李大震整理，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會上說演講的人抓起來了，抓的是接著陳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陳子明已離開了紀念碑。就在這個時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門安紀念碑上貼了一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抄寫和朗讀的人也很多。

面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sup>27</sup>

參加這個會議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是這樣回憶的：

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傷，衝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葉帥、先念同志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志主持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我彙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一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看熱鬧的人很多，也有壞人帶著一幫打架的人來送花圈。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當時，政治局的同志並沒有人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

會議還沒有散，《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一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麼允許反革命講演？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就右傾。」我當時只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分管政法工作的吳忠，吳忠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我向政治局彙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吳忠來電說，那個演講的人已抓起來了。

會議繼續，12點過後，江青說：「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

---

<sup>27</sup>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68頁。

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園全部送入寶山。」<sup>28</sup>

吳忠的回憶的吳德大體一致，但有一些細節：

《人民日報》的魯瑛（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拿了一個條子送到在大會堂開會的政治局，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周圍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罵啞了都沒人管。江青在政治局會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參加會議回來講：江青指著陳錫聯說「你是司令」，指著紀登奎說「你是政委」，「還有北京的那個二吳（指吳德、吳忠），我們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沒有？」吳德給我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嗓子都罵啞了沒人管，要立即抓起來，要放跑了拿你吳忠是問！我們相處這麼多年，吳德從來沒用這樣的語氣和我說過話。我想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吳德個人的意思。

.....

據倪志福同志講，那天晚上政治局本來有個收花園的議題，已經討論過了，6日收花園；如果6日收花園，天安門事件肯定不至於發生，群眾也是要求花園放到6日。議題已經討論過，通過了，一致意見是放到6日。江青這一大發雷霆之後，張春橋一看手錶，說現在已經12點了，清明節已經過了，可以收花園了！這樣就把已經通過了的6日收花園的決定推翻了。華國鋒主持會議，你也不說，已經決定了的問題嘛！為什麼不說這個話？也不知道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那些老同志當時有沒有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將近一點鐘，吳德回來佈置收花園，我一聽就說，不能這樣搞，群眾第二天一看沒花園，矛盾就大了；他說，啊呀，政治局已經決定了，是執行問題。我說，北京市這樣搞，非搞成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當時我就是這樣說的。吳德說，中央已經決定了，現在是執行問題，派車吧，北京市派100台，衛戍區派50台。我就把後勤部長找來，他說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

<sup>28</sup>吳德：《1976年天安門事件高層決策內幕》，載《百年潮》2004年第2期

收去吧！<sup>29</sup>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是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認為「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sup>30</sup>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動了150輛卡車，把廣場上的花圈全部運走了，深夜留在廣場上的人一部分人受到審問，少數人被帶走。4月5日早上，人們看到的是廣場上空空蕩蕩，沒有一個花圈。廣場周圍圍上了警戒線，不讓人們進入。這一狀況激怒了群眾。十餘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4月5日早上8點半左右，在廣場西邊靠近人大會堂的路上，兩輛裝有廣播器材的大轎車，一邊緩緩行駛，一邊反復廣播：「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請革命同志離開廣場，要警惕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一輛廣播車被群眾圍住，要求廣播員喊「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口號。一輛廣播車被群眾掀翻。當時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

4月5日晨，當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時，已有上千名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前的幾層台座上。不久，大約有一個連的軍人開上紀念碑並圍成一圈，一面驅趕群眾，一面喊著「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紀念碑，清明節已過，不能再送花圈了。」這時一個青年從書包裹拿出一個塑料袋包著的小花圈，要求擺到紀念碑的浮雕處。軍人推搡這個青年，阻止他往前走。這時我正在青年身旁，在批評軍人無理阻攔的同時，帶頭衝破了由軍人手拉手組成的人牆，周圍的人一擁而上把軍人隊伍沖得稀哩嘩啦，簇擁著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紀念碑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個人責備送花圈

<sup>29</sup> 《我經歷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吳忠口述，陳楚三、李大震整理，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sup>30</sup> 毛遠新筆記，中央政治局4月4日會議紀要，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633頁。

的青年，並追問這個青年的單位，這就激起了群眾的憤慨。一個穿藍制服的人說：「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的挑動。別再鬧了。別再為走資派賣命了，現在報紙上快把走資派點出來了。」群眾立即把這個人團團圍住，質問他，還要打他。這時，兩個人出來解圍。群眾認出他們是便衣警察，就喊：「打這兩個便衣！」在群眾的追打下，便衣警察就向人民大會堂逃去。群眾緊追不捨，就把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引進了人大會堂。<sup>31</sup>

當時有人喊：「花圈就放在人大會堂裏面」，有人試圖沖進人大會堂搶花圈。人民大會堂東門被群眾重重包圍。激怒的群眾和警察、民兵發生衝突，有人被打傷。局面失去控制。

#### 四、激烈衝突，強制清場

為了處置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由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揮部成立了「聯合指揮部」。「聯合指揮部」辦公處就在廣場東南的一座小灰樓裏，這本來是衛戍區警衛一師十三團第三營的營部，擔任天安門廣場警衛任務。得知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情況，「聯合指揮部」決定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隊配合，把廣場從南到北兩面封鎖起來。

民兵從哪里來？一位曾經擔任過民兵的人回憶：天安門附近的每個單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發幾個麵包，一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園和太廟，一旦有人再獻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sup>32</sup>民兵沒有解決人民大會堂東門的衝突。吳忠回憶說：

大會堂東門，人很多，要花圈，把警衛團的一個參謀也打傷了，我留下來處理。大會堂負責人給我打電話告急，說緊張得很，參謀也被打了，怎麼辦？汪東興也打電話，說群眾沖大會堂東

---

<sup>31</sup>《民主運動在中國：陳子明文集4》，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香港，2010年，第149-150頁。

<sup>32</sup>趙文滔《1976清明：我曾奉命當「打手」》。

門。一會兒，張耀祠打電話說，吳司令啊，大會堂情況很緊張，你要保護大會堂的安全。張耀祠的電話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邊，是自發給我打電話，還是毛主席知道了情況要他打的電話？但他沒說是毛主席讓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於是就找馬小六，動員民兵維持秩序，讓群眾下來，不要把衝突擴大。民兵出去，一點反應都沒有，民兵的情緒和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的情緒是一樣的，讓他們動員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下來，一點效果都沒有，我們不能讓民兵強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勸說了，群眾不聽；另外民兵也不賣力氣去勸說，情緒是一樣的嘛！我一看一點效果也沒有，人越來越多，廣場越來越亂。我回到衛戍區禮堂，把管警衛的一師、二師領導找來，曾紹東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當時一師、二師的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態繼續發展，警衛一師、二師維持秩序已經沒有能力了。……這時吳德來了，還有楊俊生同志，吳德主持我們幾個在場的副司令、副政委開會研究，是否調三師、四師進城，不進城維持不了秩序。吳德同志要我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打電話，我直接給陳錫聯同志打電話，說警衛一、二師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態一直在發展，沖東門的情況還沒解圍，我們研究調三師、四師的部分部隊進城，維持秩序，都是徒手。陳錫聯同志同意，說可以調三師、四師部隊進城，調多少，你們和吳德同志研究。做好計劃後，分三批調進五六千人。但沖東門的問題還沒解決，你不能往下拽啊！幾千民兵維持秩序，也沒法制止。這一天群眾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兒去了？汪東興打電話來，問什麼時候能解決沖大會堂東門的問題，我說下午兩點吧！組織力量還要時間……兩點後還沒解決你再找我。其實不到12點就解決了，一個日本人在裏面照相被發現了，群眾把照相機奪過來，拉出膠捲曝光，打他，日本人往歷史博物館跑，群眾「嘩」就沖向歷史博物館，大會堂東門就沒人了。

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人們離開人大會堂不是追日本人去廣場

東邊的歷史博物館，而是去聯合指揮部。在一個工人民兵的指點下，大家得知，「聯合指揮部」就是連日來鎮壓群眾的現場指揮部。於是，人民大會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縱隊，高唱《國際歌》，穿越天安門廣場，奔向聯合指揮部——廣場東南角的小灰樓。人群到達小灰樓前，工人民兵早在樓門前圍成了人牆。群眾一邊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打倒工賊！」一邊向小灰樓衝擊。在群眾的一致要求下，派陳子明、趙世堅、孫慶祝、侯玉良四名代表進樓談判。但守門的人不讓四人進去。他們四人只好踩著守門人的肩膀爬了進去。進去談判沒有結果。附近居民說樓下有一位患心臟病的老太太，讓他們不要在這裏喊了。四人只好離開小灰樓。陳子明因臉上有血，鞋子擠丟了，就離開了其他三人去止血換鞋去了。

看到四位代表談判無果，群眾更加憤怒，就開始遊行。遊行者燒毀了小灰樓前面的一輛小汽車。不一會兒，開來了兩輛救火車，都被群眾堵住不讓進來。下午 2 時 55 分，一輛小麵包車為被困在小灰樓裏的人送飯。遊行隊伍中有人說：「我們從早晨到現在什麼也沒吃，他們吃飽了鎮壓我們，不行！不行！」群眾把麵包車裏的食品扔了出來，把車掀翻了，點著了。停在小灰樓門前的兩輛吉普車也點著了。停放在門前的幾十輛自行車也被投進了烈火之中。下午五點左右，小灰樓前的警衛部隊撤走了，群眾沖進了小灰樓，點燃了樓裏的稻草，火焰直沖二樓。樓裏的桌、椅、書籍、收音機等被人們從窗口扔進了樓前的烈火。在烈火的驅趕下，小灰樓裏的人員（據說有民兵總指揮馬小六等）不得不從後門撤離。

這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首都北京從來沒有過的大規模的反抗事件。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暗暗高興。鄧榕在描述這幾天鄧小平的情況時寫道：「每一天，每一個傳來的消息，每一個激動人心的詩歌，都讓我們激動不已。鄧小平一家人的心，和天安門廣場上人民群眾的心，用同一個節奏跳動著。」<sup>33</sup>汪東興說：「有些受衝擊的老同志對發生在天安門事件幸災樂禍，楊尚昆買酒慶祝

---

<sup>33</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 469 頁

嘛。」<sup>34</sup>幹部子弟當然是「四五運動」的積極分子，但他們沒有打頭陣，在武力清場時抓捕的人當中沒有幹部子弟。4月5日下午，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到人民大會堂，在江西廳就近觀察天安門廣場的情況。鄧小平也被叫到人大會堂，受到斥責。張春橋在他給兒子的信中寫道：「4月5日，我到大會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sup>35</sup>一樣。從望遠鏡裏看得清清楚楚。當著鄧小平的面，我罵了他是納吉。」<sup>36</sup>

下午2時，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晚6時半發表吳德講話，動員群眾離開廣場。8點半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骨幹分子。

晚6點30分，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擴音器同時開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吳德的講話。這個講話稿由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起草，吳德修改後送中央。聽說毛澤東看了，批示說照辦。吳德的講話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不要上當。」吳德要求群眾立即離開廣場。

吳德這種威脅性的講話，並沒使廣場上的人減少，反而越來越多。下班的人流匯入了廣場的抗議人群。群眾的注意力從小灰樓轉向紀念碑。

吳忠回憶說：

吳德從政治局開會回來說，政治局開會決定鎮壓反革命，包圍天安門廣場，抓壞人。政治局開會時就從大會堂打電話調動民兵了。據吳德講，開始王洪文說要調20萬民兵，最後確定調10萬，實際落實的不到5萬。吳德回來傳達中央決定，民兵10萬

<sup>34</sup>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施義之妻陳楓據施口述和施的申訴材料，內部讀物，2002年，第70頁

<sup>35</sup>匈牙利事件發生在1956年，是匈牙利人民反抗專制的一次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後中共勸蘇聯出兵鎮壓而平息。納吉·伊姆雷，匈牙利推進民主改革的一位高官，曾任總理，在這次抗議活動中，群眾支持納吉。抗議活動被鎮壓後，納吉被處死。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前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共認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亂，納吉是這場暴亂的支持者。

<sup>36</sup>張春橋給兒子張毛弟的信，1976年4月18日。

佈置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幹警佈置在現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衛戍區的警衛部隊也參加，還是上午維持秩序的那個部隊，佈置在歷史博物館，小灰樓周圍。行動時間是八點半。

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八點半鐘快到了，廣場上所有的燈全部打開。開燈和廣播吳德講話，都是為了執行八點半包圍廣場的措施。

天安門廣場的最大容量是 42 萬人。吳忠看到廣場密密麻麻，已超過廣場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圍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給吳德提建議推遲時間。又一想，八點半是中央的作戰命令，建議不執行中央設定的時限，吳德是做不到的。他乾脆誰也不請示，就是按兵不動。吳忠打算推遲到晚十一點清場。十一點是北京市公共電汽車的末班車，不離開廣場就回不了家了。在八點半到十一點之間，陳錫聯多次給吳忠打電話催促：你怎麼不動啊？廣場上沒什麼人啦！吳忠心想：你要廣場上那麼多人幹什麼？我想減都減不下去呢。他認為陳錫聯在說胡話。

十一點過了，吳忠通知部隊、公安、民兵出動，開始強制清場。用棍棒和拳腳驅散了群眾。清場過程中有人挨打，但沒有死人。吳忠回憶說抓了 150 多人，實際抓的人更多。

4 月 6 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聽取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彙報。會議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當日凌晨 3 時，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11 時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sup>37</sup>

人民日報記者王永安於 11 月間，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事件復查小組負責人的協助下，搞清了基本情況：天安門事件中共捕 388 人，粉碎「四人幫」前釋放了 224 人；1976 年 11 月至 12 月，釋放 120 人；1977 年 5 月至 7 月，釋放 20 人；1977 年 5 月至 1978 年 11 月，釋放 21 人，在押 3 人。在押的 3 人，均屬趁火打劫。他們在 4 月 5 日廣場東南角的小樓著火後，沖進去偷大衣、半導體收音機，但不是

---

<sup>37</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 473 頁。



反革命分子，也與天安門事件案件無關。<sup>38</sup>

4月7日上午，毛遠新向毛彙報了廣場的情況，毛澤東說：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准。毛遠新問：由中央作決議，公開發表？毛澤東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毛澤東要毛遠新約幾個人談一下華國鋒任總理的問題，要他快去。當天中午，毛澤東聽毛遠新彙報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在談到華國鋒任總理的決議時，毛澤東又提出華國鋒任黨的第一副主席。<sup>39</sup>

4月7日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兩個決議。一，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1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質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二，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9號）：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激進的文革派沒有被安排為接班人，並不是毛不相信他們，而是毛知道軍政官僚們不會接受他們。作為政治家，不能僅憑與他的親密程度安排人事，關鍵是看他們能不能站得住。在當時的力量對比的情況下，文革派是很難站得住的。文革派對毛這樣的安排是不服的。他們看不起華國鋒，擠兌他，將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這為他們的徹底覆滅埋下了禍根。

鄧小平成了中國的「納吉」，成了眾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會議上有人提出鄧小平曾到廣場上指揮群眾騷亂。華國鋒說，這得問一問鄧小平本人。江青建議讓汪東興去問。汪到鄧那裏之前，先到了毛處，告訴毛鄧可能受到衝擊，也可能被群眾抓走。毛明確表示，對鄧不能再衝擊，也不能抓走，讓汪想辦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

<sup>38</sup>王永安：《天安門事件被捕人員的處理情況》，1978年11月15日《情況彙編》第726期

<sup>39</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46頁。

東興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 17 號加以保護。當然，汪也沒有忘記他的使命，問鄧是否去過廣場。鄧回答說從來沒有去過廣場，只去北京飯店理髮一次。第二天，鄧小平就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表示：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二，對繼續保留黨籍表示感謝。<sup>40</sup>6 月 10 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說卓琳住院，一個人太孤單，要求和孩子們住在一起，毛同意。7 月 19 日又回到他原來住的寬街。在這幾個月，他的家人也從寬街被驅趕到育群胡同，現在也回到了寬街。

4 月 8 日，北京 1 0 0 多萬軍民上街遊行慶祝。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重新在遊行隊伍中震天響起。

4 月 9 日，北京市 1 萬多名青年代表舉行大會，「憤怒申討鄧小平的罪行」。

4 月 1 0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是《偉大的勝利》，認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廣場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的勝利。

各省委和各大軍區都爭先恐後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接連幾天的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全國各省委、各大軍區黨委給毛主席、黨中央的電報，這些電報都表示：「決心更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充分發動群眾，深入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門爭進行到底！」

在極權制度下民眾的情緒是可以被操縱的。有組織的政治表態，不一定是表態者的真實意願。前幾天在廣場上十分活躍的人們中，不少也參加了慶祝「偉大的勝利」的群眾遊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縣人，原名蘇鑄。1921 年生，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 年擔任陽曲縣委書記兼任武裝大隊政委。這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他隨軍南下。1954 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全會，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特邀華國鋒為列席代表。在會上還讓他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的經驗。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稱他為「父母官」。從此，這位面容

---

<sup>40</sup>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 475-477、482 頁

敦厚、操著濃重山西口音的人官運亨通。

1959年，毛澤東到長沙。華國鋒安排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韶山故鄉，並全程陪同。從此以後，毛澤東每次回湖南，華國鋒總是熱情相待，虛心求教。毛澤東常對人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華國鋒此時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他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廣州部隊政委。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從上海調來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了華國鋒。當時在毛澤東心目中，王洪文對文化大革命態度堅決，是作為接班人調來的。由於王洪文的文革色彩過於濃重，為官僚集團所不容，華國鋒才有進入權力的頂峰的機會。1973年8月，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1月28日，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接替挨批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四五運動」把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重厚少文」。據《史記·高祖本記》載：呂後曾問劉邦，蕭何死後誰能替代。劉邦答：曹參。又問其次，劉邦說：「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澤東以華國鋒比「重厚少文」的周勃，說他可以「安天下」，是因為他是左右兩邊都可以接受的人選。張春橋雖然能夠理解毛的思想，但很難被官僚集團接受，「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希望他輔助華國鋒。

「四五運動」平息了，天安門廣場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這場抗議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留下的震動沒有平靜，社會批判的思潮沒有平靜。這場運動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它是兩年之後的「民主牆」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先聲，它不僅為突破改革開放的禁區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著自由主義思想的蛋殼，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作了準備。正如陳子明說的：四五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轉折點。

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包遵信<sup>41</sup>說：發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四五」運動，曾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兩年後為它平反則肯定它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運動」，並以此為根據而載入了官方史冊。其實，如果就事實真相說，我倒是傾向於官方給它的「罪名」。「四五運動」批判的矛頭指向是毛澤東和他那所代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如果說限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條件，「四五」運動的正面訴求更多的還是以懷念周恩來、謳歌周恩來這樣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那麼在兩年之後的「民主牆」和「民刊」時期，就以較為明確的語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願望：一黨專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權與自由、民主與法治，中國必須容納人類現代文明這些主要內容，實行政治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

在「四五」運動之前，人們誤以為，對於專政制度只有我反對，別人都是支持的，誰也不敢說，不敢碰。現在，終於衝破了「囚徒困境」。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不久，一舉抓獲毛的四個親信，結束文革。（胡平語）

1978年10月，在「天安門事件」即將平反的時候，遠在貴州的詩人黃翔來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啞的嗓子，朗誦了他歌頌「四五運動」的詩篇《不，你沒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門廣場！  
以你埋藏在胸頭燃燒著的火焰和岩漿，  
以你曾經發出過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難道你竟這樣靜靜的死去？  
永遠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會死去，你不能死去！  
你的旗幟並沒有順從和倒下，  
你的被撕毀的橫幅標語沒有垂下火紅的翅膀；

---

<sup>41</sup>包遵信（1937-2007），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因任主編的《走向未來》書，被譽為中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啟蒙者之一。1989年5月學運期間曾連同多名知識分子到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後和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等被中國當局指為事件之「幕後黑手」並被捕入獄判刑五年。

你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詩歌和傳單仍在發出嘶啞的呼聲；  
你的鐵錘般的拳頭，仍然在沉默中挑戰和應戰；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軀仍在無聲的控訴和吶喊。  
你是不可戰勝的，  
你會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強大，  
重新高舉進攻的旗幟！



## 第二十八章

# 文革落幕



十月政變，四人幫被抓捕。

## 一、毛澤東逝世

1976年9月9日，清晨的北京，微風拂過，偶爾有幾片樹葉飄落。市民們照樣起床、早餐、擠公共汽車。一切和往日沒有兩樣。但是，中南海進進出出的小汽車，一些重要機關裏人們凝重的神色，卻是一種與往日不同的氣氛。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具有政治嗅覺「特異功能」的中國人，透過那麼一點點「異常」，「感覺」到中南海裏出了非同尋常的情況。這種「感覺」像空氣中彌漫的氣味一樣，很快擴散到京城以外。在100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萬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發生一個多月，我正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合作採寫一篇抗震救災的稿子。上午9點多鐘，我匆匆趕到天津賓館的抗震棚裏去會見安崗，含蓄地對他說：「北京大概出現了宏觀異常。」「宏觀異常」是我借用當時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術語。有幾十年新聞工作經驗的安崗，很快意識到將要發生「政治地震」。他對將要脫稿的長篇通訊不作任何交代，10點鐘就趕回北京去了。

9月9日零點10分，毛澤東丟下了他的十億臣民溘然長逝了。

從1971年開始，他就一直受到嚴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並且出逃，成了轟動世界的政治醜聞，給他精神上的打擊實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經歷四天的醫生檢查後，發現他「患有兩眼白內障、運動神經元病、冠心病、肺心病、兩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左臀部褥瘡、血液中氧氣過低。還有低燒，咳嗽很厲害。」<sup>1</sup>暮年的他，總是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情況，願意看這方面的電影。一次，銀幕上出現解放軍列隊進城受到群眾歡迎的場面，毛先是陣陣抽泣，接著失聲痛哭。從5月起毛的病情不斷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經及時搶救才得以脫險。病情沉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養，「落葉歸根」，政治局考慮他的病情，沒有同意他這一要求。8有8是，他圈閱了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這是他圈閱的最

---

<sup>1</sup>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92頁。



後一個文件。<sup>2</sup>

他的個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一個兒子死在朝鮮戰場，一個兒子神經不正常。晚年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又和妻子分居。他沒有溫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讓人注釋印製大字本的《枯樹賦》、《月賦》、《雪賦》、《別賦》。《枯樹賦》中寫老樹「拔本垂淚，傷根瀝血」，《雪賦》中的「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正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悲涼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春節是在中南海的住處度過的。沒有家裏的親人陪伴，沒有客人來訪。只有身邊的工作人員陪伴他殘病之軀。在外面鞭炮齊鳴的時候，他這裏只能聽到寒夜的風聲。在無奈的寂寞中，他讓工作人員也放了幾掛鞭炮。進入新的一年，他健康狀況惡化，吃藥、吃飯都要人喂。行動更加困難。他雖然只有剛治好的一隻眼睛能看東西，但他終生養成的閱讀習慣一直保持到臨終前一天。為了滿足他艱難的閱讀需要，工作人員幫他舉著書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顫抖的手寫了一個「三」字，又用手敲木制床頭，工作人員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書，把書找來時，他點點頭，露出滿意的神態。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在參加競選，毛很關心他在大選中的情況。在工作人員的幫下，他看了幾分鐘，又昏迷過去。9月8日，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鐘。他是在搶救的情況下看文件看書的。<sup>3</sup>

在兩個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對他們交待後事。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小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

<sup>2</sup>《毛澤東傳 1949—1976》，第1774、1776、1777頁。

<sup>3</sup>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4頁。轉引自《毛澤東傳 1949—1976》第1777頁。

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sup>4</sup>

他離開人世時是擔心的，一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發生動亂。他是懷著憂慮的情緒離開人世的。

9月9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發去了急電，要求各地穩定局勢。軍隊迅速進入了戰備狀態。在政治極權的國度裏，最高政治強人的逝世有可能發生社會震動甚至動亂。中共中央的這些措施正是基於這一常識。

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悲痛的聲調廣播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佈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向全國人民通報了這一噩耗。頓時全國上下都表現出悲痛的情形。駐全國各地的新華社記者發回了各地的情況：

**新華社西安九日電：**……在市中心的鐘樓一帶，許多人泣不成聲，有的放聲痛哭。全市各電影院裏，觀眾都自動地停止觀看，悲痛地離開了影院，電影隨即停止了放映。在新華書店，人們排起了長隊，含淚購買毛主席畫像……

**新華社西寧九日電：**……全市六個新華書店門市部立即排起了購買毛主席像的長隊，人們用手絹擦淚，書店裏一片哭聲。到晚上八時止，賣出毛主席遺像21100張。在市區和郊區的八個百貨店，到晚上八時止賣出黑紗三萬多尺……

---

<sup>4</sup>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74—1775頁，後來當事人華國鋒說毛沒有這樣的談話。編者按：其實，毛澤東已不能說那麼長的話，故存疑。這段話在葉劍英講話中是沒有的，葉只是說：「毛澤東生前曾經對我們講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一件是，勝利的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時，《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649頁，實際上也否定了《毛澤東傳》的說法。可參見余汝信、曾鳴：〈毛澤東「政治遺囑」之疑〉，（載《領導者》，2014年6月號）。

**新華社唐山九日電：**……在唐山市內的成千上萬名群眾，在廣播喇叭下哭聲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車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邊的牆上掉淚。一位老大娘盤著雙腿坐在抗震棚前，拍著膝蓋放聲大哭。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坐在一堆瓦礫上雙手掩面痛哭失聲。記者在市委大院裏看見，六個同志因極度悲痛當場暈倒……

**新華社合肥九日電：**……當高音喇叭裏傳出播音員悲痛的聲音時，一個五十五萬人的城市突然沉靜下來了。所有的車輛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一齊站在高音喇叭下肅穆靜聽……

各地新華社記者的描述沒有虛構。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的場面。為什麼領導人逝世引起全國集體慟哭？這與兩千年的皇權政治的傳統有關，也是多年對毛搞個人崇拜的結果。9月9日午飯後，新華社天津分社領導讓我到天津第一機床廠，說是下午4點鐘有重要廣播，讓我和工人一起收聽，並反映收聽情況，但他沒有說「重要廣播」是什麼內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一機床廠時，已有數百人集合在露天廣場上（地震期間各種活動都是露天的）。3點鐘，廠領導人從市里開會回來。他以手掩面，哭著走下汽車，泣不成聲地說：「毛主席逝世了！」他話音剛落，立刻就有幾個人放聲大哭起來。聽廣播時整個會場一片哭聲。

哭是可以傳染的。當你置身於一片哭聲之中，也會情不自禁地流淚。我平時很少流淚，對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態度。按理說我不會哭的。但是，在當時那種氣氛中，我也淚流滿面。幾天以後，我一人獨自到天安門廣場。我在這裏漫步，沉思。在學生時代，我在這裏參加過多次國慶活動和其它政治集會，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樓上揮動大手向我們致意。現在，我仰望著空空的城樓，深深感到政治強人身後的寂寞和空虛，深切體驗到一個時代結束的傷感。這大概是全民慟哭的原因之一。別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風險，這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公開場合眾人慟哭，私下可能是另一種情況。若干年後，從一些當時受迫害的人的回憶中看到，聽到毛逝世，他們暗暗高興，還有人私下飲酒慶祝。

9月18日下午三點鐘，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100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全國各地的追悼會的分會場不計其數。在同一時間內，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0億人都在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廣場也舉行十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同時，每個單位、每個居民委員會都設立了靈堂，幾乎全國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門廣場、在各地的中心廣場、在千百萬個靈堂裏同時舉行悼念。那時，我因採訪任務從天津市陸南道騎自行車到中心廣場，路過勸業場一帶繁華商業區。街道上沒有一輛汽車，沒有一個行人，商店裏也沒有一個顧客。到處是一派寂靜肅穆的氣氛。這是絕無僅有的景象。

一個政治偉人的逝世，帶來的震動勝過悲哀。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得知毛澤東逝世時的第一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sup>5</sup>確實，這個國家政治大廈的頂樑柱崩塌了。在這所大廈裏活動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動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聲背後是悲傷，是恐懼，是憂慮，是彷徨，還是解放？都有，只不過是因人而異罷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這位偉大領袖的權威打擊「當權派」的人，或被毛澤東當作「棍子」用來打擊「當權派」的人，在悲傷中帶有恐懼。因為他們所打擊的「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大部分已經官復原職，並且成為掌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務實派」。在中國，哪一個皇帝駕崩後，皇帝的打手不遭滅頂之災？據當時瞭解的情況，這些人私下接觸比過去多了，他們說話比過去少了，行動更謹慎了。

在知識分子當中有頗多憂慮。他們都知道，毛澤東是在爭奪接班人地位的鬥爭十分激烈的時候逝世的。在極權政治體制下，接班人地位的爭奪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們覺得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當時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種各樣的傳說都有。人們憂心忡忡。

很多人在彷徨。「毛主席」，這是一代中國人用得最頻繁的三個字。在所有的報刊雜誌上，在所有的書籍上，在所有牆壁的標語上，哪里不把毛主席的話當作最權威的引證呢？從幼兒園的兒歌，到人民

---

<sup>5</sup>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6年9月11日。

大會堂的莊嚴報告；從家庭裏的輕鬆交談，到論敵間的激烈爭辯，那裏沒有「毛主席」這三個字呢？毛主席充滿了整個空間，佔據了人們的心靈。毛主席成了人們的「上帝」。「上帝」死了，我們怎麼辦？

不少人懷有期冀之心。在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和公正待遇的人們，還壓在「五指山」下。他們希望有重見天日之時。多年受打擊、受壓制的「地、富、反、壞、右」，希望有可能擺脫政治賤民的地位。在頻繁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錮得有點過分的社會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張之日。還有一大批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們，希望在毛澤東之後，日子有可能過得好一點。在當時，這些人不是滿懷希望的，他們的情緒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測，只是在茫然中存有一絲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一個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鄧小平。此時的鄧小平在幹什麼呢？

此時的鄧小平還在北京寬街的家中。他頭上還戴著一頂很大的黑帽子：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中國的「納吉」。正在看書的鄧小平，從女兒那裏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書本，在四周的哀樂繚繞中沉思起來。

## 二、劍拔弩張

如前所述，毛澤東逝世之前，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形成了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派的徹底革命派→堅持「繼續革命」的文革派→恢復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極左的徹底革命派中，一部分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徹底砸爛」，一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這正符合「極端相通」有原理）。極左派已被鎮壓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夠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股政治力量。由於官僚派強調「四化建設」，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論問題」，因而被人們稱為「務實派」。在毛活著的時候，他一直在兩種力量之間維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級權威才能維持這樣的平衡。現在，維持平衡的超級權威一下子消失了，再沒什麼力量能夠維持平衡了。勢不兩立的雙

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才是結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個人，下面的群眾基層也很薄弱。而務實派卻掌握了從下到上的權力，支持他們的群眾也越來越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務實派是一次打擊，但這一運動有違民意，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對他們減分並不多。

爭奪毛身後國家領導權這兩種政治勢力，有著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轉向經濟建設。從當時的民心來看，希望結束混亂、搞經濟建設的是多數。「四五運動」已充分顯示出，兩種政治力量的群眾基礎的明顯差別。

毛逝世後，兩種力量劍拔弩張，處於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

9月11日到9月17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七天的弔唁儀式。在這期間，30萬人來弔唁，在低沉的哀樂聲中，佩帶黑紗的人川流不息。

參加弔唁和守靈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宋慶齡、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

從守靈人的陣容可以看出，兩種政治勢力同時彙集在毛澤東遺體前。這些站在在毛澤東遺體前面容悲戚的人們，心裏各自盤算著如何擊敗對方。這正是：「大家來念經，都在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在哀樂繚繞的氣氛中，雙方開展了頻繁的幕後活動。

文革派控制輿論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當時的主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政治上、輿論上佔有優勢。毛澤東逝世後政治局常委只有四個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已讓葉劍英「養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數。

文革派對立面的務實派，雖然力量強大，但沒有掛帥的人物。鄧小平已經被打倒，「養病休息」的葉劍英不能過問軍隊。華國鋒是一個關鍵人物。他是毛親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長期間，批判「算舊帳」（即算文革的「帳」）的劉複之和于桑，是維

護文化大革命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積極的。<sup>6</sup>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澤東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華國鋒，張春橋安心當華國鋒的輔助者，可能是另一種結局。但文革派沒有這種胸懷，把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

1976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張春橋就心懷不滿，寫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一號文件，是指1975年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臺了。張春橋也期待華國鋒像鄧小平一樣，「來得快，垮得也快」。據說，文革派曾對華國鋒採取先拉後打的政策，如果拉不過來就打。從張春橋的《三月二日有感》來看，他們沒有「拉」的誠意。人們沒有看到他們「拉」華的行動，卻看到他們對華國鋒步步緊逼。<sup>7</sup>

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在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受到王、張兩人的鉗制。華國鋒不開常委會，而是召開常委擴大會，並且盡可能讓葉劍英、李先念參加。

在毛逝世前後，作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麼呢？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sup>8</sup>了天津手錶廠、第一煉鋼廠、和

---

6施義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第55頁、63頁。

<sup>7</sup>這段話出自1976年的春節張春橋給王洪文秘書蕭木的信。官方說這是張反對華的證據。但蕭木後來說，這封信中所說「又是一個一號文件」，不是對著華國鋒，而是對著鄧小平。因為1975年一號文件，是關於鄧小平複出的，而1976年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總理，實際罷黜了鄧小平的權力，所以張春橋才會在信中說「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見李遜：《張春橋和【有感】》，《記憶》2015年第144期

<sup>8</sup>江青到天津，說她不是視察，只是探望。

警備區一團一連抗震救災的軍民。她在「探望」煉鋼廠和連隊時，本書作者隨同採訪。她對群眾說毛主席身體很好，還指著她穿的軍裝對戰士們說：「這個紅星是我爭取來的，我穿上軍裝，你們明白不明白這個意思？」她對天津駐軍負責人說：「你們受壓了，我是給你們恢復名譽的。前年寫了一個順口溜，也成一條罪狀，整我，也壓你們。」她「探望」的那個連隊在幹部俱樂部旁邊。我就坐在她身後。她突然向後扭頭看到我作記錄，警覺地質問：「你是誰？」我站起來說：「我是新華社記者。」她站起來和我握手，說：「自己人！自己人！請轉告你們領導，寫的東西給我看一看，以免幫倒忙。」她想籠絡工人，拉軍隊，希望記者給她幫忙。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做做下層的工作，造造輿論。」據陳永貴說，在大寨期間，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電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強作鎮定，還吆喝著：「打牌！打牌！」。她和大家一起打撲克，一邊等待火車。但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不停地看手錶。

9

江青從大寨回來就從釣魚臺搬到中南海毛的住處旁邊，想控制毛的文件。這些文件裏有些牽涉到政治局許多人的檢討書、檢舉信。文革初期，中央領導之間也是互相揭發，幾乎人人有份。拿到了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還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誰控制了「最高指示」，誰就可能掌握政治鬥爭的主動權，誰就可以得到繼承人的合法性。所以，爭奪毛留下的文件就成為毛逝世後的第一個鬥爭焦點。9月12日，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要求召開緊急常委會。華問她討論什麼問題，江不明確回答。華問什麼人參加，江青指定不要葉劍英參加，要毛遠新也參加。會一開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和書籍交給她和毛遠新清理。她說，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書，由她整理是理所當然的。還說，列寧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為主整理的。

汪東興說：「主席的文件不是講好要封存嗎？現在保存主席遺體問題還沒有解決，沒有時間清理！」

---

<sup>9</sup>秦楚：《陳永貴談華國鋒、江青、胡耀邦》，《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江青看到華國鋒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議讓張玉鳳保管，華國鋒、汪東興不同意。江青就鬧了起來。華國鋒宣佈散會，他說：「今天的會，連劍英同志都沒參加，不算常委會。下次他來了，人到齊了再討論。」江青正要發作，張春橋阻止了她。對大家說：「我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我們分不出手來，先叫毛遠新幫小張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張春橋的意見。華國鋒沒有同意。會議開了四、五個小時，最後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的一切材料、文件和書籍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9月17日，汪東興和武健華在毛的臥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來就進不去。深夜兩點鐘，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說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鬧，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就要趕我走嗎？」

9月21日，中央辦公廳清查文件時，發現江青、毛遠新以「看一下」為名，從張玉鳳那裏拿走兩份文件沒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國記者談話的記錄副本，另一個是1974年毛澤東在武漢與楊得志、王六生的談話記錄稿。汪東興等人認為，這是兩分帶有重要機密的重要文獻，他們找江青等索回，開始不給。費了一番周折以後，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個條件，要華國鋒看後正式批給王洪文、張春橋傳閱。華國鋒沒有理睬。據務實派後來說，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對文件進行了刪改。

9月29日，晚11點。政治局會議。華國鋒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後的國慶節怎麼過的問題。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怎麼辦？」它還批評華國鋒在保定問題上優柔寡斷。王洪文和張春橋提出要加強集體領導，要安排江青的工作。這個議題被葉劍英、李先念等否決了。他們又提出討論毛遠新是否回遼寧的問題。毛遠新給華國鋒寫了一封信，試探華的態度：「我是主席的聯絡員，是從遼寧來的，主席逝世了，我沒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還是回遼寧？我覺得返回遼寧好。」「四人幫」希望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明確表示，同意毛遠新回遼寧。

江青生氣地說：「毛遠新應當留下。還要他處理毛主席的後事！」

華國鋒寸步不讓。他說：「你不是說過，毛主席的後事你不參加，毛遠新也不參加嗎？怎麼現在又讓毛遠新留下來處理後事呢？」江青

不承認她說過這樣的話，爭論激烈，會議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憊不堪。華國鋒讓葉劍英、李先念年紀大的先走了，會場只剩六、七個人。江青等人一會兒說毛遠新不能走，一會兒說要召開三中全會。等他們話說完了，華國鋒問江青：「你究竟想要幹什麼？」江青說：「要討論起草三中全會報告。」

華國鋒最後以主持人的身分說：「由於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在，三中全會問題根本不能討論。即使三中全會要作政治報告，應該由我來準備。至於黨中央人事安排，應該由政治局討論決定。」說完就站起來宣佈散會。<sup>10</sup>

「四人幫」在這一場鬥爭中，除了掌握輿論工具以外，在務實派面前，顯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軍事鬥爭，他們都不是務實派的對手。

文革派寄希望於十屆三中全會，他們想通過這次會議鞏固和加強他們在中央的力量，他們的一切活動就是為三中全會拉票。1976年9月18日晚，張春橋對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sup>11</sup>文革派沒有搞政變的計劃和打算。後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說的「四人幫」想搞「兵變」，是不符合實際的。文革派手無寸鐵，他們有一種恐懼感。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預感，擔心孩子怎麼辦。他還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不要難過。」恐懼感來自他們對力量對比的判斷，也來自從軍政官僚們那裏傳來的一些信息。

許世友的兒子是北京軍區某部團長，給他的女友、301醫院的一位護士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羅、傅藏手槍的事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講，我看他們是在準備行動了。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

---

<sup>10</sup>範頌：《葉劍英在1976》，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259—262頁。

<sup>11</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8頁。

可能要發生內亂，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臺，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幹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也快完蛋了。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sup>12</sup>

羅、傅是指羅瑞卿和傅崇碧兩位將軍。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裏。王洪文把這封信交給毛遠新，憂慮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有軍隊怎麼辦？」他們商量讓瀋陽軍區副司令孫玉國<sup>13</sup>從瀋陽調兩個師來。然而，作戰部隊一個營的調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一個團的調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王洪文雖然是軍委副主席，但他一人無權調動軍隊。張春橋雖然是總政治部主任，幾位副主任都不聽他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總政治部連一個批鄧的文件也沒有下發。他們從瀋陽部隊調兩個師進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1976年夏，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望他。他們談到，現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爭，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佈張春橋為叛徒<sup>14</sup>，實行全國

---

<sup>12</sup>丁盛說，許世友的兒子許建軍的這封信是丁盛、廖漢生兩人簽名蓋章送給中央的，他們兩人是當時南京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社，香港，第252頁。本書中引用的信的內容是新華社一位知情者當年告訴本書作者的。

<sup>13</sup>孫玉國，1969年前為黑龍江一邊防站長。在1969年3月，在中蘇珍寶島戰鬥中，成為「戰鬥英雄」，「九大」會上被毛澤東賞識，從此快速晉升，1974年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sup>14</sup>十月政變之後，中央專案組要求天津市委落實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因為1937年張春橋離上海到延安，路經濟南時曾住在濟南市警察局長趙福成家裏，趙是復興社特務。當時受命留在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1949年以後趙福成住在天津。參與調查這件事的天津市委辦公廳負責人王輝說，趙沒有供出張是叛徒的事實，「我知張，張不知我」。——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第254頁。

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

這個信息很快傳到河南省。7月，新華社河南分社一位記者把材料送到總社，要求總社通過姚文元轉給毛澤東。姚文元看了後考慮再三，把這封信壓下來了，沒往上轉。後來從姚文元處抄家，抄出了這封信。當時主持總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長周明英為此成為重點清查對象。姚文元後來說：「這封信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裏。」<sup>15</sup>

「四人幫」深感沒有武裝的危險。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見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揮部的領導人，他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裏。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揮部，把武裝部合併進來。這不是一個組織形式問題，而是一個戰略問題。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你們可要給我抓好。現在你們要做點思想準備，人家一巴掌打過來，我們是否站得住腳。」<sup>16</sup>王洪文這次回上海是參加民兵工作座談會。會後他對馬天水說：「武器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要下放到民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有武器。」<sup>17</sup>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開始發武器，到9月10日，7萬多件武器發到了基層。<sup>18</sup>不過，研究者稱，上海給民兵發槍是1976年夏天的事，當時是為了應付像「天安門事件」那樣的群體事件。毛逝世後，上海重視民兵是為了應對「人家一巴掌打過來」，並不是搞武裝政變，上海的民兵是不能到北京搞政變的。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繼續大張旗鼓地宣傳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三家聯合發出了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社論，社論中公佈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什麼是「既定方針」呢？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雜誌等

---

<sup>15</sup>這一情況是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姬世發和新華社老編輯解立夫告訴本書作者的。

<sup>16</sup>《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頁。

<sup>17</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44頁。

<sup>18</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4頁。

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和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從9月17日-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都有「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按既定方針辦」的宣傳給人們這樣的感覺：毛主席雖然去世了，但文革還要繼續，批鄧還要繼續。這樣的宣傳當然會給反對文革的務實派以很大的政治壓力。

「四人幫」在利用毛的「臨終囑咐」時犯了一個錯誤，把毛的「照過去方針辦」搞成了「按既定方針辦」，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沒有多大差別。務實派抓住了這個錯誤，說「四人幫」「篡改」、「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

「照過去方針辦」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見新西蘭外賓之後在華國鋒的本子上寫的三句話之一。這三句話是：「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為什麼搞錯了呢？這是7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華國鋒首次公開傳達毛澤東的這三句話時，記錄者沒有聽清，記錄整理者陳斐章就按照大概回憶，就寫成了「按既定方針辦」。10月2日，華國鋒審閱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時，刪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針辦」，在稿件上批示：「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張春橋怕「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沒有下達華國鋒的批示，而是讓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這個提法，慢慢改正錯誤。10月3日，姚文元對《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他要魯瑛轉告新華社領導核心小組組長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10月4日晚，魯瑛向莫艾傳達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經來不急了，這一天《光明日報》，以《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

針辦》為題的「梁效」長篇文章已經發出去了。<sup>19</sup>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編輯部組織「梁效」寫的，其根據9月16日兩報一刊的社論精神，沒有更深的背景。

當兩股敵對的力量劍拔弩張的時候，都會密切地注視著對方的一舉一動，並且將對方的舉動作出過於嚴重的解讀。這種正相關的互動，使得雙方的鬥爭不斷升級。

《光明日報》10月4日的這篇文章，被務實派認為是「四人幫」搞政變的「反革命動員令」、「反革命宣言書」、「反革命信號彈」，從而加速了務實派的政變。就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的這一天，江青提出要到石家莊去，但專列開到保定的一個岔道上就停了下來。江青下火車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時間就上車了，沒有找當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軍進行活動，也沒有去石家莊。如果這篇文章是政變的「動員令」，作為政變的主角江青還會這麼悠閒？

然而，《光明日報》這篇文章的確加快了務實派政變步伐。

### 三、十月政變

務實派下定決心「解決」文革派。怎麼「解決」？當時私下討論的結果有兩種方式：一是「黨內鬥爭的方式」，二是「特別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開會，即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後者就是突然採取強硬措施。他們說的強硬措施就是政變，用少量武裝力量制服政治對手。這就是通常說的宮廷政變。

姚依林回憶，他到陳雲家送一份關於江青叛徒的材料<sup>20</sup>，看到陳雲在家裏琢磨，能不能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把中央委員的名單反復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的力量很大，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打倒「四人幫」是沒有把握的。<sup>21</sup>陳雲是善於算計的人，他的判斷是對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陳雲這樣的判斷。不採取強硬措施是不行的。

<sup>19</sup>王忠人：《「按既定方針辦」一文發表始末》，《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sup>20</sup>事後證明，江青不是叛徒。

<sup>21</sup>姚錦：《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第190頁。

然而，要採取強硬措施，也得師出有名。務實派想到了毛澤東 1974 年 5 月 3 日批評文革派的一句話：「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好，歷來不好。」毛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誡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搞「繼續革命」。毛是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但這些批評是恨鐵不成鋼。<sup>22</sup>毛說的「四人幫」根本沒有反革命幫派的意思。務實派將「四人幫」這個說法接了過來，說抓「四人幫」是執行「毛主席的遺志」。

在華國鋒周圍，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書李鑫。李鑫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華國鋒採納了這樣的建議。要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必須得到軍人的支持。華國鋒首先想到的是葉劍英。

軍人們早就想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在毛逝世之前，葉劍英就在西山加緊聯絡、秘密策劃。葉劍英雖然被「養病休息」，但名義上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於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對他很尊重，葉劍英對軍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利用西山這個隱蔽所，同不少人進行了秘密交談。有時約進來，有時走出去。和他談話的有譚震林、康克清、耿飆、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誥、楊成武、梁必業、粟裕、宋時輪、華楠、劉志堅，李德生等。這些軍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過衝擊，有的已被邊緣化，對十分張揚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們在黨內、軍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還在毛澤東病危時，肖勁光大將就到葉劍英處，說得想個辦法，把江青、張春橋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後他們掌了權，黨和國家就糟糕了，並建議下令調集軍隊，採取分割圍殲的辦法，把江青、張春橋等抓起來。葉劍英沉思良久，擺了擺手說：主席病重，現在還不是時機。<sup>23</sup>活躍在這些老人之間的是王震。他經常到各家串門，傳遞信息，商量對策。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王震多次到葉劍英那裏去談話。一次談到「王、張、江、姚」時，王震問葉劍英：「為什麼讓他們這麼猖狂？」

<sup>22</sup> 拙著《鄧小平時代》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 92 頁有「恨鐵不成鋼」這句話，被遭到中宣部副部長劉雲山的批評，十年以後，很多學者都用這句話了。

<sup>23</sup>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版社，北京，1984，第351—352頁。

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只是做了一個手勢。他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終於領會了意思：毛主席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sup>24</sup>

毛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加緊了聯絡和準備。9月21日，聶榮臻通過楊成武轉告葉劍英：

「四人幫」一夥是反革命，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sup>25</sup>

葉劍英當然同意聶榮臻「先下手」的看法。華國鋒不知道葉劍英的底細，急需和他聯絡。華國鋒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華國鋒借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在事先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到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住處。華國鋒對李先念說，我在守靈，是藉口出來看病到你這裏。他談了「四人幫」發難的簡要情況。並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問一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也請你考慮這一問題。

9月14日，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員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說他要見葉帥。李先念進院，葉劍英將李先念讓到屋裏。為了防止竊聽，葉劍英打開收音機。葉的聽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機干擾，李先念說話，他聽不清楚。兩人用筆寫，然後燒掉。當李先念寫了「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時，葉劍英寫下了「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李先念寫了「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葉點

---

<sup>24</sup> 範碩：《葉劍英在1976》，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274頁。

<sup>25</sup> 《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版社，北京，1984，第867頁。



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一個問號。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

為什麼李先念對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放心？李先念曾和陳錫聯一起為毛澤東守靈。李先念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著去了，在洗手間，陳錫聯對李先念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

華國鋒和李先念的談話不到 10 分鐘。李先念在葉劍英處談話不到 30 分鐘。<sup>26</sup>

華國鋒一方面讓李先念和葉劍英聯絡，一方面和汪東興聯絡。汪東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此人和「四人幫」在政治上不見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權。1975 年以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不見江青，都是汪東興擋的駕。作為一個女人，江青恨汪東興。在林彪事件之前，汪東興在軍人中間誇大地散佈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軍人的力量壓江青。汪東興知道，毛死後，江青有可能執掌更高的權力，這對他將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只有採取果斷措施「解決」了江青，才能夠確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勸華國鋒用強硬手段解決「四人幫」，應當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執掌中共中央警衛團，主管「大內」的一切，搞宮廷政變，他是最方便的。解決「四人幫」時只動用中央警衛團，沒有軍隊參加，這也說明汪東興的主動性和關鍵作用。

華國鋒又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吳德的支持。葉劍英又聯繫了陳雲、鄧穎超等革命元老，他們是非常支持的。

在實施抓捕「四人幫」時，他們最大的顧慮是江青。葉劍英多次談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貴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壞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晚年批評過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並不協調。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堅定地站在毛這一邊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評她是恨鐵不成鋼。毛澤東已被神化，作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氣」，是很有影響力的。在 1966 年以後，毛以外的中央領導人，都爭先恐後地在公開場合對江青過分的讚揚。這些讚揚，也增加了江青的影響力。1974

<sup>26</sup>程振聲：《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中共黨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報告，我親眼看到天津的不少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在她面前獻媚討好。江青用摹仿毛澤東的筆跡，寫了一些條幅，送給一些軍、政要人，不少人奉為至寶。1976年8月，在毛澤東病重期間，江青以慰問抗震救災的戰士、工人的名義，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戰士們在歡迎江青的發言中，都感謝「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來看望我們，這是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體，但毛澤東還是把她當自家人。1975年，江青讓毛遠新幫助她清理一下文件，由於文件很多，毛遠新只把文件名登記一下。江青看後說，這樣不行，你得把每份文件寫一個內容提要。毛遠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沒有做。江青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讓毛澤東請毛遠新幫忙。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劃了一個圈，批給了毛遠新。毛遠新不知道劃個圈是什麼意思，去問他伯父毛澤東。毛澤東對毛遠新說：「幫幫她吧，我們家已經沒剩幾個人了。」<sup>27</sup>可見毛澤東把江青當自己人。

在毛澤東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側的江青聞訊趕來，頭髮散亂，神情緊張，一進門就撲在毛澤東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醫生啊，你們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這裏有夫妻難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懼。在9月18日的追悼會開完後，新華社的電訊稿著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獻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遺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綠的玉米、金黃的麥穗和穀穗，以及果實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組成。」

雖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幫」決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開。

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和吳忠負責；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臺、中央機關與清華、

---

<sup>27</sup>這是毛遠新退休後向江青原秘書的閻長貴講的。閻長貴在2007年12月21日在飯桌上對本書作者講的。

北大的戒備。

汪東興指揮張耀祠（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挑選了直接參與行動的中央警衛團的 50 多名官兵。吳德則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溝通，並與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聯繫，取得了對北京衛戍區部隊的直接指揮權。李鑫負責準備政變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採取行動之前，汪東興向執行任務的警衛戰士作動員時，對戰士是這樣說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機，陰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復辟資本主義」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在政治鬥爭中，都要把這個大罪加在對方頭上。

10月6日下午，葉劍英在西山接到電話，通知他晚上8點到懷仁堂開會，請他提前一個小時到達。吃過晚飯，他帶上一名警衛參謀，驅車直奔中南海。

懷仁堂燈光明亮，肅穆安靜。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擔任警衛。葉劍英的車7時到達。警衛員和司機都安排在一間房子裏休息。只有開會的人才能進入懷仁堂。

這一天下午，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內容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和毛主席紀念堂的建設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這個會涉及文字工作，理所當然地要請他來。沒有通知江青來，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實際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單獨處理。

葉劍英隻身進入懷仁堂，只見華國鋒、汪東興已經來了。他們見面時以目示意，沒有講話。這天的懷仁堂裏搬走了所有的桌椅，顯得十分空曠。中間一扇屏風把大廳一分為二。在屏風前的一半大廳中只擺了兩個高背沙發。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坐在這兩個高背沙發上。汪東興和警衛躲在正廳的屏風後面的兩側，注視著門口。

7點55分，張春橋到達。他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進來了。突然隨身警衛被留在門外，他感到與過去不一樣，就連聲地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還不等他弄清發生了什麼事，行動組負責人紀和富帶著幾個人迎了上去，「保護」他進了正廳。他邁進門坎，環視廳內，想尋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廳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嚴峻的葉劍英和滿臉怒氣的華國鋒。

張春橋這才明白自己已經成了階下囚。他還來不及說話，就聽華國鋒嚴肅地說：「張春橋你聽著，你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接著宣讀了事先寫好了的「隔離審查」的決定，鄭重宣佈立即執行。張春橋沒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帶走。

接著進來的是王洪文。他一跨進門，行動組的另一個負責人帶著幾個衛士從側面快步走過來把他扭住。王洪文厲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他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衛人員扭著他的雙臂帶進正廳。華國鋒把決定又念了一遍。還沒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聲，掙脫了警衛人員，像一頭發狂的野獸，從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劍英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劍英的脖子。雙方離得太近，不便開槍。警衛人員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摠住，給他帶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拖帶架地把他抬出門，推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姍姍來遲。大家正在著急之際，他來了。在接電話通知時他還說：「早就該開這個會了。」今天不知因什麼事動身晚了，臨走時忘了叫警衛，連帽子也沒帶，就夾上皮包，跨進汽車，匆匆趕到中南海。他到懷仁堂後，沒讓他進大廳，只在東廊的大休息室裏待命，沒由華國鋒宣佈「隔離審查」的決定，而是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團長宣佈的。<sup>28</sup>他聽完後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是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在懷仁堂解決王、張、姚三個人的時候，張耀祠、武健華、李連慶等十幾個人，來到中南海 201 號樓。晚 8 點，他們先到毛遠新住處。進到他的辦公室，毛遠新正在看電視，他看到進來的不速之客，就站起來，關了電視機。張耀祠向他宣佈：「毛遠新，我接華國鋒同志的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在這裏，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文件和材料由中央辦公廳派人來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指導員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中央。」毛遠新聽後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沒有再說了。他不主動交

---

<sup>28</sup>華國鋒 1999 年 3 月 9 日對張根生說，姚文元也是他宣佈的決定

鑰匙和手槍，一位幹部主動上去收繳了他的手槍和鑰匙。<sup>29</sup>

江青離毛遠新住處很近，張耀祠等在 8 點 20 分到了她的住所。走進她的辦公室，她坐在沙發上。張耀祠向她宣佈：「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你現在還進行分裂黨中央的活動，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去，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和鑰匙交出來。」江青雙目怒視，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聽著，未發一言。她用鉛筆在一張印有紅框的宣紙信箋上，由上而下地給華國鋒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說：「國鋒同志：來人稱，他們奉你之命，宣佈對我隔離審查。不知是否為中央決定？隨信將我這裏文件櫃上的鑰匙轉交於你。江青十月六日。」接著，她又又在一個印有紅框的牛皮紙大信封上，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幾個字，下腳還注明「江青托」。她把鑰匙用一張信紙包好，同信箋一起放進信封裏，然後在信封兩端，黏貼了「密封簽」，並用手在「密封簽」上用力地按壓了幾下，然後把信封交給了張耀祠。這時，武健華上去領著江青出來。外面專為她準備的紅旗保險轎車在等候著，江青以慣常的姿態上了車。<sup>30</sup>

與此同時，北京衛戍區還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實行隔離審查。于會泳、劉慶棠、莊則棟等也被隔離審查。

在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華國鋒派人控制了廣播電臺、新華社等重要輿論單位。

10 月 6 日晚，華國鋒把耿飆<sup>31</sup>找到中南海，先讓他看了兩張複印的紙條，紙條上是毛澤東的手跡：「你辦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來」，然後要求耿飆帶部隊進駐中央和北京的廣播電臺。耿飆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巍高等，連夜趕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直奔總編室，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正在那裏。耿飆拿出華國鋒的手令給鄧崗看。讓鄧崗通知所有的副手，帶著行李捲住到總編室，不能回家。要求他們檢查明天要播的錄音帶，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飆要他們交出直播室的鑰匙，鄧崗有點猶豫。耿飆對鄧崗說：

<sup>29</sup> 《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0—271 頁。

<sup>30</sup> 同上，第 271—272 頁。

<sup>31</sup> 耿飆，1926 年入黨，解放軍高級將領，1950 年調外交部工作，曾任駐多個國家大使。

「你執不執行我的意見？你如果不執行，還可以給姚文元打個電話。」鄧崗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說：「不必了，我想原來的電話已經不通了。」當時直播室的鑰匙由辦公室主任楊兆麟保管。他不敢輕易交出。耿飆說：你不交出來我就派戰士守在門口，誰也不能進去。看了華國鋒的手令以後，楊兆麟把鑰匙交出來了。與此同時，耿飆把北京廣播電臺的黨委書記趙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廣播電臺的作法辦理。耿飆是帶著很強的敵情觀念到中央廣播電臺的。為了安全，他們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從外面帶進去的。<sup>32</sup>

新華社是第二天由一個「五人小組」接管的。時任北京分社社長李普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另外四人是：鄭屏年（某軍政治部主任）、徐貴年（李先念秘書）、楊家祥（通訊兵軍官）、黃宗漢（康生秘書）。10月7日李普吃午飯時電話鈴響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問：「這是李普家嗎？」沈容說：「是的，您是哪位？」對方說：「我是39局，中組部×副部長請李普同志說話。」李普接過電話說：「我正請病假在家。」對方說：「我們知道，請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閣開會。」李普到了紫光閣，會議由紀登奎和蘇振華主持。紀登奎先讓大家看了「你辦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來」兩個複印件，向他們透露了對「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交待了接管新華社的任務。<sup>33</sup>

與此同時，中央派以遲浩田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

10月6日晚，「四人幫」剛一「解決」，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接到了一個緊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號樓開會。晚10點，人已到齊。出席會議的人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第二天凌晨4時才散會。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講話。葉劍英向大家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和意義。在葉劍英的提議下，一致通過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事後提請中央全會追

---

<sup>32</sup>李普、沈容同本書作者多次談起此事。

<sup>33</sup>李普、沈容同本書作者多次談起此事。

認。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等由汪東興電話通知並徵求意見。

鄧小平一家聽到這個消息表現如何呢？他女兒毛毛在她的書中生動描述了她的丈夫賀平從外面得知消息後的情況：

10月7日，賀平得到消息後，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回到寬街，把消息告訴我們全家。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看到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怕家中有竊聽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會用一些防竊聽的方式悄悄地說。我們大家——父親、母親和當時在家的鄧林、鄧楠，還有我——一起走到廁所裏面，再大大地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的流水聲中，我們圍著賀平，聽他講中央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沒聽清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啦！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聽到精采的場面，我們三個姑娘興奮得跳起來了！我們的心怦怦地劇烈地跳動著，跳得連我們自己的耳朵都能聽見。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煙頭輕微地顫動著。我們全家人，就在這間廁所裏，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解氣地怒罵著，好像用什麼方式也無法表達心中的振奮和喜悅。<sup>34</sup>

10月10日，欣喜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

<sup>34</sup>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第523頁

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寫信給華國鋒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事實上，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葉劍英元帥就提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不久，葉劍英又把鄧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為了讓他熟悉情況，還以別人的名義，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向他們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官方文件將懷仁堂事變稱為「粉碎四人幫」，這個說法沿用多年，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稱為「十月政變」較為合適，這是一次典型的宮廷政變。政變是一個中性詞，沒有褒貶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號》，正式向全黨通報了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傳達到所有群眾。事實上，在這之前消息已傳得家喻戶曉。大多數人感到輕鬆，感到高興。中國人歷來看不慣「後妃專權」，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處指手劃腳、發號施令，早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所以，對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萬軍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以後幾天，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遊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為鄧小平下臺而慶祝遊行也是這些百萬軍民，極權政治下的民眾只能跟著權力走。郭沫若寫了一首打油詩，當時流傳甚廣：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

在遊行隊伍中，有人敲著竹板，用快板書的形式，傳誦著這首打油詩。<sup>35</sup>

上海是毛發動文革的重要基地，這裏掌權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來自上海。十月政變後上海的表現如何？

10月7日凌晨3點，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到北京開會。馬天水感到突然，問開什麼會，回答說你來了就知道了。馬當即打電話給北京，想找張春橋、姚文元問詢問，但電話打不通。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書記徐景賢、王秀珍要隨行的秘書房佐庭按慣例打電話回來報平安。中央辦公廳同時打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同行。中央派專機將他們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賓館，中央下達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sup>36</sup>

馬天水上北京後沒有音訊，房佐庭也沒來電話。徐景賢、王秀珍等不停地通過各種渠道同北京聯繫，都聯繫不上。到10月8日，上海才知道，與北京的聯繫渠道全部中斷。

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少庸、王秀珍、馮國柱召集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和鐘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幹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禮堂開會。徐景賢說：情況很不正常，看來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馬天水去北京後被軟禁了。施尚英彙報了9月23日以來備戰的民兵數字。王少庸詢問了民兵的編制情況。下午4時，徐景賢

---

<sup>35</sup>這首詩的全文：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在5個月前，即1976年5月21日，郭沫若寫下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sup>36</sup>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709頁。

召集報社、電臺負責人開會，說中央可能發生了軍事政變。5時，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打招呼。晚7時，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給上海市委警衛處康寧一打電話，說「我娘心肌梗死」。這是繆文金臨上北京時王秀珍和他約定的暗號，表明情況嚴重。晚10點，文化部劉慶棠來電話，說「馬老不接電話，我們都病了，有病情。」兩天的猜測，現在都證實了。在場的朱永嘉說：「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樣。王秀珍說：民兵先動員2500人巡邏，31000人待命，槍支彈藥發下去。輿論工作由朱永嘉負責。王秀珍對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說：看來中央可能發生了右派政變，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幾個領導同志都被抓起來了。我們要同他們幹。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發源地，我們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連，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著幹，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但是，他們準備過程中，連一張像樣的軍用地圖也沒有。警衛部隊最多能拉出一個營。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會，晚7點，徐景賢又打電話給北京的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馬天水終於接了。王秀珍問他看到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沒有，馬天水說：「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沒時間和我個別談了。」聽了馬的電話，大家如釋重負，說是一場虛驚。他們立即撤銷民兵戰備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馬上恢復正常秩序。晚10點，馬天水給上海打電話，通知徐景賢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開會。

上海的三個市委書記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個老幹部：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總工會、民兵。市委寫作組的一些骨幹人物，聚集在康平路小禮堂。朱永嘉主張「馬上幹！立即幹！」他認為「民氣可用」。他說8號就應該幹，已經錯過，今夜再不幹，到了明天一切時機都會喪失，要幹就下決心今夜幹，而且要大幹。總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也主張立即幹。整個會上，態度最激烈的是總工會和寫作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眾人的激烈情緒，也說要幹，不過要等三位書記回來一起幹。

10日，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後，中央政治局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陳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們懸岩勒馬。葉劍英說中央信任

你們，對你們放手，把上海事情辦好，信賴你們。同時，要他們每天給上海打一個電話，穩定上海。<sup>37</sup>先到北京的馬天水和周純麟已經服軟。馬、週二人也說服徐、王。經中央辦公廳同意，徐景賢打電話告訴馮國柱：「一切等我們回來後再定。」

13日，市總工會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行動，制定了「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發揚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決不允許蘇聯復辟的教訓在中國重演！」等21條行動口號。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態支持中央的三位書記回來了。下午，在錦江飯店南樓會議室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三位書記傳達中央精神。會議室一片哭聲，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sup>38</sup>晚上，馬天水又召集工會、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開會，再次傳達中央精神。會後，一位堅持要幹的人到馬天水家裏，對馬天水說：「北京是政變。我們應該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裝，像巴黎公社那樣，舉行反抗，馬老你帶頭，我們跟著你！」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們手裏，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兩人抱頭痛哭，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此時，忠於中共中央的60軍就駐紮在上海附近。

上海雖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對文革不滿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從15日開始，上海民眾自發地舉行慶祝集會，數以萬計的人湧入上海市委，質問為何不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報道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上海全城沸騰，慶祝的鑼鼓聲和鞭炮齊鳴，主要馬路被燃放的鞭炮紙屑鋪了紅色。

10月26日，華國鋒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工作組以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為首。11月1日，10萬民兵戴著柳條帽、身穿工作服，扛著輕重武器舉行遊行。遊行隊伍高舉毛澤東和華國鋒畫像，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勝利。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在文革中被邊緣化的一些造反派，如原「工總司」副司令潘國平等也十分興奮，準備開慶祝大會，但未開成。<sup>39</sup>

<sup>37</sup>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712、713頁。

<sup>38</sup>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714頁。

<sup>39</sup> 十月政變後上海反應的資料，除注明外，均取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

毛澤東逝世，文革派被「粉碎」。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實際已經落幕。但是，正式宣佈文革結束是十個月以後的中共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他強調了文革的必要性後說：「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復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我們可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達到天下大治了。這樣，歷時11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請注意，華國鋒說的是11年文革，不是後來說的10年文革。

為了使十月政變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舉行了公開審判。這次審判把本來互相對立的兩夥人——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捆綁在一起，名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文革派的判決結果是：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五年以前就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對江青的審判很有戲劇性。外電報道說：「在中國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歲的江身著黑色毛式上衣，戴著一副眼鏡，在拍攝電視的燈光下閃閃發光，看起來她更像是一個嚴厲的女教師。她昂首挺胸地穿過聽眾走到她的被告席上，一副凶相地擱著下巴。」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後，審判員曾漢周把桌子一拍，厲聲說：「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們！」江青開始的時候一愣，然後反應過來了，

---

稿》，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553-1593頁。

「什麼？我要怕你？」「對，你要怕我們。」江青馬上說：「怕你？你怕我！」兩個人這樣來回幾個回合，爭論「誰怕誰」。後來江青哈哈一笑，說：「你問問坐在你旁邊的江華，看我怕過誰！」江青登場鬧了這一場，最後宣判時又有一場鬧劇。審判長江華為了嚇唬江青，宣判：「判處江青，死刑！」到「死刑」這兒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葉、鄧反革命集團！」江華又接著講：緩期二年執行。<sup>40</sup>

審判張春橋時，審判人員事先問他有什麼話要講？張說，除非如實進行報道否則他不講。後來在審判人員的一再追問下，張春橋說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麼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來一次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sup>41</sup>這是公審之前的審問，在法庭上張春橋一言不發。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來相比判若兩人。他徹底被征服了。他為什麼會這樣？和他同監的邱會作說：「王洪文被捕後，所經受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合監之時，王洪文因腦子受創傷還不能做系統的談話。他說的常常是東拉西扯，詞不達意。」<sup>42</sup>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邱會作四人是公審之後，1981年7月15日合監的。這時離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還不能系統地談話，可見創傷之重。

中國多年「無法無天」，能夠公審，是一種進步。這說明經受文革衝擊的官僚們嘗到了「無法無天」的苦頭，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從整個審判過程來看，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是政治審判。據時任「兩案」律師組組長張思之說，審判員是臨時調來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員，鬧出了一些笑話。律師是當局委派的，事先對律師提出要求：對公訴人提出的「事實不能動」，對公訴人給被告定的「罪

---

<sup>40</sup>《張思之解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內幕》，《南方都市報》；張思之口述、楊曉光整理：《審判「四人幫」，我為異端辯護》。張思之被指定是江青的辯護律師，江青不要，後來為李作鵬的辯護律師。

<sup>41</sup>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50頁。

<sup>42</sup>《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930頁。

名不能動」。作為律師，辯護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把這兩方面都封死了，還要律師幹什麼？對出庭的證人事先經過培訓，要求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這一切停當之後，還要經過多次「彩排」（李紀周曾當被告的替身，新世紀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長），「彩排」合格之後中才開始公審。旁聽群眾是有組織的，選擇政治可靠的人。<sup>43</sup>

---

<sup>43</sup> 《張思之解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內幕》，《南方都市報》；張思之口述、楊曉光整理：《審判「四人幫」，我為異端辯護》。

## 第二九章

# 文革後的大清查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

十月政變以後，逐步解除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束縛，實現了幾項重大的人道主義的壯舉：一，平反冤假錯案。從 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已經有 4600 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恢復原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以後，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不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歷次運動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不過，能夠被官方平反的大多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受害的普通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訪了，通過信訪渠道也使大批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二，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幾十萬人，除了留下幾個象徵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給廣大農村的地主、富農摘帽，數以千萬計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雖然沒有否定反右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但以上三項壯舉，也使得上億人口擺脫了政治賤民的身份。在這一人道主義壯舉中，胡耀邦發揮了重要作用。拙著《鄧小平時代》中對這一壯舉已有介紹。<sup>1</sup>

與上述人道主義壯舉相對應的是清查運動擴大化。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懷仁堂事變之後，在西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提出：「在中央，我們從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了『四人幫』問題，這是第一步，是初戰的勝利，地方上還有些『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清理。」

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查運動（當時稱為「揭批查」運動）。清查對象是「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自 1949 年以來，中共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每一次運動都有一批積極分子。以前的政治運動是「當權派」整「非當權派」，沒有從整體上傷害官僚集團，所以運動積極分子可以分享到運動的果實，相當多的積極分子得到當權派的提拔。對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的人是不可能被提拔的。中共建政以後的幹部隊伍，基本是由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組成的。而文革的重點是整「當權派」的，被文革積極分子整過的「當權派」重新掌了權，還由「當權派」來清算文革，積極分子只能品嚐「苦果」了。清算文革的前提是全面否定文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右派分子是劃錯了的，反右運動沒有被否定；大躍進造成三四千萬人非正常死

---

<sup>1</sup>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第 155-164 頁。



亡，大躍進運動沒有被否定。在專制制度下，普通百姓受害的政治運動不會被否定。文革不僅僅傷害廣大民眾，更是從整體上傷害了官僚集團，所以文革必須否定。

大清查將被處理的人分為三個檔次，第一檔是被定為「『四人幫』骨幹分子」，逮捕判刑；第二檔是「三種人」，嚴格審查，責令檢查，批判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一般是撤職下放；第三檔是嚴重政治錯誤，在「說清楚」後保留工作，但多數人終生不被重用。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結束了「揭、批、查」運動，但一些省一直清查到1980年代。1982年，中央又出臺文件，開始大規模排查清除「三種人」，一直進行到1986年。

這次清查（包括以後整黨清理「三種人」）殃及了多少人？胡耀邦說：「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sup>2</sup>他這裏說的「關押」，可能是包括在各種「學習班」裏在一段時間裏失去自由的人。據中央整黨工作指導辦公室1987年統計，在整黨前已進行的幾次清查共處理的40萬人的基礎上，全國（不含廣西）又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43074名，不予登記的90096人，緩期登記的145456人，受到其它黨紀處分的18407人。<sup>3</sup>從各省的數字來看，這個數字顯然是大大的縮小了。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在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名義下，對文革的總清算，當然也是對造反派總清算。在1966年至1968年間，造反派活躍了兩年多。文革後8年，造反派一直處於挨整狀態，少數在革委會裏還保留職務的「群眾代表」，也沒有掌握實權。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造反派也一度活躍，但主要是為了擺脫挨整的地位。籠統地把造反派當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行特別是後八年對廣大群眾的殘酷專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

<sup>2</sup>高樹華、陳鐵軍：《內蒙文革反思——一個造反派領袖的自述史》，未定書稿，第288-289頁，轉引自程惕潔：《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10年，第642頁。

<sup>3</sup>《胡耀邦傳（1915-1989）》第3卷，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70頁。

## 一、揭批查運動擴大化

十月政變之後，各地都逮捕了一批當地的造反派頭面人物，將他們判了重刑。全國上下大規模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上千萬人成了清查對象。揭批查運動不僅僅是為了清算文革的責任者，也摧毀了各地在文革中形成的權力體系，恢復了文革以前的權力體系。從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後，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中，除了少數幾個省以外，大部分被撤換。

在揭批查運動中，懲處了一些在文革中的作惡者，也有官僚集團的借機報復，還有一派群眾借機整另一派群眾。雖然中共中央一再強調注意政策，但還是有嚴重擴大化的傾向。

下面介紹幾個省市的清查運動。本書採用了一些被清查者的申訴材料，顯然這是申訴者一面之詞，可能有偏頗之處，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清查運動的擴大化。檔案開放以後才能夠得知真相。

### 河南省的揭批查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sup>4</sup>也寫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由於劉建勳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所以河南站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比較多，也比較早。河南的這一情況，當時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表揚，《人民日報》曾為此發過社論。

文革中河南有三個群眾組織：「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這三個群眾組織都是造反的，「二七公社」比較激進，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時曾被省軍區打成反動組織。1967年7月平反以後力量壯大，占了優勢。毛澤東說過「大局已定，二七必勝。河南形勢很好嘛！」他是明確支持「二七公社」的。1967年7月2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京西賓館接見河南省軍區、軍分區和駐軍師以

---

<sup>4</sup>劉建勳（1913——1983），1957年任中共廣西第一書記。1961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1968年1月至1978年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71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1978年10月被免職。

上領導幹部時，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周恩來說：「對『二七公社』、『鄭大聯委』、『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開封八·二四』這些左派，你們每一個部隊首長同志有權力支持它，保護它，要派部隊去，我們一定支持你，這是正義的革命的行動，即使省軍區不贊成，你們也要堅決幹，這是革命的行動。」周恩來說的這些群眾組織都是「二七公社」這一派的。由於中央明確支持，「二七公社」一度處於優勢，在他們掌權的地區和單位，對反對它的幹部和群眾，採取階級鬥爭手段，傷害了不少人。文革結束後，新的當權者說 1967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的表態，是劉建勳等人製造的大假案。這一說法當然不能成立，7 月 25 日中央首長的講話是記錄在案的，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在文革後，「二七公社」的骨幹和積極分子，以及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都成了揭批查運動的對象。

河南省在揭批查運動中，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搞到公務員、炊事員。從 1977 年到 1983 年，清查運動歷時 7 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 5 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十萬六千人，逮捕判刑 1700 人，又「突出判刑」2400 人，（以上均為官方公佈的數字），如果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更是不計其數。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因「文革罪」而被關押的，占犯人總數近半數，「二七公社」一派人人自危。確山縣，文革期間，兩派武鬥，雙方各被打死打傷二十餘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處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 2 人，死刑 1 人。而另一派一個也沒有處理，主要頭頭、武鬥指揮者，反而被提拔為縣委負責人。<sup>5</sup>

1978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改組省委領導班子，免去劉建勳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段君毅為省委第一書記、胡立教為省委第二書記、劉傑為省委常務書記。文革中形成的省委領導班子全軍覆沒。其中，耿起昌，1915 年 7 月生，1938 年 6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歷任河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1 月至 1979 年 3 月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 年 3 月至 1978 年 3 月任中共河南省委

---

<sup>5</sup>一丁：《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

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1983年10月被開除黨籍。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申茂功，1940年1月生，鄭州國棉六廠工人。文革開始後任鄭州國棉六廠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總工會主席。1977年7月起停職接受審查。1979年8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廠籍。1979年1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唐岐山，1977年7月停職接受審查。1978年1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1979年12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揭批查中，全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止1983年9月統計，處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名。（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被清查、批判、處理了10人，占71%。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幹部33人，被清查、批判、處理23人，占70%。18個地市委第一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焦作），批判處理97人，占82%。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餘全部受到批判，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的處理。各廳、局、委副職中被批判處理的也占大多數。原縣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很少有人未受審查，處分，保留原職。<sup>6</sup>原蘭考縣縣委書記張欽禮，曾是焦裕祿生前戰友，在蘭考工作幾十年，為改變蘭考面貌做過重大貢獻，因在文革中站在造反派一邊，被判刑13年。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遊擊」罪名判10年徒刑。這個罪名是編造的。孫騰芳刑滿釋放後沒有了工作，且年老體衰，其愛人郝志華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也沒有好工作。1998年初，郝志華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地看著老伴死在家裏。

所謂「免於處分」2020人，是審查批判後降職下放。如省委宣傳

---

<sup>6</sup> 1983年11月，河南省委副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轉引自張樹芝、王維群、張耀東、王大海：《關於河南揭批查嚴重擴大化的歷史遺留問題向省委、黨中央的申訴報告》，引自《劉建勳陳舜英畫傳》，中國展望出版社，2013年，第246-257頁。

部李海英，1954年就調到宣傳部工作，因文革中參加了「二七公社」受審查，1983年審查結束後，被告知她沒有什麼問題，免於處份，被下放到商丘縣工作。當時，她身患重病，讓兒子替她去報到了。後來商丘縣以級別高、無法安排為理由將她的關係檔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組織部說沒有收到。就這樣，一位建國前就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沒有了單位，工資沒人發，看病無人管。

1983年11月起，進行全面整黨，到1987年4月結束。全省因受到處理的黨員共43339名，其中受刑事處分的698名，受黨紀處分的25767名，對不合格黨員不予登記的8244名，緩登記的16261名，因故暫未登記的2591名。對在文革中提拔的6.6萬多名幹部分別作了處理；對在文革中發展的24.5萬余名黨員，有9.9萬餘名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有1700多名被清除出黨。「文革」中洛陽鐵路系統入黨提幹的有358人，文革結束後對他們進行了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餘人留黨察看，320多人被開除或降級，保留黨籍的只有8人。<sup>7</sup>

在揭批查運動中，河南許多地方搞「上掛下聯」，上面倒一個，下面倒一片。大批人因上、下級工作關係被株連、被處理。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班組長，加上幹部的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人數要以數十萬計。<sup>8</sup>

1979年底，河南省紀委書記趙文甫、副書記李蔚和省高級法院院長丁石等人，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於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後「束縛手腳」，就趕在這兩部法律生效前夕，緊急佈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搞「突擊判刑」，全省共判處2400多人。<sup>9</sup>

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受到打擊的人如此之多，普通群眾的造反派更多。受到打擊的官員們，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鳴冤叫屈。他們在申訴自己的冤情時，還極力和他們曾經支持的造反派頭頭劃清界線，認為

<sup>7</sup>王家駿楊桐：《文革控一大陸「文革」懷舊群體調查》，載《鳳凰週刊》，2013年4月8日。

<sup>8</sup>原河南省委常委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sup>9</sup>張樹芝、王維群、張耀東、王大海：《關於河南揭批查嚴重擴大化的歷史遺留問題向省委、黨中央的申訴報告》，引自《劉建勳陳舜英畫傳》，中國展望出版社，2013年，第254頁。

這些人受打擊是應該的。

### 雲南省的揭批查

1976年11月8日,《雲南日報》發表題為《放手發動群眾,大揭大批「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的社論,全省各地紛紛舉行大會,聲討「四人幫」及其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的罪行。

「四人幫」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主要是指黃兆其、劉殷農、朱克家、方向東等人。魯瑞林<sup>10</sup>也被當作「雲南軍內外幫派的黑後臺」加以揭發批判。1976年11月底,對這些人召開了多次大型批判會。

一些人認為賈啟允在揭批查中「捂蓋子」,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免去了賈啟允的一切職務。

截止1977年3月下旬,省級機關共召開了大型揭發批判會200多次;全省地縣兩級共召開860萬人次參加的揭發批判會議1.73萬次。

1979年2月17日,省委發出《關於對黃兆其、朱克家定性處理的通知》,將黃兆其定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逮捕法辦;朱克家定為「四人幫」的親信,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勞動。

1979年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會召開有60萬人參加的有線廣播大會,會上,公安部門宣佈對黃兆其、劉殷農、塗曉雷、胡延觀、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楊樹先8人依法逮捕。

1982年4月18-29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黃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判處劉殷農有期徒刑17年;判處塗曉雷有期徒刑14年;判處胡延觀有期徒刑13年。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判處劉光興有期徒刑12年,判處何立寬有期徒刑14年。

雲南文革多次「翻燒餅」,情況十分複雜。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炮派」就反對革

---

<sup>10</sup>魯瑞林(1911—1999),1931年11月參加寧都起義,1955被授少將。曾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因支持「八派」被清查,後調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委會。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搞「劃線站隊」，被審查人數達 138 萬多人，打死逼死 17000 多人。受害者多為「炮派」群眾。省革委會「劃線站隊」的依靠力量是「八派」（見本書第 17 章：清理階級隊伍）。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劃線站隊」的積極分子受到打擊，還抓了一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八派」又力圖「翻身」，搞了一些活動（見本書第 26 章：全面整頓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文革後的清查運動，「八派」又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這次運動這一派整另一派，下次運動另一派又整這一派。每一次反復都很難避「派性」，派性清查，不可能公正，也很難避免擴大化。

1984 年 1 月 30 日，省委「兩案」辦公室關於《全省「兩案」結論處理進展情況》的統計，全省「兩案」清查對象共 7569 人，全省共列為核查「三種人」對象 2590 人，定性處理了 2358 人。<sup>11</sup>

雲南省一批在清查中受到打擊的申訴者說，官方說雲南揭批查運動中審查 7569 人這些數字「完全是假話。」他們說：「在雲南開展的「揭批查」運動，受審查的有 150 多萬人，其中 5 萬多人被判刑勞改，15 萬多人受黨紀、政紀處分。」他們在申訴中說，雲南的「揭批查」運動中，把「八派」群眾組織打成「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層層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幫」，如昆明橋鋼分公司，抓了三個男的，還差一個女的，硬把一個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湊成「小四人幫」。玉溪地區、江川縣民政科長楊秀傑，1946 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榮立兩次大功。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 1978 年 9 月 19 日被槍決。江川縣第一中學體育教師羅慶明，1949 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連長，曾榮立三等功，在「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被判處死刑，於 1978 年 9 月 19 日被槍決。全國特級戰鬥英雄涂勳（女），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10 年。志願軍老兵、三級殘廢人黃俊傑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打砸搶」被判刑。大理州 13 個縣市革命會副主任、季振華、周金昌、卜里昂、趙嘉品等 13 人，在「揭批查」運動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後判刑。昆

---

<sup>11</sup>雲南文革大事記：《揭批查運動》，

明鐵路局醫院政工主任劉紹祖，在「揭批查」運動中，被判刑7年，妻離子散，出獄後餓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鄰居發覺有一股臭味，報警，打開門一看：臉上、鼻子、耳朵和腳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sup>12</sup>

### 天津市的揭批查

1967年1月奪權時，天津有大大小小的85個群眾組織。3月間，天津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先後召開了貧下中農、產業工人、市級機關幹部、大專院校和中學紅衛兵五個系統的代表大會，合稱為「五代會」。另一部分沒有得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支持的群眾組織合併為「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大聯籌」比較激進，和「五代會」對立。由於「大聯籌」得不到軍隊的支持，到1967年11月下旬就被迫解散了。在「大聯合」、「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清算激進造反派的運動中，「大聯籌」的骨幹分子都受到了打擊。「五代會」的頭頭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文革以後的清查中，「五代會」的頭頭成了清查對象。

從1976年10月下旬至1977年4月，清查江青八次來天津以及小靳莊問題。從1977年4月以後，進一步清查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

1977年11月8日，市委書記趙武成在「關於清查工作情況和下一步意見的彙報」中說：「經過認真嚴肅的審查，大量確鑿的證據表明，王曼恬是『四人幫』在天津的死黨；王作山、張繼堯、陳相文等人，是『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徐信積極追隨『四人幫』，向黨猖狂進攻，參與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趙武成這個報告是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起草的，若干年後他回憶說：「當是還是左的思維方式，對一些問題看得過重，甚至牽強地與『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掛鉤，非找出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不可。」<sup>13</sup>

1976年10月以後，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解學恭<sup>14</sup>領導天津

<sup>12</sup>周金昌、鄭加品等一批受害老兵申訴：《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時了》，2005年8月5日。

<sup>13</sup>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第257頁。

<sup>14</sup>解學恭（1916-1993），193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後，歷任山西省委常委、



市的清查，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他還是中央委員，但他很快就成了清查對象。197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免除了他的一切職務，但未作處理，他還等待安排工作。一直等到1987年1月，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批評胡耀邦「對解學恭長期不處理」，並說應當開除解學恭的黨籍。<sup>15</sup>1987年3月，這位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就憑薄一波的一句話，沒有經過組織程序被開除黨籍。

市委書記王曼恬是毛澤東的表侄女，由於她與毛澤東的親屬關係，是天津與江青關係最密切的人，她提供了「黑會」<sup>16</sup>和「黑戲」<sup>17</sup>的材料，江青就這些材料製造了「二黑」冤案，打倒了一批領導幹部和作家。清查一下是應該的，但認定王曼恬是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死黨」，證據不足。在揭批查中，王曼恬於1977年1月27日晚自殺身死。

寶坻縣小靳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是比較好的村支部書記。中央領導人江青和天津市委把小靳莊樹為先進典型，他不能不緊跟，卻被定為「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張繼堯原是天津市文聯的一般幹部，是文聯「紅旗造反隊」的頭目。王曼恬在向江青提供的「二黑」材料是張繼堯等人搜集的。王曼恬進入市委領導崗位後，張繼堯便被提拔為市委、市革委文教組組長。他被定為「『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王輝認為定性太重了。

陳相文原是南開大學「八·一八」造反派的代表。南開大學有「衛東」、「八·一八」兩大派，「衛東」的代表擔任了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相文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從1975年5月至1977年3月在團中央籌備組擔任副組長。1976年初，謝靜宜曾對陳相文說：「天津關於學習一號文件的報告，只是一般表態，沒有寫批鄧」。他立即給團市委

---

省委第一副書記、國家外貿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等職。

<sup>15</sup>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第307頁，王輝對本書作者說，「有人」就是薄一波。薄和解都是山西的幹部，在山西工作時有過節。

<sup>16</sup>1967年夏天，全國各地文藝界的造反派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

<sup>17</sup>「黑戲」是天津話劇院排演的《新時代的「狂人」》，共演了47場。這個劇歌頌反劉少奇的陳裏寧，後來發現陳裏寧不僅反劉少奇，也反毛澤東，從而定為「黑戲」。

寫信讓點名批鄧，並同王曼恬一起，鼓動市委快點寫點名批鄧的報告。王輝認為，陳相文雖然在批鄧中跟得很緊，稱不上「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當時的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回憶說：「這其中除了王曼恬進入市委領導班子以後，把文化局造反組織的頭目張繼堯提到文教組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間既無組織聯繫，也無工作關係，與幫派體系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從揭發材料來看，天津構不成什麼『幫派體系』」<sup>18</sup>。但當時還是把這幾個人定為「幫派體系骨幹。」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 19 名常委全部被審查全都被免職，有的被判刑。他們是：李榮貴，原鐵路工人，共產黨員，市革委副主任，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 15 年。林啟予，原電力局技術員，後任地震局革委會主任，在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 10 年。馮玉田，原棉紡二廠工人，揭批查中被審查，判刑 10 年。巴木蘭，女，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幹部，黨員，在揭批查中被審查，免職，開除黨籍。在清查運動進行一半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也成了被清查對象。

在揭批查鬥爭中，對全市立案審查 691 人的問題，其中：逮捕法辦的 57 人，勞教的 4 人，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 31 人。基層被清查了多少人無法統計。

## 湖北省的大清查

1976 年 11 月，武漢市打著「工農兵」（其中不少是原「百萬雄師」成員）旗號的一些人到處抓人，遊鬥造反派的頭面人物。董明會、朱鴻霞、李想玉、沈複禮、王錦銘等造反派頭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綁地站在敞篷汽車上，頸項上掛著「四人幫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漢三鎮大街上遊街。

1976 年 12 月，經中央批准，湖北省對「四人幫」在湖北的骨幹分子夏邦銀（「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鋼工總」一號頭頭、湖

---

<sup>18</sup>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自印本，第 258 頁。

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張立國（華中工學院學生，「新華工」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實行專案審查，1977年11月28日宣佈對其逮捕，1982年7月判處張立國、夏邦銀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各三年；判處朱鴻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處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胡厚民，1936年出生，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任造反派負責人。1967年3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獄。7月武漢「7·20」事件後獲釋平反，年底任武漢市工代會副主任。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任省革委會常委。1970年被定為湖北省「5·16」反革命總頭目，批鬥後送沙洋勞改農場勞改。1974年批林批孔中獲釋並被「補台」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6年底，被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82年被以「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0年10月病逝於勞改農場。<sup>19</sup>

2006年9月9日，湖北的謝望春、楊道遠、顧建棠等人在寫給XXX的信中說：「湖北省在『兩案揭、批、查』中嚴酷懲罰造反派96個月，受害人29127名。」

北京抓捕「四人幫」以後，造反組織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焱金到親戚、朋友家躲藏、逃亡了40多天。有位同事的女兒因窩藏「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焱金」被開除團籍。吳焱金怕再牽連別人，就進入了市革委會專門為他舉辦的「學習班」。實際是隔離審查。他回憶了進入「學習班」以後的情況：

在召開了幾次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以後，專案人員就開始從我逃走40天外出避難的問題開刀，逼著我交待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聯的，是如何陰謀組織反革命暴亂，如何惡毒攻擊黨中央、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本來外出避難40天，啥事兒也

---

<sup>19</sup>2013年4月4日，清明節，武漢市一些文革親歷者為胡厚民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並結集出版了《烈火中永生——懷念胡厚民》的紀念冊。

沒有幹過，但我不能交待出來，我不能牽連拼命保護過我的無辜的人們，……於是，我以此事與本案無關為理由，拒絕回答外出避難 40 天的問題。我越不肯交待，專案人員越發認為抓住了要害，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於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車輪戰，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潰。

由於我失眠，有一天夜間起來上廁所，無意中聽到辦公室裏專案人員在商議：「他的態度如此頑固，乾脆把他丟進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輾轉反側。「他們要把我丟到哪里去？還有比這裏更恐怖的地方嗎？」……我決心不惜一死，抗議非法的「隔離審查」。第二天，1977 年 5 月 22 日午睡時間，看守我的人則全部進入了夢鄉，我感覺機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間，翻爬到樓頂上。我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毫無眷念，從瓦上一陣助跑，縱身往下一跳，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醒來時已躺在武漢市第二醫院的病床上，腳上打了鋼釘，上了牽引，腰不能動彈，大、小便失禁。病床立即成了戒備森嚴的「學習班」，隔離審查繼續進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導致尾骶骨以下喪失知覺，大、小便嚴重障礙，完全吃不下東西，專案組將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來病房處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煩事。後來妻子回單位接受審查，專案組又將我患胃癌的父親叫來病房處理這些特別護理的雜事。我每天的檢查交待、接待外調還需照常進行。……

病房裏的隔離審查一直進行到大約 11 月份，我終於有一天拄著雙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醫院轉悠活動一下。我看到整個醫院貼滿了大標語：「打倒四人幫在湖北的黑幹將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打倒吳焱金！」「吳焱金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搞笑的是，「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也不少。

……1977 年 11 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漢劇院，裏面坐滿了人，看守告訴我這是全市的廣播大會，聽眾有百萬人之多，你要放老實一些。大會開始，和我同台被批鬥的人是市革委會常委、鋼工總頭頭沈複禮。我聽到不斷有人在臺上痛哭流涕地

控訴我，說的卻是與我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和事，無非是這個被打，那個被鬥。我當時想，文革十年中，我從沒打過人或指使別人打人，如今被當權派指使人控訴，而走資派指使百萬雄師無端殺死我的戰友 28 人，他們無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最後，大會宣佈我三項罪名：一、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二、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三、充當「四人幫」在武漢篡黨奪權的黑幹將，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會後將我押送到武漢市第一看守所關押。

### 山西省的揭批查

由於文革多次反復，各地政權在文革中幾經換手，1976 年掌權的一些人，借清查運動的機會，對上幾輪得勢的施加報復。山西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駐山西的 69 軍軍長謝振華、政委曹中南和山西很有勢力的陳永貴不是一派。陳永貴當上了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借中央文革派的力量把謝振華趕下了台。陳永貴和他支持的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在控制了山西各級政權。謝、曹這一派的人成了清查對象。

1977 年一季度開始，全省各級基層單位陸續開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幫」辦公室，辦清查學習班。各單位持謝、曹觀點的縣、科級幹部大多住進了學習班。開始時，這些學習班「學員」一般在白天被巡迴批鬥，晚上八、九點至次日凌晨兩、三點被審訊，用殘酷的手段逼供。

在揭批查運動中，省委書記王謙提出「劃大線，切西瓜」的口號，對大寨的態度成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昔陽縣委副書記王金籽升為省委書記，一位張姓公社書記被任命為省委秘書長。會上殺氣騰騰，點了李文亮、吳象、白興華等多人的名，還要逮捕中央候補委員王體。他們的罪名是向中央寫信反映山西的問題，說他們投靠「四人幫」。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曾批評過大寨，成了重點清查對象。李順達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總代表」、「晉東南『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魁禍首」，還搞了一個「李順達幫派體系」，牽連了數百人。

曾經批評過大寨、向中央反映過大寨問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傷害幹部、群眾數以萬計。省直屬單位的審查對象被集中到交城「5·7 幹校」。1977 年 2 月 22 日，山西省委在昔陽召開學大寨會議，陳永貴

大罵他不喜歡的人。昔陽縣領導人發言，把批評過大寨的人說成「特務」，把給中央寫信反映陳永貴問題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1975年因反對「四人幫」被打成「張趙反革命的集團」的成員，1977年11月不僅沒有釋放，反而把張瑁、趙鳳歧、羅建中判處死刑，張耀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另6人被分別判處7至15年徒刑，太原市因「張趙反革命的集團」案株連1000多人，其中兩人被迫害致死。<sup>20</sup>

新華社山西分社也成了清查的重點單位，7位領導幹部和記者被當作清查對象。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先後兩次把新華社山西分社全體職工召集到省委常委會議室，他在講話中，把新華社通過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稿，說成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會的方便，搞特務活動」，指責分社記者「為『四人幫』提供炮彈，「搞特務活動」，「以山西的材料打擊山西」。說新華社山西分社是「四人幫的御用文人」、「反動文痞」、「『四人幫』控制的新聞單位」。

按中央規定：新華社分社由總社和省委實行雙重領導，以總社為主。分社領導班子由總社提出，徵求省委意見商定。但是省委沒有徵求總社意見，就將原有的領導班子成員一律靠邊站，另行指定了臨時領導小組主持分社工作，又專門派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新蘭（原大寨人民公社婦聯主任）帶領的清查聯絡組進駐分社指導清查運動。給社長方言羅列了幾條罪狀，未經調查落實，也沒有與總社聯繫，就動用公安機關，搜查了他的住宅和辦公室，並把方言關進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近兩年。<sup>21</sup>

老記者馬明一段時間負責接待處理群眾來信來訪。有一次從郵局寄來讓轉給江青的一封來信，信的內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樣板戲的感想。馬明按照當時的規定，把來信連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一起轉寄總社處理。在清查運動中，把這件事當作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記者廖由濱是總社從遼寧分社正常調到山西分社的，清查時說他是「毛遠新派來的」。記者馮東書曾在分社研究報道會上說過

<sup>20</sup>李輔：《所思所憶七十年》，溪流出版社，2012年，第352-353頁。

<sup>21</sup>馬明：《山西分社「清查」厄運追記》，《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不能提永遠學大寨」。也作為清查內容。<sup>22</sup>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副主任李輔，文革初是省直機關群眾造反組織「七·一公社」的頭頭。1973年，省委讓李輔帶工作隊到襄汾縣，後任縣委書記。李輔大刀闊斧工作了兩年，局勢大有好轉。李輔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1977年1月，臨汾地委召開6000人大會，開展揭批查，蒲縣縣委書記楊桂舟被逼自殺身亡。在清查中李輔被關在「5·7幹校」，讓他交待問題，被關押了8個多月，巡迴批鬥21場。王謙下臺、霍士廉當了省委書記以後，1981年4月給李輔平反。9月被派到平遙縣工作，不久被任命為縣委書記。李輔到平遙工作兩年，成績顯著。1984年前後，又以參加過造反派組織，擔任過造反派頭頭的罪名，被定為「三種人」，撤銷職務，開除出黨。他上訪申訴三年多毫無結果。<sup>23</sup>

### 四川省的揭批查

全省確定為清查對象的2100名，其中，屬於打砸搶和犯有嚴重罪行而逮捕的1400名，屬於造反起家結合進縣以上領導班子的有385名，除逮捕7名外，被撤職或免職的365名。

在18個市(地、州)委的289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132名，增補73名。在212個縣(區)委的2225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902名增補869名。實現了大換班。

以上是官方公佈的數字。申訴者說：「清查運動高潮時，一夜就抓捕數千人，重慶市看守所、轉運站、各區縣看守所一夜之間就滿員了。」據當時重慶九區四縣不完全統計，受審查人員被以現行反革命判刑的就有上千人，僅1977、1978兩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的就達600多人，以『打、砸、搶』為由判處的就更多了。此外，還有上萬人被勞動教養，開除公職的則不計其數」<sup>24</sup>自貢市委以(1977)34號和自貢市委政法黨組(1978)15號等文件為依據，將大批基層

<sup>22</sup>馬明：《山西分社「清查」厄運追記》，《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sup>23</sup>李輔：《所思所憶七十年》，溪流出版社，2012年，第342頁。

<sup>24</sup>重慶吳如輝申訴：《強烈要求重慶市委市府落實中央(1982)9號文件》，2006年12月7日。

幹部和群眾點名打成「反革命」逮捕，並於 1978—1979 年先後判刑達 260 餘人，還有上千幹部、群眾被以辦學習班之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和處分。<sup>25</sup>

當時在四川主政的是趙紫陽，據說他對造反派比較寬容。四川大規模抓人是 1978 年 2 月中旬才開始的，要比全國許多省份晚一年多。四川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大規模抓人？因為 1978 年春節前鄧小平回四川有明確指示。當時省委向他彙報揭批「四人幫」的工作，鄧小平問那些幫派頭頭都抓起來沒有？紫陽說對幫派體系的人都進行了揭發、批判、清查。鄧小平又問抓沒有？趙紫陽只得說還沒有抓。鄧小平說幫派骨幹都應該抓起來。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不能置之不理。省委專門開會傳達和落實鄧小平指示。1978 年 2 月 11 日，四川省召開了全省規模的公捕大會，每個地區都設了一個分會場，全省統一大規模抓人，設在成都的主會場主要是抓省一級的造反派人員。全省範圍的抓捕對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責任人和武鬥命案責任人以及 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和 1976 年批鄧運動中帶頭鬧事的人。但是，四川沒有像有些省份那樣把知名造反派頭頭都收入網中。成都地區結合進省革委的八九個造反派學生代表一個都沒有抓。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紅城」頭頭蔡文彬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團省委書記，四川大學學生，成都「826 戰鬥團」政委江海雲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到了 1977 年 12 月四川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文革中結合進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驅逐，1978 年，趙紫陽為了保護他們，讓蔡文彬到邛崃縣擔任縣委副書記，讓江海雲到資陽縣擔任省革委副主任（沒有到職）。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趙紫陽鞭長莫及，對造反派的抓捕和判決遠遠超過成都地區。<sup>26</sup>

北京抓了江青等四人之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黃廉被關押審查，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 年，被判處 18 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5 年。周家喻，重慶大學學生，重慶大學「8·15」頭頭，1968 年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1970 年被安排長安機器廠

<sup>25</sup>四川自貢市「兩案兩清」受害者：《再次控告中共自貢市委製造 260 餘人「反革命」冤案，拒不糾正》，2007 年 8 月 2 日。

<sup>26</sup>蔡文彬：《一個造反派眼裏的趙紫陽》，《昨天》，2012 年第 9 期。



三車間勞動。文革後也被判刑 15 年。江海雲最終還是被撤職並開除黨籍，蔡文彬被撤職，整黨中不准登記。

### 湖南省的揭批查

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被抓捕，湖南的造反派勢力終於徹底覆滅。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頭目與骨幹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大部分的則被關到限制自由的「學習班」接受清查。

1982 年 5 月，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傷人罪」先後分別將省市級別的原造反派主要頭頭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5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葉衛東（教師、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3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唐忠富（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10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張厚（中共長沙市委書記、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8 年。

除了省一級造反派頭頭以外，其他文革積極分子經數年各種形式的隔離審查後，有一批被定為「三種人」，大部份的檔案結論，則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准提拔、重用，不准進入黨政機關。湖南最早起來支持「工聯」造反派的副省級領導幹部章伯森，也於 1984 年 3 月，被定為「三種人」，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1983 年 11 月，省委召開四屆九次全體會議，部署全省的整黨工作。在整黨中受到各種組織處理的有 34, 000 多名，其中，開除黨籍和不予登記的 8957 名；留黨察看、緩期登記的 15000 多名；給予其他組織處分（警告、嚴重警告、撤職）的 9685 名。

### 吉林省的揭批查

1976 年底，中共吉林省委對王淮湘<sup>27</sup>、崔海龍在文革中所犯錯誤和罪行進行清查。1981 年 4 月 11 日，王淮湘、崔海龍被開除黨籍。據官方公佈，全省犯有嚴重打砸搶錯誤的 14, 522 名，定為打砸搶分

---

<sup>27</sup>王淮湘，(1920—2013)，1937 年 9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9 年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兼吉林省軍區政委，1971 年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

子的 787 名。給予撤職處分的 183 名，給予黨紀和行政處分的 987 名，開除黨籍的 181 名，給予刑事處理的 302 名。1978 年 6 月，省委決定，對身任省委委員、省革委會副主任、團省委書記、東豐縣委書記等職務的許肇昌，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交司法機關處理。1983 年 11 月 9 日，對許肇昌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黑龍江省的揭批查

1976 年 12 月 10 日，黑龍江省委決定對「與江青有關聯的」原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離職審查。1977 年 1 月 4 日，對省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張永昌、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隔離審查。7 月 1 日，省委召開揭批查大會，要求徹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在黑龍江的幫派骨幹分子。7 月 9 日，省委召開全省揭批查廣播大會，全省 385 萬幹部群眾收聽大會實況。當時，全省列入重點清查對象 373 人（地市局級以上幹部 26 人），其中，隔離審查的 199 人，被拘留的 26 人。1977 年 12 月 8 日，中央決定原省委負責人免職，回部隊分配工作，任命楊易辰為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

1978 年 7 月 22 日，黑龍江省委召開處理清查對象大會，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聶士榮、劉雪峰、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分子邵岩成。8 月 12 日，又逮捕了打砸搶分子韓潮、劉佐文、丁樹順。<sup>28</sup>

全省立案審查的 655 名人員中，黨員 495 名。這些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的 4 名，開除黨籍的 18 名，受黨內處分的 44 名。與此同時，對文革中的打砸搶事件進行了清理。全省 7188 名清理對象中，定為打砸搶分子的 167 名（判刑 102 名），其中黨員被開除黨籍 99 名，一些人被調離領導崗位。

### 上海市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後幫助中央穩定上海局勢的三位市委書記也未能倖免。1977 年 1 月 10 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被停職審查，6 月

---

<sup>28</sup> 《黑龍江省志·第 70 卷·共產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8-270 頁。

被逮捕。徐景賢被判 18 年，王秀珍被判 17 年。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患神經病沒被起訴，後來死於神經病醫院。1980 年底，全市經過審查批准列為清查對象的有 5385 名，其中採取組織措施審查的有 1683 名。清查結果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 52 名，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骨幹的 9 名，還逮捕拘留打、砸、搶分子 450 名。包括徐景賢等三位市委書記共 30 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陳阿大（16 年）、葉昌明（15 年）、黃金海（15 年）、戴立清（15 年）、馬振龍（16 年）朱永嘉（14 年）。

全市從 1984 年到 1987 年開展整黨工作，並結合整黨核查「三種人」。在整黨中，全市列為核查對象的有 4829 名，經過核查定為「三種人」的 394 名，定為嚴重錯誤的 3814 名。對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的黨員分別情況作了處理，全市開除黨籍的 619 名，不予登記的 1134 名，緩期登記的 1752 名，給予留黨察看以下黨紀處分的 3687 名。

### 浙江省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以後，浙江省將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等定為「反革命分子」，賴可可、羅毅被停職審查。

張永生，1940 年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群眾組織「省聯總」主要負責人。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委員、浙江美術學院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等職。1975 年 10 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時調離浙江下放河北省農村勞動 1977 年 2 月押回浙江審查。1978 年 8 月 13 日依法逮捕，1979 年 4 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翁森鶴，1938 年生，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浙江群眾組織「紅暴派」負責人。曾任「杭絲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總工會副主席、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補委員等職。1975 年 7 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中拘留審查，1976 年 12 月 23 日被逮捕，1979 年 8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賀賢春，原杭州通用機器製造廠技術員，廠革委會主任，杭州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曾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在文革後的清查中自殺身亡。

賴可可，1911年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1方面軍團長。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後任多種軍職。1949年後，在山東、浙江歷任多種領導職務。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79年被撤銷一切職務。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浙江省分期分批進行整黨。被定為「三種人」101人，受黨紀處分的9418名，其中開除黨籍1229名，留黨察看2248名，撤銷黨內職務222名，嚴重警告2284名，警告3435名。不予登記的黨員2258名。這是官方的數據，實際上被清查的人遠大於這些。

據《金華縣人民法院志》記載，1977-1979年，原金華縣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華地區判反革命罪662人，校址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有7人以反革命罪判了刑。在清查中，杭鋼工人張小定、杭汽工人孔漢茂，被另一派打死。不到2000人的杭州機床廠，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瘋，3人被判刑，一夜之間關押了38人。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廠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兩人被判重刑，還有16人被關入土牢。1977年7月17日，海鹽縣縣委召開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大會，批鬥了3名「幫派頭目」。經省委批准，依法逮捕了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從寬處理了1名「幫派頭目」。到7月底統計，全縣參加重點人住讀「培訓班」的有58人，全縣揭露有攻擊性言論的有52人，其中「幫派體系」成員的占65%。<sup>29</sup>

### 福建省的揭批查

福建省各地開展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及其在福建的幫派骨幹」陳佳忠、莊志鵬、李慶霖等一夥人的罪行。全省被列為審查對象的有11000多名。1979年，在揭批查的基礎上，對各級領導班子做較大的調整變動。在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常委委員以上18名領導成員中（不含軍隊幹部），調整變動8名，占44.4%；省直

<sup>29</sup>海鹽縣志志辦公室：《海鹽縣的「揭批查」運動（徵求意見稿）》，海鹽史志網，2010年第3期。

部委局黨組和大專院校黨委成員以上 313 名，調整變動 127 名，占 40.6%；地市委常務委員以上 71 名，調整變動 42 名，占 59%；縣（市、區）委常務委員 564 名，調整變動 344 名，占 61%。1972 年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禦狀」的李慶霖，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鼓勵以後，被譽為「反潮流英雄」，1976 年 11 月被隔離審查，1977 年 11 月正式被捕入獄。1979 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 江西省的揭批查

塗烈，原是江西拖拉機製造廠工人，文革中先後任省「大聯籌」負責人，江西拖拉機製造廠革委會主任，江西省常委。北京十月政變後塗烈被逮捕，1983 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另一派頭頭，洪都機械廠工人、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萬里浪，在四人幫垮臺後的「打招呼」時華國鋒都曾經對萬里浪一派特為關照。1978 年初經人大選舉的新一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仍有萬里浪。但時不過半年，萬里浪就被送進看守所。1983 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其他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蔡方根 14 年，陳全生 13 年，蔡松林 13 年，張羽 11 年，魏厚慶 11 年，曾凡珩 11 年。

### 甘肅省的揭批查

1977 年 6 月，中共中央免去洗恒漢<sup>30</sup>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宋平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原任 4 名書記中，1 名停職審查，2 名免職；13 名常務委員中，5 名軍隊幹部免職回部隊，1 名停職審查，3 名免職。

1977 年年 6 月 7 日互 9 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洗恒漢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韓先楚、肖華與宋平。會議一開始，就宣佈洗恒漢被正式免去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

---

<sup>30</sup>洗恒漢，壯族。1911 年生，1929 年參加工農紅軍，中將軍銜。1955 年 5 月至 1964 年 6 月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1968 年 1 月至 1977 年 6 月任甘肅省革委會主任，1971 年 2 月至 1977 年 6 月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1977 年 6 月被免除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的職務。

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鐵路系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一套，使蘭州鐵路局一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的這次會上指出：「洗恒漢同志在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有些是嚴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中央政治局經過反復考慮，按照毛主席當年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處理的精神，洗恒漢同志的工作還是調動一下為好，按正常調動工作辦理。」

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西北之行，成了清查洗恒漢的一個重點。莊則棟按分管體育的陳錫聯副總理指示，到甘肅調查研究體育工作並視察臨澤這個體育先進縣。宋平指示秘書給洗恒漢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視察體育工作，洗恒漢同志在張掖，不見不好，讓洗接見他一下。莊則棟看完臨澤後就到張掖，在 19 軍軍部和洗見了一面。安排打了一場球，吃了中午飯，他就回臨澤了。葉劍英在批判洗時說：莊則棟是江青最心愛的人，在甘肅同你聯繫，這不是組織聯繫啊！他一個人跑遍西北幾個省，是什麼行動？非常反常。我們看「四人幫」有一條原則，就是他們說好的，我們就說壞；他們說可靠的，對我們就不可靠。從這個觀點出發，「四人幫」說蘭州比較可靠，我們就要想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解決甘肅問題會議以後，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搞層層揭批「洗家幫」、「西北幫」等活動，一大批在西北艱苦地區工作了幾十年的幹部挨整，僅省、軍、兵團、大軍區級的幹部被拘留或停職專案審查的就有 40 多人，師、地和縣、團級幹部有好幾百人，一般幹部更是一大批。洗恒漢被扣上了「『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的帽子。從此，黨報、地方報紙幾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連篇累牘刊登批判文章，聲討「代理人」。洗的秘書陳文生被押回蘭州隔離審查，對他大搞逼、供、信，強迫他揭發洗的「罪行」，後來被復員處理，分配到火葬場幹活。洗的保衛幹事華德孝也被揪回去參加運動，後來被處理到磚瓦廠。

1982 年 11 月，軍委讓在北京治病的洗恒漢回蘭州最後解決他的問題。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裏對洗恒漢說：「他們打了個報告讓你回蘭

州去，最後把問題了結一下……，放心吧，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什麼錯誤檢查一下就是了，不會對你搞什麼批鬥，事情都過去六年了嘛……」但是，洗恒漢一下火車，蘭州軍區便立即將他軟禁起來，不許回家，不許和外界聯繫，用一個排的戰士看守他。以後十幾天裏，一大群專案人員對洗進行嚴厲審訊、逼供，不給他一絲解釋和辯白的機會。每天十幾個小時的批鬥，七十多歲的人了，這種身心折磨終於使他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住院搶救。

1982年12月5日，總政治部讓洗退出現役及降至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並要求限期搬家，否則便停水、停電、停暖氣。由於無處可搬，只得聽憑制裁。水停了，孩子們爬下水管道又接上；電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線過來。只有暖氣無法解決，冬天到了，西北風呼呼地刮著，只有生幾個大爐子取暖。1984年6月，總政又電話通知，說中央指示，改變以前對洗恒漢同志的處理決定，按正軍職待遇離休安置。不久，又電話通知，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sup>31</sup>

### 軍隊裏的揭批查

軍隊裏也進行了大清查。

開國將軍丁盛成了重點清查對象。

1977年3月24日，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座談會全體會議上突然宣佈：「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硬往『四人幫』那裏鑽，他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葉帥再三告誡他，初犯從寬，再犯從嚴，『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把他當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參與了『四人幫』在上海餘黨密謀搞叛亂，他的談話有記錄可查。『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聽了丁盛的談話以後，加緊發武器，發了七萬多件，並急忙派人到北京來向『四人幫』密報。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參與『四人幫』搞陰謀，搞奪權，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丁盛被華點名後，被撤職，抄家，批鬥，關押兩年之久沒有任何手續，妻子兒女被趕出軍區大院。1980年開始的「兩案」審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沒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下了一個《免予起訴決定書》，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狀」，因是從犯，「決定

---

<sup>31</sup> 《洗恒漢自述：風雨八十載》，電子版。

免予起訴」。<sup>32</sup>丁盛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華國鋒的指摘一一進行了辯解，說對他的揭發「完全是無中生有。」<sup>33</sup>

華國鋒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1976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許世友從南京調到廣州，丁盛從廣州調到南京。1976年8月，丁盛到上海附近的島嶼視察，視察後住在上海軍隊所屬的延安飯店。得知丁盛到了上海，8月8日晚8點，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一起去看望。丁盛對他們說：「許世友說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無冤，後世無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後，是他搞我的家屬、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屬和孩子。他們在廣州拉一批人請客吃飯，我在南京很孤立。我從廣州來南京沒帶人來，我是襟懷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殺頭的。」丁盛說，這次軍區開會，通知60軍，軍長、政委不來開會。60軍政委是許世友前任秘書，軍長張明也是緊跟許的。他們聽許世友的，不聽我的。60軍駐防地是從南京到蘇州。上海領導人認為丁的話是對他們的提醒，就加緊佈置民兵。<sup>34</sup>丁盛在否認他說了這些話，還說曾找徐景賢為上述內容對質，徐景賢回避。<sup>35</sup>

1978年年3月以前，揭發清查了「四人幫」在總參搞的陰謀活動，重點清查了副總參謀長胡煒（最早支持西安交大造反派的那位軍長）以及一些部局42人的問題。1978年4月20日，中共總參謀部委員會發出《關於「三查三整」的通知》，決定在機關開展查鬥志、查紀律、查作風和整頓「軟、散、懶」、整頓官僚主義、整頓文風的「三查三整」運動，同時下發了查整方案。在「三查三整」運動中，繼續清查第11次路線鬥爭中的問題，聯繫揭批林彪，又清查了25人的問題。兩年來，共清查了68個人的問題，其中軍職以上幹部19人，師職幹部15人，一般幹部和職工34人。採取「組織措施」的46人。在聯繫揭批林彪路線時，對總參原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1974年重新工作以後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揭發，總參領導對他進行了幫助。

---

<sup>32</sup>曉明：《華國鋒的功與過》，《記憶》第8期。

<sup>33</sup>《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265、272-274頁。

<sup>34</sup>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第1552-1553頁。

<sup>35</sup>《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248-251頁。



在「三查三整」中，對 1966 年的所謂「8·25 反革命事件」，重新作了評價。新的結論說：所謂「8·25 反革命事件」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為了篡軍反黨奪權，蓄意打擊迫害賀龍同志的陰謀。他們借作戰部 1966 年 8 月 25 日支持外事局的一張大字報，誣陷王尚榮等同志「在賀龍的指使和策劃下，顛覆總參黨委、篡奪總參謀部的領導權」，在總參首先打倒了王尚榮、雷英夫同志，譚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誣陷。隨後又以「配合王、雷」「陰謀顛覆總參謀部黨委」等莫須有的罪名，迫害陳鶴橋、樊哲祥、王善甫、王紹南、劉清明等同志，使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殘，並株連了家屬、親友。當時總參主要領導同志（楊成武）在「8·25」問題上執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負有罪責的。<sup>36</sup>

### 公安部的揭批查

文革中，為了審查高級幹部，設立了「中央專案組」負責人是周恩來。下設三個專案辦公室，即一辦、二辦、三辦。一辦由汪東興負責，審查劉、鄧、陶、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等副總理以上的幹部。二辦由黃永勝負責，審查軍隊裏被揪出的領導人，如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三辦由謝富治負責，審查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民主黨派知名人士中被揪出的人。

文革中被關押的審查對象有的是經毛、林、周批准的，有的是經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批准的，都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理。

1982 年 4 月鄧小平在公安部一個報告上批示：「過去搞專案的，原則上調離公安部。」（原因是王光美向鄧小平寫信說：「整我們的人至今還留在公安部」）。1982 年 5 月 26 日，彭真就公安部的專案人員一事給彭沖、劉複之、趙倉壁寫信，說：「看了小平的指示信後，反復考慮了專案人員的問題」「事情是很清楚的，兩案已經審理了，在林、江指揮下，誣陷迫害劉少奇同志等大批老幹部的專案人員，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動』，沒有處理。有些人處在重要崗位上，自然要引起幹部群眾的疑問和擔心，反應是強烈的。」

文革中根據上面指示，公安部調 283 人參加了中央一、二、三辦

<sup>36</sup>中共總參謀部委員會：《總參機關「三查三整」運動總結》，1979 年 1 月 15 日。

的專案工作。其中一辦 42 人，二辦 4 人，三辦 237 人。十月政變後，將這些人集中到公安大學審查。公安部自己又擴大了三部分人。這三部分人是：1，參加過搞公安部副部長以上專案的人；2，參加過搞李震「他殺」專案組副組長以上的人；3，造反派表現不好的人。另外還擴大到參加其它一些專案調查的人，共擴大 100 多人。和一二三辦的人合在一起共 380 多人。這 380 人占公安部幹部人數的三分之一。從 1982 年夏到 1984 年 9 月，共審查了兩年多。1984 年 10 月，《公安部整黨工作彙報提綱》中提出：「經調查核實，51 人在專案期間沒有問題或表現較好，留部工作；多數人有一般性質錯誤，本人作了檢查，分配到部屬單位或其它部門工作；問題比較嚴重的 20 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屬單位工作的人，以後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有的多年不分配具體工作，無事可做。<sup>37</sup>

## 二、還是採用文革的思維和手段

在揭批查運動中，還是沿用文革中的思維，採用文革中的手段。徐明清案就是一例。

徐明清，1926 年加入共青團，後又轉為共產黨員。1928 年，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1932 年 10 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並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從青島來上海避難的李雲鶴（江青），通過「左聯」的關係，進入「晨更工學團」當教員。

1934 年 1 月 28 日，上海各界舉行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1934 年 9 月的一天，李雲鶴因在遊行中表現突出被捕。徐明清馬上就向教聯常委彙報，組織上對她進行營救。

出面保釋李雲鶴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法租界公董局長何德奎。李雲鶴被捕後，既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

---

<sup>37</sup>這一資料是公安部宴樂斌提供給本書作者的，胡治安《中央專案組人員文革後的遭遇》（《炎黃春秋》，2014 年第 9 期）中的情況和宴樂斌提供有情況基本一致。

據，被關押了兩個月，警察局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就允許保釋。1934年冬，李雲鶴被釋放。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幫助下，李雲鶴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了延安。之後，黨組織審查江青歷史，徐明清客觀地為她寫了一份證明材料。一年之後她便與毛澤東結為夫妻。

十月政變後，江青專案組將徐明清秘密逮捕，逼她寫證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說不瞭解情況，不能寫。專案組斥責徐明清包庇江青，不讓徐睡覺。三個月後，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專案組的口授，寫了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發的十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隱瞞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證明，鑽進黨內。」徐明清交上了這個材料後，進了秦城監獄。三年後，幾乎神經分裂的徐明清被無罪釋放，只因為胡耀邦在高檢說了這樣一段話：「四人幫粉碎之後，我們還搞左的那一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緊放。」胡耀邦一口氣點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sup>38</sup>

中央專案組如此，地方的專案組的行為可想而知。

### 三、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

在清查不斷向擴大化的方向發展的時候，胡耀邦不斷地敲警鐘，不斷地降溫。他多次指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那股潮流來了，誰擋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只不過性質輕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強調，「對於一般性的錯誤，在這次整黨中不再作為問題提出。」<sup>39</sup>

1980年3月11日，胡耀邦對《關於江蘇如皋縣清查工作等三個

<sup>38</sup> 徐明清：《我與江青》，蔣寄夢整理，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啟之：《目的與手段：文革思維今與昔》，原載《記憶》2014-10-10。

<sup>39</sup> 《胡耀邦傳》第三卷（徵求意見稿），2010年11月20日，第104-105頁。

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中說：「這樣的同志不諒解，不信任，就很難安定了（指：團縣委書記王光國，文革初期當過公社的十二個人的造反組織頭頭，兩個月後退出，這次卻被列為「造反起家」的人）。這「三種人」本來界限就不清，不要急急忙忙鋪開搞（指報告中說，清查和清理打砸搶問題還未處理結束，清理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又已開始）！」<sup>40</sup>

1981年5月18日，胡耀邦對《關於大同礦務局調整「幾種人」出領導班子的情況報告》的批示中說「其實任何一件事一個人的事情是複雜的，變化的，簡單的框框框不了，框了就不符合實際，就變成主觀主義的了，因此不是死框框，而是廣泛的群眾路線（指在調整領導班子中，一些單位主要套「身份」、看「文革」初期的錯誤，缺乏具體分析，忽略現實表現的情況）」<sup>41</sup>

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胡耀邦給負責「兩案」審理的彭真、彭沖、黃火青、江華、程子華、魏文伯、趙倉壁等人寫信。信中說：「處理過了頭，容易帶來後遺症。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嚴重注意。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化為具體實踐，萬分困難。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認為成功的例子，簡直微乎其微。」「不少單位對查清楚有問題的人強烈要求起訴判刑，這不是解決的唯一方法吧。」胡耀邦舉出曹操頒佈手令宣告「喪亂以來，謗議之言，一切勿論」的典故，反問說：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難道我們自稱要改造全人類的共產黨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嗎？」11月16日至22日，中央「兩案」領導小組召開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會議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見。<sup>42</sup>

1982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學員結業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初期，你當時要在臺上，又不參加造反，不表態行嗎？我不知道你們如何，可能在座的許多同志當時沒有造過反，那麼你們是不是

---

<sup>40</sup>《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一冊）》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1986年8月。

<sup>41</sup>《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一冊）》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1986年8月。

<sup>42</sup>轉引自肖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第319-320頁。

站在「造反派」一邊了呢？同志們，還有我支「左」，支你。我就知道在座的有好幾個。那個賬還能算清楚呀？！主席下的命令嘛。所以，要提倡大家自覺地清理一下思想，然後就算了，以後不提了。」

43

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常委、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迴批鬥，接著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但起訴準備拖了三年之久，因為查來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還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內人黨」運動。檢察院認為實在夠不上起訴條件，但負責清查的領導幹部不斷施加壓力。高樹華給胡耀邦寫信申訴（在「九大」期間曾和胡耀邦相識）。胡耀邦接到申訴材料之後給自治區書記周惠打電話：為什麼高樹華僅僅因為是造反派，沒有罪行也抓住不放，關押審查五六年、還堅持無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內內戰 800 萬人。胡耀邦說：「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麼不對！勸你們少抓，該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結果，高樹華免於起訴。<sup>44</sup>但是，高樹華出獄之後放在工廠勞動改造，每月只拿 10 多元的生活費，到他去世前的 2004 年，生活費才長到 190 元。他雖然學有專長，但在上級有關單位的「關照」下，沒有單位敢用他。

顯然，胡耀邦一人之力難以阻擋各級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但各級有了像胡耀邦這樣一些開明的領導人，對殘酷的清查運動，確實有所緩解。

#### 四、清理「三種人」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14 周年，鄧小平發出了號召：「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

---

<sup>43</sup>：《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一冊）》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1986 年 8 月。

<sup>44</sup>高樹華、陳鐵軍：《內蒙文革反思——一個造反派領袖的自述史》，未定書稿，第 288-289 頁，轉引自程揚潔：《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10 年，第 642 頁。

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sup>45</sup>。

從此，鄧小平說的這三類人就作為「三種人」成為清查對象。

劃定「三種人」沒有明確的政策界限，更沒有法律依據。被結合到各級革委會裏的群眾組織頭頭，都可列為「造反起家的人」。清理「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以思想定罪。鄧小平把「幫」和「派」綁在一起。「派」是文革中形成的派別，幾乎每個人都參加一派，而「幫」就帶有黑社會性質。文革中沒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至於「打砸搶分子」，最突出的是在恐怖的「紅八月」時「破四舊」，抄家，打人，這在當時是受軍政官僚們鼓勵和支持的。年輕紅衛兵是只是充當打手。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再一次強調「最危險的是『三種人』」，他說：「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這種主張就是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書信者注），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佈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繫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sup>46</sup>

在清理「三種人」這個問題上，陳雲和鄧小平高度一致，陳雲說：「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保持警惕，就是說，決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把他們撤下來。為此，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組織部門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一定要進行切實的考察。」<sup>47</sup>

---

<sup>45</sup>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sup>46</sup>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年10月12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頁。

<sup>47</sup>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2.07.30

清查「三種人」從 1982 年開始，是結合「整黨」進行的。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2]55 號），通知指出：「必須堅決把他們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實際上，在成立革委會時進入權力機構的群眾組織代表（一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在以後的多次政治反復中早已排擠出權力機構，有的長期被關押。大量不在領導班子裏的造反派頭頭就成了清理對象。「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對政治不可靠的人的處置。文革積極分子也成為這樣的人。

1983 年 9 月 20 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鄧力群、胡啟立等人談話時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sup>48</sup>因此，年紀輕的、有專業知識的就成了清理「三種人」的重點。

我的一位叫張世榮的同學，不僅被定為「三種人」，而且成了通報全國的典型。1983 年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專門發了通報。<sup>49</sup>通報列舉張榮的第一條罪狀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積極參加『造反』。1967 年 1 月，以他為主組成『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7623 戰鬥隊桃園分隊』，到撫寧縣桃園大隊搜集、編寫誣陷劉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並參加揪鬥四清中提拔的大隊幹部。張世榮返校後，他和桃園分隊部分人員執筆寫出『徹底清算劉少奇、王光美破壞四清運動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並刊登在《井岡山》報上。1967 年 4 月，清華大學召開批鬥王光美同志大會時，他將編寫的誣陷材料提供給前來參加會的桃園大隊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同志進行『揭發控訴』，起了很壞的作用。」

1967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製造了劉少奇的冤案，全國各地大張旗鼓地揭發批判劉少奇和王光美。張世榮借串連機會到桃園大隊調查王光美的材料是一種跟風行為。所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7623 戰鬥隊桃園分隊」是隨意組合的幾個人。文革中的戰鬥隊起名時

<sup>48</sup> 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1983 年 9 月 20 日

<sup>49</sup> 《「三種人」張世榮已開除出黨》，中央整黨辦公室《整黨通報》[參閱文件]6，1983 年 11 月 27 日

總是虛張聲勢，如清華的「114 獨立營」是住在 114 房間的一個學生。1967 年 4 月清華批鬥王光美是周恩來批准的。張世榮的調查材料是桃園大隊向他提供的，在批鬥會上桃園大隊的發言不需要張世榮的材料。

通報列舉張的第二條罪狀是：「1966 年 9 月，張世榮南下串連到湛江，與北京 101 中學和北大串連學生一起，聯合召開了『炮打湛江市委資產階級司令部』大會。會後，他執筆起草了傳單，鉛印散發全市。1967 年 8 月，『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發表後，他立即組織人竄到湛江，以『清華井岡山兵團對外作戰部』的名義進行活動，揪鬥軍隊領導幹部，抄了南海艦隊第一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紹彬同志的家，策劃綁架桂紹彬同志，並參加了對桂的審訊。」

今天看來，張世榮在湛江的行為當然是錯誤的，但在文革時期，這些行為是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策劃綁架桂紹彬同志」更是錯誤。不過，開綁架的先例的是一些高幹子弟綁架北京市長彭真，周恩來得知後不僅沒有追究，反而和他們談判，以召開批判彭真的大會為條件要回了彭真。張世榮應當檢討在湛江的錯誤，但作為「三種人」對他進行揭發批判，開除黨籍，通報全國，是太重了。

張世榮 16 歲考上清華，學習成績十分優秀，是「因材施教」<sup>50</sup>的對象。1965 年 3 月，我所在的黨支部討論張世榮入黨，由於他的優秀，沒有任何爭論就順利地通過了。清華大學討論入黨是很嚴格的。胡錦濤所在的黨支部討論他入黨時，第一次由於對「剝削階級家庭認識不深刻」沒有通過，經過一段時間「幫助」之後，他重新作了陳述，在第二次討論時才通過。張世榮參加工作以後表現突出，1978 年 6 月提為上海新成汽車配件廠副廠長，1980 年又任廠黨總支委員。同是清華同學的黃菊不服從畢業分配，卻成了上海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世榮的素質比黃菊好得多。

1983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於文革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

---

<sup>50</sup>「因材施教」，是清華大學對成績特別優秀的少數學生「吃偏飯」，增加學習內容。



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聯繫，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

從此，這些被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地、富、反、壞、右之後的政治賤民，喪失了「被選拔」和公派「出國」的權利。

為了清查「三種人」，全國出現了一支龐大的清查隊伍，進行內查外調。僅石家莊市，專職核查幹部最多高達 1600 人，兼職幹部 1100 人。<sup>51</sup>外調人員走遍全國各地，尋找幹部（其中包括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在文革中的錯誤。「據初步瞭解，各地各部門考察面大的占到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sup>52</sup>調查結果屬於「一般錯誤」的不裝檔案，屬於「嚴重錯誤」要裝檔案。但「一般」和「嚴重」之間的界線常常是由各單位領導人掌握。這些本人看不見的檔案，決定了他終生的命運。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野蘋說：「不能認為只要是屬於一般性錯誤的，都不影響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一般性錯誤是處理『文革』中犯錯誤人員的一個政策界限，這同選拔幹部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範疇的兩個概念。提拔幹部，即使是『文革』中沒有犯過錯誤的，都必須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sup>53</sup>所謂「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實際是對文革後期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的的態度。如果在文革中保了重要領導人，那就會官運亨通。如果文革中響應毛的號召反對了重要領導人，那就要倒黜一輩子。

中央清查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曹志說：「立案審查的核查對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員×、×百萬，牽動面之大，不下於『文革』以前的幾次政治運動」<sup>54</sup>

---

<sup>51</sup>高廣景：《清理「三種人」的前前後後》，國史網 2013-10-19。

<sup>52</sup>曹志在清理「三種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6.06.07。

<sup>53</sup>陳野蘋在清理「三種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86.06.14。

<sup>54</sup>曹志在清理「三種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6.06.07，本處引自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一冊）》，1986年8月。

## 五、清查三種人運動的雙重標準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老幹部從寬，對青年知識分子從嚴。鄧小平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那個時候，不說違心的話行嗎？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贊成，不違心地去做行嗎？不能把那時在特殊情況下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的，也說成是『三種人』。」<sup>55</sup>實際上，在文革中摧殘普通百姓的運動，如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某些地方對普通百姓的大屠殺，都是在進入革委會的幹部和軍人主導下進行的。對老幹部網開一面，使一批人在文革中的重大責任沒有追究。如，廣西大規模屠殺「4·22」，主要責任人應當是韋國清，文革後不僅沒有任何觸動，反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江蘇殘酷地清查「5·16」的主要責任人許世友也沒有任何觸動。當然，能夠寬恕的老幹部有一個前提：沒有反對過鄧小平和其他文革後還在臺上的中央領導人。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幹部子弟搞「打砸搶」不加追究，反而作為接班人。清華大學學生陳楚三親身經歷了這一不公正的情況。他回憶說：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幹局任處長的李志民找到我，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一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麼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我推脫不過答應了，……。此後，我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一萬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給李志民。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佈。我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

---

<sup>55</sup>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1983年9月20日

中學紅衛兵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遙想當年送蘋果，江青阿姨多愛我」，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信中著重敘述了清華大學 414 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鬥爭情況，指出 414 派「全體是反謝（謝富治）的，骨幹是反陳（陳伯達）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把紅衛兵視為「洪水猛獸」，主張對紅衛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對紅衛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指出，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證，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倖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一次說過，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麼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一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我還提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長達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對長達六分之一的一段歷史，不應當簡單地「徹底否定」，而應當認真總結，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我說，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衝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麼「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此相聯繫，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組部青幹局推薦了三個人：沈如槐、羅征啟和任彥申。

陳楚三寫的材料被送到陳雲那裏，1984年2月27日，陳雲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給陳雲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一些想法。所謂「老紅衛兵」，是指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革，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一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佈一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革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制，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一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

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間，貫穿著黨的各級老幹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一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制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1966年12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臺」來整老幹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復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著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一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製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志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

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一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一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一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一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志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作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一些想法，不知當否。

收到了陳雲的批示以後，胡耀邦第二天就批示：「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閱批。然後請喬石同志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志。」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

從此，孔丹和陳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前者代表高幹子弟的命運，後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運。

孔丹，父親孔原（1925年入黨，1949年以後歷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副主任、總參謀部二部政委等職）。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文革後直接考上社科院吳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任張勁夫秘書，以後調光大集團任部門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 1920年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是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 1960-1967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中是溫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貴州水電部第九工程局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當教師，1992年到實創總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總經濟師，1995年到一家民營企業擔任副總經理、董事、監事會主席直到退休。陳楚三的父親陳潭秋雖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犧牲，陳楚三沒有權力的庇護。

在清理「三種人」中，對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網開一面，是出於官僚集團的利益。文革的最終勝利者是官僚集團，當然要對這兩種人加以保護。造反派承擔了文革的責任，清查的重點必然放在青年造反者的身上。

在很多地方，清理「三種人」運動中，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自己一派寬，另一派嚴。一些重新掌權的老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文革中保過自己的人格格外重用，對反對過自己的人，重則定為「三種人」，輕則壓制不用。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因背上了「文革罪」的政治包袱，終生報國無門。

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大搞打砸搶的幹部子弟不僅沒有清理，反而占盡了一切先機，公派出國，優先提拔，以權經商，……。他們借助父輩的政治優勢，控制了優質社會資源，把持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

## 六、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對十年文革的總清算。除了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以外，也有正面作用：大體摸清了文革的底細；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對這些人實施了必要的懲罰；對重大的大屠殺事件作了善後處理。

一，各地在大清查中對當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進行了清查摸底，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

北京市在大清查中查出在文革中全市非正常死亡 9830 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有 2214 人。清查中列出的大事件 1221 件。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清查。全市被遣返到農村的幹部、職工共 33000 多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子女共遣返了 125,000 人。全市還有 92,000 戶被抄了家，被抄家的人中很多同時遭受嚴重批鬥、侮辱等迫害。<sup>56</sup>

四川省對文革中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殺人、縱火、搶劫以及刑訊逼供致死致殘的案件共 2486 起重大事件進行了調查。查清了非正常死亡的 22,525 人的死因。<sup>57</sup>

在清查結束後，各省對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有統計。如果將各省上報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匯總，就可得知十年文革全國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可惜檔案還不開放，我無法作這項工作。

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文革後的清查和整黨過程中，對這些冤案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和平反。到 1982 年底，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三百多萬件，涉及受牽連的人約一億。<sup>58</sup>1982 年以後，這項工作繼續進行。略舉幾省平反冤假錯案的資料<sup>59</sup>：

北京市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占當時幹部總數 1/5 的 65000 名幹部的問題，都重新作出結論，全部平反冤假錯案，被迫害致死的幹部

---

<sup>56</sup>《中共北京市委對全市清理「三種人」進展情況和今後工作意見》，1984.06.30。

<sup>57</sup>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黨派團體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sup>58</sup>高勇：《從來歷史非欽定自有實踐驗偽真——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sup>59</sup>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黨史出版社，第 6、第 7 卷。



得到昭雪。全市共清理 21 萬余名幹部的檔案，撤出含有誣陷不實之詞的材料。與此同時，為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 1.17 萬名（含外地調入的）幹部作了改正，為 1959 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的 4,500 多名幹部予以平反。還復查處理了「四清」和文革前的一批歷史錯案。經過落實政策，為 9,648 名黨員恢復黨籍，為 1824 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為大批受株連的人消除影響。

至 1986 年底，江蘇省共復查處理文革中和文革前及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案件 147,583 件，其中，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 95,000 多名幹部，作出了結論和處理；對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 3,300 余名幹部予以改正；對反右傾中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 257 名幹部和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 5,000 余名幹部，予以平反；給 3300 多名黨員恢復黨籍。

到 1983 年冬，河北省共平反糾正文革中的冤假錯案 49 萬件，涉及 102 萬人，其中脫產幹部 14 萬人；文革前的錯案 12 萬件，涉及 13 萬人；改正右派 2,6397 人。

到 1986 年，黑龍江省復查文革前歷史遺留案件和文革中立案的案件近 20 萬件。文革期間造成的冤假錯達 8 萬多起，涉及 12 萬人。僅幹部政策方面。就涉及 10 萬餘人。全部平反昭雪。此外，還全面清理幹部檔案，僅省管幹部中即清除各種不實材料 4 萬餘份。復查處理文革前反右傾、四清等運動中形成的案件 2,4164 件，平反糾正了 15,666 件。對 1957 年錯劃為右派分子 43,584 名進行復查糾正。

在中共十一屆二中全會以後，湖南省全省全面復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 169,000 余名幹部撤銷誣陷不實之詞的結論性材料；改正錯劃右派案件 3 萬餘件；糾正反右傾中留有尾巴的案件 4,900 餘件和四清運動中的冤假錯案 1 萬餘件；復查幹部歷史案件近 5 萬件，糾正 3 萬餘件；並為全省 3,800 余名幹部在肅反審幹中所作的限制使用的意見作出撤銷、註銷和解除的決定。通過落實政策，為 22,029 名黨員恢復黨籍，為 12,747 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

到 1982 年底，山西省山西省因劉少奇冤案受牽連的 1,086 人全部平反。對 1957 年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復查農村「四清」中形成的案件 94,600 件，其中糾正錯案 6,500 件，總計糾正 55,000 名

幹部的冤假錯案。

到 1981 年 9 月，安徽省共平反冤假錯案 23.3 萬多件，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的 1,700 多件，並對有關人員作了妥善安置。從 1978 年 11 月起，對被錯劃右派的 15,341 人予以改正，還對 4,000 人全部取消所戴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沒有法治、不講人權、沒有權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平反了舊的冤假錯案，又不斷地製造新的冤假錯案。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立下大功的胡耀邦，幾年以後又成了更大冤案的犧牲品。

## 二是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實施了必要的懲罰：

有一些人當作「三種人」清理出來是官僚的報復。但是，的確有一些人在文革中作惡多端，在大清查中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下面引用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 1983 年 11 月印發的上海「三種人」的兩個案例：

張超，男，54 歲，1945 年參加工作，1948 年入黨。「文革」前是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科員，1971 年任勞動保護用品商店黨支部副書記。1984 年 1 月逮捕。

「文革」初，張是警衛處「紅色警衛造反隊」隊委。1968 年 5 月被派到 542 廠任軍宣隊副隊長，負責清隊。張與該軍宣隊隊長一起製造了一起「糜××、高×潛伏特務集團」的錯案。張親自參加對糜××刑訊逼供，進行人身侮辱，誣陷糜××是「百分之百的中統特務」，迫使糜上吊身亡。糜妻也受到株連，被誣陷為特務分子，遭批鬥後投河自殺。張超還抄了所謂特務集團成員宋××工程師的家，親自動手打了宋，還說要他「嘗嘗無產階級的鐵拳」，宋被迫上吊自殺。張又多次刑訊逼供所謂特務集團成員糜××，糜不堪折磨，跳樓自殺，造成左腳跟和腰脊椎骨折。張指使「戰鬥組」嚴刑拷打退休職工包××；包被打死後，張還到現場踢著屍體說：「死了等於死只狗」，並唆使有關人員謊報包××「畏罪自殺」，掩蓋犯罪真相。後來包的家屬堅持驗屍，證實確系遭嚴重毆打致死。

張在 542 廠的 8 個月中，親自打過 16 人，手段殘忍。對車間主

任馮××，剝掉棉褲，拉住手腳，用木板橫劈臀部，從夜晚打到次日清晨，幾次昏死過去；還打馮的頭、臉，致臉部腫得和鼻子一樣平，耳朵被打聾。用木棍打老工人袁××的臀部，打得木棍折斷，袁腰部留下終生後遺症。張經常在專案人員面前煽動說：「棍子底下出反革命」，並親自作打人示範，介紹刑訊逼供的「經驗」。在他的影響下，這個廠的其他專案組亦採取掛鐵塊、跪磚頭、「攢背包」、假槍斃、假活埋等殘酷手段，大搞刑訊逼供，造成迫害致死八人、致殘一人的嚴重後果。

1969年初，張回到公安局警衛處。「清隊」中，張繼續帶頭和煽動打人。張擔任戰鬥組長「審問」警衛處科長孫××時，打得孫牙齒脫落，小便出血，留下終生後遺症。「審問」左××時，不顧左懷孕，仍拳打腳踢。張不是警衛處副處長劉××的專案組人員，也沖進去打劉的耳光，導致這個專案組也經常打劉，後來劉被迫跳樓，造成殘疾。

趙志明，男，48歲，1952年參加工作，1953年入黨。「文革」前在寶山縣長興公社黨委副書記，「文革」中任寶山縣委副書記，「四人幫」被抓捕後任縣委書記。

「文革」初期，趙志明因是當權派一度被「靠邊」。1967年2月，積極起來造反，當上了公社「大聯委」的顧問、革委會常委。1968年4月，趙到同心大隊蹲點，經他同意，大隊某些人把女社員顧×當作「流氓阿飛」批鬥；他親自參加了批鬥會，刑訊逼供，致使顧上吊身亡。1968年5月，趙任公社革委會第二把手。在他負責「清隊」期間，全公社被誣為「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有95人，「反革命集團」4個，被逼自殺身亡18人，下落不明1人。1969年初，在趙的參與策劃下，1949年初去過國民黨占區小羊山的人被集中到公社，舉辦第二期「對敵鬥爭學習班」，確定「審查」對象150人。學習班中刑訊逼供，共搞出「派遣特務」30人，「搶劫匪徒」30人，有「支敵行動」的45人。事後，趙在全縣「清隊」幹部會議上介紹「經驗」說：「在一點沒有掌握材料的情況下」，「挖出了一批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不久，趙因「清隊有功」，被提拔為縣「清隊」辦公室負責人，後任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

1985年2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文革中廣西「殺人魔王」

胥明德被依法處決》，報道稱：胥明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任臨桂縣某群眾組織的副總指揮，並以「群眾代表」身分任縣革委會委員。1968年6月至9月，胥明德在臨桂縣策劃、指揮和親手殺害幹部群眾77人。這個被群眾叫做「殺人魔王」的罪犯，為了逃避懲罰，於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由調回原籍四川綦江縣工作，擔任綦江縣搬運站黨支部副書記，後又擔任重慶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長。在檔案中沒有記載一點劣跡。在廣西臨桂縣的幹部群眾強烈要求下，胥明德逍遙法外十多年後終於被逮捕歸案。桂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其死刑。

三是，在這次大清查中，對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作了一定程度的善後處理，這些處理是在「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查和整黨結合進行的。

湖南零陵地區「文革」中被殺害九千多人，一些殺人事件的禍首沒有查出來或沒有受到應受的懲處，少數甚至還在臺上，因而一部分受害人的平反工作及其家屬的撫恤工作沒有真正落實，群眾意見很大，上訪不斷。在大清查中，省、地委核查組按照省委的部署開展核查，對少數犯有殺人罪行的人進行了處理，同時進一步落實了政策，一批孤老孤殘及被迫外逃的人重返家園，絕大部分得到安置，受害人的房屋財產的清退工作也基本做完。<sup>60</sup>但是，大多數的文革施害者並沒有得到與其犯罪行為相對應的法律懲罰。1985年，中共中央對道縣大屠殺作為文革遺留問題進行了調查處理。處理意見是：「據調查，全區參與策劃、部署、指揮殺人者及兇手近兩萬人，……經過認真研究，在對殺人責任人處理問題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和組織策劃指揮者從嚴，奉命執行者從寬；個人品質惡劣者從嚴，受『左』的影響者從寬；國家工作人員從嚴，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從寬』的原則。全區共追究刑事責任201人，其中判無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對挾私報復、殺人後強姦輪奸其妻女的判處死刑13人，不在此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2,6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160多人，整黨中不予登記340多人，

---

<sup>60</sup>曹志在清理「三種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6.06.07。

撤銷職務 420 多人。<sup>61</sup>

在文革後的清查中，對廣西文革中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調查處理。

中央 1968 年 7 月 3 日頒佈的《7·3 佈告》把少數派定為反革命，把當時群眾組織的一些錯誤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軍方和廣西革籌小組根據《7·3 佈告》的這一錯誤的定性，支持一派、打擊一派，號召一派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還調動軍隊和武裝民兵時行鎮壓，導致大量亂殺人後果。1983 年 5 月 13 日，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上報《關於對「7·3」佈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認為當時中央發佈《7·3 佈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是佈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至於《7·3 佈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據當時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從現有材料看，當時「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報告本身帶有片面性。所以《7·3 佈告》發表後，即為派性所利用，成為亂打亂殺人的合法依據。在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時，把一些指揮和直接亂殺人的人結合進革委會。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的嚴重性與《7·3 佈告》關係甚大。建議把《7·3 佈告》的問題按上述認識在適當範圍內講清楚。中共中央 5 月 21 日批復，原則同意廣西區黨委的意見。從此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得以進行。

全自治區通過立案審查，結合考核幹部和整黨，審查和考察了 81,114 人，內有國家幹部 36,752 名，有黨員 64,243 名。定為「三種人」的 209 名（國家幹部），嚴重違法犯罪分子 698 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 4,937 名，犯有嚴重錯誤的 9,303 名。判刑 1,808 名（內有國家幹部 698 名），其中民憤極大、罪大惡極的兇手 10 名（內有國家幹部 5 名），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7 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內有國家幹部 11 名）。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 24,912 名，給予開除公職處分的 402 名，給予開除公職留用處分的 1997 名，給予留黨察看處分的 8,039 名，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 5,872 名，給予留職處分的 645 名。同時，對全區在文革中被亂殺亂打死和被迫害死亡的人，都按有關規定，對死者進行平反，對遺屬進行慰問

---

<sup>61</sup> 《關於處理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的意見》（中共湖南省委文件〔1985〕12 號）。

和撫恤，全區共發放喪葬費、撫恤費、撫養費、生活困難補助費 5000 萬元，還安置 7, 600 多名遺屬就業。經各地委和工作組做工作，許多與殺人有牽連的人，向政府交待問題並攜帶禮品向苦主請罪。有的一進門就跪倒在地，痛哭失聲，追悔自己的罪行，答應出錢安葬死者，賠償經濟損失。在政府和鄉鄰勸說下，苦主們也原諒了殺人者，表示同居一村，冤仇宜解不宜結，要子子孫孫不再記仇，共吃「彌合飯」、「團結飯」，共飲「團結酒」<sup>6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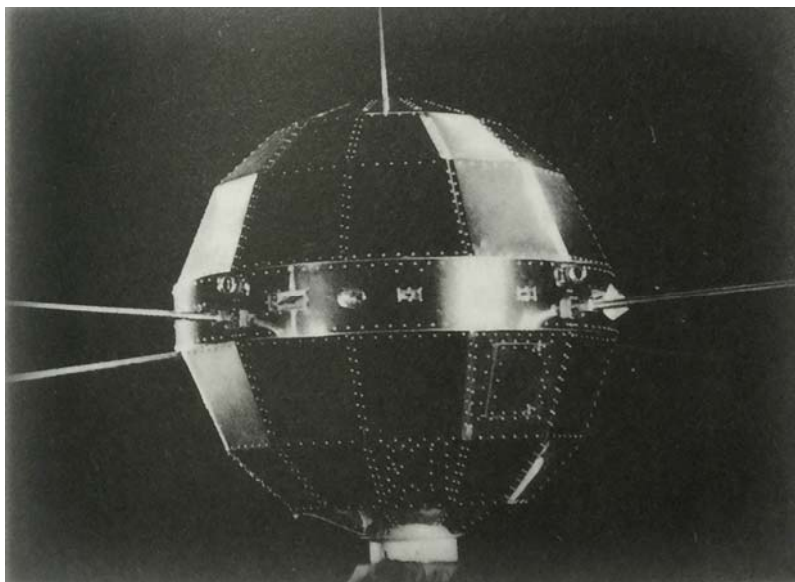
（本章中的數據除了註明以外，均來自古樵網，鐘馗專欄中《中共組織史資料》第 6 卷、第 7 卷編寫的《文革后各省、市、自治區的揭批查和撥亂反正》。）

---

<sup>62</sup>《周一峰在廣西領導文革處遺的回憶》，周一峰是赴廣西「處遺」小組負責人。

### 第三〇章

##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當時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是 1953 年至 1957 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是 1958 年至 1962 年，第三個五年計劃應當是 1963 年至 1965 年。由於大躍進，二五計劃被衝垮了，不得不調整三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延遲到 1966 年到 1970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年就是三五計劃開始的一年。「三五」、「四五」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 一、經濟建設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

「三五」計劃的重點和原來設想有比較大的轉變。大饑荒餓怕了的中國人，很自然把肚皮放在第一位。在討論「三五」計劃時陳雲提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係到五億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它方面『犧牲』一點，是完全必要的。」當陳雲講到準備採取「傷筋動骨」的辦法改變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高指標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sup>1</sup>「三五」計劃原來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用」就是陳雲說的市場問題，即市場供應緊張、民用商品短缺。根據這個指導思想，1964 年 4 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彙報提綱）〉，這個「初步設想」提出的基本任務是：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第三，加強基礎工業，使我國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

毛澤東對這個「初步設想」很不滿意，1964 年 6 月 6 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sup>2</sup>

<sup>1</sup> 《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210 頁。

<sup>2</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 1993 頁



從此，三線建設、加強戰備，就成了「三五」期間的重要任務。1964年8月2日，在北部灣，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與越南海軍發生激戰。8月4日，海戰進一步擴大。8月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到杭州，和毛澤東一起聽餘秋裏彙報「三五」計劃的設想。毛說：「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佈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的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周恩來把毛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sup>4</sup>三線不完全是防外敵，也是防內部出修正主義。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好造反。」<sup>5</sup>

在文革十年和前後一些時間中，大量資金投向了三線建設。從1965到1980年，對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2,052.68億元，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時期，這個比重為49.43%，幾乎占了全國總投資的一半。<sup>6</sup>1965到1980年國家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全國為3,409.78億元，三線形成的固定資產為1,145億元。<sup>7</sup>這就是說，國家投入占全國投資總額39.01至49.43%的資金，形成的固定資產只占全國的33.6%。

---

1199-1200。這裏說6月6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是6月8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57。所謂一、二、三線，是按中國地理區域劃分的，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西部地區的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全部或大部及湘西、鄂西為西南三線，陝、甘、寧、青四省全部或大部及豫西、晉西為西北三線。三線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為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省區的腹地為小三線。

<sup>3</sup>餘秋裏，石油工業部長、「小計委」主持人。毛嫌國家計委不順手，1965年初成立了「小計委」，負責重大戰略事項。

<sup>4</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03。

<sup>5</sup>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與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534頁。

<sup>6</sup>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年，第414頁

<sup>7</sup>同上，第413頁。

這些已形成的固定資產的效果如何？1984年1月22日到26日，國務院三線辦公室在北京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開展調查工作。會後，經過半年的調查，基本摸清了三線企業的基本情況：三線地區共有大中型企業1945個。屬於第一類，即佈局符合戰備要求、產品方向正確，有發展前途，經濟效益好的佔48%；屬於第二類，即建設基本是成功的，但由於受交通、能源、設備、管理水平的限制，生產能力沒有充份發揮，經濟效益不好的，佔45%；屬於第三類，即有的選址有問題，生產科研無法進行下去，產品方向不明，沒有發展前途的，佔7%。<sup>8</sup>顯然，這是80年代初的調查，到90年代，由於處於和平年代，這些生產武器的工廠大都處於半停產狀態，只好轉為民用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山溝裏的工廠缺乏競爭能力，上述第一類、第二類的企業的比重大大減少。

三線建設存在一些嚴重問題：第一，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建設規模過大，戰線拉得過長，「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不必要有損失。第二、三線工廠按「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佈置，許多現代化的工廠建設在偏僻的山溝和洞穴裏，給交通運輸、配套協作、生產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難。如陝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和陝南48個縣、450多個點上，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一廠數點。第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三線工廠是封閉的，不僅對周邊經濟沒有甚麼帶動作用，反而和周邊農村產生很多矛盾。

國家對三線建設的投資效果是歷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例，三線地區「三五」時期為46.7%，不到一半，比混亂的「大躍進」時期的62.2%低；「四五」時期為55.8%，也低於「大躍進」時期，比其他時期更低。<sup>9</sup>

三線工廠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員。生活艱苦，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們抱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

<sup>8</sup>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第359頁

<sup>9</sup>同上，第434-435頁。

到八、九十年代，由於三線工廠在產品結構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都不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有的被關閉、停產，有的被合併、轉產，有的遷往城市。在關、停、併、轉、遷的過程中，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職工的利益也受到損害，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資金設雖然問題很多，但也不能完全抹殺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間，在西部的荒山野嶺建立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縣鄉城鎮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綿陽市、德陽市、都勻市、凱裏市、天水市、寶雞市、漢中市、曲靖市、格爾木市等。三線建設在中國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了一批重要鐵路和公路：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權等，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西部的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為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西部開發建立了一定的基礎。

「備戰，備荒，為人民」，把「為人民」放在第三位。然而，由於資金大多用於備戰，用於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人民」這個目標就不可能真正落實。

用於戰備的資金不僅僅是三線投資。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設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向生產民用產品的工廠下達常規武器和其他軍用品的生產任務。「軍工動員」是強制性的，是不惜代價、不計成本的。「軍工動員」產品所耗費的資金，其數量是無法統計的，在財政支出中，也不納入「國防費用」這一項。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從蘇聯搬過來的建設方針。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只能靠壓縮人民的生活水平來積累。這可從積累（即非消費資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簡稱積累率）中表現出來。文革的頭三年，由於社會比較混亂，積累率有所下降。從1970年到1976年這七年，除了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使基建工程受影響以外，其餘年份都在31.4%到34.1%之間。按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31%以上的累計率就過高。不僅累計率過高，而且在基本建設投資的使用方向上，生產性建設的比例大大高於非生產性建設（住宅、醫院、學校），十年

文革期間，生產建設投資占 82.8%。老百姓糧、肉、油、布的消費提高很少，食用油還有所降低。<sup>10</sup>當時，農民一年也吃不上一兩次肉。雖然國家發了肉票，但很難買到肉。一旦肉店殺豬，頭天晚上到肉店排長隊。農民破衣爛衫，國家幹部也穿打補丁的衣服。直到 80 年代幾個大化纖廠投產以後，才基本解決了穿衣問題。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來看，文革期間的居民消費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增長緩慢。（見表 1）

表 1 文革期間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人、年）<sup>11</sup>

年份	居民消費水平（元/人、年）		
	全國居民	農民	非農業居民
1965	125	100	237
1966	132	106	244
1967	137	111	251
1968	132	106	250
1969	135	108	255
1970	140	114	261
1971	142	116	267
1972	147	116	294
1973	155	123	306
1974	156	123	314
1975	158	124	324
1976	161	125	340
1977	165	124	361

為了把更多的資金用於重工業和備戰，政府不得不壓低職工的工資水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文革前的 1964 年、1965 年還要低（表 2）。大躍進時期（「二五」）和文革時期（「三五」、「四五」），職工工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表 3）

<sup>10</sup>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載《經濟研究》，1984 年，第一期，第 29 頁。

<sup>11</sup>《中國統計年鑒 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第 454 頁。

表 2 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元/年）<sup>12</sup>

年份	各部門平均	工業
1964	661	741
1965	652	729
1966	636	689
1967	630	701
1968	621	689
1969	618	683
1970	609	661
1971	597	635
1972	622	650
1973	614	640
1974	622	648
1975	613	644
1976	605	634
1977	602	632
1978	644	683

表 3 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增長速度（%）<sup>13</sup>

	「一五」時期	「二五」時期	1963 至 1965 年	「三五」時期	「四五」時期	「五五」時期
貨幣工資	7.4	-1.5	3.3	-1.4	0.1	5.5
實際工資	5.4	-5.4	7.2	-1.2	-0.1	2.9

## 二、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認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與搞「物質刺激」有關。高舉「三

<sup>12</sup> 《中國統計年鑒 1984》，第 459 頁。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工資水平比實際情況要高。

1975 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製造廠調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級工，月薪 41.5 元。

<sup>13</sup>同上，第 460 頁，其中，「實際工資」是扣除生活費用價格上漲後的工資

面紅旗」也好，發動文革也好，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國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文革期間，經濟工作中也按這個指導方針辦事。毛澤東主張限制按勞分配，實行差別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勵為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通過革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典型引路」，是共產黨領導全局的一個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也是通過樹立、宣傳兩個典型來推動的，這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岩中發現工業性油流。時值國慶十周年，因此將這塊油田命名為「大慶」。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石油部提交的報告，同意進行大慶石油會戰。這時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1960年5月，在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余秋裏、康世恩<sup>14</sup>等人的領導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萬名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來到松遼大草原。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辦公、住宿。沒有起重設備，人拉肩扛加滾杠，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車上卸下來，拖到幾公里之外的井場上安裝起來。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1963年底拿下了一個大油田，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一期工程，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一千多萬噸。這是三年大饑荒以後石油工人送給中國人最好的禮物。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要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

大慶的主要經驗是什麼呢？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概括為以下幾條：第一，把毛澤東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慶人通過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靠「兩論起家」；第二，自始至終地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

---

<sup>14</sup> 余秋裏、康世恩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

原則；第三，認真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黑夜和白天幹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幹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幹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幹工作一個樣；第四，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幹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幹部，等等。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了大慶油田的經驗，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經濟建設中起了一些鼓勵作用。但這種「革命加拼命」的態度，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傷亡。在成昆鐵路通車的時候，同時建立了一座成昆鐵路烈士紀念碑，在鐵路上面有227個墳頭，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犧牲的烈士。在全長1,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上，這樣的墳頭有一千多處。1968年，一個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進了半個排的戰士。<sup>15</sup>大慶油田的開發是採用軍事化組織，建立各級指揮部，用行政命令指揮生產。這為「瞎指揮」留下了空間。瞎指揮，「大會戰」，節日前搞「獻禮」，硬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這些非科學、非經濟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大慶油田提倡「先生產，後生活」，職工都住在乾打壘的土房子裏，生活十分艱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了一個文件，說獎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掛帥精神，認為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澤東思想，靠政治掛帥。此後，工廠的獎金改為平均發放的「附加工資」。工廠裏不斷組織工人批判「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過份強調精神作用，一時鼓動起來的熱情不能持久；長期漠視

---

<sup>15</sup>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第437頁。

職工的經濟利益，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進行了勞動生產率調查，發現工人八小時工作一般只能幹四個小時。調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機廠和工人一起上夜班，發現八十多套設備，白天開動的只有十一到十四台，夜班2點以後開動的只有兩台。開這兩台機器的一個是班長，另一個是被監督勞動的「歷史反革命」。這個廠老工人說：「現在我廠一年生產汽油機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勁鼓起來，工藝設備進行一些改進，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產兩萬台。」不少企業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有的工廠欠工人五十多個休假日也不能兌現；相反，工人遲到幾分鐘也要記下來，累計起來扣工資。天津染料化工行業取消了夜班補助費，工人不願上夜班了，化工生產是連續的，夜班開不起來，變成間歇生產，產品質量因而受到影響。<sup>16</sup>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廠金工車間緊固件工段勞動了一個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為了檢測工人的勞動潛力，就在一台萬能銑床上加工一個零件（清華畢業的人都會開機床），且不緊不慢，工人休息時筆者也休息，一個夜班出的活兒竟超了定額（即每個班的工作量）的一倍！這樣幹了兩天，一位老工人對筆者說：「楊同志，你是飛鴿牌，我們是永久牌，你要悠著點！」原來，工人的定額（即每個班的工作量）要定期調整，如果廠裏知道了我輕鬆地超定額一倍，就要提高定額，工人就要吃虧。

至於發展農業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學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山村，是一個生產大隊。1963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沖毀，苦幹了十幾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衝垮。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大寨社員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莎蔭、範銀懷寫的通訊〈大寨之路〉，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路〉一文介紹：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人民日報》社論說：「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

---

<sup>16</sup>楊繼繩：〈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國內動態清樣》（新華社），1972年10月21日。



會主義的雄心大志，充分發揚革命精神，並且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使大地變樣，使河山易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

1964年3月27日，毛澤東南下視察。3月28日、29日在邯鄲聽取山西、河北兩省領導人的彙報。山西省第一書記陶魯筭講了大寨和陳永貴的情況，毛要陶提供資料，陶當場把〈大寨之路〉呈上。毛澤東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說：那兩位記者的文章我看了，看來農業要靠大寨。<sup>17</sup>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隨著階級鬥爭的調子提高，大寨從農業生產的典型，演變為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山西省委說大寨「從來沒有放鬆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寨，「不僅是一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sup>18</sup>。

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大會時，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提名，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提議：陳永貴在國務院協助華國鋒主抓農業工作。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陳永貴一成為全國抓農業生產的主要領導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縣」。他要讓全國都建設成大寨式的農村。「普及大寨縣」除了有具體的生產指標以外，主要是推廣大寨的抓階級鬥爭和政治工作經驗。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準備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向大隊。1975年8月14日，陳永貴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逐步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員的自留地，連農民自己搞的開荒地也一併收回。有的地方乾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養豬、養雞。

---

<sup>17</sup> 范銀懷：《從太行山到渤海灣——范銀懷通訊報告選集》，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22頁。

<sup>18</sup> 陶魯筭：〈讓大寨精神遍地開花結果——山西農村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初步總結〉，《紅旗》，1965年第11期，頁4-14。

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換地」的苦役之中，開墾荒山，圍湖造田，植被被毀，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抓革命，促生產」，除了激發革命熱情、將這種熱情用於生產建設以外，另一個重要含義就是通過「抓革命」施加政治壓力。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人們不敢懈怠，生產就「促」上去了。對生產領導部門的務實派來說，「抓革命，促生產」，還有另一種意義：他們在搞生產建設的時候，總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實際上「抓革命」是虛，「抓生產」是實。文革派批評這種做法是「以生產壓革命」。1967年初，全面奪權開始，大批幹部被打倒，許多幹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生產一度下降。也有些地方，當權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來控制權力，用以對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來在武漢對陳再道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sup>19</sup>就是指後一種情況。

### 三、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文革十年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為4.9%。<sup>20</sup>現將文革期間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列表如下（表4）。80年代初期的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認為，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文革期間的經濟數據，儘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復核算，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sup>21</sup>

表4 文革期間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率（%）（以上一年為100）<sup>22</sup>

<sup>19</sup>《陳再道在文革中的口頭檢查》，史實編：《文革中的檢討書》，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51頁。

<sup>20</sup>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時期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頁23。

<sup>21</sup>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時期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頁25。

<sup>22</sup>《中國經濟年鑒1988》，「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頁XI-13、XI-17、XI-22。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其中		国民收入
		工業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1965	119.0	126.4	108.3	117.0
1966	116.9	120.9	108.6	117.0
1967	90.1	86.2	101.6	92.8
1968	95.3	95.0	97.5	93.5
1969	125.3	134.3	101.1	119.3
1970	124.1	130.7	111.5	123.3
1971	110.4	114.9	103.1	107.0
1972	104.4	106.6	99.8	102.9
1973	103.6	109.5	108.4	106.3
1974	101.9	100.3	104.2	101.1
1975	111.3	115.1	104.6	103.3
1976	101.4	101.3	102.5	97.3
1977	110.3	86.2	101.6	107.8

數據表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但是，與其他時期相比，除了大躍進年代（「二五」）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經濟增長率是最低的。（見表 5）這說明，如果沒有文革，按照 1963 至 1965 年的趨勢發展，經濟增長會更快一些。

表 5 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sup>23</sup>

	社會總產值	工業總產值	農業總產值	國民收入	國內生產總值
「一五」時期	11.3	18.0	4.5	8.9	9.1
「二五」時期	-0.4	3.8	-4.3	-3.1	-2.2
1963-1965 年	15.5	17.9	11.1	14.7	14.9
「三五」時期	9.3	11.7	3.9	8.3	6.9
「四五」時期	7.3	9.1	4.0	5.5	5.5
「五五」時期	8.3	9.2	5.1	6.0	6.3
1953-1983 年	8.0	10.1	4.0	6.2	-
1979-1983 年	8.2	7.9	7.9	7.1	-

<sup>23</sup> 《中國經濟年鑒（1988）》，頁 X1-7。

隨著運動的進展，十年間，國民經濟時起時落，呈波浪狀態。經濟學界稱之為「三起三落」：

大饑荒以後的經濟調整，到 1965、1966 年出現了明顯的效果。全國工農業總產值，1965 年增長 20.4%，1966 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 20.3%，雖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響，1966 年全年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一年增長 20.9%，社會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 16.9%。1967、1968 年兩年「天下大亂」，生產秩序被破壞，有些地方停工停產，經濟急劇下降。以社會總產值為例，1967 年比上一年下降了 9.9%，1968 年又比上一年下降了點 4.7%。

隨著各省革委會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社會趨於穩定，1969 到 1973 年經濟發展較快。然而，社會秩序稍一穩定，主政的官員就企圖搞「躍進」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21 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成了發動經濟躍進的動員會議。會議確定 1970 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长 17%，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长 46%，大中型建設項目 1,113 個，主要產品產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標。如鋼產量指標增長幅度高達 20 至 27.5%。在中央計劃指標的鼓勵下，一些地方要求產量「翻番」，或一廠變多廠。<sup>24</sup>在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上，鞍鋼、本鋼、武鋼等鋼鐵企業都提出鋼產量要「翻番」，在電力工業會議上，提出到 1972 年實現「老廠一廠變一廠半，新廠快馬加鞭，發電能力翻一番，縣縣都有電」的口號。1970 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长 30.7%，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长 24.1%。「小躍進」帶來嚴重後果：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工廠拼設備，採掘業強化開採；建設規模過大；基礎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增長過多。1970 到 1971 年，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 306 萬人，實際增加了 983 萬人。新增職工中有 600 多萬人是從農村招來的<sup>25</sup>。經濟建設中出現了難以承受的「三個突破」：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這三項都突破了國家能夠承受的限度。從 1970 年下半年開始，就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調整力度壓不住擴張的願望，1971 年這三項繼續擴張，1972 年速度雖然降下來了，

---

<sup>24</sup>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89 年，頁 83-84。

<sup>25</sup>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383-384 頁。

但擴張趨勢未除，1973年1月的計劃會議上，還把解決「三個突破」當作一個重要問題。<sup>26</sup>

1974年，工業總產值才增長0.3%，社會總產值才增長1.9%。學界一些人認為，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結果。實際上，主要原因是與當時解決「三個突破」問題採取的緊縮措施有關。1974年的經濟指標使人們不滿意，11月6日，在長沙聽取李先念彙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sup>27</sup>

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對恢復交通運輸秩序和企業管理秩序當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放鬆了緊縮措施，對提高經濟指標起的作用更大一些。1975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1.3%，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5.1%。這個較高的指標是在上一年較低指標上實現的，實際不是很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幾位領導人逝世，對經濟有負面影響，這一年經濟增長比1974年還要低。至於這一較低增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多大關係還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由於廣大工農群眾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努力，文革十年雖然增長速度不是太高，但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文革十年農業平均發展速度為3.9%，糧食生產穩步增長，1976年達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由1965年的544斤增長到610斤。<sup>28</sup>另一個發人深思的數字是，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620斤，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點（表6）。

表6 按人口平均糧食產量<sup>29</sup>（斤/人）

年份	1956	1960	1962	1965	1967	1968	1969	1970	1972	1975	1976
糧食	620	430	481	544	579	540	530	586	558	621	615

<sup>26</sup> 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86。

<sup>27</sup>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556。

<sup>28</sup> 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頁。

<sup>29</sup> 《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67頁。

除了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以外，文革期間建成了一些技術比較先進的大型企業，如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第二汽車製造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等。除了上述的三線建設的成就以外，還建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大慶到秦皇島的輸油管道等一些基礎設施。核工業、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國防科技在這個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在重大項目的建設方面，集權制國家顯示了他的優越性，國家可以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排除各種阻礙，全力以赴地進行。在這一點上，可以超越西方國家。

在文革期間，1958年開始興起的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等）也發展較快。這些地方工業為1980年代鄉鎮工業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經濟效益低，對環境污染嚴重，到新世紀大多被清理。

#### 四 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項經濟指標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是靠多投資，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而形成的。首先，經濟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積累基金增加的國民收入，「一五」時期為32元，三年調整時期（1963-1965）為57元，十年文革時期只有19.6元。如果按「一五」時期的水平計算，十年共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元；按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30%計算，共損失財政收入1,500億元。<sup>30</sup>1976年全國國營企業虧損總額達117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這一年財政收入完成776.6億元，比上一年減少39億元。<sup>31</sup>此外，產品質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據國家有關部門對8,373種產品檢查，產品合格率平均為45%。同時，工傷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對十一個部的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共發生人身傷亡事故和設備嚴重損壞事故

---

<sup>30</sup>《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財政》（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61頁。轉引自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第20頁。

<sup>31</sup>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頁。

2,000 多起，死亡 2,400 多人。<sup>32</sup>

其次，企業管理混亂。文革中把必要的企業管理當成「修正主義的管、卡、壓」來批判，一些企業雖然訂了規章制度，但沒有貫徹執行。天津染化四廠酞青車間工藝規定溫度在攝氏 170 至 175 度的範圍內保溫 15 小時，工人為了早下班，只保溫 14 小時，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此外，崗位無定員。天津第二毛紡廠細紗機過去一人看 2 台，現在 15 台機器，每班 35 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樣的 3 噸電爐，有的用 27 人，有的用 35 人；D5G 拉絲機有的單位 2 人看 3 台，有的單位 1 人看 5 台。<sup>33</sup>

1971 年 12 月到 1972 年 2 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1972 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若干整頓企業管理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落實。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間是對知識份子歧視最嚴重的時期。1971 年 7 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制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8 月 16 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大字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中央發向全國各級黨委。。雖然這個文件是 1971 年出籠的，但這體現了毛多年來的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上到下，普遍輕視知識份子，進而輕視科學技術。

文革時期，科技人員工資普遍較低。1957 年中專畢業生當技術員的 1972 年拿 48.5 元，1957 年進廠的學徒工（小學文化或更低）1972 年是四級工，拿 57.6 元。許多 1958 年畢業的大學生，1972 年只拿 50 多元。據筆者調查，一些工程技術人員說：「當時要是不上大學，參軍或當工人就比現在強多了，讀書吃虧了！」比工人更加困難的是，科技人員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兩地，這些人沒有家庭生活；每年探親一次，火車費耗盡了一年的積累。天津市技術人員中有

---

<sup>32</sup>同上，第 388 頁。

<sup>33</sup>楊繼繩：〈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2 年 10 月 21 日。

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兩地的，有的單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一些。

文革前，天津市屬研究所 51 個，文革中關、停、並、轉，砍了一大批，1972 年只剩下 25 個，人員也減少過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員不在科技工作崗位上。據調查，1972 年初，天津有 40% 的科研人員當普通勞動力使用。在科技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從事科研工作。南開大學元素有機研究所除了「拉練」、勞動，每年只能工作八個月，在這八個月中，每個星期只有四天業務活動時間。挖地道（備戰）、搬白菜、搞衛生、寫總結，隨便什麼人，一句話都可以調走。一機部天津電力傳動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對筆者說：「我們是廉價勞動力，哪里需要人，不管我們業務多忙，誰都可以把我們吆喝去！」

科技人員受到壓制，當然不會有創新；不重視科技，技術水平必然落後。1972 年，天津市冶金工人 37,000 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 15,000 多人。天津紡織行業的機械設備 1930 年代的占 55%，天津機械行業的設備也大多處於 1930、40 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業生產群青顏料還是用小土窯煉燒，和《天工開物》上所介紹的差不多。天津城廠是中國化學家侯德榜在 1930 年代提出聯合制城法（又稱侯氏制城法）的基地，這種先進的制城工藝戰後被日本廣泛採用，而天津城廠 1972 年還用比較落後的蘇維爾法(Solvay Process)生產。<sup>34</sup>

## 五、工人、農民家徒四壁

1978 年，老記者馮森齡<sup>35</sup>到 1940 年代工作過的延安調查，看到昔日的「革命聖地」滿街都是討飯的人。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馮森齡在延安東關食堂停留半小時，討飯的就有 17 人。這些討飯的人都是來自農村。馮森齡又調查到 9 個縣市，縣縣都有討飯的。<sup>36</sup>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 28 戶人家，家家都缺糧食，80

---

<sup>34</sup>楊繼繩：〈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2 年 10 月 21 日。

<sup>35</sup>馮森齡，1940 年入黨，曾任延安《解放日報》記者，文革後任新華社陝西分社社長。

<sup>36</sup>馮森齡：〈延安有很多農民上街討飯——延安調查之一〉，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8 年 8 月 24 日



多人出去討飯。<sup>37</sup>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革命聖地延安採訪，他們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30元，他們吃的飯是像豬食一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19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唱《東方紅》的時候。<sup>38</sup>

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樹木都砍光燒盡。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村莊掩映在密密的樹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兩人合抱的參天大樹，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裏幾乎看不見樹木，成了「和尚村」。不僅人窮，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1978年，全國每個農民從生產隊裏得到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兩億農民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1980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西北地區的農民收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地區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第三，為57.2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sup>39</sup>

在城鄉差距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全民所有制各部門職工的工資，除了1971年對部分人員有所提高以外，再沒有增加。從1966到1976年，平均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sup>40</sup>

1975年，筆者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的工人70%

---

<sup>37</sup>馮森齡：〈延安很多農民去年口糧不到100公斤——延安調查之二〉，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8年8月24日。

<sup>38</sup>傅上倫等：《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7。

<sup>39</sup>陳大斌：《饑餓引發的變革》，頁17。

<sup>40</sup>〈中國當代經濟體制改革〉，轉引自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資料》下冊2，第653頁。本章表3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增長速度也顯示文革期間工資下降的情況。

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 41.5 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筆者在天津第一棉紡織廠調查所得的職工生活情況抄錄如下：

時間：1975 年

天津棉紡一廠電動車間在編人數 345 人，家庭月收入情況如下：

人均收入 10 元以下的 8 人 占總人數的 2.32%

人均收入 10-11 元的 6 人占總人數的 1.74%

人均收入 11-12 元的 7 人占總人數的 2.02%

人均收入 13-15 元的 28 人占總人數的 8.11%

人均收入 15-20 元的 65 人占總人數的 18.8%

人均收入 20-25 元的 231 人占總人數的 66.95%

其中，人均收入達 25 元的只有幾戶。

人均收入 10-13 元的生活狀況：不能保證每頓都有熟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批低價處理的白菜。國家標準供應的生活品不能買全（如雞蛋、糖），很少吃肉，多吃粗糧。布票等證券不能買全。

人均收入 15 元的生活狀況：在沒有病人或上山下鄉的子女不需要定期補助的情況下，一般都能買全國家標準定量供應的物品。有時還能吃點肉。

人均收入 20 元的狀況：一般生活沒有甚麼問題。日子過得比較寬裕。

天津棉紡一廠在當時是令人羨慕的國營大廠，電動車間技術人員的比重高於其他車間。其他不少單位職工的收入比棉紡一廠低很多。當時天津市人均收入在 12 元以下的家庭有 6-7%。這樣的家庭可以申請少量的困難補貼。

經濟停滯，就業機會少，政府只好強制 1,600 多萬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將城鎮就業矛盾向農村轉移。下鄉知識青年不能維持生活，城

鎮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給以接濟。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上海《解放日報》（1988年19月14日）公佈了一個數據：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戶。按國家所公佈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困難戶，其中人均住房面積低於4平方米的有21.6萬戶，住房不方便（大兒大女同室）的有24.3萬戶。這是改革以後七八年的情況，比改革前還是有所改善。

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婦睡在床上，已經成年的孫子上了小吊樓，年老的爺爺奶奶和已經成年的孫女兒打地鋪。這種情況到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大的改變。1972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一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8戶，危房待修的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著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筆者和同事杜潤三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筆者提供了他們新完成的一個調查：

在對天津市981個工廠的37,720人的不完全統計，對四種作業（矽、鉛、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鉛吸收343人

苯中毒39人

白血球降低86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134人

天津棉紡二廠三紡筒子車間184名職工患病的達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種以上。天津乾電池廠幹汞電

池車間的 125 名工人幾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產。天津紅衛皮鞋廠、十月皮鞋廠苯中毒十分嚴重。天津化工廠周圍 1,500 米的範圍內空氣中汞的含量超過國家標準，電解車間 85 人中有 76 人汞吸收，占總人數的 89%。

## 六 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

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一直提倡「為人民服務」，這一代領導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都勤勞節儉，為什麼搞了幾十年中國還這麼窮呢？

這個問題最早的答案是，中國領導經濟的權力太集中。毛澤東在 1956 年就覺察到了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說：「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sup>41</sup>毛澤東力圖擺脫蘇聯的影響，探索中國自己的路。其中最重的探索之一就是下放權力，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以前，有三次比較集中的舉動。

第一次是 1958 年。按照「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擴大的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管理權限。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性的」企業以外，其餘企業原則上一律下放給地方管理。從 1958 年 3 月成都會到年底，中央直屬企業下放了 87%，中央統一分配的物資比 1957 年少了 75%。同時在六個大區設立了協作區機構。

1958 年權力下放以後，地方政府有權投資建設，一時「五小」工業遍地開花。這為以後地方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地方政府官員把高指標當作政績，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因而宏觀失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59 年 6 月，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

---

<sup>41</sup>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273、275 頁。

混亂，應該強調一下統一領導，中央集權。」<sup>42</sup>中央部門開始收回企業。到 1960 年代初，又回到「一五」時期高度集中的狀況。

1964 年第二次權力下放。將十九個非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劃歸地方安排；「五小」企業的產品基本歸地方分配；適當地擴大地方的財力；適當擴大地方調劑物資的權限等等。和 1958 年相比，這次的動作比較小，地方政府還是覺得沒有發展經濟的權力。

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製造工廠，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一點實。<sup>43</sup>根據這個精神，醞釀著下放企業。由於開始了文革，因此被擱置起來。1969 年，社會稍有穩定，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1969 年 2 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討論了〈中央各部關於企業管理體制下放的初步設想〉，在條塊關係上傾向「以塊為主」，凡是適宜於地方管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級革委會對企業實行一元化領導。1970 年計劃會議上批判「條條專政」，「條條」是指中央各部委，說中央部委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次會議決定把中央部門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儘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到當年 9 月底，中央工交九個部共有企事業 3,082 個單位，已下放給地方的 2,237 個，占總數的 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有 1,412 個，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 814 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 11 個。經過這次下放，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鞍鋼、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等 2,400 多個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又進一步下放到市、縣。<sup>44</sup>

像 1958 年那次下放企業那樣，此時又出現了重複建設、盲目生產、地區分割的現象。此外，中央下放給地方的大型企業，原來面向全國的產銷關係被割斷，地方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上海以前每年從鞍鋼、武鋼等鋼鐵企業調入生鐵 200 萬噸，這些鋼鐵企業下放到地方後，上海就得不到生鐵。有的已經下放到地方的企業，中央部門

<sup>42</sup>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 802。

<sup>43</sup>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 569。

<sup>44</sup> 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頁 372。

還讓它分擔產品計劃指標，但只給任務，不給材料（材料廠已下放，中央部門無法供給），造成「只轉戶口，不轉糧食關係」的局面。<sup>45</sup>由於問題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業，很多後來又收回中央了。

在文革中，下放企業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改革」，除了下放企業以外，1971年開始實行地方包乾：一、基本建設投資大包乾；二、物資分配大包乾。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證上繳」的辦法；三、財政收支大包乾。在國家統一預算下，對地方政府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乾、保證上繳、結餘留用」的辦法。四，擴大地方權限，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sup>46</sup>顯然，文革中稱為「經濟體制改革」，只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行政性分權，對搞活企業沒有多大作用。

每次下放權力都要出現經濟混亂，為治理混亂不得不集中權力；而每次集中權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聲強烈，不得不再下放權力。「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國民經濟總是跳不出這個循環。

事實證明，「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但不是中國經濟問的根本所在。

那麼，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呢？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經濟界的共識是：根本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這裏所說的「主觀判斷」就是人們制定的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就是市場規律。

毛澤東等一代人從馬克思、列寧那裏把改造社會和管理經濟的理論接受過來：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業時還強調中央是「計劃製造工廠」，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執行這個「工廠」製造的計劃。毛的分權是行政性分權，即管理企業的權力

---

<sup>45</sup>同上，第377-78頁。

<sup>46</sup>柳隨年、吳敢群：《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頁。

只是由一級政府下放到另一級政府，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還得聽命於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澤東一再批評商品經濟，主張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孫治方也被打成「修正主義份子」被投入監獄。沒有市場競爭，價值規律不起作用，一切聽命于各級行政官員的指令。價格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西方經濟學有一句名言：要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是麻痺這個國家的價格機制。文革期間，由於過度的行政控制，價格機制被完全麻痺。1966 至 1976 年間，中國零售物價指數不僅沒有上漲，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表 7）。這是用行政手段凍結物價的結果，它對工資一直很低的職工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有很大的殺傷力。

表 7，文革期間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以 1950 年為 100）<sup>47</sup>

年份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物價指數	134.6	134.2	133.2	133.3	131.5	130.2	131.0	131.7	131.9	132.3

1971 年「林彪事件」以後，隨著國際關係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進行了大規模技術引進。1972 至 1977 年，中國先後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了 250 多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引進合同，成交額達 396 億美元。<sup>48</sup>還引進了 13 套大型化肥成套設備、43 套綜合採煤機組、3 座大型電站設備、一米七軋機整套生產設備、3 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和 4 套大型化纖設備等。在引進國外技術的過程中，受到江青等文革勢力的阻攔。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到美國康寧公司，這家公司送給考察團一個工藝蝸牛作為禮品。1974 年 2 月 10 日，江青在四機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說：美國人這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這件事被稱為「蝸牛事件」，使得引進彩管生產線推遲了幾年。1976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 134.4 億美元（其中出口

<sup>47</sup> 《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 425 頁。

<sup>48</sup> 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第 377 頁。

68.6 億美元，進口 65.8 億美元)<sup>49</sup>，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 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如此之小，可見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這些成套設備的引進，使十分匱乏的國民經濟如飲甘泉。但是，這只是設備引進，不僅排斥先進的管理制度和企業經營制度，更是排斥國際經濟遊戲規則。文革中的技術引進和 1980 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

文革結束了，留下的不僅是極端貧困，而是留下了造成極端貧困的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留下了空間。

---

<sup>49</sup>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第 641 頁。



### 第三章

## 文革期間的外交



文革中的宣傳畫

1949年以後的10年，中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蘇聯是最好的朋友，美國是主要的敵人。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發生了變化。以後幾年中蘇關係不斷惡化，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兇惡的敵人。除了「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以外，站在美國或蘇聯一邊、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就稱為「一切反動派」。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對「帝、修、反」全面出擊，外交一直處於困境。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調整了國內的文革戰略思想，也調整了對外政策，從全面出擊轉到聯美反蘇，中國與外交形勢才出現了轉機。這一外交戰略的轉變從六十年代上半期開始，到1972年完成。

何方<sup>1</sup>說：「毛澤東堅持繼續革命，國內事繼續按革命黨不按執政黨路數辦，國外事按世界革命規矩不按現代國際關係準則辦」。<sup>2</sup>毛澤東外交政策的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國的國際關係，但沒有脫離世界革命的路數。

## 一、「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

共產主義者主張世界革命。多年來，蘇聯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蘇共變成了「修正主義」以後，中國共產黨希望取代蘇共的地位。文革前，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已經形成，例如，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的「農村」，西歐、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可以借鑒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文革之初，「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中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類說法當時廣為流傳，一些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國人卻不能走出國門。當時，除了高級領導人出訪和外交工作人員以外，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沒有出國的機會；對工人、農民來說，出國這樣的好事，是連想也不敢想的。那時，街上很少有外國人。偶爾來了幾個外國人，人們感到十分新奇，對他

---

<sup>1</sup>何方，1938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50年到外交部，先後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78年後，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sup>2</sup>我請何方審讀這一章的初稿時，何方夫人宋以敏給我的回復中轉述何方的話。

們的藍眼睛、黃頭髮看個不夠。圍觀、尾隨的現象經常發生。在文革中，中國市場上沒有外國商品，圖書館裏沒有外國的期刊（某些科技期刊除外），工廠裏沒有國外的新技術……對外科技文化交流也基本停止。

既然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世界各國輸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一項重要任務。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中國國際書店向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尼、阿拉伯、緬甸、斯瓦希裏、波斯等14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80多萬冊。<sup>3</sup>這個數字還不是對外發行毛著的全部。1967年7月2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的短評。11月24日，新華社報道：文革一年多，毛主席著作外文版25種，460多萬冊，發行到14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了建國17年毛著對外發行的總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的標誌大量輸出國外。

對外大量輸出毛澤東著作，使許多國家對中國的不滿，引發了很多外交糾紛。

1967年7月7日，中國向捷克發出照會，抗議「捷修領導集團公開點名攻擊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1967年8月，錫蘭（斯里蘭卡）海關攔截一艘中國船，查出一箱被禁的毛主席像章，8月15日，中國政府為此向錫蘭提出抗議。駐×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工作人員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被人家連推帶

---

<sup>3</sup>章梅雅：《【毛主席語錄】編發全程行蹤》，《炎黃春秋》1993年第8期。

搔轟出帳門。<sup>4</sup>

自 1962 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重提階級鬥爭以來，「三自一包」<sup>5</sup>、「三和一少」<sup>6</sup>就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三自一包」是指國內，「三和一少」是指對外。批判「三和一少」發展到批判「三降一滅」<sup>7</sup>。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就成了對外政策的一條主線。批判「三和一少」，就實行「三鬥一多」：同帝國主義鬥，同修正主義鬥，同各國反動派鬥，多支持一些國家的革命運動。不停地鬥，鬥，鬥；援外支出越來越多。1972 年、1973 年、1975 年援外支出分別占國家財政支出的 6.7%、7.2%、6.3%。從 1954 年到 1970 年，給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達 90 多億人民幣，按當時阿爾巴尼亞總人口平均，每人達 4000 元。<sup>8</sup>當時中國極度貧窮，1972 年、1973 年、1975 年中國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分別為 147 元、155 元和 158 元。<sup>9</sup>1971 年，中國的援外經費超出美、蘇兩國援外經費的很多倍。<sup>10</sup>美國和越南交戰以後，1967 年 12 月 19 日，毛澤東在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電報中宣佈：「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毛澤東說到做到，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裝備海陸空三軍 200 多萬兵員的輕重武器和其它軍需品；中國還向越南提供了 450 個輕重工業工廠、醫院、研究所的成套設備，替越南修了數百公里的鐵路、數千公里的輸油管線。還提供了各種原材料、副食品等大量物資。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 2 萬多人。派出地空導彈、高炮、掃雷等部隊 30 多萬人。在援越抗美戰爭中，中國傷亡人員 5000 多人。<sup>11</sup>從 1950 年到 1978 年，中國對越南的援助

<sup>4</sup>黃華：《文革時期的荒誕外交》，共識網 2014-12-05 11:52，來源：黃華《親歷與見聞》。

<sup>5</sup>「三自一包」，即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

<sup>6</sup>「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搞和平，對修正主義搞和平，對各國反動派搞和平，對革命運動支持少。

<sup>7</sup>「三降一滅」指：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革命人民運動的烈火。

<sup>8</sup>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 年，第 312、313 頁。

<sup>9</sup>《中國統計年鑒 1984》，第 454 頁。

<sup>10</sup>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 年，第 314 頁。

<sup>11</sup>《中國國情大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第 1208 頁，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 315 頁。

總值，按當時的國際市場價格計算，達 200 億美元，絕大部分是無償援助，小部分是無息貸款。<sup>12</sup>

在濃厚的鬥爭氣氛中，人們爭先恐後地站在反對「帝、修、反」的前列。在北京街頭，大規模的反美、反蘇、反印度及印尼的遊行不斷。1967 年，我駐東德使館一輛公務車出了交通事故，造成死傷。使館沒弄清情況就向東德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外國人將有毛澤東頭像的郵票倒貼在信封上，中國外交部也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議。近萬名紅衛兵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在使館門前架起高音喇叭，24 小時高呼「打倒蘇修！」「打倒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現場指揮竟是一位 16 歲的小姑娘。<sup>13</sup>

1967 年，外交糾紛中最突出的是「三砸一燒」事件。6 月 18 日砸印度駐華大使館、7 月 3 日砸緬甸駐華大使館、8 月 6 日砸印尼駐華大使館，8 月 22 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參加這些過激行動的不只是紅衛兵，工人、幹部、外交人員也參加了。

文革期間對在北京的外國人加強了控制，不許外國人在大街上對大字報拍照，一經發現，拍照者就會被群眾包圍起來。6 月 4 日，印度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三等秘書維傑，據說是因偷攝我國禁區被拿獲。6 月 13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了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審判。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驅逐出境，立即執行；判決維傑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三天內離開中國。6 月 14 日，印方宣佈將我國駐印度使館一等秘書陳魯直驅逐出境，並宣佈我國使館三等秘書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6 月 15 日，我方就印方將「陳魯直驅逐出境、宣佈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事，提出強烈抗議。6 月 16 日，千餘印度人襲擊我國駐印大使館，並毆打我國使館人員。6 月 18 日，北京一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到印度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打碎印度使館沿街的玻璃窗。外交部參加這次行動的不僅有造反派，亞洲司的王某某（是外交部造反派對立組織的）爬上了印度駐華使館的鐵柵欄，摘取了使館門前帶有印度國徽的牌子。<sup>14</sup>

<sup>12</sup> 《中國國情大詞典》，第 295 頁，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 314 頁。

<sup>13</sup> 黃華：《文革時期的荒誕外交》共識網 2014-12-05 11:52

<sup>14</sup> 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139-142 頁。

文革之前，中國駐仰光使館和新華社分社資助當地的華語學校，在學校課程中加進了許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多了。1967年6月，中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因此，緬甸方面對像章的事特別忌諱。緬甸政府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學校方面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6月27日、28日，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打死援緬專家劉逸，打傷五人。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奈溫！」「絞死奈溫！」<sup>15</sup>的口號。一些人用磚頭砸了大使館。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中國一直支持印尼共產黨。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的政變計劃流產以後，新上臺的蘇哈托政權對內屠殺印尼共產黨、排斥印尼華僑，對外反華。文革初期，中國駐印尼使館在新聞櫥窗宣傳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不斷發生襲擊中國使館和中國駐印尼機構的事件。中國政府不斷提出強烈抗議。1967年4月4日，印尼宣佈中國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從24日到28日，北京共有60萬人到印尼駐華使館前示威遊行。遊行中砸了大使館的大門。8月5日，印尼武裝部隊糾集一千多人到我國駐印尼使館破壞、縱火焚燒我國使館館舍，並打傷我國使館四名工作人員。8月6日，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大使館，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8月6日下午，北京約萬名民眾到印尼大使館前示威。一些人強行沖進印尼駐華使館，砸壞館內設施和八輛汽車，放火燒毀辦公樓，並揪鬥了數名印尼使館人員。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起因於香港「六七事件」。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左派工人罷工罷市。內地不斷聲援香港左派

---

<sup>15</sup>奈溫是當時緬甸總統。

人士，事態不斷升級。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廖承志 5 月 20 日向周恩來提交了《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6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提出要香港左派「隨時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篇社論是經周恩來批准並經他修改後發表的。在中英對抗不斷升級的情況下，1967 年 7 月，深圳的中國軍方提議要對港英進行一次懲罰性打擊，並將方案報給了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報給了周恩來。周批准了這一方案。中方組織民兵從沙頭角打入了香港境內，港英警方用火力封鎖，中方使用了解放軍的火力。在這場武裝衝突中，中方死 2 人，港英方死了 5 人。<sup>16</sup>7 月 10 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聽取廣州軍區領導人彙報時說：「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sup>17</sup>從而對沙頭角事件進行了冷處理。8 月港英當局勒令香港三份左派報紙停刊，拘捕了一些記者和工作人員。這些行為更加激發了香港和北京的「反英抗暴」鬥爭。經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准，8 月 15 日連續 3 天 3 夜在北京英國代辦處門前舉行百萬人遊行集會。8 月 20 日，中國外交部發出 48 小時限時照會，要求港英當局撤銷對三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 50 多名記者和工作人員等，這個照會是周恩來批准的<sup>18</sup>。8 月 22 日，48 小時已過，港英當局沒有答復，憤怒的學生和工人沖進了英國駐華代辦處，一番打、砸以後，點火燒了代辦處。強迫代辦處的英國工作人員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被毒打，工作人員逃到附近的印度大使館和芬蘭大使館避難。事後周恩來說，當時太疲勞了，沒辦法好好考慮就批准了 48 小時照會。他還說，就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他已在主席面前檢討過四次。<sup>19</sup>清華大學參與「火燒代辦處」的是「四一四」派，「四一四」總部委員蔣南峰被臨時拉去作為領隊，為此被清查多年。

外交出現如此亂相與當時外交指導思想有關，也與外交部的文革運動有關。運動初期，外交部黨委打擊了一些出頭造反的人。批判資

---

<sup>16</sup>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143 頁。

<sup>17</sup>餘汝信：《香港，1967》，天地圖書出版，香港，2012 年，第 197 頁。

<sup>18</sup>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144 頁。

<sup>19</sup>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 年，第 146 頁

反路線以後，被打擊的造反派翻了身。12月21日，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聯絡站」。「聯絡站」的成立得到了周恩來的承認和支持。「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外交部黨委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領導下只負責外交業務。駐外大使應召回國參加文革運動，1967年初，各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革的人已有一兩千人。他們以使館為單位組織了戰鬥隊，把大使、參贊和他們的夫人當做當權派來揭批鬥，一些大使遭到責罵、個別被罰跪被毆打。

文革開始的一年多時間內，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係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發生了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sup>20</sup>當然，外交糾紛不完全是中方的責任，是在互動、互激的過程中逐漸升級的；但是，「三鬥一多」的外交方針是造成外交糾紛的重要原因。

## 二、逼制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

1967年是「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8月份，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的「八七講話」<sup>21</sup>的鼓動下，外交部造反派接管政治部、批鬥外長陳毅、頂撞周恩來總理、越權向駐外使館發電報，文革前就已形成的極左外交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在外交出現亂相的同時，國內也出現了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亂」。7月20日發生的武漢事變後，全國各地在「二月鎮反」中被支左部隊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借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的聲勢，紛紛向

---

<sup>20</sup>黃華：《文革時期的荒誕外交》，共識網 2014-12-05 11:52，來源：黃華《親歷與見聞》。

<sup>21</sup>8月7日晚，王力在釣魚臺他的辦公室召見姚登山和「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在他們彙報外交部運動、揭發外事系統「頭號走資派」陳毅「三反」言行、奪權、北京外國語學院激進派沖堵外交部等情況時，王力不時插話。王力支持姚登山站出來「革命」，支持「聯絡站」造反，讚賞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陳毅）派」衝擊外交部，煽動「聯絡站」徹底篡奪外交大權。他還說反對打倒陳毅的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是「保守組織」。



鎮壓過他們的軍隊發起了攻擊。

從武漢事變中脫身到上海的毛澤東，開始打算武裝造反派，用群眾武裝制衡不支持文革的軍隊。但經過再三考慮，在軍人和造反派對立中，他選擇了保軍隊、遏制造反派的政策。他的文革戰略發生了轉變：由鼓動「天下大亂」轉到逐步推進「天下大治」。周恩來利用這個機會促進、落實了毛的戰略轉變。他首先向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下手。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讓楊成武專程送來的王力「八七講話」以後，8月26日上午9時，毛召見楊成武，說王力這篇講話是「大、大、大毒草」。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26日中午，楊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的意見。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成了階下囚。<sup>22</sup>王力被抓的詳情本書第15章中已有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8月31日，周恩來召見外交部造反組織「聯絡站」核心組頭頭及部黨委成員，嚴厲批評8月份的一些重大政治錯誤。周恩來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周嚴厲批評姚登山：「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他還指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sup>23</sup>周恩來說：「我支持『聯絡站』到8月31日」。「聯絡站」失去了周恩來的支持，很快土崩瓦解。

9月1日，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了毛的文革戰略轉變，嚴厲批評了造反派的反軍行動，並說近期外事口完全脫離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軌道，說外事口裏面有壞人。

9月2日，外交部與《聯絡站》對立的群眾組織，連續開會揭發批判王力、姚登山、王中琪（《聯絡站》負責人）等人，肅清王力「八

---

<sup>22</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76》6卷，第113-114頁。

<sup>23</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76》下卷，第183-184頁。

七講話」的流毒。9月27日，王海容（文革中被群眾認為是毛在外交部的代言人）等11人貼出了題為《王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報。

毛澤東、周恩來想扭轉外交形勢，但極左的作法還在繼續。

1967年9月14日，中國向突尼斯提出強烈抗議，稱突尼斯總統「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極點」。9月26日，中國發表聲明關閉駐突大使館。10月27日，中國同印尼斷交。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印尼共產黨中央，祝賀印尼共產黨成立50周年。賀電說：「印尼革命1965年遭受的暫時挫折，證明了『和平過渡』、『議會道路』修正主義路線的徹底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地走『槍桿子面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奪取最後勝利。」由於緬甸政府繼續驅趕中國援緬專家，1967年10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聲明說奈溫政府「叛賣緬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蘇修。」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反政府的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1967年11月，贊比亞總統翁達對中國在贊比亞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滿，並表示反對把非洲國家拉進中蘇爭吵的旋渦。

24

抓了王力，批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只能讓極左外交來個急剎車。關鍵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狂熱冷卻下來，「三鬥一多」的外交方針緩和下來。多年對「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批判，外交人員如驚弓之鳥。別人對「世界革命中心」和「三鬥一多」提出不同的看法，會被加上反毛的罪名；毛澤東自己出面糾正，還會被人說成英明。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來糾正。

1967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編印的簡報刊登《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一文，安齋庫治是日本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11月27日，毛批示：「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sup>25</sup>1968

---

<sup>24</sup>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第277-278頁。

<sup>25</sup>《毛澤東年譜1949-1976》6卷，第142-143頁。

年5月1日，一個報告提到7機部的一個會議通知，說在「世界中心——北京」召開會議，毛在「世界中心——北京」下劃了兩道杠，批註：「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經毛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後，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一律不要用『世界革命中心』的這種提法，對於『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應經常警惕和批判。」<sup>26</sup>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人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開會，談到外交關係時，毛說：緩和一點好，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sup>27</sup>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以友好的姿態會見了一些國家的駐華使節，並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向世人發出了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關係的信息。

有了毛澤東明確的態度，周恩來就積極落實。1970年9月18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說，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才行，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麼包辦得了呢？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9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指出「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sup>28</sup>

此後，中國的外交形勢有所好轉。中國同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斯里蘭卡）和加納等國，有的恢復、發展了外交關係，有的進行了訪問，有的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新關係，有的致電表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願望。在此期間，在已建交國家中，除與蘇聯、印度和印尼的關係仍較為緊張外，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發展。從1968年至1971年7月，亞、非、拉美、歐洲、北美有1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sup>29</sup>

---

<sup>26</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163-164頁。

<sup>27</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卷，第237頁。

<sup>28</sup>《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395、396頁。

<sup>29</sup>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2頁。

### 三、從「兩條線」到「一條線，一大片」

中蘇關係破裂，最好的朋友成了最危險的敵人，與其他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隨之惡化。中國的主要敵人從一個變成兩個，即蘇聯和美國。中國陷入了在兩條戰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毛澤東觀察世界風雲，尋找出路。他把眼光投向了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伍修權在座。在談到國際形勢時，毛說「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sup>30</sup>毛澤東認為「兩個中間地帶」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依靠亞非拉第一中間地帶，爭取歐洲、日本等第二中間帶，把亞非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這是文革前幾年的外交戰略。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對亞非國家進行了多次訪問。對歐洲的外交也有進展，1964年1月，中國和法國建立外交關係。從1949年到1965年，有47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文革頭兩年外交上的這種進展被中斷。

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毛澤東號召全國軍民「準備打仗」。毛澤東從軍事上準備應對蘇聯的戰爭突襲，戰略上尋求組成新的反對美、蘇霸權的國際統一戰線。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由陳毅牽頭研究國際問題，為中央決策提供諮詢。從1969年6月7日到10月20日，四位元帥和熊向暉、姚廣等人，開了17次會議，得出了一些看法。7月11日，他們提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認為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美國的戰略重點在西方。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但和中國大打還有很多顧慮和困難。7月29日到9月16日，元帥們又開了10次座談會。9月17日，他們提交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

---

<sup>30</sup>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5卷，第301頁。

輕易發生；在蘇美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

毛澤東是否接受了四位元帥的意見沒有見到他的文字表示，但是他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sup>31</sup>他把眼光投向了美國。

自 1949 年以來，中美一直是敵對關係。兩國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進入六十年代中期，中美兩國都互相需要。中國需要擺脫「兩個拳頭同時出擊」的困境，美國陷在越南戰爭的泥淖之中急待脫身。1969 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謀求使美國從越南戰場脫身的辦法，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應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以便和蘇聯對話時「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改善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人比中國人更主動。

1969 年 12 月 3 日，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辦的一個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主動靠近中國使館官員，企圖搭話。使館二秘李舉卿和翻譯景志成一再回避這位敵對國家的外交官。斯托塞爾只好追上景志成，急切地向他表示，尼克松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經請示國內，11 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將斯托塞爾請到使館交談，正式獲得了尼克松的意見。當晚看到駐波蘭使館發來電文的周恩來，立即將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高興地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sup>32</sup>12 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時，請他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國接觸，可以利用官方渠道。隨後，恢復了中斷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後因 1970 年 3 月，美國支持柬埔寨軍人政變，中國推遲了中美大使級會議。5 月 20 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但是，這並沒有阻擋中美關係改善的進程。

---

<sup>31</sup>1972 年 7 月 24 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等人的談話，轉引自李丹慧：《中蘇分裂與「文革」時期中國外交》，《黨史研究資料》1997 年第 1 期。

<sup>32</sup>《毛澤東傳 1949-1976》第 1619 頁，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 298 頁。《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 338 頁：周「送上我駐波代表接見美大使報告來電三份，請閱。擬攔一下看看各方反應，再定如何回答。」毛批：「照辦。」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約見中國駐巴大使張彤，說不久前他訪問美國時，尼克松總統讓他傳給中國的一個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3月21日，張彤將這個口信報告了周恩來。<sup>33</sup>1971年春夏之交，中美兩國領導人口信頻繁，幾乎都是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sup>34</sup>

1970年10月初，美國總統尼克松對《時代》週刊說：「如果說我死前有什麼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10月下旬，尼克松面對面地同葉海亞·汗總統商量，請葉作為「中介人」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提供助力」。隨後，尼克松又讓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向中方捎「口信」，希望同中方高層接觸。<sup>35</sup>中方得到尼克松的「口信」以後，周恩來通過巴、羅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國的立場：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佔領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旅行者來也行，當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多年沒有外交關係的兩個敵對國家的最高首腦直接對話，需要尋找一個柔性機會。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文革以來中國第一次參加世界體育比賽。經過毛澤東圈定的體育代表團報告中規定：比賽期間，如果同美國官員相遇，不主動交談；如果和美國隊比賽，比賽前不交換隊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比賽期間，美國隊首席代表先後6次同中國代表隊接觸，表示了友好訪華的願望。外交部接到報告後研究時，多數人認為尚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3日，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提出了請示報告：「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以後會有機會。」周

---

<sup>33</sup>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356頁。

<sup>34</sup>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299頁。

<sup>35</sup> 《尼克松回憶錄》，中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30頁。轉引自《毛澤東傳 1949—1976》第1620頁。

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他還增加了幾句話：「可以告訴他們通訊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報告送到毛那裏，毛沒有批復。4月6日下午，由於賽事即將結束，外交部把周恩來的批示意見通知了在名古屋的中國乒乓球球隊。毛看了請示報告時沒有表態，是因為他在認真考慮。4月6日午夜前他做出了最後決定：「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球隊訪問中國。」4月10日，美國乒乓球球隊從廣東深圳進入中國。4月13日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中美乒乓球比賽。14日下午，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體育代表團。當年在延安採訪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羅得裏克也在其中。周對羅得裏克說：「現在門打開了。」<sup>36</sup>羅得裏克將這個消息傳向了全世界。

美國乒乓球球隊訪華卷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風。5月29日，周恩來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6月2日，尼克松得到口信後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他立即回復周恩來。<sup>37</sup>

在改善中美關係過程中，中國表示了堅決不當美國的保護國的意圖。1972年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黑格到達北京，他率領的是基辛格訪華的先遣組。他向周恩來轉達了尼克松的口信：「蘇聯企圖組織中國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國。」「美國認為，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生存能力』。」他還說：希望尼克松總統訪華能「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形象，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周恩來向毛彙報了黑格的意思，他們兩人一致認為，這是美國利用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來恫嚇中國，讓中國在中美談判中讓步。1月6日晚，周對黑格說：「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sup>38</sup>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國總統安全事務

---

<sup>36</sup> 錢江：《乒乓外交始末》、《釣魚臺檔案——中美間重大國事風雲》，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300-301頁。

<sup>37</sup>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59頁。

<sup>38</sup> 史雲 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1-82頁。

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就尼克松訪華安排問題進行磋商。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球。3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即將結束時，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提案，與此同時，取消了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對這一重大進展，中國沒有思想準備，也在基辛格意料之外。據美國學者說，中國能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有美國的作用。<sup>39</sup>

改善中美關係有很多障礙，臺灣問題是最大的障礙。中國一再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得干涉，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軍。美國一再強調不能放棄臺灣這個「老朋友」。尼克松訪華前基辛格和周恩來反復協商，既鬥爭，又妥協，初步解決了一系列難題。

1972年2月21日上午1時4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開始了他在中國進行一個星期的訪問。尼克松走下飛機舷梯，立刻伸出手，和前來迎接的周恩來熱烈握手。周恩來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寬闊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這一天，毛澤東不停地詢問尼克松的行止，急切地要會見他。這是他2月12日出現休克後的第9天。他雙腳浮腫，原來的鞋穿不上，工作人員特地為他做了兩雙肥大的鞋。屏風後面放了急救的醫療設備，醫務人員在後面守候。下午2時50分，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一行，就國際形勢、兩國關係、哲學和歷史問題進行了交談。隨後尼克松一行在北京參觀了文化、工業和農業項目，接著訪問了杭州和上海。一邊訪問，一邊會談。周恩來和尼克松進行了6次會談，周又和基辛格多次會談，在27日從杭州到上海的飛機上，公報終於定稿。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了「中美上海公報」。

公報先是各自聲明自己的立場。中國方面聲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

---

<sup>39</sup>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中文版，香港星克爾出版，第352頁。



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衝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

公報說：「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實行這些原則。」

對於臺灣問題，中國在公報中重申自己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公報表明了美國的態度：「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或軍事設施。」

《上海公報》發表，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在「上海公報」發表一年後，中美兩國同意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

在「上海公報」發表前後的 1971、1972 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1972 年 9 月 29 日中國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兩年之內有 33 個國家和中國建立

了外交關係，和中國的建交國從 1965 年的 47 個國家增加到 88 個國家。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國成為第 117 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sup>40</sup>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澤東同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格談話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思想。即建立一條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這「一條線」，及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係以後，中國的外交沿著毛的這個設想前進了一步。但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沒有改變，只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發生了變化。中美建交以後，毛澤東將他的「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發展為「三個世界」的思想。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周恩來、王洪文在座。毛在談話中明確地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sup>41</sup>25 日，在會見阿爾及利亞客人時，毛澤東又進一步補充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

「三個世界」的設想，沒有擺脫「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兩個中間地帶」也好，『三個世界』也好，都是為了進行「世界革命」的統一戰線。

二戰以後，直到六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毛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世界局勢的轉變，因而調整了對外策略。但是，他沒有看到時代的重大轉變。上海公報中還強調中國的立場：「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

---

<sup>40</sup>黃華《親歷與見聞》，共識網 2014-12-05 11:52。

<sup>41</sup>《毛澤東年譜 1949-1976》6 卷，第 520-521 頁。

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這說明，在時代的認識上，毛還堅持列寧提出的「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列寧在 1816 年出版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他這本書對時代的估計是「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

對時代的認識是高層次的戰略判斷，這個判斷是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基礎。如果認定世界處在「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國內就必然「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必然「三鬥一多」。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有戰略眼光的中國人，看到了時代的變化。1985 年，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訪華團時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sup>42</sup>1986 年，何方深入研究以後認為：二戰後不久，世界就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這個轉變即告完成。我們建國後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耽誤了三十年，主要原因就是對時代判斷錯誤。明明是和平發展的年代，我們卻認為是戰爭與革命的年代。產生這種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本來，《帝國主義論》的基本判斷當時就不夠準確，二戰後更是大多已經過時，但我們還是基本抱著不放。<sup>43</sup>

正是有了世界已經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這一根本性的估計，中國的內外政策才得以改弦更張：對內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放棄「三鬥一多」，實行對外開放，進而加入 WTO，融入世界主流。

---

<sup>42</sup>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4-105 頁。

<sup>43</sup>《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第 459-460 頁。



## 第三二章

# 官僚制度下的改革開放



被譽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

## 一、文革後中國的政治光譜

文革失敗，是繼大饑荒之後，再一次證明毛澤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失敗。教科書多年宣傳的神聖而美好藍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破產，「中國人期待一個巨大而翻天覆地的變革。」這種期待，不僅是在城市，不僅在發達地區，著名學者錢理群在貴州安順偏僻的山區中學裏也深深感受到了！<sup>1</sup>

然而，中國人對變革的期待，要受到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結束以後，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左右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力量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使得這股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一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毛晚年的路線在群眾中還有一定的基礎。

第二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五十年代。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五十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

第三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持這種看法的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

---

<sup>1</sup>錢理群：《我的精神歷程——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載《望盡天涯路：當代學人自述》，21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113頁。

革之初，還沒有人敢說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第四種力量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這是一種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剛結束時，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這種力量主要存在民間和部分知識分子中間。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已經轉軌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國外的主流思想持續不斷地對國內施加影響。

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和堅持毛晚年路線的人們，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力量和陳雲代表的第二種力量。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持續了中國改革 30 多年的進程，四種力量的合力決定了中國的方向。

前三種政治力量，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堅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只有第四種政治力量是希望將一黨專政改變為憲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種力量比較弱的時候，前三種力量圍繞經濟改革的目標相互鬥爭。一旦第四種政治力量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前三種政治力量會一致起來，共同打壓自由民主派。

面對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有兩種選擇：一是在各種政治力量間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駕馭各種力量；二是依附最強的政治力量，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華國鋒既沒有能力駕馭各種政治力量，也沒有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一種政治力量的代表，這是最沒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勢必下臺。

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繼毛澤東之後，作為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決這個難題沒有大的建樹。1976

年 10 月 26 日，他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揭批「四人幫」時說：「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 1977 年 3 月 14 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1977 年 2 月 7 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顯然體現了中央最高層的意圖。華國鋒還發表文章，提出「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sup>2</sup>

儘管 1978 年底華國鋒下臺時對他定的幾條「罪狀」十分牽強，儘管在他主政的兩年多時間裏，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在醞釀，但「兩個凡是」的副作用還是不能否認的。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無疑有歷史慣性的作用。對毛這種崇拜持續了多年，毛剛去世，華國鋒難以擺脫歷史慣性。在當時的中國，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細胞和血液之中，誰敢說毛主席的話不是真理？誰敢對「最高指示」有半點遲疑？

在「兩個凡是」的約束下，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些和毛澤東在世時完全一樣。

揭、批「四人幫」是以過去搞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大搞群眾運動，大打清查戰役，大搞人人過關。全國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清查。

當時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這似乎可以當作「罪狀」，但細分析一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難道官僚派沒有奪權？難道官僚派的奪權活動都是「陽謀」？問題的實質在於，「四人幫」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要揭批「四人幫」的思想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思想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

---

<sup>2</sup>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日報》1977年5月1日。



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批判這一思想路線，還要高舉這一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也就是說，把「四人幫」扣在務實派頭上的「帽子」，反過來扣在「四人幫」頭上。這真是政治和理論上的尷尬。

當時的報刊的宣傳邏輯混亂，牽強附合。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sup>3</sup>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一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修正主義上臺，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sup>4</sup>。說「『四人幫』干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製造出來。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評毛澤東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1977年12月4日被槍斃。華國鋒主政期間，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這些被殺的青年，多數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下來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再也不能有所作為；

---

<sup>3</sup> 《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2日。

<sup>4</sup> 《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3日。

「兩個凡是」像一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一步；

「兩個凡是」，像一根釘子，把鄧小平等一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死死釘在毛澤東設置的十字架上。

當時多數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能解決。

所以，鄧小平必須向「兩個凡是」挑戰。

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一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鄧小平用政治智慧規避了挑戰的風險。他用抬高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降低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說：「我們必須世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sup>5</sup>。他在「必須世代地」的漂亮包裝下，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不露聲色地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放鬆了「兩個凡是」的繩索，這為他以後改弦更張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他解釋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sup>6</sup>

然而，怎樣鑒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鑒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只能靠新的超級權威來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超級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裁決。送走了一個毛澤東，又再造一個新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就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澤東的話當做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這一點似乎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引發的。文

---

<sup>5</sup>《鄧小平致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的信》，1977 年 4 月 10 日。

<sup>6</sup>《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 年 7 月 21 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42 頁。

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是孫長江、胡福明，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裏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命題，包含著一個重要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這就要顛覆幾十年來官方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編定的歷史教科書。這就可能損害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執政者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不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是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現在終於要砸碎精神枷鎖！

## 二、一股洶湧的民主浪潮

枷鎖一旦砸碎，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猛烈衝擊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其標誌就是「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西單牆是民間的，理論務虛會是官方的。

「西單牆」，是從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一段臨街牆。高約三米左右。牆內有一座燈光球場、電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那時沒有西單文化廣場、民航大樓、圖書大廈等建築。這裏是北京的中心地帶，距天安門廣場不很遠。是向公眾發表意見的理想場所。

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文革結束後，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長安街西單地段北側那段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也有人在這裏張貼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較早是貼出的是被禁止發行的一期《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1978年9月復刊第一期登載了1976年「四五」運動中的天安門詩抄，還發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學》的評論文章（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撰，經胡耀邦審閱同意），文章批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並稱之為「現代迷信」。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大為不滿，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雜誌全部收回。人們就將這期雜誌

一頁一頁地貼在「西單牆」上，成千上萬的人便湧去觀看。後來很多人貼出小字報、大字報，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小字報、大字報越貼越多，幾百米的牆全被貼滿，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看大字報的人常常是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人流不息。這段牆就被人稱為「民主牆」。一時這裏成了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外國記者豐富的新聞來源。後來，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處也貼滿了大字報。「民主牆」的影響逐漸擴展到全國主要城市。中國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民主牆」。

「西單牆」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還有泛泛地傾訴社會冤案無處申訴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張大字報是一首長詩，題為《包青天，你在哪裏？》其悲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勢，打動了不少行人。抄錄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

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個現代化」中又加了一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即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稱為「第五個現代化」。高山（即郭成華）的《民主運動的歷史根據和理論根據》從「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對專制的仇恨」出發研究民主運動。任曉暉的《中國人權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實現思想言論自由，釋放全國思想言論犯」。

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有的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支持「四人幫」、解除鄧小平的職務。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黃翔的《火神交響詩》，提出「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亂和拆毀」。

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王府井大街有一張大字報說汪東興是「何是非」。何是非是當時轟動性的話劇《於無聲處》中的一個人物。他是一位出賣靈魂的老幹部。該話劇是首次批評文化大革命的文藝作

品。

「西單牆」繼續發展。由集會又發展為出版各種民間報紙和刊物。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牆》、《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廣州有《人民之聲》、《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覺悟》、《渤海之聲》等。這些刊物中走得最遠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曉町主持的《中國人權》。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稱，無產階級專政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一些的膏藥」。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天津「覺悟社」，等等。

「西單牆」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人民民主牆」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7時，本書作者到「西牆單」看大字報。正好又開討論會。有人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講。聽眾約有幾千人。演講者認為，光爭民主、爭自由還不夠，最根本的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聽的人越來越多。致使西單交通堵塞。有人提議把集會轉移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去。於是，數千人排著縱隊向天安門進發。一邊走一邊喊著「要民主，不要專制！」「中國人民不是阿鬥！」「讓思想衝破牢籠」等口號。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隊列還很整齊。

記者的職業習慣使我也跟著隊伍走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紀念碑下，參加討論的和圍觀的已達數萬人之眾。站在紀念碑的臺階上演講的人一個接一個。演講的內容和西單牆大字報差不多，但措辭激烈，富有煽動性。我感到這是一股民主浪潮。

與民間民主浪潮相呼應，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也發出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這就是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在真理標準討論期間，即1978年9月，《紅旗》雜誌編輯部寫了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

文章。這篇文章是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回擊。文章雖然也講實踐第一的觀點，但整篇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文章不反教條主義，而大批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說這種言論是「海外奇談」。

《紅旗》編輯部將它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去徵求意見。哲學所提出了六點不同的看法。《紅旗》編輯部將它和哲學所的意見一起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到後，提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

理論務虛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79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22 日（中間春節休息了 5 天）。這一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集，邀請中央和北京的 160 多名理論宣傳工作者參加。各省市還派出了聯絡員。與此同時，許多省市也召開了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計劃從 3 月開到 4 月。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他號召大家，「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sup>7</sup>鄧小平也指示這個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這一階段集中批判了「兩個凡是」。討論者的發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一些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在當時看來，有一些發言是驚世駭俗的。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建國快要 30 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

---

<sup>7</sup>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0頁。

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擋不住的。」這個組的組長周揚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上、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歷史學家黎澍批評毛澤東過早地放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不講條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聯繫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說：「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的結果？」「既然唯意志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還有什麼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經濟。」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sup>8</sup>：「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錯了，文風也特別壞」，他分析了「九評」對國內政策路線的惡劣影響。理論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領袖和人民》的長篇發言，直言不諱地全面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當時正在時興的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鮑彤、阮銘等人的發言，也使人振聳發聵。

理論務虛會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清算。它已經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領袖毛澤東的形象。它將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衝開了一個大缺口。

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衝擊波，「西單牆」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衝擊波，二者構成了中國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牆」的。1978年11月26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

---

<sup>8</sup>「九評」是1960年代發表的九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權威性文章，由中共中央專門組織一批人撰寫、最後經毛澤東審定後發表的。

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sup>9</sup>葉劍英 12 月 13 日的一次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

12 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作鬥爭中，鄧小平還要借助民間的力量，還要借用黨內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 三、「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現代版<sup>10</sup>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形態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極權制度的殘酷性推向了極端的程度，每一個有理智的中國人都感到中國必須改弦更張，必須重新作出選擇。這是形成中國改革共識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文革將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問題推向極端，將它的問題暴露無遺，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

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都在文革中吃夠了苦頭，所以官民都有改變現狀的共識，即改革開放的共識。但是，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在文革中吃的苦頭是不一樣的，官僚集團吃的苦頭是來自民眾的衝擊，民眾吃的苦頭是來自極權制度的殘酷。所以，民眾要求通過改革開放掙脫官僚制度的鎖鏈；官僚們要求改革開放是穩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後勝利者的官僚集團，雖然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但他們嚴防改革開放的大潮，衝垮了他們的利益保障——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制度。為了維護這個制度，也必須堅持毛澤東留下的意識形態。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的激烈的言詞，「西單牆」引發的群眾請願，

---

<sup>9</sup>《人民日報》1978 年 11 月 27 日；《鄧小平年譜》第 436-437 頁記載了這次談話，但刪除了這一句話。

<sup>10</sup>拙著《鄧小平時代》（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原稿第 8 章中有「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可惜被出版社刪除了，我在以後發表的文章和多次演講中闡述了這一看法。



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使中國共產黨內高層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事過7年以後的1987年胡耀邦下臺時，在天津當市委書記的李瑞環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我當時就向胡耀邦建議砍掉『西單牆』，他還猶豫不定。」高層一些人對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很不滿意。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sup>11</sup>鄧小平感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並且受到了來自黨內多方面的壓力。

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2月22日結束。第二階段開會前領導小組開了一個會，胡耀邦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第一階段結束後就開始起草鄧小平的報告。據起草者之一的李洪林回憶，原來計劃是華國鋒在閉幕式上講話，在會議開始時，胡耀邦、胡喬木向李洪林面授機宜，主題是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華國鋒不講了，改由鄧小平講，還成立了由胡喬木、吳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組成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主持。鄧小平對起草者說，講話中要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很嚴厲地指責社會上的「極端民主化」，也批評了理論工作的軟弱。<sup>12</sup>3月30日，鄧小平作報告，聽眾不僅僅是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幾百人，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整個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人感到，這是向全黨、全國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動員大會。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民主牆」也在以後被取締。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中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

<sup>11</sup>《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徵求意見稿，2005年，第206-207頁。

<sup>12</sup>李洪林：《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載《往事》第71期，2008年8月27日。

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sup>13</sup>

鄧小平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共產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如果國家出現亂局，就不可搞改革開放。為了穩固政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必須的，所以鄧小平用「四個必須」來表達。「兩個凡是」和「四個必須」雖然有不同之處，但都含有繼承毛澤東的體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盤繼承毛澤東這一套，就不可能改革開放了。為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重新作出解釋<sup>14</sup>，在經濟體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也走出了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

為了剎住「西單牆」引起的民主浪潮，3月29日，逮捕了《探索》主編魏京生，4月4日，又逮捕了《中國人權》主編任曉町。同時還逮捕了帶領上訪人員鬧事的傅月華<sup>15</sup>。各地也相繼逮捕了一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關於魏京生罪案，本書作者的鄰居、新華社離休老編輯穆廣仁，向我談了他經歷的一件事。當時他和曾建徽都是新華社副總編，在法

---

<sup>13</sup>《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65—173頁。

<sup>14</sup>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張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完全放棄了教科書上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幾個特徵：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

<sup>15</sup>傅月華是一位受本廠領導人迫害的女工人，它為自己的合法權利上訪，後被判刑，當時採訪這個案件的新華社記者、和本書作者住同一棟樓的楊克顯2010年對本書作者說，傅月華被判刑是一件冤案。

院審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幾天，新華社社長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的電話，讓他派人到公安部採訪，並且將公安部的談話發通稿。穆廣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兩位負責人向他們講述了魏京生的罪狀（即後來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謂「洩露軍事機密」）。稿子寫好以後，送朱穆之審定，由新華社社長穆青簽發。事後朱穆之又來電話說：請你們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讓他們務必登出。穆廣仁給《人民日報》總編室打電話，接電話是副總編李莊。李莊說：「我們不登。」穆廣仁只好打電話向朱穆之回報。朱穆之說：「再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登。」穆廣仁又打電話。李莊接電話後一句話也沒有說。第二天，《人民日報》還是沒有登。後來《人民日報》登了法院的判決結果。

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經有不同意見。他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sup>16</sup>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又發出通告。通告說：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的大字報（包括小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內大字報張貼處，並在附近登記處填報真實姓名、化名、住址和單位，禁止在「西單牆」和其它地方張貼。

當局的作法引起了群眾的議論。大家認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為什麼對寫大字報的人採取如此壓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專制制度下，一旦憲法束縛了最高執政者的手腳，他們就要修改憲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45條，取消「四大」。同年8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

<sup>16</sup>胡績偉：《胡耀邦和人民日報——為胡耀邦逝世10周年而作》未刊稿。

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就必須正面肯定毛澤東這個人的歷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乾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以後，鄧小平主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

從1979年11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10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後來又交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徵求意見。經過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前後歷時19個月。這麼多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達成妥協的過程，是取得共識的過程。人們常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因為，當代人寫歷史總是懷著當代人的訴求和期待、在當代所允許的政治條件下敘述和評論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過程。鄧小平主持作出的這個決定，它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文革勝利者——官僚集團的「當代史」。是根據1981年掌權者的政治需要和當時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這個決定當然不可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不是歷史的最終總結。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長達38000字。這個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東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

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毛澤東留下的兩大問題：經濟上極度貧困，政治上極端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制度遺產、意識形態遺產，在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經濟體制上，他推行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上，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將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把這一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堅持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發展經濟的經驗。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時，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體制，「西學為用」，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層面的經驗，強化晚清的政治體制，鞏固晚清的統治，延長日益衰敗的清朝的壽命。在鄧小平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改革開放就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毛澤東留下的道路、理論和政治制度；「西學為用」的目的就是發展經濟，並以此來鞏固和延長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歷史已經證明，張之洞這個指導思想失敗了。現代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能夠成功嗎？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擺脫多年極度貧困的應有之義。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旦作為最高的共識，它必然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取代，就出現了社會寬鬆的效果：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賤民及其家屬上億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對外開放。這就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

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然而，這場改革的主導者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他們掌握著國家全部資源，左右著改革方向，客觀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麼階層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階層間如何分配。

改革開放，使得多年被壓制的社會活力一下子迸發出來，再加上吸收西方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使經濟持續三十多年快速增長，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的趨勢。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鄉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是舉世公認的成績，這是將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造就的奇跡，這是給多年禁錮的勞動者以自由而出現的奇跡。

但是，官僚專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繁榮背後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 四、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毛澤東提出「當權派」這一概念，明確指出了官民對立。對中國來說，有著強烈的針對性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們，控制著全國的一切資源，對普通民眾進行壓迫和盤剝，不僅產生官僚特權，「國有經濟」也變成了「官有經濟」。毛澤東動員群眾揭露和批判這一問題，企圖通過群眾運動式的繼續革命來克服。然而，毛澤東不可能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主義階層的形成，是由於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造成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毛自己就是這個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這就決定了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文革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不僅要否定毛的「當權派」這一思想，更要保護和擴充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是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根本原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體系的過

程，是中國的官僚制度迅速發展和急劇膨脹的過程，從而形成了 1949 年以來最龐大、最強壯、最細密的官僚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面強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隊伍的膨脹就是一個明顯的指標。官僚隊伍的膨脹從 1970 年代重建政權機構時就開始了，到改革開放時期更加嚴重。

官員過多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又使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低下。多少年來，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簡機構，壓縮人員。但是，官員人數還是越來越多，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

#### 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就業人數<sup>17</sup>（年底數）單位：

年代	1965	1975	1979	1980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5
人數	287.0	357.6	451.0	477.1	506.7	799	872	925	971	1022	1248

這個表中的「社會團體」是民主黨派、工會、婦聯、共表團等附屬於共產黨的政治機構。文革初期，黨政機關受到衝擊，上述財政供養的非事業單位的人數降到 240 萬以下。恢復秩序以後，官員人數迅速膨脹，1975 年達 357.6 萬人。以後經過多次精簡和多次擴張。1996 年為了精簡政府機構，將一些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劃為事業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事業單位的費用不在「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中開支，公務員人數有所減少。但是，1996 年公務員還有 1096 萬人。<sup>18</sup>

在公務員數量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一次擴張比前一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一次壓縮比前一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1996 年以後的數據我沒有拿到，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的膨脹也大體可以看到官僚體制的膨脹狀況：

#### 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sup>19</sup>單位：億元

<sup>17</sup>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這裏的「社會團體」是政府的附屬，靠國家財政開支，不是 NGO。

<sup>18</sup>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摘要》。

<sup>19</sup>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摘要》，中國統計出版社。

年代	1978	1985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2000	2005	2006
數量	49.1	143.6	303.1	535.8	729.4	872.7	1040.8	1787.6	2883.5	3355.8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 年的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是 1978 年的 68.35 倍！從 2007 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的沒有「國家行政管理費用」這一項，而有「一般公共服務」，這應當是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相當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數據是：2007 年 8514.2 億元；2008 年 9795.9 億元；2009 年 9164.2 億元；2010 年 9337.2 億元，2011 年 10987.8 億元；2012 年為 12890.8 億元。<sup>20</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幹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幹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一般幹部的增長速度。例如，國務院系統 1987 年處級以上幹部占實有人數 29.2%，到 1989 年則占 33.6%<sup>21</sup>。由於領導幹部比一般幹部增長得快，有的單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區直屬機關中，副科級以上幹部占地直機關總人數的 41.9%。湖南某地區一個地區直屬單位，縣（處）級幹部占 54.2%；科級幹部占 37.5%，一般幹部占 8.3%。<sup>22</sup>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後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

在官僚隊伍膨脹的同時，警察隊伍也大大膨脹。1989 年北京政治風波時，說「警力不夠」，就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接著就加快擴充警察隊伍。1992 年擴充到 130 萬人。到新世紀，擴充到二百萬。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摘要》中，有幾個年度在「各地財政支出分項數」中公佈了「武裝警察部隊支出」，現摘其數字列表如下：

#### 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單位：萬元

年	1997	1998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數量	56, 111	104, 632	208, 522	242, 441	309, 307	410, 708	626, 459

上表中的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不包括中央一級武裝警

<sup>20</sup>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摘要》，後一年代與前一年代公佈的數字略有差別，因為後一年對前一年有所修正，凡有不一致的，本書選後一年代的數字。

<sup>21</sup>本書作者 1990 年採訪國家編制委員會得到的數字。

<sup>22</sup>本書作者 1990 年採訪國家編制委員會得到的數字。



察的支出。從上表中可看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增速度之快。在 2006 年以後，更加強調維穩，這個數據的增長會更快，但國家統計局沒有公佈。

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互動：改革開放為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扭曲了改革進程。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在器物層面上「全盤西化」，在制度層面堅守毛澤東的遺產，從而製造出了一個怪胎——權力市場經濟制度。1989 年夏，鄧小平用數十萬大軍將「反官倒」「反腐败」的示威群眾鎮壓下去以後，官僚體制更加強硬。1992 年開始宣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這個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另一種表述：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實，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結果所否定，也被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崩潰所否定。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是權力市場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行政權力主導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沒有經過大的改革的權力體系，即不受制衡的權力體系。有人將權力市場經濟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而政府的管理範圍和政府行為又不受憲法的約束。政府主導就是官僚集團主導。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官僚集團用行政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規則被官僚集團的意志嚴重扭曲。

由於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權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權力控制市場、操縱交易、權力本身也進入了市場。權力操縱資本，資本收買權力，一些基層政權被黑金政治所控制。一旦權力進入了市場交易，由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萬家企業不得不「購買」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貴的「商品」。官階越高、權力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容易發財。

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能把一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你有多少才能，而在於你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的關係。同掌權的人關

係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過程中，官員們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級關係，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夥夥，就是一張黑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利益關係網。無論是幹部任命形成的人事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黑網。這樣的「互聯網」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權力黑網是一個三維結構的網，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鉤連。觸犯任何一個結點，都會涉及到其它結點的利益。無權的百姓就被罩在這個巨大的黑網之中，正義難以伸張，冤屈不能申訴。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敗，而且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只要權力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存在，腐敗分子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而且越來越壯實。有人說這種反腐是「在茅坑裏打蒼蠅」。制度性腐敗的土壤上滋生了權貴階層。由於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為權貴階層造就了巨大的利益，還在繼續造就利益，權貴階層就力圖保持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更加堅持「中學為體」，千方百計地阻礙政治體制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用「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說法來描述這個制度。他這個說法有相當的尖銳性。但是，這一說法既誤讀了資本主義，又回避了權力的責任。所以我一直堅持用「權力市場經濟」來描述這個制度。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權力市場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失去社會公正。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幾千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城市化過程中，幾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權貴們佔有了蛋糕最大、最有營養的部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者和無權者進行交易，必定前者勝，後者敗。強權剝

奪，使公平交易、平等競爭成為奢望。這樣，財富就向有權的人和與權力有關係的人集中。權力具有強大的吸金優勢，一個一個權力中心成了一個一個填不滿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只能處於社會底層。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超級富豪的隊伍逐漸壯大。富豪中有一些是借改革開放的機遇，靠自己的拼搏發起來的。也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直接借助權力斂財起家的。靠自己拼搏發發家的人，也得向權力交付「買路錢」。

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長陳一諮曾有一段對話：

鄧問：「一諮，你說說看，改革是什麼？」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著說：「你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鄧朴方接著說：「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

陳說：「照你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一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你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陳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鄧說：「你說的不錯，但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開始能做到的。總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sup>23</sup>

「從國家那兒撈一塊」，「離權力近的人撈得多」，這正是官僚集團主導下的改革真實情況。所以，中國的大富翁多半是離權力近的

---

<sup>23</sup> 《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頁。

人。離權力遠的人不僅撈不著，還被剝奪。與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相對應的是龐大貧困群體。如果採用世界銀行用每天人均消費低於 1 美元作為國際貧困標準算，中國貧困人口超過 1.5 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sup>24</sup>

## 五、階層固化和階層衝突

我在《集體世襲與「權力場」》一文中寫道：「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於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幹子弟是集體世襲。」<sup>25</sup>我在 2010 出版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中不僅分析了改革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還著重指出了階層固化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的另一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集體世襲不只是單指高幹子弟，而是指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

高於子弟千差萬別，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們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有一種利益機制，促使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活動（這正是權力市場經濟的特徵），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訂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就會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拉上高幹子弟參加商業活動，就會財源湧進。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完全滿足了這兩個條件），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

---

<sup>24</sup>中國貧富差距的具體情況，見楊繼繩：《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年，第 59-84 頁。

<sup>25</sup>楊繼繩：《集體世襲與「權力場」》，《炎黃春秋》2008 年第 6 期。

呆在家裏，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送金錢、送官帽。高幹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幫高於子弟升官發財，自己才能升官發財。1980年代，共產黨元老陳雲曾經說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這句話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說法，其實，後來流行的「官二代」群體、「富二代」群體，就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與「官二代」、「富二代」群體相對立的是「窮二代」群體。「窮二代」群體也是集體世襲，是被迫的集體世襲。

獲得優質教育是人們向上流動的階梯。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小學到大學，優質教育資源多被權貴階層壟斷。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學越來越困難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貧困子弟，上大學期間用盡了家庭的積累，有的還得向親朋好友借債，畢業以後最緊要的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不能成為「中產階級的孵化器」，反而成為使貧困者更加貧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週末》報道，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劉偉父親是農民，舉債為她上學。他父親也知道畢業後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還是想「賭一把」。她每個月生活費只有兩百元。她本來是一個堅強的孩子，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我不應該拒絕貧困，相反，應當感謝它，它讓我由一個懦弱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裏供他上學不容易，她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上大學，家裏只好讓弟弟輟學。我欠弟弟很多，以後再償還給他。」為此，她一進入大學，就為找工作擔憂。為此，她參加了一次又一次應聘，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她在日記裏寫道「我是一個失敗的人，直到今天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這樣的錯誤。明知道家裏窮得叮嚀響，不去打工掙錢，還偏偏選擇了上大學。」她最後一篇日記只有6個字：「為什麼這麼難。」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

究生楊元元自殺身亡。楊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畢業于武漢大學商學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楊元元6歲喪父，一直和母親、弟弟相依為命。母親以特有的毅力和堅韌，含辛茹苦，供楊元元讀書。楊元元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忍辱負重，努力學習。後來，母親因工作的單位搬遷而失去了住所，楊元元就帶著母親在武漢大學求學並謀生。本科學業完成後努力工作，償還了自己在大學學習的債務和貸款。楊元元又努力學習，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再次帶著母親一起來校，想一邊讀書一邊繼續照顧母親。然而，由於貧困而無錢租房，楊向學校申請允許母親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絕，還禁止其母再進宿舍樓。被逼無奈的母親瞞著女兒坐在瑟瑟冷風的學校禮堂前過夜。在找房沒有著落時，校方相關人員不斷給元元施壓，致5天5夜沒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來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她不得不承認，今天的社會「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據多家網絡媒體報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時50分左右，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吳死前留下了一份遺書，摘要如下：

「這個世界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我在這裏再怎麼折騰也激不起半點漣漪。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冷漠的人，謝謝你們曾經看輕我，讓我最終下了這樣的決心。世俗的炎涼，塵世的醜惡，噁心的嘴臉，可惡的壓力，你們都隨風去吧。」

「我可憐的讓我萬般不舍的媽媽，最對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蒼蒼的白髮，粗糙的雙手，一年大部分的飯菜只是饅頭就鹹菜，一件藍色的夾克穿了那麼多年，每年過年都是那一件，我都心痛得要死。兒子不孝，沒能讓您的付出得到回報，這麼多年您一個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讀到北郵的博士啊……我所有對您的承諾，都沒有辦法履行了，對不起，對不起。兒子是一個沒有用的人，自從離開老家以來，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想著讓您也能來北京吃一次烤鴨，看看天安門和故宮，住上樓房，坐上

小車，不用再為了我去撿垃圾、拾破爛，不用再去給人家工地上做飯賺錢瞧人家白眼……可是，這麼多年了，我什麼都沒有給您，我甚至連您一直想要卻捨不得買的假牙伴侶都沒能給您買到，每當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頓飯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著乾澀的饅頭，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沒用了。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係和背景。現在要憑正直的才華去出人頭地，太難太難了。我也曾試著找過工作，但是沒有人用我。我對這個世界徹底地絕望了。絕望了。……永別了，媽媽！」

「知識改變命運」，這是廣大平民百姓子女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一個又一個令人痛心事件向人們宣示，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這條出路不通了。正因為如此，2009年全國有84萬考生「棄考」。

上面這三個案例說明，在今天的中國，拿到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人，也很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中上層職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躍進」，大量「擴招」，求職者的隊伍迅速膨脹。由於中上層的職位階層繼承性很強，工農子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2009年出現了「蟻族」一詞。所謂「蟻族」，就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據一份調查，僅北京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他們的特點，據說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們大多來自農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奮鬥20年，好不容易大學畢業，還是處於社會下層，成為「窮二代」。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不是世代代不變的。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動或者說階層成員的變動稱為社會階層流動。

在封閉社會，先賦性因素<sup>26</sup>是社會流動的主因；在開放社會，後致性因素<sup>27</sup>是社會流動的主因。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下等階層的人們

---

<sup>26</sup>先賦性因素是由個人出身決定的因素，即由繼承父輩的資源影響他的社會流動。

<sup>27</sup>後致性因素是由個人努力而決定的因素，即由後天獲得的資源影響他的社會流動。

有進入上層的機會，從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後致性因素造成的階層流動可以激勵人們奮發向上。只要努力學習、積極工作，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就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在先賦性流動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裏，個人努力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處於上等階層的人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計地壓制人才，使得處於下層的人們很難向上層流動。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就會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盪。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流動的主因是先賦性的，社會是封閉的。

社會不公正、階層固化使下等階層的人們感到絕望。因此，階層之間的摩擦和衝突越來越激烈。這種衝突有時表現為群體事件。所謂群眾事件，就是大規模的示威與騷亂。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群體事件逐年增多。1993 年有 8700 起，1999 年 32000 起，2000 年 5 萬起，2003 年 58000 起，2004 年驟升到 74000 起，2005 年 86000 起，2006 年達到 90000 宗。2008 年超過 10 萬起。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質的群體事件約占了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 75% 以上。學者們對各種群體事件的分析中得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第一，一件偶然發生的小事卻造成了上萬人參與的群體事件。這是因為社會上瀰漫著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一個偶然的火星就會引燃，偶然事件只不過導火線而已。第二，大量與觸發事件無關的人參與群體事件，甚至成為事件的主體力量。大量的非當事人同情受害的當事人，是因為非當事人也有不滿情緒，說明參與群體事件的人們有著共同的意識。這種共同意識就是「仇官」和「仇富」。這兩種社會心理產生的原因，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面對數量增多、規模擴大的群體事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維持社會穩定作為第一任務。「維穩」，不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而主要是對維權者實行權力強制和暴力鎮壓。政府「維穩」的支出越來越大，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維穩」費用已經超過了軍費。老百姓的維權和政府的維穩，成了一對尖銳的矛盾。從表面上或從短期看來，政府的維穩力量超過了民眾維權的力量，因為民眾手無寸鐵；從深層或從長遠看，民眾維權的力量遠遠大於政府維穩的力量。這是因為，民眾對政府官員來說是絕對多數，而且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具



有天然的正義性。「維穩」的高壓會使維權的力量不斷聚集。一旦維權的力量超過了臨界點，就會出現空前的社會大爆炸。

## 六、制衡權力駕馭資本<sup>28</sup>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新世紀的中國兩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制衡的權力，從而出現「仇官」；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駕馭的資本，從而出現「仇富」。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公正，所以，權力市場經濟社會不可能和諧。

怎麼才能公正？這就要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一套新的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的目標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權力和資本是兩種社會能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兩種社會能量。

權力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它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成為肆虐的暴君。國家權力如此強大，它可以取得社會上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無法取得的成績，也可以製造任何個人、任何集團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惡。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國家、馬克思說「國家是禍害」就是對國家可能犯下罪惡的恐懼。權力必須放在籠子裏，放在憲法的籠子裏，放在法律的籠子裏，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裏活動。

資本也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其貪婪

---

<sup>28</sup>楊繼繩：《制衡權力駕馭資本》，載《中國改革》2009年第一期，2008年《炎黃春秋》第一期楊繼繩寫的題為《新的一年，新的期待》的新年獻詞中，就重點闡述了「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的思想。

性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馬克思說「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一面。黑磚窯事件<sup>29</sup>、毒奶事件<sup>30</sup>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

權力和資本這兩大社會能量相比，國家的行政權力的力量超過了資本的力量。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對資本起著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這兩件大事，制衡權力要放在優先地位。

權力制衡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這就是說，「同體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異體制衡」才有效。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和其它種種防止腐敗的政府機構，都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都是這個權力體系的內力。靠這些機構的內力不可能從根本上制止權力腐敗。不能獨立審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體是權力的恭順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合為一體，就不可能有權力制衡。一黨專政，沒有政黨競爭，也不可能實現對權力的制衡。人類近兩百年的經驗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有效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這就要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的改革指導思想，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對官僚制度進行根本性改變。當然，這需要時間，不可能

---

<sup>29</sup>2007年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獲一起黑磚場虐工案，解救出31名農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後，數百失蹤兒童的父母在網上聯名發帖尋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動，胡錦濤等作出批示。逃逸工頭衝庭漠落網。山西省長于幼軍道歉。此事件被媒體稱為「黑磚窯事件」。

<sup>30</sup>2008年，很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在其奶粉中被發現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據公佈數字，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嬰幼兒奶粉而接受門診治療諮詢且已康復的嬰幼兒累計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癒出院1,579人，死亡4人。

在期內發生突變。突變是危險的，和平演進比較妥善。

# 文革大事記

## 一，文革前的醞釀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權制度與相應的意識形態開始形成。毛澤東「國王」兼「教皇」地位逐漸確立。

1958-1962年 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會，就大饑荒教訓問題中共高層出現分歧

1962年9月24日-2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此前的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毛對劉少奇等收拾大饑荒局面的作法提出批評。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

1960年4月，中蘇論戰開始，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共發表了9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九評」把反修推向了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也是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

1963年春至1966年夏，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提出「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劉就社教的方針發生爭執。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 二，文革的準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一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

1966年2月4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等人談話，批評「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

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5月10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 三，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一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

的中共領導人，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 1957 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 1957 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 四，文化革命進入高潮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毛批評了派工作組的作法，25 日，毛決定撤銷工作組。

1966 年 7 月 29 日晚 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一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讚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 7 次接見了一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衝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一兩年間，是製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 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 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製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 年 8 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鋤刀鋤、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一條腿，用雙手抓住另一條腿，使勁往上一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 年 8、9 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權，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一小撮」。有些地方黨委

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衝擊,其中一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一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從此軍隊深度介入文革,並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導權。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製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佈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

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衝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一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一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沉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岩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製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佈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7·3佈告」對制止武鬥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佈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一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一個成立，實現了「全



國山河一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 五、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埃德加·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雖然沒有點名，但中國人都知道是批評林彪。這次談話《紀要》印發到基層黨支部，傳達到每一黨員。

1970年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改組了北京軍區。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毛用「挖牆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一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 六、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採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佈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佈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佔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一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一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一

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 七，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一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一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牆」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一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上作報告，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納入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路線。經過三十年改革，國民經濟空前發展，但政治還保持專制，從而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體制。









「文革」十年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規模最大的暴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將全國十億多的民眾捲入其中，是一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持續最久的天地翻覆的「革命」，這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神州大地，幾乎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隨着「四人幫」的覆滅，「文革」正式落幕。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場持續了十年，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徹底予以否定，並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時隔五十年，《人民日報》於2016年5月17日發表的文章重申了官方對十年文革的否定之定性。

著名作家王蒙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天機》的書中說過：「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也就是說，「以史為鑑」是為了中華民族更好地前進。

三十多年來，「文革史」題材寫作一直是數以億計中國親歷者關注的讀物，但對「文革」的褒貶之議不斷。這個話題也成為海內外「當代中國史」的一門持續重要課題，本書就是中國學者的一個新的嘗試。

從2007年起，本書作者楊繼繩窮近十年之功，撰著了這部長達九十萬字的力作，不僅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追溯起源，且「清明上河圖」式地展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本着「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寫史原則，力圖用客觀、公允、中立的理性角度來還原歷史本來的面目。而且，希冀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價值的觀點來研究與反思文革。本書分為上、下二部，上篇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到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謎」；下篇從「清理階級隊伍」至「文革落幕」。全書合共32章，既有史實的細節考證，又有新穎、獨特的史論，成一家之言。尤其是長文「導論」就文革對中國社會五十年之變局及現狀的探索，值得當代讀者掩卷長思。

ISBN : 978-988-8257-54-6



9 789888 257546

(上、下二冊)

**H.K.\$ 32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